

## 译者的话

本书编者罗伯特·唐纳森 (Robert Donaldson), 是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文学科学院副院长、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罗伯特·唐纳森博士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顾问, 1978至1979年, 在战略研究所当客座教授, 撰写过大量论述苏美两国外交政策的论文, 并在1974年发表了专著: 《苏联对印度的政策: 意识形态与战略》。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 是由罗伯特·唐纳森博士最近主编的一本研究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学术论文集, 共21篇。这些论文是参加1979年9月美国战略研究所主办的一次重要学术讨论会的一些美国学者名流和政界人士的调研成果。书中着重探讨了当前苏联在亚、非、拉美的战略目标, 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 苏联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变化, 它有哪些成功与失败, 对外政策的侧重点是什么, 美国应采取什么对策, 以及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对未来国际体系, 特别是对美国外交和防御政策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对苏联在这些地区的政策也进行了预测。因此, 此书对深入研究苏联的对外政策, 进一步分析亚、非、拉三大洲未来形势的发展, 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认为, 苏联不够重视拉丁美洲。尽管苏联对厄瓜多尔、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的石油, 巴西的

煤，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铁，巴西和墨西哥的铀很感兴趣，但是，这个地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对它来说没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作者指出，苏联在拉丁美洲追求的目标包括：第一，加剧拉丁美洲与美国的矛盾；第二，取代美国的地位，攫取原料和市场；第三，支持拉丁美洲的共产党；第四，与古巴这个西半球的“前哨阵地”和“共产主义的橱窗”保持特殊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在美国的“战略后方”与美国争霸。作者认为，苏联在过去20年里用在古巴身上的钱“没有白花”，因此在古巴获得了“成功”。不过，总的来说，苏联在整个拉丁美洲的卷入还是比较“保守”和“谨慎的”。

但是，苏联对非洲的政策则大不相同。特别是从葡萄牙殖民主义崩溃以来，苏联在非洲大陆的活动相当“积极”。作者指出，苏联在非洲追求的目标主要有：第一，削弱西方和中国在非洲的影响；第二，破坏南部非洲的少数白人统治政权；第三，取得对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组织的支配作用；第四，加强与非洲各国特别是与前线国家的关系；第五，阻挠美国在安哥拉取得进出港口、飞越领空和着陆的特权，而使自己获得这些特权；第六，抵消美国、南非、扎伊尔和赞比亚在南部非洲的影响、抵消这些亲西方的非洲政权对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第七，阻挠西方得到南非的矿产资源；第八，谋求港口设施，威胁美国和西方的石油运输线。作者认为，苏联在非洲获得了“明显的收益”。例如在非洲之角，苏联的地位比过去巩固得多。再如在安哥拉，苏联的政策也是“成功”的，尽管不能说是“全面”的成功。此外，苏联与前线国家的政策也是“友好和睦”的。但是，作者认

为，苏联在非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使如此，迄今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允许”苏联把它们的领土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也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从属”于苏联。它们接受苏联的援助是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的，正象苏联对非洲的政策是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的一样。凡是愿意与苏联合作的组织，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苏联都进行拉拢和支持，并将其册封为“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作者认为，苏联最近几年在中东实行的是“进攻性”的政策，即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削弱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势力。作者指出，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它的“成功”之举，不过它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代价会愈来愈大”，由于苏联支持不得人心的阿富汗政府，致使东西方缓和遭到破坏。

作者指出，苏联在亚洲追求的目标是：第一，与亚洲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第二，争取印度和东盟国家支持苏联的反华政策；第三，遏制中国；第四，削弱中国、日本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第五，将越南纳入苏联的经济和战略轨道。作者认为，除了在越南之外，苏联在亚洲的其他国家的进展并不大。例如，虽然苏联与东盟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政策的“成功”。再如，虽然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军援和经援，但印度却拒绝了苏联支持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和防止核扩散条约。

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和达到自己的目标，苏联的手段是多方面的，有经援、军援、贸易、外交关系、宣传、文化交流及武力，等等。作者指出，经援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苏联

在使用经援这种手段方面是有很大变化的。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帮助发展中国家修建“大型的”和“炫耀性”的项目，有些项目“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意义”。在过去20年里，苏联把大部分经援给了所谓“进步的”和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和符合苏联战略利益的国家。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强调经援必须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主张援建项目要“在经济上对苏联和受援国都有较大的好处”，强调“相互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从长远观点来看，经援必须“符合苏联的利益”。除此之外，苏联还支持“进步”或反西方的政权，减轻受援国对美国的依赖，并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施加影响。作者指出，军援是苏联扩大自己影响的另一种最重要的手段。这种手段“最有效、最灵活、最有持久性”。今天，一些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军队现在使用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苏联。根据作者估计，今后，苏联将继续把军援和出售武器作为它保持和扩大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的最重要手段。

最后，作者认为，由于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事务都是“相互依赖”的，所以，必须结合“具体情况”来估价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否则就会“夸大苏联的实力”。作者最后指出，苏联和美国的能力都有“严重的局限性”，“军事手段没有经济手段的效果大”，“从长远观点来看，美国比苏联更有能力影响第三世界的事态发展”。

罗伯特·唐纳森指出，“事实证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莫斯科的许多最大的‘胜利’系来自它无力控制的事件”。“因此，美国决策者不应当过高估计苏

联在第三世界的号召力或它在那里的成功前景”。“美国应当更审慎地注意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化”。

本书的作者虽然大多是长期研究苏联问题或其他国际问题的专家，有较深的学术造诣，但他们毕竟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者，看问题难免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和倾向性。我们相信读者会有所觉察并能正确对待。

本书翻译出版时只选译了其中的13篇论文，并作了一些删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如有错误和不当之处，请读者不吝指正。

1984年9月于北京

000001

## 内 容 提 要

这本论文集由美国一些著名学者、苏联问题和国际问题专家权威撰写，详尽介绍和探讨以下重大问题：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苏联在第三世界搞了些什么活动，有何得失，它在亚非拉的战略目标和对外政策的侧重点是什么，采取了哪些重要手段，它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对未来国际体系，特别是对美国的外交和防御政策有何影响，等等。此书对深入研究苏联的对外政策，了解苏美在第三世界的争夺，进一步分析亚非拉三大洲未来形势的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 目 录

- 第一章 苏联在拉丁美洲：成功或失败？  
.....雷蒙德·邓肯(1)
- 第二章 苏联与古巴的关系：共生或寄生？  
.....加布里埃尔·马塞拉、丹尼尔·帕普(34)
- 第三章 苏联与南部非洲  
.....丹尼尔·帕普(56)
- 第四章 苏联与安哥拉  
.....阿瑟·克林霍弗(91)
- 第五章 苏联对非洲之角的政策：干涉的决定  
.....理查德·雷姆内克(131)
- 第六章 苏联对伊拉克的政策(1968—1979)  
.....罗伯特·弗里德曼(159)
- 第七章 苏联对伊朗政策的演变  
.....罗伯特·艾拉尼(188)
- 第八章 苏联在阿富汗的收益和代价  
.....希林·塔赫—凯莉(208)
- 第九章 苏印之间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关系  
.....拉詹·梅农(225)
- 第十章 苏联与东盟  
.....托马斯·威尔伯恩(244)

第十一章	苏联对第三世界的经援与贸易	
	.....	罗杰·卡尼特(268)
第十二章	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武器援助	
	.....	罗杰·帕亚克(295)
第十三章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成败	
	.....	约瑟夫·诺吉(319)



## 第一章

### 苏联在拉丁美洲：成功或失败？

雷蒙德·邓肯\*

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政策，至少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很容易使人误解为是容易分析的。莫斯科的势力似乎日益在向以前的北美洲势力范围扩张，或者威胁要这样做。由于古巴在1961年倒向马列主义而开始的这种明显的转变，在70年代初期已变得不如以前显著，但从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莫斯科与加勒比海地区和墨西哥的关系，这种转变的形势再度获得发展。到了1979年夏季和秋季，由于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亲古革命者在尼加拉瓜战胜了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由于苏联派驻古巴的3,000名作战部队所引起的一场争吵，还由于菲

---

\* 作者雷蒙德·邓肯博士 (Dr. Raymond Duncan)，著名政治学和国际问题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全球研究计划室主任。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在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获得国际问题、法律和外交硕士学位，并在该学院获得国际问题博士学位。邓肯博士的专著有：《拉丁美洲的政治：一种发展方法》（1976年版）。他编辑的书有：《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1970年版）和《苏联在第三世界》（1980年版）。他还与别人合编过《拉丁美洲的改革要求》一书（1970年版）。——译者

德尔·卡斯特罗悍然企图促使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公开支持莫斯科，许多有影响的观察家（最明显是美国国会的观察家）都认为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存在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sup>①</sup>

1979年，美国觉察到，苏联正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逐步增加势力，这转而促使美国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它促使华盛顿要求苏联改变它的“战斗部队”把哈瓦那作为基地的现状，并塑造了美国总统未能准确地掌握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外交政策的形象。<sup>②</sup>与此同时，苏联的威胁力量的形象对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总的来说，它使人对缓和和对俄国人产生了日益否定的情绪，并加强了扩大军费的势头。<sup>③</sup>这些事件的结果表明（请看一下美国的新闻报道、国会的各种议论、国会行政部门的关系和1979年夏季和秋季围绕苏联及古巴的政策公众舆论），判断克里姆林宫在拉丁美洲显然正在增长的势力是多么容易！

---

① 见《纽约时报》登载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向卡特总统的呼吁书，该呼吁书敦促他不许在尼加拉瓜出现“另一个古巴”。由125人签名的这份呼吁书附有一幅漫画，画面上有一只苏联人的胳膊（手举斧头和镰刀）伸过古巴岛，将大镰刀刺入了尼加拉瓜。《纽约时报》，1979年6月18日。苏军的宣言是1979年8月30日发表的，该宣言的发表，与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六届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的开幕日在同一天。见8月30日以后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② 《纽约时报》，1979年9月6日。莫斯科明确地宣称，苏联军事人员在古巴的目的，严格来说是为了帮助古巴进行训练。见《真理报》，1979年9月11日。关于（美国）政府对苏军采取过多行动的政治效果，见《纽约时报》，1969年9月16日，第四部分，第2页。

③ 1979年8月30日—9月20日的美国新闻报道，对这些趋势作了详细论述。参议院批准增加国防经费32亿美元。1979年9月18日，纽约，《民主人士轶事》杂志，1979年9月19日。

众所周知，苏联势力在拉丁美洲扩张的意图是尽人皆知的。在苏联领导下，古巴所扮演的“代理人”或“代表”的角色，乃是这个问题的核心。<sup>①</sup> 1975年以来，苏联便和古巴在非洲进行军事合作。从这种背景来看，古巴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任何主动行动或对尼加拉瓜和中美洲革命领导人的支持，都自然地使人们得出结论：古巴是受苏联操纵的。国会对于1979年尼加拉瓜内战的反应就说明了这种逻辑。<sup>②</sup> 苏联的影响更明显地表现在：从60年代初期以来扩大了与拉丁美洲的外交和经济关系；1977年向秘鲁出售了 SU-22 战斗轰炸机；70年代后期加勒比海地区和墨西哥与经互会建立了关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莫斯科密切地注视着华盛顿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战略后方”。<sup>③</sup> 与此同时，苏联继续通过多种渠道与拉丁美洲共产党发展关系。<sup>④</sup> 显然，这个记录明白无误地表明：苏联正在拉丁美洲内部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事务中扩大其势力。

面对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的情况和趋势，在苏联最近关于该地区的辩论中，一些人争辩说，该地区的特征是：“争取民主和社会正义的反帝斗争正在高涨”，“拉丁美洲

---

① 关于古巴是苏联人用以策划霸权的“代理人”势力的争论，见国际战略研究所：《1978年战略评述》，伦敦，第13—14页。到1978年中期，古巴在埃塞俄比亚有17,000部队，在安哥拉有20,000部队，在非洲其他地方有3,000部队。

② 见第二页注释①中提到的呼吁书。

③ 瓦西里耶夫：“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新姿态”，《国际事务》杂志（莫斯科），第6期，1971年6月，第43页。

④ 关于最近对拉丁美洲的共产党的讨论，见《1978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理查德·斯塔尔主编，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页；第331—438页。

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目前确已达到高潮”。<sup>①</sup>在这场辩论中，人们特别关注加勒比海地区，因为它靠近革命的古巴，而古巴“已使这个地区发生了显著的进步，并把人民的反帝斗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sup>②</sup>对此种“进步”的解释正与苏联分析家们的信念不谋而合，这些分析家经常而广泛地谈到的信念是，现在的世界“力量对比”对社会主义有利，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已经进入了“持久性的极度困难时期”。<sup>③</sup>

在这种论据的基础上，许多苏联作者自然坚持鼓励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及其地区性组织，诸如“拉丁美洲经济体系”（该体系包括古巴）等，以便削弱华盛顿的势力。在拉丁美洲，人们还可以看到其他趋势，而这些趋势看来似乎是支持这种解释的，即最近那里发生的事件，有利于加强莫斯科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地位。恰如其分的例证是：拉丁美洲人要求更多地控制自己的自然资源和领土，没收外国多国企业和发展民族解放运动，例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运动”或波多黎各的“争取波多黎各独立运动”。从苏联的这种具体观点来看，只要各种事件削弱美国的势力，并且促进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相互之间的积极关系，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就会日益增强。

从这种关于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势力正在日益增强的设

---

① 克洛奇科夫斯基：“拉丁美洲的经济解放斗争”，《国际事务》杂志，1979年4月号，第39—47页。

② 亚库波夫：“在新姿态的背后”，《真理报》，1978年3月2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国际事务》，1978年3月7日。

③ 《真理报》，1978年1月6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1月11日。

想，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例如，人们可以下结论说，在地区性的革命事件或左派策动的平民造反事件背后，特别是在靠近莫斯科的代理人古巴活动的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地区发生的这类事件背后，隐藏着“苏联的威胁”。这种结论自然会导致要求做出军事反应，例如，1965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这种情况，1979年在尼加拉瓜有人主张这样做。<sup>①</sup>这种主张做出军事反应的论断，是根据这样的设想：古巴在非洲受苏联支持的行动，很可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重演，因此，该地区所发生的大量事件，将损害美国的利益，或者起码可以说，苏联和古巴的军事势力有能力打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一种可能性是，古巴在苏联支持下进行军事入侵，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前景：马列主义将通过该地区的共产党进行传播，而这些共产党通过苏联和古巴与它们的持续不断的联系，将会加强自己的力量。拉丁美洲共产党的代表团川流不息地前往莫斯科，1975年和1977年，在哈瓦那召开了拉丁美洲共产党的重要会议。此外，这类分析还强调，尽管在1973年之后拉美大陆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智利受到挫折，但是，墨西哥共产党从1973年的5,000人增加到1977年的60,000人。1978年，墨西哥共产党完全合法了，并且有力量参加大选。<sup>②</sup>

---

<sup>①</sup> 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呼吁紧急组成一支美洲和平部队，以便1979年6月21日在拉丁美洲恢复秩序和民主。《纽约时报》，1979年6月22日。见第二页注释①中提到的呼吁书。

<sup>②</sup> 墨西哥共产党在1979年7月的议会选举中首次露面，并在墨西哥市的低收入地区获得10—15%的选票。在首都以外的各选区中，该党只获得1—2%的选票。

从1972年到1977年，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秘鲁和委内瑞拉的共产党员也有增加。①人们可以争辩说，在加勒比海地区，苏联和古巴的全部影响尚未被人们觉察到，但是，1977年从古巴回国的一个牙买加青年建筑队决心沿着马列主义路线建立一个组织，这是一个不祥之兆。②

从预测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人们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拉丁美洲的基本问题严格来说是经济问题，即拉美需要更多的美国经济援助。许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经济衰退是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这种经济衰退和70年代初期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冲突所造成的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的严重恶化是孪生兄弟。有几件事是后一种情况的反映：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日益明显地同第三世界争取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运动打成一片；自1973年以来，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通过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增加石油生产，自1975年以来，它们参加了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活动。莫斯科把这些事件看作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衰退的证据，这些事件促使拉丁美洲国家集中力量搞经济发展，而对华盛顿在这个地区的传统做法（即在没有发生严重危机时，华盛顿总把这个地区放在全球事务的次要地位来考虑）表示不满。③

---

① 见《1978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第23页。

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7年11月30日，牙买加《每日新闻》。

③ 关于苏联对这些趋势的认识，见克洛奇科夫斯基：“拉丁美洲的经济解放斗争”，《国际事务》杂志，1979年4月，第43—44页。关于莫斯科在美国“帝国主义”面前特别重视加勒比海地区的团结，见《真理报》，1978年8月2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8月7日。

假如我们在探讨美国的恰如其分的政策反应时，打算把幻想与现实区分开来的话，这类结论更值得加以密切注意，因为这类结论的依据是，苏联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政策真的象起初那样有影响吗？苏联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都是绝对“成功”的吗？当我们识别苏联最近同拉美国家的关系的明显特点时，我们将在这篇论文中探讨这些问题。同时，我们将联想到这些关系的若干不那么明显的基本方面。本文分为三个部分：苏联的目标、苏联的政策手段和对美国的影响。

## 一、苏联的目标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莫斯科在拉丁美洲的目标，是苏联最近越来越重视第三世界事务的结果。<sup>①</sup>特别是自从1975年安哥拉为苏联更多地介入非洲事务开辟道路以来，第三世界已成为苏联主动实行其政策的一个主要舞台。<sup>②</sup>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苏联周围的国家）对于苏联的安全是不可缺少的。其他一些国家（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越南）则向莫斯科提供机会，使它能够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为借口，去扮演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超级大国的角色。总之，在苏联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中，第三世界具有巨大意

---

① 见《1978年战略评述》，第13—14页。

② 见两篇关于苏联最近重视第三世界的论文：唐纳德·札格里亚：“进入突破口：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新联盟”，《外交季刊》，第57卷，第4期，1979年春季号，第733—754页；罗伯特·莱格福尔德：“超级对手：在第三世界的竞争”，《外交季刊》，同上，第755—778页。

义，因为正如苏联学者们所理解的那样，“这些国家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正在不断增长”，而且，“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共同的反帝意志，是苏联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柱石”。①

那么，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呢？这下子我们可遇到了难题。这是因为苏联分析家们现在似乎正在对拉丁美洲的情况和趋势进行一场重要的辩论。如上所述，一种学派认为，“进步势力”正在上升。相反，另一种学派则把这个地区描绘成在本质上是一个“依附性的资本主义”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外国控制的增长和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②对于苏联能否跟上民族经济主义的潮流，并用各种方式帮助削弱里奥·格兰德河以南的美国经济势力，第一种学派的观点是乐观的。对于莫斯科在拉丁美洲按社会主义路线影响经济发展的能力，对于在该地区在近期内获得经济独立的可能性，第二种学派的观点是悲观的。

如果在苏联近来与拉丁美洲的外交、经济、技术和贸易关系的背景下，来衡量这两个论断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到一幅传统的强权政治的图案。在这幅图案里，苏联人预想自己能在拉丁美洲获得有限的机会，来削弱美国和西方的影响，但仍然应当比拉丁美洲更优先考虑非洲和亚洲的问题。按照苏联的观点，用扩大国营经济成份的方法，来迅速实现

---

① 布鲁坦茨：“苏联与新独立的国家”，《国际事务》杂志，1979年4月号，第3—4页。

② 见维克托·沃尔斯基：“相对成熟，绝对依赖”，《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杂志，1979年6月号，第40—45页。



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并不大。按照这种估计，目前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于当初古巴革命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极端乐观主义的那些日子。

如果考察一下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著作就可以看出，苏联很有机会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领域是争夺拉美原料的竞争场所。<sup>①</sup>该地区一些外国公司被实行国有化（例如凯泽·雷诺德公司和阿尔瓜铝矿被牙买加实行国有化）和旨在建立地区性原料组织的任何行动（例如，包括圭亚那、牙买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铝土协会的成立），看起来都使莫斯科的分析家们受到鼓舞。虽然拉丁美洲国家对战略原料的控制，绝不意味着苏联可以唆使这些国家拒绝向美国提供这些原料，但与此同时，它确实为苏联获得更多的原料打开了大门。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里，在全球原料供应不断减少和世界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原料贸易方向的任何变化，都会帮助苏联人在围绕强权政治和大国地位的角逐中获胜。<sup>②</sup>这

---

<sup>①</sup> 见克洛奇科夫斯基前引文，第39—47页。瓦西里耶夫前引文，第43页；G·金：“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与世界政治”，《国际事务》杂志，1979年2月号，第84—89页；《真理报》，1978年3月2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3月7日（加勒比海地区被描写成是发生了“十分进步变化”的特别地区）；《真理报》，1978年4月5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4月12日（拉丁美洲目前的时代性质，被描写成是在“古巴革命胜利”指引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sup>②</sup> 关于战后苏联对超级大国地位的一般追求，见罗伯特·莱格福德：“苏联势力的性质”，《外交季刊》，第56卷，第1期，1977年10月，第49—71页。见詹姆斯·赖斯顿对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采访，“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世界”，《纽约时报杂志》，1978年12月31日，第9—12页。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苏联人增加市场和原料的重要性，在《1978年战略评述》中的第1、4—6页和1978年11月全国外交研究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1977年共产党对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中，都有明确的强调。

里应当指出，拉丁美洲确实拥有宝贵的原料：厄瓜多尔、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委内瑞拉都有石油，其他国家也有少量的石油，加勒比海地区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巴西有煤；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都有铁矿石；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都有铀。<sup>①</sup>从苏联最近在援助和贸易方面采取的做法来看，苏联倾向于支援拉丁美洲的能源生产，特别是水电工程项目的建设。这种趋势表明，莫斯科想通过帮助那些在能源生产方面需要援助的国家，来为拉丁美洲的原料敞开自己的大门。突出说明这一目标的是，苏联向这样一些国家讨好，这些国家由军人统治（例如，阿根廷、巴西和秘鲁），不怎么支持本国的一些共产党组织，（除秘鲁外）还被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所渗透，但它们的领土蕴藏着对于苏联和美国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矿物和原料。<sup>②</sup>

苏联对拉丁美洲的实用主义态度的另一方面是，它渴望与古巴保持牢固的关系。只要古巴的外交政策继续按照苏联的意图发展，即在拉丁美洲搞广泛的非军事斗争阵线，支持采取各种反帝的经济和政治形式的民族主义，注意保持反华形象，维护已经得到承认的国家的外交关系，那么，莫斯科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影响就会得到加强。<sup>③</sup>这是因

---

① 石油勘探的加快是因为古巴和波多黎各都增加了勘探。巴哈马的石油蕴藏使人感到乐观，牙买加正在钻探近海石油。见《拉丁美洲经济报道》杂志，第7卷，第24期，1979年6月22日，第191页。

② 阿根廷生产价值高的粮食（小麦和玉米）、肉类，以及金属：钨、锌、铅、锡和银。巴西的资源包括：铀、钻石、木材、橡胶和食品。

③ 苏联三番五次地把古巴描写成是拉丁美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势力。见米申：“拉丁美洲：两种发展趋势”，《国际事务》杂志，1976年6月号，第64—71页。

为，古巴不仅可以在非洲实行俄国超级大国所不能冒险的军事政策，而且，哈瓦那同样可以在拉丁美洲苏联支持的各项活动中扮演主角。这些活动的例子包括：对波多黎各独立的外交支持和推翻尼加拉瓜索摩查政权，或者象在圭亚那和特别是（最近）在牙买加那样，按照扩大国营经济成份的模式，促进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一般说来，在那个地区有较多的国家在文化、种族、历史和民族意义上承认古巴是“拉丁美洲大家庭”的合法成员。古巴还是莫斯科全球棋盘上的一颗关键的海上战略棋子，也是苏联商船、军舰和渔船停泊，进行贸易活动和海洋科学工作的一个港口。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古巴商船队活动有了惊人的增加，同美国的商船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自己的商船队有了发展。<sup>①</sup>所以，苏联关于拉丁美洲事务的许多声明，都提到了古巴在该地区的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这就不足为奇了。

看来，苏联对拉丁美洲民族主义力量的认识很敏锐。多年来，由许多民族组成的苏联是由于克服了内部的民族骚乱而生存下来的，现在它每天在国内政治事务中仍面临着民族骚乱，而在国外，它在东欧国家也面临着这种情况。因此，任何旨在使本国重新控制原料、经济生活或自然领土的拉丁美洲运动，都会使俄国精神紧张。在现在起作用的拉丁美洲民族主义力量中，有能源生产规模巨大的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畅所欲言和很有说服力的经济民族主义。现在，这两个国

---

<sup>①</sup> 见詹姆斯·西伯奇：《苏联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制海权：政治与战略的牵连》，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2年版。

家的资源在拉丁美洲与美国的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将来能源供应的减少，它们的资源会有更重要的意义。当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波多黎各和伯利兹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必定会对莫斯科有吸引力。与此同时，加勒比海地区也以自己的方式燃烧着左派民族主义的烈火，在圭亚那、牙买加是如此，现在，在格林纳达也是如此。1979年3月，由莫里斯·毕晓普首相领导的新宝石运动，在那儿搞了一次左派政变。<sup>①</sup>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民族主义是活跃的。它虽然采取截然不同的形式，但却始终包含着要求从美国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因素，苏联官员们可没有忽视这一点。

在其对拉丁美洲总的态度中，莫斯科继续宣传马列主义的价值。它主要是通过亲苏的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广泛的和平阵线”来进行的。尽管在1973年9月在智利受挫之后，共产党的人数减少了，但在某些方面，这些党仍反映对莫斯科有利的一些趋势，苏联继续强调共产党的作用的事也并非少见。1972年，只有4个共产党（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共产党）是合法的，而1977年有10个共产党是合法的，或者是得到了默许。<sup>②</sup>到1977年后期，许多共产党的人数都有大量增加，例如，古巴党1972年为125,000人，到1977年增加到204,000人；墨西哥党1972年为5,000人，到1977年增加到60,000人；委内瑞拉党1972年为8,000人，到

---

<sup>①</sup> 见我写的论文，“加勒比海地区的左倾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杂志，第27卷，第3期，1978年5—6月号，第33—57页。

<sup>②</sup> 《1978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第23页。

1977年增加到10,000人。

但是，如果认为苏联对直接支持拉美共产主义非常重视，比如说，象对通过合法的国家关系支持拉丁美洲民族主义那样重视，那将是错误的。尽管苏联非常愿意欢迎到苏联首都进行访问的亲苏的拉美共产党代表，但是，在禁止共产党的国家（玻利维亚、巴西、乌拉圭）、在本国政府刁难同游击运动有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例如70年代中期的阿根廷）以及在跨国公司把拉美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里，克里姆林宫继续实行积极的外交、贸易和技术援助计划。另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实用主义，使苏联的目标更加明显，即苏联宁可纵容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意志，也不试图把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强行灌输给不愿意接受它的国民。这里应当强调指出，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外，拉丁美洲并没有造就象在非洲和亚洲可以找得到的那种新的共产党领导人。在非洲和亚洲，自1975年以来有7个亲苏的共产党（越南、老挝、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南也门、柬埔寨的党）。<sup>①</sup>它们用武力夺取了政权或领土。同非洲和边缘地区国家相比，西半球使苏联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现实和机会。

苏联人深知中国人对他们在拉丁美洲的存在的挑战，因此，苏联人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和地点都力图挫败这种挑战。按照苏联人对于形势的解释，中国人在拉丁美洲的推进，从本质上来说是“反苏”的，而且，有助于在该地区加强美国

---

<sup>①</sup> 扎格里亚前引文，第733—754页。

“帝国主义”。<sup>①</sup>至少从现在出版的文献来看，莫斯科对北京在拉丁美洲搞的反苏宣传运动感到担心，这个运动在70年代初期开始加强。<sup>②</sup>从那以后，到拉丁美洲去的北京的外交、贸易、经济和军事代表团增加了，苏联作者们把这种情况描写为“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强有力的攻势”。<sup>③</sup>这里应当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智利于1970年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于1973年在外交上承认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新的保守军人政府。接着，于1971年同秘鲁建交，于1972年同阿根廷、圭亚那、墨西哥和牙买加建交，于1974年同巴西、委内瑞拉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建交，于1976年同苏里南建交，于1977年同巴巴多斯建交。1978年，加勒比海地区开始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了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和墨西哥。<sup>④</sup>

中国人所建立的这些关系使苏联人感到日子很不好过。在打进拉美时，中国人发表了“反苏”和“反古”的声明，谴责苏联和古巴“通过在非洲的行动危害国际均势”，并且责备古巴人实际上是苏联在加勒比海地区谋求霸权的“特洛伊木马”。<sup>⑤</sup>中国与巴西建立的新贸易关系表明，中国也开始打开了同拉丁美洲进行贸易的路子。这些关系扩大了中国与阿

---

① 卡查托罗夫，“毛泽东思想在拉丁美洲”，《国际事务》杂志，1979年3月号，第55—63页。

② 塞西尔·约翰逊，“中国与拉丁美洲：新的关系和战术”，《共产主义的问题》杂志，第21卷，第4期，1972年7—8月号，第53—66页。

③ 卡查托罗夫前引文，第59页。

④ 见《北京周报》，第21卷，1978年8月4日，第4页。

⑤ 卡查托罗夫前引文，第60页。

根廷和智利先前的贸易关系。1979年，巴西与大陆中国的贸易实际上可望达到2亿美元。<sup>①</sup> 总之，苏联显然感到，不仅在处于战略要塞的广大拉美国家，而且在加勒比海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和贸易上都向苏联提出了挑战。

## 二、对苏联目标的分析

对苏联目标的这种观察，是更深入地分析莫斯科在拉丁美洲势力的各个方面的出发点。首先，莫斯科对该地区的政策给人的印象是，它实质上是一个大国为了追求传统大国利害关系的政策。这些利害关系至少包括：追求从长远观点来看能够确保领土安全的影响；增加经济繁荣所必须的市场和资源（随着全球需求和供应短缺的压力的增长，更需要市场和资源）；对各种机会做出谨慎而实用的广泛估价。部分地说，虽然莫斯科的目标是根据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决定的（这反映在继续支持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和国家控制的经济企业，而不支持私人控制的企业），但是，苏联的国家利益似乎主要是根据经济和政治权力来规定的。这并不是说，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决定苏联的权力观念，实际上恰恰相反。不过，它确实意味着，作为一个对世界提出了传统要求的正在兴起的大国（特别是用意识形态和领土方面的对手美国和大陆中国的话来说，苏联是这样的大国），在拉丁美洲直接推销共产

---

<sup>①</sup> 《拉丁美洲经济报道》杂志，第7卷，第7期，1979年2月16日，第55页。

主义不如莫斯科的利益更为重要。

莫斯科对拉丁美洲事务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可以部分地用不同种类的资料来加以说明，从上述明确目标的“字里行间”中可以找到这些资料。经济注册揭示，苏联和东欧向拉丁美洲提供的信贷，被集中使用在用重工业机器和设备换取自然资源的贸易上。这些自然资源包括：例如牙买加的铝（苏联的铝可能快挖掘一空）、古巴的蔗糖、阿根廷的粮食和肉类。另外，苏联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也感兴趣。这些资料还表明，莫斯科不想在拉丁美洲背上过重的援助计划的包袱，毫无疑问，这是由于苏联自己国内经济困难，是由于莫斯科某些人对苏联能否改变拉丁美洲的“依附性资本主义”感到悲观，而且，还由于古巴的活动已经耗费很大。<sup>①</sup>与此同时，莫斯科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逆差，因为拉丁美洲国家喜欢传统的西方商品，从1959到1977年，共产党国家提供了24亿美元的信贷，但是，它们只提取了5.25亿美元。<sup>②</sup>到1977年时，苏联向拉丁美洲提供的经济信贷看来已经急剧减少，这与苏联对第三世界总的援助情况是一致的，新的许诺额比1976年减少了50%以上，比1971年到1976年的年均许诺额减少了60%，也许，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sup>③</sup>

---

① 关于苏联给古巴的援助，有很多的估计，但是，在古巴卷入非洲的高潮时期，每天的开销大概为900万美元。后者包括1975年进行的45次向安哥拉运输任务，加上从1977年11月初开始的头60天内向埃塞俄比亚空运的50次飞行。《1978年战略评述》，第13页。

② 《共产党向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年报，第24—28页。

③ 同上，第4页。



政治资料同样表明，苏联在拉丁美洲事务中是很小心谨慎的。诚然，莫斯科继续派遣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去访问拉丁美洲的共产党领导人，而且，后者在苏联仍然受欢迎。<sup>①</sup>克里姆林宫在新闻报道方面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也不少。例如，在尼加拉瓜，从1978年1月起，苏联的新闻报道骤然增加。<sup>②</sup>对联合国决定宣布波多黎各是美国的“殖民地”一事（古巴长期在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里主张采取这种立场），苏联也进行了广泛的报道。<sup>③</sup>但是，总的来说，苏联在政治上的姿态是：同公认政府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即使是保守的军人政权（阿根廷和巴西），苏联也要同它们进行贸易和向它们提供援助，对美国后院（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的某些危机事件，苏联采取克制态度，甚至是对古巴同美国恢复邦交，苏联也要给予默默的支持。<sup>④</sup>

在军事方面，拉丁美洲的形势同苏联在非洲、中东和亚

---

① 1978年，有许多拉丁美洲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访问，例如：在9月，有阿根廷代表团；在10月，有乌拉圭代表团（受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后补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的接见）；在12月，有玻利维亚共产党代表团。

② 从1978年1月开始，苏联电台对尼加拉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报道。广播使用的是俄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具体用哪种语言，都根据听众的情况而定。总的来说，这些广播都把美帝国主义与索摩查地区联系在一起。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1月14日、23日和31日。

③ 把波多黎各列入联合国殖民地名单的正是古巴的决议。1978年9月12日进行表决，10票赞成（包括苏联和中国），12票弃权（包括智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关于莫斯科的新闻报道，见莫斯科塔斯社英语广播，1978年9月5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9月7日；《真理报》，1978年9月25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9月28日。

④ 《消息报》，1978年11月2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11月7日。

洲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里，苏联显然对马克思主义组织进行公开的军事援助。在拉丁美洲（除了古巴之外），唯一的军事援助协定是苏联与秘鲁签订的，而且，也没有证据说苏联在军事上直接介入了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或波多黎各的独立运动。尽管如此，应当说，在这两个组织中，古巴都起着间接的支援作用。<sup>①</sup>显然，在美国利益敏感的地区附近，苏联人是不愿意冒同美国公开对抗的危险的。

### 三、战略考虑

苏联在拉丁美洲追求大国的利益时意识到，对于莫斯科自己的利益，或者对于美国来说，有些国家和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到70年代后期，苏联明显地强调它同阿根廷（在美国的拉丁美洲事务中，阿根廷具有独立的传统）、巴西（吉米·卡特关于人权和核能的声明，曾使美国同巴西的关系紧张）、墨西哥（在出售天然气和向美国移民问题上显然是有矛盾的）和委内瑞拉（其领导人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是一位认识到了石油的意义的第三世界领袖）的关系。尤其是苏联对加勒比海的关注有所增加，特别是圭亚那和牙买加，从70年代中期起，它们通过外交、经济和贸易关系，进

---

<sup>①</sup> 关于古巴卷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事务，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登载的詹姆斯·古德赛尔的论文，例如，“尼加拉瓜：这场斗争的背后是什么？”1979年6月22日。与此同时，古巴一直通过电台广播，敦促波多黎各独立，允许波多黎各独立运动分子在古巴接受采访，并承认它在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中的坚强努力。

一步靠近了莫斯科。

70年代后期，许多重要的事态发展都证明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1978年11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它已经同意与莫斯科签订一项为期两年的合同，允许苏联搞巴拉那·梅迪奥水电站工程，这为签订更有利可图的价值为25亿美元的汽轮机和发电机合同铺平了道路。<sup>①</sup>1978年5月，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访问了莫斯科，结果，又签订了一项新的1978—1979年的科学技术合作计划，同时，还签订了文化、体育、教育和社会科学等协定。<sup>②</sup>1978年4月，圭亚那总理福布斯·伯纳姆访问了苏联，接着，1979年4月，牙买加首相迈克尔·曼利访问了苏联。<sup>③</sup>圭亚那的努力，导致了它同苏联达成了一项扩大渔船队和帮助扩建铝矾土生产的协定。牙买加人的访问则导致了新的体育、广播、文化和航空协定。与此同时，莫斯科同古巴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牢固了。所以，苏联人犹如向鱼池中撒网的渔夫，他们正在向重要的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国家伸手。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外国私人资本在拉丁美洲已经根深蒂固，苏联的实用主义者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一位苏联学者指出：

---

① 《拉丁美洲经济报道》，第6卷，第45期，1978年11月17日，第1页。

② 《消息报》，1978年5月17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5月20日。

③ 塔斯社英语广播，1978年4月26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4月27日。见莫斯科电台俄语广播，1979年4月10日；《真理报》，1979年4月11日和塔斯社英语广播，1979年4月11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9年4月9—11日。

尽管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采取比较广泛的措施，把外国财产实行了国有化，但是，私人的直接投资正在继续增加。目前，据估计，私人投资约有400亿美元。<sup>①</sup>

接着，在同一篇文章中，鉴于拉丁美洲的新“联合公司”给东道国拥有更多支配权，对此他评论说：

通常，外国资本……继续控制着有少量股份属于外国资本的联合公司……。这使拉丁美洲国家在技术上处于极端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实际上，拉丁美洲已经陷入新殖民主义的财政依赖体系之中，根据1977财政年度结尾时的数字，拉丁美洲的外债达到了1,000亿美元。<sup>②</sup>

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占有强大地位，这个论点表明，苏联理论家们是用权力的观念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美国资本仍然占有统治地位。

苏联在拉丁美洲的目标是围绕权力观念提出来的，是根据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方法提出来的。在这种前提下，分析苏联在世界这个地区的外交政策，就出现了复杂的问题。例如，粗浅地看一下记录，“苏联的威胁”看起来并不那样紧迫。对于在哪里介入和如何介入，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介入，苏联是小心谨慎的。他们似乎意识到，他们在拉丁美洲

---

<sup>①</sup> 克洛奇科夫斯基前引文，第39页。苏联人还强调，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有大量的投资和势力。苏联人指出，到1978年时，美国在那里的投资已经超过45亿美元。《真理报》，1978年3月2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3月4日。

<sup>②</sup> 同上，第41页。

的力量是有限的和受约束的。而且，苏联的势力确实是有限的。另外，莫斯科在拉丁美洲的存在，并不等于就能扩大其影响——虽然苏联也提供了经济信贷，但是，被接受的经济信贷却很少。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贸易的逆差，对苏联是不利的，而且，拉丁美洲国家特别喜欢西方的商品。与此同时，为了争夺拉丁美洲的市场和原料，苏联人不但必须同美国进行竞争，而且也要同西欧国家和日本进行竞争。苏联实际上认为，支持民族主义比传播共产主义更为重要。对于美国的决策者们来说，这可以成为一个有益的教训。

这一切并不是说，苏联已经毫无作为，以致美国在政策上可以放任自流，因为苏联并不是毫无作为。鉴于拉丁美洲的历史和传统权力结构，苏联实际上已经显著地扩大了同该地区的关系。而且，从苏联人的观点来看，同卡斯特罗以前的时代相比，这确实增加了选择的机会。今后，各种各样的条件，都可能为莫斯科创造机会，美国在该地区决不可以采取软弱无力的政策。

#### 四、苏联的政策手段

苏联象美国一样拥有许多政策手段，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它可以利用这些手段达到预期的最大效果。在苏联同拉美国家的关系中，经济援助、贸易、宣传、外交关系、文化交流和<sup>1</sup>技术援助，都是莫斯科所使用的典型手段。除了这些明确的政策手段外，苏联在拉丁美洲还拥有一种美国所没有的特殊政权手段，即苏联有一个依附于它的国家，该国的国内政策

在许多方面都与该地区其他正在实行现代化的政治集团的目标是相同的。在估价古巴的作用以及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作用时，必须把它们看作是苏联在该地区扩大势力的手段。

但是，当我们开始估价这些势力手段的现实效果时，必然提出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这是因为，苏联利用这些政策手段向拉丁美洲事件实际上施加影响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莫斯科提供的若干经济信贷、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或由当地共产党散发的马列主义文献。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不管有没有苏联人，拉丁美洲的事态朝特定方向的发展到底已经（或将要）达到什么程度。<sup>①</sup>这个基本命题引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

这些问题使人联想到，要对莫斯科在其他国家的活动的影晌作出判断是何等困难！苏联人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实际上达到了何种程度呢？某个特定的拉丁美洲国家对于苏联谋求影响的活动的敏感程度和抨击程度如何呢？莫斯科有多大能力来提供拉丁美洲国家想要的东西呢？在限制一切国家追求权力的全球性相互依赖体系中，莫斯科受牵连情况如何呢？<sup>②</sup>例如，莫斯科在国内陷入了经济困难，它的继续发展要依赖外国的资本商品和粮食。在能源供应的前

---

<sup>①</sup> 限制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影响的问题，开始是由阿尔文·鲁宾斯坦于1975年在他的著作中提出来的，其书名是：《苏联和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5年版。见安德列斯·斯瓦雷兹和乔治·金斯伯格斯著作中的第8、9两章，以及鲁宾斯坦著作中的第1、10两章。

<sup>②</sup> 全球相互依赖的理论，有助于估价莫斯科执行对拉丁美洲的具体政策中的代价和好处，有助于试探苏联在第三世界地区的长期影响能力。关于全球相互依赖，见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著作：《权力与独立》，波士顿，利特尔和布朗出版社，1977年版；丹尼斯·皮拉格斯，《国际关系的新意义：全球经济政治学》，马萨诸塞州，北西图亚特，达克斯伯里出版社，1978年版。

景日益暗淡的情况下，它面临着国内和国外依附它的国家（东欧国家）对能源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些趋势会对苏联政策产生什么影响呢？

然而，根据莫斯科力图影响拉丁美洲事件的权力手段的有效程度，来对苏联的“成功”或“失败”作出简单的估价，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强调的是，由一个国家直接和单向地把权力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情况已越来越少了。有些事情看起来是苏联的影响，实际上可能截然相反，这是由于某个拉丁美洲国家取得了对于自己目标有有利影响的结果，拉丁美洲国家同苏联的贸易的顺差就是一个例子。古巴也是一个例子。古巴每天能从莫斯科得到900多万美元的援助，莫斯科对古巴的非洲政策的支持，对古巴自己的外交政策态势是有利的。莫斯科在1970至1973年没能大力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没有可供使用的巨额经济贷款、拉丁美洲继续喜欢西方商品而不喜欢苏联商品、以及古巴对莫斯科的经济消耗（这种消耗限制了其他地方的援助计划），所有这一切情况勾划出这样一幅画图：苏联提供拉丁美洲人民所需求的东西的能力，不如乍看起来那么强。①

我们还面临着给“成功”下定义的困难。假如我们根据苏联在拉丁美洲削弱美国的直接影响、增加拉丁美洲的国家

---

① 从全球的观点来看，苏联的援助计划表明，由共产党国家在过去25年里提供的援助总额，还没有西方仅仅在1977年提供的援助多。1978年7月，不结盟国家外长们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指出，自从1974年以来，来自发达的共产党国家的援助已经逐步减少，在1978年，这种援助才占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的0.1%。1979年2月，在阿鲁沙举行的77国集团外长会议，敦促共产党国家增加发展援助。与西方工业国家的0.31%相比，1977年，苏联援助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03%。

经济成份、锻炼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或培植共产主义等情况来下定义的话，我们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莫斯科用其政策手段所干的事情，与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事情，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到底表现在哪里呢？实际上，当我们把分析千变万化的差别的注意力，从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上转移到美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上，或转移到拉丁美洲的内部力量上，我们就会发现各种有条不紊的相互关系。

完全可以说，华盛顿地位的削弱，主要是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要求所作出的反应的结果。这实质上就是说，美国没有用有效的援助、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去对付日益增长的拉美经济民族主义和日益增多的反对少数保守派统治者的基层叛乱。<sup>①</sup>这并不是说，华盛顿没有政策（卡特总统的人权姿态表明，事实恰恰相反），但是，经济选择要么没有被有效地利用（例如，在墨西哥只是最近才部分地解决了天然气方面的争端），要么被国会拒绝，例如，在优惠关税率和更多的援助问题上，情况依旧如此。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是由莫斯科提出来的，而是在每个拉丁美洲国家独特的国内情况下产生的。而且，人们十分怀疑，一旦民族主义的风暴

---

<sup>①</sup> 1978年，《纽约时报》编辑艾伦·赖丁在一篇为外交关系委员会写的未发表的论文《中美洲的政治趋势》中，提出了这个观点。1978年3月，卡斯特罗访问委内瑞拉和巴西（这次访问没有产生积极性）。随后，在1979年2月，卡斯特罗访问墨西哥（这次访问的准备工作似乎非常仓促）。这两次访问表明，最突出的问题是缺少有效的政策。见《拉丁美洲政治报道》，第12卷，第13期，1978年4月7日。关于苏联说这些访问的“失败”对国内是一个打击的新闻报道，主要见塔斯社俄语广播，1978年8月29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3月30日；塔斯社英语广播，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3月31日；其他莫斯科电台广播，1978年8月31日至4月7日。



席卷拉丁美洲，莫斯科能否控制这种风暴。<sup>①</sup>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自己特殊的民族主义动力，在古巴和墨西哥发生的事件，阿连德成为第一个掌权的共产党人的事件，都突出强调了这一点。至于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的性质和活动范围能施加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大可以讨论一下。

作为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政策工具，古巴的特殊情况是值得研究的。确实，古巴可以鼓吹和推行对莫斯科有利的政策，例如，加强“民族解放运动”（象在尼加拉瓜和波多黎各那样），与此同时，它也可以支持左派政府（象在圭亚那和牙买加那样）。哈瓦那还充当批评家的角色，代表拉丁美洲对美国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在该地区，它曾多少一度是唯一的声言，但是，现在已有若干其他地区的伙伴跟它站在一起了。而且，通过主持地区性的共产党会议，哈瓦那已经明显变成了本地区亲苏共产党的支持者了。古巴还在不结盟运动中起重要作用，把拉丁美洲国家拉入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世界的共同联盟，例如，1979年9月在哈瓦那主持不结盟会议时，它就是这样做的。必须指出的是，古巴不威胁他人，它在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都搞过现代化实验，它在北美的强国面前泰然自若。这个加勒比海小岛，对于加勒比海地区其他左派分子有一定的吸引力，从而有一定的影响。<sup>②</sup>作为

---

① 见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在这里发生的不同的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根源，例如（1876年）在古巴和（1910年）在墨西哥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

② 邓肯：“加勒比海地区的左倾主义”，第46—57页。

某些方面可以仿效的一个楷模，古巴在加勒比海地区可以比苏联起更直接的影响。

虽然不能轻视古巴自70年代初期以来的直接影响，但仍应当研究它对持亲苏立场的运作的支持从长远上产生的效果。哈瓦那对于苏联援助的依赖性，削弱了它在加勒比海地区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能力。哈瓦那承认了自己有经济困难使这一点更加突出，这些困难可以部分地通过将来某时与美国建立新的贸易关系得到克服。古巴对非洲的干涉，也在不结盟运动中引起了问题，这些问题会波及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政治中去。<sup>①</sup>第三，苏联今天是可以接受古巴的民族主义的，但是，明天将会如何呢？该岛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关系中起着自己的作用，可是，当华盛顿和哈瓦那完全恢复外交和经济关系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总之，对苏联权力手段的简单归纳表明，在对拉丁美洲施加实际影响中，莫斯科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限制。各种限制部分地来源于向拉美民族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十分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目标是发展自己的国家）开放的多种渠道。这些渠道减少了西半球对苏联政策的抨击和敏感。现在，拉丁美洲各国政府与西欧国家进行贸易，并且接受西欧国家、日本和大陆中国的技术援助。采用这种多样化贸易方式的国家也包括古巴。这些拉美国家也收听西方和美

---

<sup>①</sup> 7月25日—30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有几位领导人对古巴企图责成该运动与“社会主义国家”（即著名的苏联集团）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和对古巴在非洲的军事作用感到不满。实际上，多数不结盟国家都反对古巴对非洲的干涉以及苏联的影响。见《基辛斯当代档案》，1978年10月27日，第29281—29562页。

国的广播、看美国电影、阅读美国出版的书籍和文献，所有这一切都抵消了苏联的西班牙语广播、苏联电影和当地亲苏共产党印刷品的压力。<sup>①</sup>此外，西方资本不断产生的经济上的吸引力和能力也限制了莫斯科的影响，尽管莫斯科力图让人们不信任这些渠道。显然，就连那些强调拉美是莫斯科的“资本主义附庸”的苏联分析家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sup>②</sup>。

莫斯科与全球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外部压力的冲击，所有这一切都影响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权力手段。今后，莫斯科会面临的问题有：苏联的能源将不能满足依附于它的那些国家的需求；从苏联的国内需要来看，原料会枯

---

<sup>①</sup> 有趣的是，到1977年为止，苏联是对拉丁美洲广播的第二个共产党大国，每周148小时，居首位的是古巴，每周253小时，占第三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周90小时。那年，苏联人停止了对巴拉圭的圭亚那语广播。《1977年共产主义国际电台广播》，华盛顿，国际电信局，1978年11月20日，第8页。

<sup>②</sup> 这个论点还要加以评论。美洲发展银行（美国是其最大的捐助者）在1978年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的贷款达79,200万美元，其中，有65,700万美元给了最不发达国家，有13,500万美元给了比较发达国家。这与苏联在1977年共计给第三世界26,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撰写这篇论文时，还没有1978年的援助数字。见《1978年美洲发展银行年报》，华盛顿，第11页。世界银行是拉丁美洲另一个多国参加的主要机构，美国也是该行的主要捐助者。作为财政能力的一种表现，1978年，该行向……（此处原文漏掉一个国名。——译者）提供10,500万美元，向巴西提供68,800万美元，向哥伦比亚提供41,800万美元，——这些只是三个拉丁美洲国家接受世界银行贷款的情况。见《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报告》，华盛顿，1979年3月31日。1979年6月，世界银行还批准向牙买加提供总额为4,350万美元的两笔贷款，同年，它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供2,000万美元的教育贷款。《世界银行发布的新闻》，第79/100号，1979年6月4日；第79/105号，1979年6月11日。与此同时，莫斯科却声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忽视第三世界的需要，特别是没有注意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加的债务，继续不断的贸易障碍、原料的降价和收支逆差。塔斯社英语广播，1978年9月28日。

竭；在国内外武器生产的费用与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非军事投资之间存在着矛盾。<sup>①</sup>如果说，华盛顿领导人虽然这么多年以来生活在拉丁美洲附近，但仍然感到拉丁美洲事务难以理解，那么，苏联领导人可能会感到拉美事务太深奥莫测，这不利于苏联制订有效的政策。这部分是由于苏联在文化和地理方面都同拉丁美洲有距离。鉴于苏联考虑到过深地卷入拉丁美洲事务所付出的代价和所得到的好处，特别是它与全球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第三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在地理上更靠近苏联，它们向苏联提供了更多扩大影响的机会，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宫就更加不愿意大大超过它在古巴的做法了。

## 五、对美国的影响

虽然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对地区性事件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它却为美国发展适当的政策方针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材料。例如，它表明，该地区正在经历一个爆炸性的变革时期，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采取的是特殊形式，对美国来说，这些形式包含着机会和陷阱。它还集中反映出，全球具有相互依赖的性质。美国是这个全球相互依赖体系中的一部分，而所有国家对彼此的外交政策行动愈来愈敏感并相互拌

---

<sup>①</sup> 这份资料的目的是想在苏联把如此巨额的资本投入军事生产而没有投入非军事的资本形成的时候，提出资本形成中的交换使用问题。当第三世界国家把大量的宝贵资本拨给军事生产的时候，难道它们没有削弱资本形成中和经济发展中的潜力吗？如果军事拨款达到使国家部门的增长受到阻碍的程度，苏联人就会顾此失彼。

击。①特别是在（但不仅仅是在）能源和原料供应及需求方面，情况确实如此。莫斯科在拉丁美洲寻找能源、原料和贸易市场，这证明在相互依赖的大国争夺中，该地区是有作用的。在这场争夺中，美国不能使自己陷入孤立地位。

苏联的威胁性不是间接的军事行动或扩张主义的马列主义。它的更多活动是鼓动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私人财产实行国有化，减少现有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出口；在莫斯科与未来的潜在的重要国家——波多黎各（如果它实行独立的话）、加勒比海国家（牙买加和圭亚那）、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之间建立联盟。拉丁美洲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地区，苏联的政策突出地说明了争夺的利害关系。拉丁美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求美国做出有效的政策反应。

1979年7月，在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贝利将军被推翻的前夕，有人主张采取紧急军事行动，看来这种行动并不保险。对美国来说，支持民族主义运动，比用军事手段制止民族主义运动更明智一些。事实上，在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分子夺取政权时，华盛顿就立刻这样做了。②向拉丁美洲增加经济援助是需要的，但是，不能把经济援助与有效的贸易政策分割开来。这种方针意味着，要进一步承认拉丁美洲在支持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所表达的愿望，还意

---

① 见斯坦利·霍夫曼：“没有选择，没有幻想”，《外交政策》杂志，第25期，1976—1977年冬季号，第97—104页。

② 詹姆斯·古德塞尔：“尼加拉瓜：美国企图放弃义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9年7月26日，第1页。

味着，要有支持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的诚意。苏联在拉丁美洲搞了这么多的活动，这是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正在恶化的结果；美国与拉丁美洲在经济领域里改善关系，等于使苏联减少选择。

在使美国的政策适应经济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这在苏联与拉丁美洲的许多关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过程中，某些国家是特别关键性的。与古巴恢复经济关系和正式外交关系，而不是用许诺建立这些关系的办法来使古巴从非洲撤退，这对美国来说是有意义的。加强古巴的经济发展计划，是为了巩固古巴国内有历史意义的民族主义根基，是为了增强哈瓦那与苏联的谈判力量，甚至是为了冲淡古巴把北美视为“帝国主义阵营”领袖的观念。墨西哥是另一个恰当的例子。不必对十分明显的事务作不必要的反复说明，美国与墨西哥的相互依赖是众所周知的——美国需要能源，墨西哥需要向美国移民和出口劳力的渠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使这两个国家紧密地靠拢在一起。<sup>①</sup>

无视古巴和墨西哥的这些问题（不言而喻，鉴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取得胜利，中美洲也有同样的经济发展问题），是一项糟糕的政策。无视这些问题，也会招至古巴人和苏联人搞一些活动，从而使人们曲解苏联影响的现实，这样，就为对明显的“苏联威胁”采取不恰当的政策创造了条件。较好的行动办法是，首先使拉丁美洲尽量减少考虑它与苏联的关系，从而帮助美国国会和公众在进行合理的政策辩

---

<sup>①</sup> 见乔治·格雷森：“墨西哥的机会：石油迅速发展”，《外交政策》杂志，第29期，1977—1978年冬季号，第65—69页。

论时保持头脑冷静。<sup>①</sup>例如，如果给波多黎各更多的经济照顾，难道就不能把波多黎各当作美国与拉丁美洲改善关系的样板吗？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考虑。美国的行政部门、立法机关或宣传工具，都不厌其烦地曲解拉丁美洲发生的事件。例如，它们最近用什么“红色的浪潮”、“苏联的威胁”和“另一个古巴”正在形成，来奢谈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获胜以来的中美洲。<sup>②</sup>各种政治环境的独特性，与每个拉丁美洲国家相关联的、极其复杂的全球性相互依赖，以及每个国家中民族主义的特殊因素，都因对现实的过于简单的描写而不见了。这种对拉丁美洲环境的简单看法被认为是：华盛顿低估了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这有点象早些时候对伊朗事件的估计）；1965年4月，华盛顿忽视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弱点，或者在1961年，华盛顿低估了古巴卡斯特罗的力量。总之，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仍然有待人们去充分认识，因为它影响苏联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政策。

## 六、结 论

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政策象它在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

---

<sup>①</sup> 关于美国对拉丁美洲外交政策的新设想的必要性，见亚伯拉罕·洛温撒尔：“美国与拉丁美洲：结束霸权设想”，《外交事务》杂志，第55卷，第1期，1976年10月号，第199—213页。

<sup>②</sup> 例如，“继索摩查之后，另一个古巴正在诞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9年7月30日，第33—35页。

一样，必须根据拉丁美洲地区的情况来进行估价。如果把莫斯科的目标和政策手段同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竞争场所割裂开来进行研究，那就可能过高估计苏联的实际力量。对苏联行动具有制约作用的地区性和世界性力量，不仅有助于说明对苏联影响的现有的强制因素，而且有助于说明将会塑造苏联未来胜利和失败的各种倾向的性质。最后，假如美国的公众、私人和政府利益集团以及官僚政治机构，能够就美国的民族利益达成一致意见，苏联的地区性和国际性外交政策表明，其方针政策是适合美国的外交姿态的。对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政策限制，是全球环境的组成部分。莫斯科发现，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它自己正处在这样的世界环境之中。或许，全球“相互依赖”的观念最好地表达了这种形势。这个名词的含义是说，莫斯科对于外来的压力是敏感的和脆弱的，在当代国际斗争中，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这些外来的压力日益增多，包括对能源、粮食、市场、原料和技术的需求。按照供应和需求关系来解释这种政治和经济意味着，苏联的政策不会自动带来全面的胜利，因为它不是计算目标和实施程序的简单公式。形势是这样的：在希望达到的目标和所达到的目标之间，以及所实行的政策和对所实行的政策施加的限制之间，要经常加以权衡。相互依赖迫使我们去对苏联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政策所取得的好处和所付的代价进行估计，也迫使我们去对莫斯科在拉丁美洲地区单方面扩大势力所遇到的各种限制进行估计。

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是反对苏联政策的地区势力，而不是受外来的苏联压力所左右的一种潮流。在拉丁美洲各国，



正象在最近要求苏联滚蛋的埃及和索马里那样，民族主义的形式和内容并不相同。在这里，根本的问题就是那个深深地扎根于固有传统和种族环境中的民族主义，这是苏联进行渗透的永恒不变的障碍。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民族主义是特殊的国内环境和特殊的外交政策的卫士。这一点，对古巴适用，对墨西哥或尼加拉瓜也适用，而且，它是一个教训，在美国与拉丁美洲的现阶段关系中，华盛顿应当比以往更加注意这一教训。

## 第二章

### 苏联与古巴的关系：共生或寄生？

加布里埃尔·马塞拉\*、丹尼尔·帕普\*\*

苏联在其外交政策上历来把拉丁美洲置于次要地位。它承认这个遥远地区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占支配地位的地区；这个地区对苏联的利益并非极端重要，也缺乏可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环境。总之，苏联人没有把拉丁美洲看作值得它花费大量精力和资源或进行冒险的地方。

苏联对拉丁美洲政策的这些特点，并没有妨碍苏联努力促进该地区忠于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成长。在那里，已经建立起来的党一般都不大，苏联经常鼓励它们保持一种相对低的姿态，并利用与“进步”势力的策略联盟提倡和适应人民阵线的战略。它还鼓励它们在呼吁公众注视美帝国主义的危险的同时，支持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

---

\* 作者加布里埃尔·马塞拉博士 (Dr. Gabriel Marcella)，1974年到战略研究所工作，曾在圣母大学获得拉丁美洲历史学博士学位。1964—1965年，他曾利用富尔赖特—海斯研究基金在厄瓜多尔学习，并曾在坦普尔和印第安纳大学任教。马塞拉博士撰写过关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政治、国际事务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等方面的论文。——译者

\*\* 关于作者丹尼尔·帕普的简介，见本书第三章的脚注。——译者

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在拉丁美洲出现的革命运动和革命形势（最突出的是智利和古巴的革命运动和革命形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苏联对自己在拉丁美洲的机会的估计。虽然由于国内矛盾，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遭到了失败。使苏联人失去了在南美洲西海岸获得立足点的机会，<sup>①</sup>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早期的民族主义革命却给苏联提供了基础，使苏联可以成功地在一致的民族利益基础上同古巴建立持久的关系。本文下面将讨论苏古关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同时将从莫斯科和哈瓦那的角度来考察这一准联盟的动力，并分析美国在这种背景下的作用，推测苏古关系的发展前景。

## 一、对苏古合作的看法

自从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以来，苏联同古巴的关系有时是混乱的。在一些情况下，苏联和古巴相一致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例如：1962年古巴同苏联达成协议，允许苏联在古巴国土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古巴有保留地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说这是不幸的然而却是保卫社会主义所必

---

<sup>①</sup> 关于1970—1973年智利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见约瑟夫·诺吉、约翰·斯隆：“阿连德的智利与苏联：拉丁美洲国家追求自治的政策教训”，未出版的论文，休斯敦大学，1979年。对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政策作了有益的评价的专著有：布鲁斯·杰克逊：《卡斯特罗、克里姆林宫和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69年版；利昂·古尔雷、莫里斯·罗森堡：《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渗透》，迈阿密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奥斯瓦德、斯特罗维：《苏联与拉丁美洲》，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0年版。

需的；古巴和苏联最近在非洲协调一致地进行军事部署（1975年在安哥拉，1978年在埃塞俄比亚）；古巴积极支持拒绝1978年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的集团；古巴骤然反对中国的“教条主义分子”和“霸权主义分子”；1980年1月14日，古巴在联合国大会上保留地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

在另一些情况下，两国之间的分歧同样令人吃惊，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后阶段，苏联人没有得到卡斯特罗同意就拆除和撤走了导弹；古巴批评苏联人没有全力帮助北越人反对美国人和西贡政府；苏联人不赞成古巴在60年代向拉丁美洲输出革命的努力（这部分地是由于在拉丁美洲应采取何种正确的革命方法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sup>①</sup>，此外，在对待非洲问题的态度上，最明显的是在对待厄立特里亚问题和对待安哥拉国内政治的政策方面，存在分歧。<sup>②</sup>

这些是说明苏联和古巴关系史上发展趋向变化的事例。提出这些事例不是要预言苏联和古巴将来在政策上将走向一

---

① 关于这个论点，见爱德华·冈萨雷斯：“苏联与古巴对拉丁美洲的态度比较”，《共产主义的比较研究》，第5卷，第1期，1972年春季号，第21—35页；赫伯特·迪纳斯坦：“苏联与古巴的革命观念”，《共产主义的比较研究》，第4卷，第1期，1972年1月，第3—22页。迪纳斯坦说：“卡斯特罗通过（里吉斯）·德布雷的嘴，指责了苏联的革命教条，并暗示说，由于苏联和追随它的共产党采取保守主义，许多建立共产主义的机会都失掉了。”第12页。

② 关于厄立特里亚问题，古巴人不愿意以直接承担作战作用的办法，来支持亚的斯亚贝巴和苏联的政策。见丹尼尔·帕普：《厄立特里亚与苏古关系》，《军事问题研究备忘录》，卡莱尔·巴勒克斯·宾夕法尼亚，战略研究所出版，1978年7月31日。关于安哥拉，在安哥拉解放运动内部正在竞争的派别当中，古巴人明显地权衡了苏联的影响。关于这个论点，见查尔斯·埃宾格：“内战中的外部干涉：安哥拉内战的政治与外交”，《科学世界》杂志，第20卷，第3期，1976年秋季号，第697—698页；威廉·利奥格兰德在国际研究学会年会上提交的论文，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8月22日至26日，第26—27页。

致还是发生歧异。事实上，古巴和苏联目前在非洲、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和军事合作所达到的水平，以及古巴为使不结盟国家运动转向亲社会主义集团立场的努力，都是对古巴和苏联共同制订政策的论点的支持。因此，这两个国家可能会把它们的政策分歧缩小到最低限度，而且几乎不会出现威胁两国共同的民族利益的事情。

我们可以把苏联和古巴的关系看作是民族利益和外交政策两方面都兼顾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合作既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也可以较快地达到顶峰。不论这些利益可能朝什么方向发展，两国显然从它们之间关系的目前状况中得到相当大的好处。

从苏联的利益来看，同古巴建立密切关系有许多好处。这个加勒比岛国代表着共产党在一度属于美国霸权范围的西半球的一个前哨。最近几年，古巴出现一种罕见的政治现象，苏联人可以用它为例证，设法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即一个与苏联不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粗暴地强制的情况下采取亲苏方针的。近几年来，不是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古巴，通过其军队和文职技术援助人员，为苏联提供了推进其全球目标的一种方法。<sup>①</sup>最后，古巴还有潜在用处，它可以成为苏联在美国防线内的军事设施和监听站。

<sup>①</sup> 到1979年8月，在安哥拉、贝宁、佛得角、刚果、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坦桑尼亚、赞比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人民共和国、西撒（波利萨里奥运动）、老挝、越南、格林纳达、圭亚那、牙买加和尼加拉瓜等国家中，大约有3.9万古巴军事人员和1.2万非外交文职人员。资料来源：《格拉玛报》、《格拉玛周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拉丁美洲、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报道）、《起义青年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

从古巴方面来看，同莫斯科建立密切关系同样有好处。苏联向卡斯特罗政府提供了急需的经济补助。其次，苏联的军事和技术援助减少了古巴在军事和技术上的传统弱点。第三，苏联充当了古巴政治上的保证人，表示愿意促进和支持古巴领导不结盟运动的愿望。最后，克里姆林宫对古巴摆脱美国而独立，可以起保护者的作用，虽然不能起保证者的作用。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广泛援助，使古巴人有足够的活动余地，来实行一种同古巴的国土面积不相称的激进的外交政策。

所以，无论是从哈瓦那还是从莫斯科的方面来看，两国建立密切关系都有一定好处，否则，就不会有这些好处。这样看来，两国之间明显地存在一种交换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共生的又是寄生的。鉴于历史上苏古关系出现过麻烦，从每一方的角度研究一下这种交换关系的每一个方面，看一看两国民族利益的结合能够持续多久，将是有益的。

## 二、莫斯科方面对同古巴关系的看法

革命的古巴向莫斯科提出了令人迷惑的、错综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自从卡斯特罗掌权以来，苏联对古巴的政策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在如何最好地利用古巴这个自称为西半球马列主义前哨的问题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sup>①</sup>从克里姆林宫

<sup>①</sup> 虽然卡斯特罗在1961年4月猪湾轰炸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次谈话中宣布，他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并在1961年12月1日的谈话中宣布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但是，苏联一直没有提到过古巴是社会主义。直到1962年4月11日，《真理报》才最后承认这个加勒比岛国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的角度看，至少在1959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内，苏联对这个加勒比海国家的支援和兴趣过多或者过少，都会给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造成不利的后果。走了极端就可能导致下列两种结果：不是引起美国对古巴的干涉，从而使苏联在加勒比海地区显得无能为力；就是导致古巴脱离苏联，从而使苏联失去它同古巴（古巴是没有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夺取了政权的几个马列主义政权之一）建立联盟所带来的荣誉。<sup>①</sup>的确，克里姆林宫在同古巴的关系中曾一度陷于推行比较冒险的政策路线，例如1962年的导弹赌博和人们所说的对古巴事务的干涉，后者曾导致古巴党1968年将亲苏的“小派别”开除出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必须将自己对古巴的政策活动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

然而，很明显，就克里姆林宫而言，在不欢迎苏联的西半球中，古巴作为唯一的共产党前哨阵地是有其价值的。所以，古巴起着苏联“共产主义”橱窗的作用，而无论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或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橱窗都必须成功。因此，这个加勒比岛国可以被看作是最成功的事例，克里姆林宫可以用它来证明苏联的马列主义和经济援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此外，古巴的革命经历表明，它是唯一由本国的民族运

---

<sup>①</sup> 古巴共产党没有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运动，并且，它从开始就对这场运动的革命潜力持怀疑态度。在60年代中期，卡斯特罗比较依赖这个党了，最后，这个党参加了古巴政府。过去有一段时期，在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有所疑虑，对此所作的杰出评论，见雅克·莱维斯克：《苏联与古巴革命，1959—1977年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战略观点》，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8年版。

动依靠自身的努力而夺取了政权的事例，它使马列主义同本国革命的需要和条件相结合，并采取了主要是亲苏的外交政策方针。西方常常忽视这些事实，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在考虑自己如何才能取得政治合法性和具有普遍吸引力时，肯定意识到了这些事实。

苏联同古巴的密切关系中获得的另一个好处，是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支持。最引人注目的事例是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在那里，由苏联装备起来的古巴部队（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战争中，古巴军队是苏联人指挥的）为苏联所支持的政治运动作战。尽管有证据说明，古巴人可能把苏联人拉进安哥拉，使他们承担义务，而且，两国在对待厄立特里亚应采取什么合适政策的问题上存有分歧，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古巴部队在推进苏联和古巴对这两个非洲国家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目标方面，显然是起了作用的。跟保加利亚人一样，古巴人可能是苏联外交和国内政策最热情的支持者。

最后，通过使用在古巴的基地设施，苏联从同古巴的密切关系中得到了纯军事意义上的好处。这些设施使得苏联可以定期检验美国容忍苏联在加勒比海地区部署空军和海军力量的限度，可以让苏联军人得到热带的训练，可以使古巴领导人看到苏联援助的证据和保证，还可以帮助实现对古巴的巨大安全援助计划。<sup>①</sup>但是，苏联人注意到要遵守导弹危机

---

<sup>①</sup> 有些作者认为，苏联的海空军部署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而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的。见科尔·布莱齐尔：“古—美冲突中的苏联”及乔齐·多明格兹：“武装部队与外交关系”（《世界中的古巴》），布莱齐尔、卡梅罗·梅萨—拉戈合编，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51页和第53—86页。



后美国和苏联就不向古巴人提供进攻性武器所达成的谅解。此外，苏联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增加了苏联的政治影响，表明它有向西半球扩大势力的能力。但正象1979年夏末关于苏联“旅”的辩论所证明的那样，苏联的军事存在对于古巴和苏联的利益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很明显，有一些理由迫使苏联非同古巴保持密切关系不可。但是，仍然要问，从莫斯科的方面看，两国维持密切关系要付出什么代价？或许，最明显的不利因素是需要长期向古巴提供大量经济补助。鉴于苏联自身存在着经济问题，这种补助数量之巨（据报道，1976年达12亿美元，1979年可能超过30亿美元）表明克里姆林宫十分重视保持苏古的密切关系。

保持密切关系的第二个不利因素是，它使苏联不断冒着风险，虽然这种风险是最小的。这种风险表现在，古巴和美国之间存在许多分歧，这些分歧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引起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古巴的激进的外交政策目前是同苏联的政策目标相吻合的，但在历史上来看，它一直是取决于哈瓦那对其自身利益而定。所以，如果苏联的政策目标和古巴的激进主义将来发生分歧，如同过去发生的那样，那么，两国之间的密切团结可能要迫使克里姆林宫迁就古巴的主动行动，而苏联则认为这种行动不符合它自己的利益。

苏联的这些考虑总的意味着什么呢？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可能，但是十分明显，克里姆林宫相信，同古巴保持密切关系利远大于弊。然而，这种趋势未必继续下去。两国之间不和的种子确实存在，虽然目前尚未引起严重后果。事实证明，依附于苏联的国家过去并不总是屈从苏联的愿望

的，而苏联领导集团几乎毫不犹豫地可以减少对它所不喜欢的政权的支持，或拒绝提供经济援助，以迫使对方服从自己。

尽管如此，这仍然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或然性。若各方面的情况仍然相同，那么，目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表明苏联会使它同古巴领导人的关系降级。现在，把莫斯科方面的看法撇开不谈，考虑一下哈瓦那方面的看法是适当的。

### 三、哈瓦那方面的看法

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在许多方面对古巴领导集团是有益的。在美国经济封锁和敌对态度面前，这种关系使这个军事上脆弱和地理上、政治上孤立的岛国获得了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同情它的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关键支持。因此，寻求对国家安全的保障一直是推动古巴密切同苏联关系的主要动力。过去，苏联同古巴在外交及防御政策方面，在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政治及经济结构方面，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以及在古巴共产党的作用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尽管如此，两国在结成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以在国际事务中追求共同的目标方面，民族利益是充分一致的。在古巴历史上，结成这样一种联盟是个新现象，它使这个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具有讨价还价的地位，这个地位远远超过自己的能量，同自己传统的附属国的地位不相称（直到1898年，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此后，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殖民地）。

60年代，古巴同苏联的关系曾经紧张，它既必须维护革

命本身的自主权，同时又必须获得和保持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古巴人非常失望的是，60年代，苏联人对古巴人在拉丁美洲充当游击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先锋的努力做出了明显保守的反应。同时，随着古巴社会的革命不断发展，由于忽视（后来又重新强调）蔗糖生产的重要性，强制实行工业化，失去了美国的蔗糖市场和资本与技术，以及由于人材外流而丧失技术力量，古巴的经济遭到了破坏。鉴于美国继续敌视古巴，以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山区之死为标志的游击战略的失败，古巴外交上在拉丁美洲的日益孤立，以及来自莫斯科的强大经济压力（例如减少了石油装运，哈瓦那被迫进一步靠拢莫斯科。因此，古巴看到了，放弃对苏联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疑虑，更多地接受苏联的援助，并在自己事务中更多地接受苏联的指导，是明智的。古巴人不会允许同苏联的这种关系使自己处于殖民地附属国的第三阶段。不管他们如何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词语，如“社会主义团结”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美化两国的关系，古巴领导人对新殖民主义剥削的担心应该说是一点也不假的。

1968年，卡斯特罗总理赞美但有保留地同意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推行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认识到古巴有同其苏联恩人保持和睦关系的必要。1972年7月和12月的协定使古巴成了经互会的成员，这保证了古巴的蔗糖和镍通过长期的贸易协定和随后的技术援助计划有个稳定的市场，从而使古巴同苏联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双方进一步同意，古巴可以延期到1985年才开始偿还其累计46亿美元的债务，

而且可以延长在25年内还清，这等于是取消其债务。最近，苏联把古巴的主要出口商品蔗糖的价格维持在每磅30美分以上，这比现在的国际市场价格将近高20美分。而且，苏联人在改组和发展古巴经济的许多任务中（例如开采镍矿和深海捕鱼）帮助了古巴，向它提供石油，并在古巴贸易中总共占近60%。<sup>①</sup> 苏联的补助和贸易对古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使哈瓦那赢得时间来进一步改组经济和使经济多样化，因为古巴经济仍然是单一的，它严重地依赖蔗糖，对镍的依赖性也与日俱增（古巴的镍矿蕴藏量占世界第四位）。

古巴的军事组织也得到苏联的赞助，苏联向它提供设备、训练和人员。如果没有苏联在价格方面的支持和无保留的赠款，古巴就很难腾出足够的人投入其广泛的海外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并把大批作战人员派遣到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估计古巴在那里分别有1.9—2万人和1.2—1.8万人）。<sup>②</sup>

古巴的贸易，有70%是与共产党国家（包括中国）进行的。1976年，古巴向经互会的出口达22亿美元，进口达21亿美元。古巴同苏联的贸易占它同经互会国家贸易的80%。1976

---

<sup>①</sup> 有迹象表明，苏联在石油价格方面通过经互会给予古巴的好处，超过了东欧的消费者，其办法是让古巴享受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北朝鲜和北越一样的待遇。关于古巴的贸易关系和经济发展的前景，见卡梅罗·梅萨一拉戈：“经济与国际经济关系”；科尔·布莱齐尔：“在古巴投资的经互会”；西奥多·莫兰：“古巴的镍矿开采”；乔齐·佩雷兹—洛佩斯：“古—苏贸易条件中的糖和石油”；布莱齐尔、梅·萨一拉戈：《世界中的古巴》。

<sup>②</sup> 关于对古巴在海外大量经济许诺的消极影响所作的推测，见梅萨一拉戈：《现在和将来的古巴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关系》，未发表的手稿，匹兹堡大学，1977年，第9页、13页和脚注16。

年，古巴向苏联出口估计略微超过20亿美元，而进口为18亿美元。糖约占古巴向经互会出口的90%，苏联进口其中的85%。

古巴将继续是经互会的糖的重要来源。苏联还购买这个岛国镍产量的3/4，每吨的价格为6,050美元，而1977年的国际市价每吨为5,400美元。在古巴出口的农产品中，柑桔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也是为了供应经互会市场的，不过，苏联也正在增加自己的柑桔生产。<sup>①</sup>

在进口方面，苏联1977年按每吨7美元的价格向古巴提供它所需要的石油的95%，这同每吨14美元的世界价格和苏联向东欧消费者收取的每吨8美元价格相比，节省了相当大的一笔钱。苏联预计其国内能源的生产将减少，于1976年与委内瑞拉签署了一项协定，交换石油市场，每天的供应量为2万桶石油。根据协定，委内瑞拉将向古巴运送原油，苏联则将接管委内瑞拉在西欧的一些市场。1974年古巴每天从苏联得到15.5万桶石油。<sup>②</sup> 1978年5月，墨西哥和苏联签署了一项类似的协定，根据协定，墨西哥要向古巴供应石油，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得向墨西哥在希腊、土耳其和东欧的石油主顾交货。<sup>③</sup>

虽然古巴的贸易大部分是同经互会进行的，它对同西方

---

<sup>①</sup> 关于对古巴贸易关系的补充分析，见劳伦斯·塞里奥特：《经互会中的古巴》，美国商业部出版，1977年版，第3—5页。

<sup>②</sup> 戴维·宾德：“委内瑞拉与苏联达成的石油协定”，《纽约时报》，1976年12月10日，第D<sub>1</sub>页。

<sup>③</sup> 玛丽安·莱顿：“墨西哥、古巴和苏联：美国后院的骚乱”，《自由电台研究》，1979年12月27日，第9页。

扩大贸易和从西方得到资本非常感兴趣。由于同经互会有长期的贸易协定，糖产量及价格又变化莫测，古巴同西方的贸易在最近的将来大约将占其贸易总额的30—40%。1974年，由于糖涨价，它同西方的贸易达到41%，而在70年代初，平均贸易额为30%。因此，糖的产量、糖的价格以及在世界糖产量和贮存量都在增长的时期，古巴糖进入其他市场的能力，都将大大影响古巴同经互会、苏联和西方的贸易规模和构成。同时，苏联和古巴在政策上的一致程度将在苏联对古巴经济进行补助的程度和期限反映出来。最近宣布的苏古1981—1985年商业协定看来是加强了这种一致性。1979年12月27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时提到了一项经济援助协定，按照该协定，古巴在那个时期每天大约可得到1,000万美元的援助。在那五年期间，苏联将提供6,100万吨石油，或每年1,220万吨石油。目前古巴每年要消费1,100万吨石油。按照规定，古巴将以每吨105美元的价格购买这些石油（1980年初国际市价是每吨250美元）。在此期间，古巴将每年出售350万吨糖，为此，苏联人将按每吨880美元的优惠价格付钱，这个价格还可以随着苏联石油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调整。说古巴每天获得1,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是这样计算的：古巴为自己的糖获得21亿美元，在石油账单上节省了17.7亿美元。<sup>①</sup>

美国将来同古巴进行的贸易，乐观的打算是达到6—7亿美元，这不会明显减少苏联给古巴的补助费用，因为美国

---

<sup>①</sup> “卡斯特罗讲话强调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法国新闻社，1980年2月6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拉丁美洲每日报道》，1980年2月8日，第Q1页。

商品和资本进入古巴市场的可能性有限。这些事实突出说明古巴同经互会的贸易安排对古巴不利，因为古巴极端需要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来提高在本国占主导地位的制糖工业的生产率和促进镍业的发展。

#### 四、古巴的外交政策和苏联

前面关于古巴同苏联建立关系的利弊的讨论，并没有充分说明古巴当前外交政策态度的某些方面。经济上和军事上对苏联的依赖，并没有说明古巴外交政策所产生的明显矛盾，例如，既在非洲战争中部署军队，又想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得到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当然，照马列主义看来，这两个方面并不相互矛盾。

爱德华·冈萨雷斯这位主要的古巴问题学者，为说明古巴的激进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说古巴依赖苏联并不意味着古巴是苏联的代理人，并不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古巴都对苏联唯命是从，或得去苏联人自己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冈萨雷斯反对这种苏联代理人之说，因为这种说法没能说明古巴作为一个自主国家本身的外交政策利益。<sup>①</sup>另外，他还争辩说，这种说法明显地忽略了古巴没有同意苏联的政治主张并在没有苏联后勤支援的情况下独立采取行动的那些事例，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行动。

---

<sup>①</sup> 唐·伯宁、汤姆·非德勒，“古巴的威信是入侵阿富汗的伤亡”，《费城询问者报》，1980年1月10日，第5—A页；“墨西哥在联合国理事会中取得席位是古巴的失败”，《纽约时报》，1980年1月9日，第A—2页。

第二种看法认为，意识形态是推动古巴充当第三世界革命先锋的力量。这种看法也缺乏充分的根据，因为它没有说明古巴政策态度的某些实用主义方面或哈瓦那同其意识形态敌人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迫切愿望。冈萨雷斯强调国内的决定性因素（经济上的需要和实用主义的专家治国论者的作用）是调整古巴政策态度的重要因素。制度的因素和古巴的军事利益促使古巴在寻求在世界上扩大其外交关系和争取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在海外部署军队。<sup>①</sup>卡斯特的个性和他鬼迷心窍地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是领导第三世界的思想，也是推动古巴卷入海外事务的重要因素。

在同莫斯科的关系中，古巴认为，它为报答克里姆林宫的援助，也向苏联提供了相当多的好处。就古巴的领导人而言，克里姆林宫同哈瓦那建立密切关系，使苏联赢得了相当大的尊严和国际威望。而且，这种关系可以不断证明莫斯科关于社会主义团结的主张是正确的。因此，古巴把自己看作是同苏联自由结交的一个国家；当然，古巴的地理位置排除了莫斯科对哈瓦那使用武力的可能性。由于没有粗暴的强制和古巴所处的地理政治条件，古巴领导人可能比东欧领导人更容易同意同苏联建立密切关系。这是否也意味着古巴可以比较容易地摆脱苏联呢？当然是，不过只有当社会主义古巴的生存不再需要这种联系的时候，古巴才会这样做。

这样，古巴人得到了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友谊，这种友谊使得这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扩大到美国跟前，

---

<sup>①</sup> 冈萨雷斯：《共产主义的问题》，第36卷，第6期，1977年11—12月号，第1—15页。



并帮助塑造了一个联盟形象，可以通过这个联盟促进两国在第三世界的共同目标——古巴自称是一个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认为第三世界是它开展活动的合法领域。的确，在国际事务中几乎没有一件事古巴和苏联不是一致的。它们都支持东西方缓和并且相互吹捧对方的社会主义成就。它们协力破坏美国的国际地位；攻击美国社会的缺点，采取共同的政策削弱美国在非洲、中东以及最近在拉丁美洲（以新的精力）的影响。

此外，古巴明确地认为，世界的“力量对比”日益对社会主义集团有利。几年来，古巴人一直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最近，不结盟运动的其他成员（显著的是南斯拉夫）谴责古巴力图使该运动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亲苏的立场。哈瓦那主办了1979年不结盟运动的最高级会议，并将在以后三年里担任该运动协调局的领导。铁托逝世后，卡斯特罗主席将是该运动一位资格老的政治家。最近，古巴对苏联的支持已经使古巴在不结盟运动内部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苏联1979年12月25日进入阿富汗之后，古巴即失去获得它所垂涎的联合国安全委员会席位的机会。卡斯特罗主席把古巴的声誉押在这方面的努力上，誓不承认失败。<sup>①</sup>如所预料，联合国大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辩论使古巴人“进退两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因为大会普遍谴责苏联的入侵（104票对18票），古巴却被迫投反对票。

这样，古巴的激进的外交政策增强了自己的相对有限的

---

<sup>①</sup> 冈萨雷斯：《共产主义的问题》，第36卷，第6期，1977年11—12月号，第9—10页。

力量，并加强了它与美国和苏联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它是作为一个具有特别需要和其他列强必须加以对付的角色，用卷入国际性和地区性争端的办法，做到这一点的。最后，它企图使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和它的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得到绝对的承认。随着社会主义价值在古巴社会的更加内在化，这两个目标同国家安全的观念便不可分开。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在国内保卫革命免遭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古巴已在海外的事业中，使其革命外在化了。使革命外在化还产生这样的效果，它使本国人民以为古巴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存在缺点是有理由的。古巴的宣传工具把这些缺点归咎于美国反对古巴的经济战。

古巴不管如何使自己同苏联的关系合理化，它却必须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忍受一定的矛盾。古巴在经济和军事上依赖苏联是众所周知的，这在第三世界并不受赞扬，而古巴却力图在第三世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独立的角色。而且，世界许多地方都对古巴实行的军事外交感到担心。在非洲，人们并不怎样把古巴看作无私的革命者，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紧邻中，古巴慢慢地才交上了朋友——格林纳达、牙买加、圭亚那和尼加拉瓜。同苏联的联系，在国内的极权主义和地理上靠近美国，这些都将继续抑制古巴在拉丁美洲扩大影响的努力。

如果说古巴同苏联的紧密联合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满，那么，这种联合还可能促使国际共产主义出现更多的裂痕。同苏联的联合使古巴遭到中国和南斯拉夫的责骂。同苏联的联合还使古巴同欧洲共产主义疏远。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运

动,它主张在意识形态上独立于苏联,它代表通过民族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尊重多元化结构的非列宁主义思想。<sup>①</sup>古巴最终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丧失自己的主权形象。如果它是这么明显地依赖苏联,它在世界的心目中就不是独立的。此外,还存在极小的可能性,苏联可能会减少对古巴的支持,以集中力量解决自己国内的需要或追求它在其他地方的政治目标。为了使这种可能性变得更小,并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古巴必须使自己成为苏联必不可少的伙伴,而同时又保持其独立与主权国家的形象(这在表面上看来是相互矛盾的)。由于古巴自身的力量不大,这就存在很大的危险,即这种态度最终可能使古巴的独立和主权遭到损害。

同苏联的联系还给古巴带来其他的不利因素。与经互会的长期贸易协定,使古巴难于实现其贸易的多样化和获得它所急需的西方资本和技术。古巴同经互会的贸易,主要是在以货易货基础上进行的,它得不到供交易用的硬通货。近几年来,古巴同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只有一次出现顺差,那是1974年,当时糖价达到每磅68美分。当糖价下跌和古巴能够向非经互会国家出口的数量有限时,古巴就发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古巴的人为的经济关系所造成的困难,不大可能促使古巴领导人放弃其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内容,也不大可能促使古巴大大改变它与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关系。

---

<sup>①</sup> 在理论著作中,古巴人称欧洲的共产党是严肃的运动,这些运动曾经提到过用非暴力革命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我们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某个特定的国家里,由于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不诉诸武力就夺取政权和建立国家是可能的。”加斯帕·乔齐·加查·盖洛:“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格拉玛周报》,1979年6月3日,第2页。

总之，古巴认为它同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是利大于弊的。古巴卷入了一场很复杂的政治游戏，它必须在依附的关系中保持自主性。只有从古巴对待它同其超级大国朋友苏联和超级大国敌人美国的关系的态度来看，才好理解古巴外交政策中明显的矛盾。

## 五、苏古关系与美国

那么，从苏古关系的演变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大概将继续保持密切。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出现过某些紧张（表现在对待非洲的政策分歧上和苏联经济补助费用的不断增长上），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互利的事情将继续使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密切的关系。在非洲大陆和在不结盟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挫折，可能使它们之间的某些紧张关系加剧，但是不一定会使它们的关系破裂。

对两国的领导集团进行分析将进一步证明上述的估价。在苏联，年迈的决策者长期主张国际的社会主义团结、支援古巴革命和向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鉴于克里姆林宫从它同古巴的联系中得到了其他好处，以及苏联现在和正在出现的领导人不会急剧地改变其态度，莫斯科不大可能改变其现行的古巴政策。

对当前的古巴领导人，尤其是卡斯特罗，也可以这样说。卡斯特罗有一种受围困的心理，他的革命热情，加上想在第三世界以及最近在加勒比海本地区利用各种机会有所进取的

愿望,无疑地使得他更加认为美国对古巴的态度是强硬的。即使不考虑苏联的经济补助,卡斯特罗的古巴也明显地从苏古的密切关系中得到好处。因此,从古巴领导人的角度看,苏古关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正如卡斯特罗经常说的,美国对古巴的态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小。

美国可能希望对这种关系施加什么影响呢?鉴于现在和不久的将来苏古的国家利益和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都有许多一致之处,美国的行动对苏古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小的,很难看出会有较大的影响。即使美国的政策发生急剧变化,即一方面进一步加紧经济制裁,以对付古巴的对外冒险,另一方面使古巴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到恢复两国的贸易关系,支配苏古关系的演变的无疑还将是别的因素,为华盛顿所无法影响的。如果美国选择“强硬路线”政策,苏古目前的团结必将长久地保持下去。如果美国采取“温和路线”政策,那一定会使克里姆林宫勉强削减它给古巴的经济补助,但是这一削减将不会很大,以致于降低苏古关系的质量。

上面的分析说明了美国政策对苏古关系的短期影响。但是,从长远的前景看,情况就有点不同。在美国采取强硬路线政策的情况下,古巴领导人在北方仍将面对一个具有危险性的超级大国,没有几种政策可供选择。实质上,古巴人将被迫把他们同苏联的分歧减少到最低限度,并强调他们之间政策的一致性,就象他们最近所做的那样。鉴于克里姆林宫现在从它与哈瓦那密切关系中获得的政策好处似乎没有时间性,完全有理由认为勃列日涅夫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将继续背着对古巴的经济负担。因此,即使美国对古巴采取强硬路线

的政策，苏古关系的现状看来还会继续保持下去。

倒是美国的温和路线政策的长期影响可以提供不同的前景。在今后的10—20年里，苏古的大部分领导人将会发生更迭。正是在这些领导人更迭之后，假定的美国的温和路线政策才会带来好处。简而言之，美国的一条温和路线政策将使新上台的古巴领导人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这个新领导集团很可能力求巩固它对古巴政权（这个政权可能有卡斯特罗，也可能没有）的控制，因而愿意并可能作出现在卡斯特罗无法作出的政策选择。卡斯特罗现在无法作出这些选择，这既是由于他本人所持的政治和思想态度，也是由于美国对关系正常化所持的强硬态度排除了作这些选择的可能性。美国采取温和路线政策的危险在于，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或其他人）可能把这种政策视为美国意志薄弱和含糊其词的表现，因而促使古巴推行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和进行更多的冒险。

## 六、结 论

总之，在最近的将来，苏联和古巴看来将会保持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苏古关系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似乎只有从长时期看才会有重要意义，而且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也要有许多因素同时起作用才行，例如，如果苏联人从他们的民族利益出发，被迫减少或取消对古巴的经济补助；如果苏联人决定抛弃古巴而到其他地方追求自己的利益。看来，如果美国对古巴采取“温和路线”的政策，在长远的将来削弱苏古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作出这种政策决定，又将在短

期和中期内增加苏联和古巴进行冒险的危险，因为美国的温和路线政策可以被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美国意志薄弱的表现。自从1975年以来，这种感觉一直是苏联、古巴和美国三者关系中的一个因素，由于美国最近在外交政策上受到挫折，这种感觉可能更加强了。

所以，美国决策者面临着一种复杂的选择。他们作的决定必须以对一系列其他问题的答案为根据，说明这些问题有点离开本文的范围。尽管如此，如果全面改善古巴和美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认为苏联和古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连续不断的冒险危害着美国的安全，那么，采取一项新的政策是适宜的。美国应当采取一项政策，以减少古巴人在动乱的第三世界寻找机会的目标，并使苏联人也对古巴的态度施加节制的影响（同时要注意莫斯科自身同古巴人之间的杠杆作用问题），同时给美国和古巴的领导集团保持发展互利的正常关系的选择余地。

### 第三章

## 苏联与南部非洲

丹尼尔·帕普\*

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垮台和争取黑人多数统治斗争的加速发展，使南部非洲变成了当代国际冲突的主要中心之一。<sup>①</sup>仅这两个因素就足以使南部非洲长期陷入了动乱。但不幸的是，苏美两国又竞相卷入南部非洲事务，这就使得那里的不稳定的形势变得更加紧张和危险。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种竞争是苏联和古巴大规模卷入1975年安哥拉内战的结果。关于那次卷入的情况和卷入的动

---

\* 作者丹尼尔·帕普博士(Dr. Daniel Papp)，佐治亚技术大学国际问题副教授，1977至1978年在战略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曾在迈阿密高级研究中心获得国际问题博士学位。丹尼尔·帕普博士在《国际杂志》、《社会科学季刊》、《苏联》、《资源政策》、《参数》、《美国海战大学评论》、《空军大学评论》和《当代历史》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并著有《越南：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的观点》一书（1980年版）。——译者

① 这篇论文中所说的南部非洲，就其广义而言是指：南非、罗得西亚和西南非洲等白人统治的国家（后两个国家以下分别使用它们各自的非洲的国名——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以及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黑人统治的前线国家。



机，曾在别处做过分析，<sup>①</sup> 这里就不再探讨了。然而，对于苏联对南部非洲地区的政策的研究却很少。苏联在这个地区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苏联使用什么政策手段？克里姆林宫当权人物在实现这些目标过程中取得了多少成就？苏联将会采取什么政策？对美国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分析。

## 一、苏联的目标

苏联在南部非洲的目标大体上可分为三类。<sup>②</sup> 第一类是苏联政府明确宣布过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与前线国家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建立并改善关系；加强并支持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并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残余；支持并援助被苏联认定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

苏联在南部非洲的第二类目标可以看作是第一类目标的必然结果，包括苏联政策中两个未经宣布但却是明显的目标：

---

<sup>①</sup> 关于这些讨论，参阅约翰·马克姆：《安哥拉革命》，坎布里奇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8年版；彼得·瓦尼曼、马丁·詹姆斯：“苏联对安哥拉的干涉，企图与牵制”，《战略评论》杂志，1976年夏季号；吉里·瓦伦塔：“1975年苏、古对安哥拉的干涉”，《共产主义的比较研究》杂志，1978年春夏两季合刊号，第8—34页；丹尼尔·帕普：“安哥拉、民族解放与苏联”，《参数》杂志，1978年3月号，第26—39页。

<sup>②</sup> 关于对苏联在南部非洲的目标的分析，参阅美国国会图书馆：《苏联与第三世界：超级大国的政治活动领域》，华盛顿市，美国政府出版署，1977年5月版；“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渗透”，《非洲学会公报》杂志，1978年，第16卷，第2期，第62—69页。

削弱美国和西欧在该地区的影响、削弱共产党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苏联的第三类目标是西方有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至少包括：苏联臆想的但却是实用的三个目标，苏联对每个目标都断然否认。这类目标包括：在该地区谋求军事基地和侦察的权利；减少美国和西欧在该地区攫取富饶矿藏的机会；威胁美国和西欧的石油供应线，以便加速西欧的所谓“芬兰化”。

### 1. 苏联政府宣告的目标

苏联政府于1978年6月23日发表的“对非洲的政策声明”，也许是苏联最近在南部非洲目标的最明确的官方声明。苏联政府在该项声明中声称，苏联想加强并扩大苏联与非洲合法政府的“和平关系”；援助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非洲政府所实行的进步计划。该声明（最初发表的目的是针对美国对“苏联在非洲的扩张主义”的指责而做出的明确反应），从那以后就被苏联领导人和新闻机构以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下加以重申。<sup>①</sup>

这类目标的公开宣布，给苏联带来了一些具体的好处。

---

<sup>①</sup> 参阅勃列日涅夫：“为了苏联人民的幸福”，《主要言论集》，1979年4月版，第14卷，第12期，第371页；V·沃罗比耶夫：“非洲的殖民主义政策”，《国际事务》杂志，1978年9月，第9期，第47—48页；D·沃尔斯基：“南部非洲：持久的动乱”，《纽约时报》杂志，1979年5月，第22期，第7页；G·罗什金：“非洲的国际垄断扩张”，《国际事务》杂志，1979年7月，第7期，第68—69页；《消息报》，1979年1月31日。

苏联呼吁与合法的非洲政府改善并扩大关系的主张，为与南部非洲前线国家扩大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提供了合理的基础。确实，前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于1977年3月访问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莫桑比克时，他经常呼吁苏联与非洲进行更密切的联系。苏联对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支持，直接加强了苏联争取同前线国家改善关系的要求。前线国家主要是在言词上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由乔舒亚·恩科莫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组成的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因此，苏联支持这些组织也毫不奇怪，虽然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支持，其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说，苏联对于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支持，完全出于苏联想改善它与前线国家的关系；而是指出，从苏联的观点和前线国家的观点来看，苏联加强它与前线国家关系的这一目标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是相辅相成的。

对于苏联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也可以做几乎同样的解释。前线国家领导人都在言词上抨击欧洲国家在该地区的这种残余，苏联领导人也随声附和。无论从政策观点或从意识形态观点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博茨瓦纳总统塞里特塞·卡马对该地区的白人统治采取颇为克制的立场，苏联对此采取的态度同样值得注意。苏联对卡马立场的反应与另外4个前线国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大家认为，博茨瓦纳的克制态度决定于“地理而不是喜爱”。<sup>①</sup>这就再次表

---

<sup>①</sup> 关于苏联的这个态度的讨论，参阅查尔斯·麦克莱恩：《苏联—非洲的关系》，伦敦，中亚研究中心，1974年版，第16页。

明，苏联自己宣告的目标与前线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提出的目标是互相配合的，是吻合一致的。

最后，苏联宣布支持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进步政府，这一目标从理论上讲至少符合4个前线国家政府的目标。在前线国家中有两个执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已将“科学社会主义”写入它们的党纲。苏联当然大力支持这种行动。此外，从1974年起，苏联甚至愿意对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两个人的“社会主义”，采取容忍的态度。

苏联声称，它在南部非洲所寻求的政策目标与大多数前线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所寻求的政策目标，是明显一致的。这给苏联推行对南部非洲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不过，政策也会不时地遇到困难。但是，意识形态观点的巧妙运用，能使苏联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便使这些困难尽量减少。<sup>①</sup>例如，鉴于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中的亲毛派占统治地位，可以预料，苏联将反对“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然而，尽管苏联在1978年以前仅给“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少量的物质援助，但是，苏联仍然承认“爱国阵线”的穆加贝派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

---

<sup>①</sup> 关于这个争论的详细发展情况，参阅丹尼尔·帕普：《对苏联世界观点的估计》，《军事问题研究备忘录》，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巴拉克斯市，战略研究所，1979年3月15日。关于用这个观点对民族解放运动作具体分析的问题，参阅丹尼尔·帕普：“缓和时期的民族解放：苏联的观点”，《国际杂志》，1976—1977年冬季号，第32卷，第1期，第82—99页。

## 2. 虽未宣告但却非常明显的目标

苏联宣告的在南部非洲的目标，包含着—项不可告人的安排，即削弱并最后消除美国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只要苏联把美国的影响看作是“帝国主义的”、把中国的影响看作是“扩张主义的”，只要三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竞争，苏联就要极力削弱美国和中国在南部非洲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

苏联的宣传工具，几乎每天都针对美帝国主义在南部非洲的危险发出警告。苏联同时劝告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1976年在卢萨卡讲话以后，美国对南部非洲政策的变化，只不过预示着美国将采取更为阴险的新方法而已，美国是想保持并扩大它在该地区的地位。<sup>①</sup>苏联认为，美国和英国最近力图取得向黑人统治实行和平过渡的行动，也属这种性质。<sup>②</sup>所以，苏联发出的帝国主义危险的警告和美国的政策是阴险的劝说，只是一枚铜币的两面，都是苏联为了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而做出的努力。

同时，苏联还想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长期以来，中苏两国在南部非洲的对抗，一直是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之内的一种分裂因素。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在独立初期所采取的亲华态度，使得苏联大为恼

---

<sup>①</sup> 参阅罗什金前引书，第5页；《消息报》，1979年1月12日。1976年4月，基辛格在卢萨卡讲话中宣布：美国支持整个南部非洲的黑人多数统治。

<sup>②</sup> 参阅《真理报》，1978年12月11日；莫斯科电台，1979年8月6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9年8月8日。

火。<sup>①</sup> 苏联曾想派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这些国家，但是，这种尝试一再遭到拒绝，直到1976年12月苏联才宣布：波德戈尔内将于来年3月访问这3个国家。从那以后，在多数情况下，前线国家都对中苏争夺影响的斗争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政策。

中苏争夺势力的斗争，对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也有影响。如上所述，罗伯特·穆加贝宣布，“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政策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制定的，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乔舒亚·恩科莫却接受了比较正统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描述中国在津巴布韦的影响时，塔斯社甚至指责中国人向伊恩·史密斯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塔斯社的这些指责，是在苏联明显加速援助“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时候提出来的（1979年4月和5月）。<sup>②</sup>

中苏两国的竞争，在“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也有充分的反映。苏联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持，与中国对“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支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个不幸的国家里，内战的确仍然在发展，而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则继续各自援助前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中它们所偏袒的那一派。自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控制罗安达以来，苏联人一直指责“安

<sup>①</sup> 莫桑比克于1975年获得独立，坦桑尼亚于1961年获得独立，赞比亚于1964年获得独立。

<sup>②</sup> 据一篇报道说，1978年夏季，苏联集团的武器大约占“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武器的30%，1979年夏季则占80%。参阅“可以继续下去吗？”《非洲秘闻》杂志，1979年6月6日，第20卷，第12期，第2页；“恩科莫的孤立”，《非洲秘闻》杂志，1979年6月20日，第20卷，第13期，第1页。

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是“分裂主义分子”，并谴责这些组织、中国，当然还有美国，为了在安哥拉建立新殖民主义而与南非进行合作。<sup>①</sup>

十分明显，苏联想削弱美国和中国在南部非洲的影响。反过来说，苏联是否想在该地区直接增加影响和长期保持势力呢？这是一个更加有争论的问题。

### 3. 是设想但却是可能的目标

苏联在南非可能有3个目标：在该地区谋求军事基地和侦察权利；减少美国和西欧在该地区攫取矿产资源的机；威胁美国和西欧的石油供应线。虽然苏联发言人不断地否认苏联有这些目标，<sup>②</sup>但是人们对于苏联的矢口否认的真实性是有怀疑的。

有一部分怀疑是由苏联的表现直接引起的。苏联在南部非洲的军事存在确实有明显的增加。苏联的侦察飞机确实在罗安达城外飞行过，而且，苏联的海军舰队曾经访问过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等前线国家。虽然1977年和1978年关于苏联在莫桑比克的巴扎鲁托岛和在塞舌尔群岛有基地权利的报道失真，但是很清楚，苏联海军已经在南部非洲得到了好处。1976年初期，当安哥拉内战加剧的时候，确实有一

---

<sup>①</sup> V·索芬斯基、A·卡扎诺夫：“北京背叛安哥拉的史实”，《国际事务》杂志，1978年7月，第7期，第60—69页。

<sup>②</sup> 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都否认这类目标。参阅沃·罗比耶夫前引书，第47—48页；V·库德里亚夫泽夫：“非洲为它的未来而战”，《非洲事务》杂志，1978年5月，第5期，第38页。

艘科特林号驱逐舰、一艘克雷斯塔号巡洋舰和一艘载有100—150名士兵的两栖作战艇，在安哥拉附近的水域巡逻过。<sup>①</sup>

其他方面的怀疑，特别是矿产资源 and 石油方面的怀疑，是由南部非洲的资源财富和战略地位引起的。最近，在1969年，南部非洲（这里包括扎伊尔）占世界黄金产量的69%，占世界宝石和工业钻石产量的64%，占铬产量的32%，占铜产量的22%，占锡和铂产量的28%，此外，世界已经探明的钴矿的57%和已经探明的铀矿的17%，也分布在该地区。<sup>②</sup>鉴于该地区拥有这么多惊人的财富，而苏联又对美国 and 西欧“掠夺”该地区“财富”的尝试不断进行谴责，<sup>③</sup>所以，有些分析家不相信苏联的否认。他们认为，苏联采取“断绝矿产资源的战略”<sup>④</sup>是不足为怪的。与此同时，鉴于南部非洲位于从波斯湾到美国 and 西欧油轮航线的要冲，所以苏联在南部非洲的存在就会使人担心：一旦发生东西方危机，西方国家就会受到苏联的攻击。

## 二、苏联的政策手段

苏联对南部非洲采取的政策手段，大体上可以分为：外

<sup>①</sup> 《华盛顿邮报》，1976年1月27日。

<sup>②</sup> 威廉·明特：《葡属非洲与西方》，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sup>③</sup> 参阅《真理报》，1978年10月24日；《消息报》，1978年10月3日、12月5日和1月12日；M·亚历山德罗夫：“南部非洲：斗争在继续”，《苏联军事评论》杂志，1979年5月，第5期，第53—54页。

<sup>④</sup> 彼得·扬科：“苏联断绝矿产资源的战略”，《苏联分析家》杂志，1978年11月，第7卷，第22期，第5—6页。



交、军事支持、贸易和援助等几种。

### 1. 外交

直到最近，苏联与南部非洲的外交联系仍然是非常有限的。苏联想向该地区的独立国家派高级代表团的尝试，一直拖到1977年才实现。在整个非洲，特别是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正在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虽然勉强得到了莫斯科不同程度的支持，<sup>①</sup>但是，实际上直到南部非洲的葡萄牙殖民帝国垮台和争取黑人统治的斗争加速发展的时候，莫斯科与该地区的外交联系才有所增加。表一说明了这种情况。

除了最近苏联与南部非洲的联系数量有所增加之外，还应当指出，联系的级别也有所提高。例如，苏联有两名政治局委员在1977年访问了前线国家。另外，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所长、苏联重要非洲学家瓦西里·索洛多夫尼科夫，于1976年7月被任命为驻赞比亚大使。苏联已经在1976年早些时候向莫桑比克委派了一名新大使。据说，他可以随时拜会马谢尔总统。<sup>②</sup>最后，1978年8月，塔斯社对“热带非洲和南部非洲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盟”的建立及其代表大会的召开，进行了报道。

毫无疑问，在苏联与南部非洲之间的国与国和党与党的关系中，外交关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样毫无疑问，在这

---

<sup>①</sup> 参阅阿瑟·贾·克林霍弗：“苏联对非洲社会主义的看法”，《论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罗杰·卡尼特编，劳伦斯市，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麦克莱恩前引书，第145—154页，174—178页。

<sup>②</sup> 《华盛顿邮报》，1976年4月16日。

表一 1975年以来苏联与南部非洲之间的主要访问①

年份	月份	安哥拉	月份	莫桑比克	月份	纳米比亚	月份	南非	月份	坦桑尼亚	月份	赞比亚	月份	津巴巴韦
1976	1	苏 外长访	4	国防部 长访苏	8	“西南 非洲人民 组织”主 席访苏	4	“非洲 人国民大 会”总书 记访苏					4	“津巴 布韦非洲 人民联 盟”主席 访苏
	5	苏 总理访	5	苏 总统访	8	苏 总统访	4	苏 总统访					4	苏 总统访
	10	苏 总统访												
1977	9	苏 总统访	2	苏联代 表团访莫	3	“西南 非洲人民 组织”主 席德戈 尔内	3	“非洲 人国民大 会”主席 波德戈 尔内	3	波德戈 尔内坦 访	3	波德戈 尔内访赞	2	“津巴 布韦非洲 人民联 盟”主席 访苏
	12	基里连 柯访安	3	波德戈 尔内访莫										

续表

年份	月份	安哥拉	月份	莫桑比克	月份	纳米比亚	月份	南非	月份	坦桑尼亚	月份	赞比亚	月份	津巴布韦	
1978	4	总统访 苏	11	代表团 访苏											
	11	总统访 苏		总统访 苏											
1979			2	苏联副 外长访莫			2		苏联副 外长访坦		2		苏联副 外长访赞	1	“津巴 布韦非洲 人民联 盟”主席 访苏
	9	总统访 苏并死于 苏联													
	12	代表团 访苏													

① 没有关于苏联与博茨瓦纳之间访问的报道。  
资料来源：此表系根据苏联各种来源制定。

些关系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事件：1976年10月和1977年2月，苏联分别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1977年3月，波德戈尔内对前线国家进行了访问。这两个条约是惹人注目的，因为这是苏联与南部非洲国家首次签订的这类条约。波德戈尔内的访问，是苏联政治局委员首次访问该地区。<sup>①</sup>

苏联主席的访问与非德尔·卡斯特罗对非洲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在时间上正好吻合，古巴领导人至少有一次改变了他的日程，因为他的访问日程可能与苏联主席的访问日程有“冲突”。<sup>②</sup>然而，卡斯特罗改变日程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当卡斯特罗访问坦桑尼亚时，他受到了过分赞扬和热情接待；而波德戈尔内访问坦桑尼亚时是在卡斯特罗刚刚离开不久，苏联主席却受到了低规格欢迎，尽管苏联最近向坦桑尼亚提供了米格飞机、坦克和全套空防系统零部件。<sup>③</sup>卡斯特罗改变日程，可能是想避免有人把坦桑尼亚对苏联的态度和对古巴的态度作进一步的比较。

波德戈尔内还会见了“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领导人恩科莫、“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萨姆·努乔马和“非

---

① 克里姆林宫为重视波德戈尔内的访问而采取的3个措施是：代表团规模（120人），抵达方式（图-144飞机，这种苏联飞机相当于协和式），抵达时间（在赛勒斯·万斯为了海军武器限制谈判而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

② 这是在赞比亚。参阅《华盛顿邮报》，1977年8月29日。

③ 同上，1977年8月24日。苏联与坦桑尼亚意见不一致的另一个表现是，苏联与坦桑尼亚政府发表的最后联合公报，仅仅提到：在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建立，是争取实现津巴布韦的多数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苏联人曾经想说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叫他承认“爱国阵线”是津巴布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奥利弗·坦博。波德戈尔内答应“永远支持”他们的斗争。<sup>①</sup>

自从波德戈尔内的访问以来，苏联与前线国家的关系一直是友好和睦的，虽然有明显迹象表明非洲对于跟苏联过分亲密感到踌躇。苏联与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关系也是友好和睦的。诚然，苏联最近与“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外交关系发生了有趣的变化。苏联显然愿意改善它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关系，埃塞俄比亚亲苏的临时军政委员会首脑海尔·门格斯图上校在“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组织之间充当了调解人。

## 2. 军事援助

苏联向前线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提供军事援助，这是苏联对南部非洲的最明显的政策手段。苏联的这种政策手段，使美国、中国、西欧和一些非洲国家担心苏联开始对非洲实行扩张政策。

在安哥拉内战爆发以前，苏联在南部非洲的军事存在是很少的。在1965—1974年的10年里，苏联向整个南部非洲输入的武器只价值300万美元。1975年，苏联输入的武器价值上升到600万美元。1976年，苏联输入的武器价值猛增到2.36亿美元。表二说明了这种增长的情况，并且把它跟美国和中国输入该地区的武器数量做了比较。

应当指出，尽管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对苏联卷入安哥拉内战一事进行过严厉谴责，但是，1976年苏联向赞比亚的武器

---

<sup>①</sup> 参阅《华盛顿邮报》，1977年3月29日。波德戈尔内于4月3日回到苏联，并于5月24日离开政局。他的非洲之行与他的调离这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表二 向执政的政府输入的武器①

(单位: 百万美元)

接受国	年份			1965—1974年			1975年			1976年			
	来源												
		美国	苏联	中国	美国	苏联	中国	美国	苏联	中国	美国	苏联	中国
安哥拉②	—	—	—	—	—	—	—	—	—	—	190	—	
莫桑比克③	—	—	—	—	—	—	—	—	—	—	15	—	
坦桑尼亚	2	2	62	—	3	—	—	—	—	25	75	—	
赞比亚	6	1	1	1	3	1	—	—	—	6	3	—	

① 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指出: 这些数字不精确, 没有关于输入博茨瓦纳武器的报道。

②③ 1975年以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没有获得独立。

资料来源: 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1966—1974年世界军事出口和武器转让》, 华盛顿, 美国政府出版署, 1976年版。同卷, 1966—1975年(1977年版), 1967—1976年(1978年版)。

转让增加了。另外, 1979年7月, 赞比亚国防部长访问了东德, 他想使赞比亚保证得到更多的武器。据报道, 东德答应增加军事合作, 尽管具体的协定条款不得而知。

表二不包括对非执政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例如“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武器转让。不过, 它并没有说明苏联对该地区执政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军事援助的增长。从1975年起, 苏联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援助也增加了, 但是, 没有美元数字。西方新

闻机构经常报道，苏联把军事装备运到前线国家，然后，再转让给“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并把一少部分军事装备转让给“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up>①</sup>这种军事装备包括：T-34和T-54坦克、122毫米火箭发射架、载人运输工具和大批小型武器。<sup>②</sup>有许多军事装备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和贝拉着陆。这种军事装备有时是经过苏联国防部批准运送的，1977年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联负责向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分配武器的主要联系人索科洛夫将军，陪同波德戈尔内访问了非洲。据报道，他会见了努乔马、恩科莫和坦博。

苏联、古巴、以及某些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还参加了培训活动和顾问活动。最近，除博茨瓦纳外，所有前线国家都有苏联顾问，而且有传闻说，他们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承担了一定的作战任务。<sup>③</sup>另外据报道，“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游击队，在苏联和古巴接受训练之后，回到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参加作战。南非则指责苏古顾问在安哥拉训练游击队，以便到纳米比亚和南非去打仗。继游击队于1977年和1978年进攻沙巴省之后，扎伊尔也对苏、古的共谋关系做了同样的指责。<sup>④</sup>表三说明了苏联

---

① 参阅1976年3月10日、6月21日、11月18日和11月30日的《纽约时报》。

② 《华盛顿邮报》，1977年3月28日。

③ 例如，据1979年8月30日《亚特兰大法规报》报道，有5名苏联顾问在对反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军队的作战行动中被击毙。

④ 《纽约时报》，1977年4月24日；《华盛顿邮报》，1977年4月26日，1977年6月22日；1979年5月22日。

表三 1976年在欠发达国家中的亲苏军事技术人员

场 所	苏联人和东欧人	古 巴 人
莫桑比克	50	350
安哥拉	500	10,000
整个非洲	3,900	11,150
所有欠发达国家	9,080	11,656

资料来源：中央情报局《1976年共产党对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77年版，第4页。

顾问在非洲，特别是在南部非洲，承担义务的广度和深度。

毫无疑问，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政策目标，已由在南部非洲的所谓“代理人部队”，特别是在安哥拉的古巴人，向前推进了。在南部非洲，代理人部队是按照驻在国政府和施舍国政府的意志参加活动的，他们得到了苏联的大肆鼓动和大量财政援助，这种看法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这些代理人部队目前和今后的活动广泛程度如何，大家的看法就不一致了。代理人可能卷入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这是西方特别关心的问题。但是，卡斯特罗一再声称，古巴部队将为“爱国阵线”、“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物质援助”，但是，古巴部队决不会去为它们作战，因为“独立从来不会从国外输入。有关的人民必须去为自己的独立而战斗”。<sup>①</sup>

<sup>①</sup> 《华盛顿邮报》，1977年8月23日。参阅《华盛顿邮报》，1977年4月2日；《事件汇编》，1977年，第456页。



上述例子并不意味着，苏联实行的“军事外交”（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已经取得了彻底的成功，或者说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早在苏联刚在安哥拉扩大军事卷入的时候，肯尼思·卡翁达就严厉谴责了俄国人，他警告非洲同胞们说，“有一只吃人成性的老虎带着小虎仔从后门进来了”。这样，苏联与赞比亚的关系就冷了下来。直到一年以后，当波德戈尔内访问赞比亚时，苏、赞两国的关系才有改善。

很明显，博茨瓦纳对苏联在非洲的企图也是有怀疑的。虽然博茨瓦纳与苏联的联系比不上其他前线国家那么多，但是，1976年末的一个奇怪事件说明了这一点。加博罗内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宣布，他的国家“将考虑”苏联为了帮助挫败罗得西亚边境袭击而提供的军事援助；苏联迅速做出反应说，它将对这类援助的“正式请求”予以考虑。<sup>①</sup>迄今，博茨瓦纳也没有提出正式请求。（为了保护边界，使它领土内的难民营不受罗得西亚人的进攻，博茨瓦纳在1977年末组成了一支2,000人的“军队”。这支“军队”主要是用英国武器装备起来的）。

很明显，甚至苏联与安哥拉和与莫桑比克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也是一些人对苏联和前线国家的军事关系问题进行争论的根源。例如，苏联—莫桑比克条约宣布，“在出现威胁或干扰和平的情况时”，两国将“立即进行联系，以便协调它们的立场，消除威胁和恢复和平”。在这项条约签订之后的岁月里，罗得西亚对莫桑比克发动了惩罚性的空袭和

---

<sup>①</sup> 《华盛顿邮报》，1976年12月22日。

地面进攻，主要是进攻“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游击队的基地。这些进攻并未受到惩罚。直到最近，苏联向马普托政府提供的唯一防空装备是少量的几架米格-17飞机。很可能，由于莫桑比克根据该条约的规定期望苏联提供军事援助，而苏联却采取一种明显的犹豫态度，所以，马谢尔最近表示愿意转向美国。莫桑比克总统把他自己与吉米·卡特在1977年10月的会谈，描写成为美国与莫桑比克关系的“新时代”的开端。后来，苏联向莫桑比克输入了萨姆-7空防导弹，苏联还向罗得西亚提出警告，说莫桑比克在面对索尔兹伯里的进攻时“并不孤单”，<sup>①</sup>这才或多或少地减轻了马谢尔的困惑。可是，勃列日涅夫最近又说，苏联—莫桑比克条约是非军事性的条约，无疑，这又再次增加了马谢尔的困惑，即使苏联领导人的声明可能是直接讲给西方听的，<sup>②</sup>它也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苏联与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特别是与“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军事关系，也是很复杂的。我们已经评述过莫斯科对“爱国阵线”承诺的援助，尽管实际上苏联只将它的大部分军事援助给了“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1978年10月2日，罗伯特·穆加贝在接见美国《新闻周刊》时，他对这个事实做了评论。他宣布说，在“爱国阵线”中，他那一派没有从苏联或古巴得到过多少援助。（他还评论说，他对这样的事实很不理解。他宣布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哲学是“毛泽东思想”。很显然，这是莫斯科不会接

---

① 《消息报》，1978年12月15日。

② 勃列日涅夫前引书，第371页。

受的)。即使如此，如前所述，苏联已经对“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采取了一种比较不偏不倚的立场。但是，这并不是说，莫斯科在“爱国阵线”内部的问题已经解决，即使门格斯图的调解是成功的。从意识形态、部族主义、利己主义和争权夺利中产生的这种仇恨，是不容易克服的。

苏联军事外交必须克服的另一个问题是：伤亡人员日益增多。苏联自己的伤亡人员并不多，但是，古巴代理人则大不一样。古巴在非洲的卷入，并未遭到象在加勒比岛那样的大规模的反对，但是，确实有1,500以上的古巴人死亡在非洲大陆上，仅在安哥拉就有1,000多古巴人死亡。来自安哥拉的消息表明：古巴部队不愿在安哥拉中部重要的本格拉铁路沿线活动，因为该地区“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部队使他们遭到了重大伤亡。<sup>①</sup>

我们在讨论苏联对前线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军事援助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分析。苏联相当强调该地区的军事关系表明：苏联反对在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最后在南非向黑人多数统治实行和平过渡或谈判过渡吗？虽然克里姆林宫的人们不怎么说，用非军事办法解决过渡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非常清楚，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条件是不大可能产生的。美国和英国在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安排政权和平过渡的努力，常常被诋毁是为了维护白人统治和新殖民主义控制。最初的“各方”会议建议、落空的联合国纳米比亚选举

---

<sup>①</sup>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苦恼》，《非洲秘闻》，1979年5月23日，第20卷，第11期，第1页。

解决方案、各种“内部”解决办法、以及1979年8月在卢萨卡举行的英联邦会议上所达成的妥协会议解决办法，统统都遭到诋毁。<sup>①</sup>艾贝尔·穆佐雷瓦主教和雷沃林德·恩达巴宁古·西索尔，甚至被说成是美国和英国的“当地非洲傀儡”。<sup>②</sup>对苏联人来说，在这种形势下的和平解决办法，只不过是政权过渡给津巴布韦的“爱国阵线”和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up>③</sup>在苏联人的心目中，这两个组织都是他们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鉴于苏联对于用和平办法解决津巴布韦问题采取这种态度，苏联新闻机构和政府有保留地评论1979年秋天伦敦会议的结果，人们就不会感到非常奇怪了。苏联新闻机构常常把这次会议的成功，归结于“联合爱国阵线”的“灵活而现实”的态度，而把这次会议的困难，归结于穆佐雷瓦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利己”政策。《真理报》和《消息报》都警告说，尽管有进步的表面现象，但是，仍然存在着无数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穆佐雷瓦和英国造成的，因为他们想保留白人特权和引进西方雇佣军参与这场冲突。已经产生的明显印象（而且应当强调，这仅仅是一种印象）是，苏联领导人对于这种解决办法感到大吃一惊，他们认为，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已经被进一步削弱。

---

① 关于苏联对这些建议、意见和步骤的反应，参阅《消息报》，1978年12月15日；1978年1月15日；1979年1月24日；1979年8月8日。《真理报》，1979年1月31日；1979年2月1日。

② 《消息报》，1978年12月15日。

③ 《真理报》，1978年11月5日；V·西丹科：“国际解决办法的闹剧”，《新时代》杂志，1979年5月号，第20期，第10—11页。

### 3. 贸易和援助

自1975年以来，苏联在南部非洲的贸易和援助都没有增加。苏联与安哥拉的贸易则是唯一的重要例外。表四是1975—1978年苏联与前线国家的贸易数字，表五是南部非洲从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接受援助的数字。

南部非洲的冲突造成了经济困难，南部非洲的经济处于比较不发达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却不愿与南部非洲进行比较多的贸易、不愿向南部非洲提供比较多的援助，这或多或少使人感到奇怪。苏联当局认为，贸易和援助是“巩固国家独立和经济独立”的手段，所以贸易和援助是反对帝

表四 苏联与前线国家的贸易①

(单位：百万卢布)

国 家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苏联出口	苏联进口	苏联出口	苏联进口	苏联出口	苏联进口	苏联出口	苏联进口
安哥拉	—	—	5.3	14.4	69.2	10.4	47.8	9.6
莫桑比克	—	—	—	—	5.9	—	17.4	0.8
坦桑尼亚	2.6	5.9	1.2	2.8	1.2	3.5	6.2	3.4
赞比亚	—	7.5	2.3	—	1.4	0.4	0.6	0.8
所有欠发达国家	3310.0	2998.8	3740.1	2827.0	5336.7	2997.2	5726.4	2831.2

① 没有关于博茨瓦纳贸易数字的报道。

资料来源：《对外贸易》(莫斯科)，1977年3月，第3期，附表；

《对外贸易》(莫斯科)，1978年12月，第12期，附表；

《对外贸易》(莫斯科)，1979年3月，第3期，附表。

表五 共产党国家的经济信贷和赠款

(单位: 百万美元)

受援国家	年份来源		1954—1974年			1975年			1976年		
	年	份	苏联	东欧	中国	苏联	东欧	中国	苏联	东欧	中国
			来源								
安哥拉 <sup>①</sup>	—	—	—	—	—	—	—	10	10	—	
莫桑比克 <sup>②</sup>	—	—	—	—	—	—	59	3	1	—	
坦桑尼亚	20	13	331	—	—	—	—	—	—	28	
赞比亚	6	50	279	—	—	—	—	—	—	28	

① 没有关于给博茨瓦纳信贷和赠款的报道。

② 在1975年以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没有获得独立。

资料来源: 中央情报局《1976年共产党对于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 华盛顿, 美国政府出版署, 1977年版, 第11—12页。

国主义的“有用武器”, ① 可是, 苏联当局至少在1979年却没有广泛地使用这些手段去推行他们在南部非洲的政策目标。

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 从实际的历史情况来看, 无论是长期以来在削弱潜在对手的影响方面, 还是长期以来在增加自己的影响方面, 贸易和援助都不太有效。苏联、美国和中国都已经看出了这一点。第二, 苏联自己正在集中力量搞国内发展, 所以, 它只能提供数量有限的信贷和少量的援助。第三, 苏联贸易当局显然想在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贸易方面

① B·科津泽夫、P·卡谢罗夫: “苏联与热带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 《对外贸易》杂志(莫斯科), 1978年2月号, 第30页。

出现顺差，以弥补苏联同发达国家进行的贸易方面出现的逆差。例如，1975年苏联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品价值为331,000万卢布，苏联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价值为299,880万卢布。三年之后，苏联向这些国家出口的商品价值上升到572,640万卢布，苏联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商品价值实际上下降到283,120万卢布。

最后，南部非洲国家对于在经济上跟苏联靠得太紧是有所犹豫的。西方有投资资本，苏联则没有投资资本。所以，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总统最近都呼吁西方向他们国家增加投资，在此期间，苏联对南部非洲的兴趣也正在增加。<sup>①</sup>甚至在苏联贸易占优势的安哥拉，从1977年起贸易也下降相当多。最重要的是，安哥拉下降的贸易几乎都是从苏联进口的商品。安哥拉和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同意莫桑比克的一位高级官员的意见，他说：“我们不想成为第二个保加利亚，而且，我们当然不想卷入集团政治活动”。<sup>②</sup>

总之，虽然苏联说贸易和援助是重要的政策手段，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并没有广泛地使用这些手段，去实现苏联在南部非洲的目标。苏联对南部非洲国家的政策，继续由外交和军事因素决定，目前还看不出来有改变重点的迹象。

---

① 《华盛顿邮报》，1977年12月13日；1977年12月15日；《非洲报道》杂志，1979年3—4月号，第2期，第32页。

② 《华盛顿邮报》，1977年2月16日。

### 三、外来因素对苏联政策的影响

不管苏联在南部非洲追求什么目标，也不管它选择什么外交手段，某些当地的、地区的和国际的因素，对苏联在该地区的政策取得成功或遭到失败，显然都起一定的作用。总之，这些外来的因素包括：民族主义感情、民族解放组织各派之间的不同意见、经济上的实用主义考虑、以及其他非洲以外的国家所采取的反措施，而且，外来的因素还不止这些。

#### 1. 民族主义

前线国家的民族感情，既支持苏联削弱美国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又阻碍苏联在该地区扩大影响。这种民族主义感情的通常表现是：不愿意依赖非洲以外的国家。而南部非洲国家则不然，在争取独立的历史过程中，在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愿意接受任何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技术援助。这就导致卷入该地区的非洲以外的国家不断遭到挫折。

在安哥拉，阿戈什蒂纽·内图经常宣称，他的政府准备偿还它从苏联接受的全部援助。虽然苏联和古巴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军事援助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早在1976年7月就有报道说：苏联与内图之间的分歧已经开始表面化。据说，内图愿意采取不结盟立场。<sup>①</sup>不到一年之后，

---

<sup>①</sup> 《华盛顿邮报》，1976年7月16日。



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亲苏势力领导的、反对内图的流产政变，被忠于内图的人和古巴部队镇压了下去。<sup>①</sup> 1978年11月，据报道，安哥拉政府正在寻求与加强西方联系，这时，内图却出现在莫斯科的电视屏幕上，他宣布，他的国家感谢苏联的援助，不过，他的国家同时还想与一切国家建立和平的关系、并想保持不结盟。<sup>②</sup> 一个月以后，内图解除了另一名亲苏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成员（即洛波多纳希门托总理）的职务，内图重申，任何时候都要维护民族独立。

内图在1979年9月逝世以后，安哥拉人士进一步揭露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苏联与安哥拉意见不一致的具体情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有：内图在1977年曾经请求葡萄牙政府派20,000名士兵，以便取代古巴人（不过，葡萄牙没有接受这个请求）；内图拒绝向苏联提供基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的亲苏派，至少搞过三次暗杀阴谋。

自从内图逝世以来，苏联与安哥拉的关系一直没有发生过明显的变化。新任总统埃德瓦多·多斯·桑托斯保证继续执行内图的政策，包括寻求西方投资和保持不结盟政策。在两国友好合作条约三周年之际，在多斯·桑托斯和勃列日涅夫的贺电中，都没有什么重要内容。<sup>③</sup>

---

① 《华盛顿邮报》，1977年6月28日；《纽约时报》，1977年6月20日；戴维·伯明翰：“5月27日事件”，《非洲事务》杂志，1978年10月，第77卷，第309期。

② 莫斯科电视台，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8年11月15日，第112页。

③ 《真理报》，1979年10月8日；1979年10月9日。

在莫桑比克1975年获得独立后不久，苏联的政策在这个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功，大大增加了苏联在马普托的影响。苏联影响的增加使中国的影响减少了，中国在对“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进行无益的支持以后，暂时减少了对非洲事务的卷入。在1976年和1977年初期，萨莫拉·马谢尔经常把莫桑比克与苏联的关系描写成为“榜样”，但是，由于苏联向莫桑比克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莫桑比克总统开始请求西方提供援助，特别是在罗得西亚频繁而疯狂地进攻莫桑比克、反对在莫桑比克设置“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游击队基地的时候。<sup>①</sup>马谢尔不但呼吁西方向莫桑比克投资，而且宣布莫桑比克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也许最显眼的一件事是，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于1979年2月访问了莫桑比克，他同马谢尔进行了“同志式的坦率的讨论”。苏联政治的分析家们明白，“同志式的坦率的”就意味着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

苏联与坦桑尼亚的关系也走过了坎坷的道路，虽然两国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真正亲热过。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尖锐地批评西方对南部非洲争取多数人统治的斗争的支持太少，而与此同时，他却大力支持苏联和古巴在非洲的存在。他说，这是因为西方比东方对南部非洲独立的威胁更大。然而，苏联向尼雷尔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却

---

<sup>①</sup> 关于对莫桑比克事务的讨论，参阅托马斯·赫尼克森：“马克思主义与莫桑比克”，《非洲事务》杂志，1978年10月，第77卷，第309期，第441—462页。

一直很少。尼雷尔自己似乎很了解，苏联在这里的目标与在南部非洲的目标可能不完全一样。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

“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的武器……是被民族主义者用作实现民族主义的目的”。<sup>①</sup>尼雷尔甚至更加坦率地说，

“坦桑尼亚不想让任何非洲以外的国家来统治非洲”。<sup>②</sup>

赞比亚与苏联的关系从来就没有亲密过，而在卡翁达针对苏、古在安哥拉的存在发表了“吃人成性的老虎带着小虎仔”的声明之后，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冷淡。卡翁达对于中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赞扬，进一步疏远了俄国人。<sup>③</sup>虽然苏联对于主要在赞比亚境内开展活动的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中的一派（“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支持，或多或少填补了苏联与赞比亚之间的鸿沟，但是很显然，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还远远谈不上是亲密的。在1979年期间，穆佐雷瓦政府对赞比亚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进行了空袭。但是，在对这些空袭进行报复过程中，赞比亚却没有得到西方的军事援助。当时，卡翁达政府转向东德请求援助，不过，赞比亚只得到一点点儿军事援助。

总之，当时前线国家不愿意与苏联维持特别亲密的关系。但是，可以肯定，当苏联向它们提供军事援助的时候，它们都接受了苏联的军事援助。假如谈判解决的办法失败的

---

① 朱利叶斯·尼雷尔：“冲突不是共产党人与反共产党人之间的战争”，《华盛顿邮报》，1976年1月12日。

② 朱利叶斯·尼雷尔：“外国军队在非洲”，《非洲报道》杂志，1978年7—8月号，第23卷，第4期，第10—14页。

③ 科林·勒古姆：“理想之国的目标”，《纽约时报杂志》，1976年3月28日，第60页。

话，那么，罗得西亚向“爱国阵线”在 frontline 国家中的基地发动的进攻，南非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哥拉和赞比亚的基地发动的进攻，都可能影响前线国家向苏联寻求更多的军事援助。但是，假如它们有摆脱依赖的迹象的话，那么，这些步骤就不一定对苏联有利。毫无疑问，南部非洲的民族主义势力，是苏联必须认真对付的一种势力。

## 2. 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对立

各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内部的对立，是使苏联对南部非洲政策变得复杂化的第二个主要因素。当然在安哥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之间的内战，仍然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过去得到了美国、中国和南非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中的后两派一直被克里姆林宫谴责为“分裂主义分子”。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把三个组织的分裂说成是由部族原因和地区原因造成的，而苏联却将其说成是由意识形态原因造成的，是由西方新殖民主义的阴谋造成的。然而，有一点一直是很清楚的，即在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内部斗争中，苏联人支持的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不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本身已经出现了分裂迹象。1977年5月27日反对内图的政变计划，是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的亲苏派搞的。因此，苏联到底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哪一派，这是苏联今后必须做出抉择的一件难事。

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看来是积极争取

独立和争取黑人多数统治的唯一重要政治力量。苏联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坚决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斗争。一个由纳米比亚白人控制的政治组织——“特恩哈尔民主联盟”，被普遍看作是一个争取继续维持白人统治的代理人组织。苏联也是这么看的。

在南非，苏联倾向于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有可能增强，但是，这两个组织目前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在津巴布韦，苏联面临着困难的选择。史密斯、穆佐雷瓦、西索尔和奇劳主张的“内部解决办法”，受到了苏联的强烈谴责，与此同时，苏联却大力支持“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爱国阵线”。直到最近，苏联几乎把全部援助都给了乔舒亚·恩科莫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但是，使苏联人感到不幸的是，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已经变成了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它获得了多种来源的援助。自从1978年中期开始，如前所述，苏联对“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支持已经明显增加。苏联人认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在伦敦会议上通过的统一阵线，减少了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内部的斗争，不过，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更加不安的前景：就是津巴布韦问题的解决办法使苏联在该国的影响受到削弱。显然，苏联认为这样的解决办法是不可取的。

### 3. 经 济

过去五年中自相残杀战争，已经使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民族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在安哥拉，内战使本格拉铁路的建筑工程中断，并使该国原有的少得可怜的工业遭到破坏。独立以后，白人外逃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977年，莫桑比克关闭了它与罗得西亚的边界，这对罗得西亚的经济和莫桑比克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破坏。1977年，赞比亚也关闭了它与罗得西亚的边界，但是，到1978年后期，赞比亚重新开放了铁路，以便进口在南非卸运的急需商品。赞比亚另外一条通海的铁路——坦赞铁路，远远没有达到它的最高效率。<sup>①</sup>总之，赞比亚和安哥拉都面临着经济破产的局面，而莫桑比克的经济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在南非矿场中劳动的莫桑比克工人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说，博茨瓦纳的经济情况也是困难的。在白人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白人的外逃及打内战的局面，正在破坏津巴布韦的经济，而纳米比亚的经济则主要依赖矿业。从经济方面来说，只有南非仍然是一个强国。

苏联政策的含义是清楚的：整个地区（不管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问题未来的前景如何）非常需要经济援助，而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却非常少。一旦这些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可能会改变政策，但是，现在苏联没有改变政策的迹象。诚然，经济困难的形势或许会使前线国家被迫对民族解放运动组织

---

<sup>①</sup> 《洛杉矶时报》，1978年10月1日。

施加压力，以便逼迫它们接受逐步向黑人统治过渡的解决办法。假如这种过渡的解决办法取得成功，那么，对于军事装备的需要显然就会减少，这样，苏联推行南部非洲政策的两个有效手段中的一个手段就没有用了。

#### 4. 非洲以外的国家的对抗手段

苏联在南部非洲增加活动，直接刺激西方在该地区增加活动，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增加了活动。诚然，肯定会有人提出争论说，美国对南部非洲政策的整个态势已被苏联的存在改变了。1976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卢萨卡讲话时许诺，美国将支持黑人多数的统治。从那时起，美国就在外交上一直支持前线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并与英国一起继续设法做出一种向黑人统治进行和平过渡的可以接受的安排。由英国在伦敦会议上提出的各种建议，都被“内部”势力和“外部”势力接受了。这种情况使朱利叶斯·尼雷尔认为：在津巴布韦发生了政治变化的论断已经得到进一步重视。<sup>①</sup>也许更加明显的情况是：美国和英国都采取措施，向该地区增加援助。因此，英国取消了它过去向英联邦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和坦桑尼亚）提供的17.4亿美元贷款的债务，1979年7月31日，这可能是为8月初在卢萨卡举行英联邦会议做准备；1979年11月中旬，英国还停止了它对津巴布韦的经济制裁。12月，美国步英国的后尘，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安哥

---

<sup>①</sup> 《华盛顿邮报》，1979年8月4日。

拉取得胜利以后，中国已经减少了对前线国家的经济援助。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经济影响就是建设坦赞铁路，这条铁路是1976年移交给非洲国家的。虽然中国对该地区的兴趣减少了，但是，中国在1978年却认为，中国向赞比亚捐赠一个中队用于空防的米格-19飞机是能够胜任的。<sup>①</sup>

当然，苏联会说，非洲以外的这些国家的政策，都具有新殖民主义的性质。苏联宣传工具特别热衷于谴责美国、中国及英国在建立地区霸权方面进行合作。<sup>②</sup>不管怎样，苏联承认这些国家在整个南部非洲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它们在扩大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以及安排向黑人多数统治进行和平过渡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或失败，将对苏联在该地区政策的成功或失败起很大的作用。

#### 四、结 论

在讨论完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还不能够说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政策目标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诚然，西方和中国在南部非洲的影响都已经明显削弱，而苏联在南部非洲的影响却增加了。但是，很难说这是苏联政策带来的结果。1960年，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开普敦说，“改革之风”正在席卷

---

① 《华盛顿邮报》，1979年5月23日。

② 参阅《消息报》，1978年10月26日；莫斯科电台，1978年10月29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8年10月31日，第H页；莫斯科电台，1978年12月20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8年12月22日；《消息报》，1979年1月17日。



南部非洲；到了今天，这种“改革之风”的力量已经达到了飓风的级别，而苏联的政策却对这种“改革之风”起不了作用。

不过，苏联在南部非洲的广泛兴趣，需要美国做出认真的政策反应。我们已经看出，从长远观点来说，无论是前线国家还是民族解放运动组织，都不会采取盲目亲苏或盲目反美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说，苏联把希望寄托在黑非洲国家那些政治上还不够老练的人身上。苏联告诫他们说，美国企图维护白人少数政府和建立新的殖民主义统治。从一定程度来说，非洲国家看来还算是老练的，它们不会接受苏联的政策。

美国可望变得非常老练，它不会对苏联在南部非洲的策略采取过激反应。1978年6月，卡特总统在安纳波利斯发表谈话；1978年10月，美国驻苏大使马尔科姆·图恩在亚特兰大发表谈话。这两次讲话都是美国非常老练的表现。卡特说，甚至有些马列主义组织都不再把苏联看作楷模了。图恩则说，由于有上述讨论到的各种因素，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预料苏联在非洲不会有大量的存在。

如果存在着反应过激的危险，那么，也存在着反应不足的危险。正如唐纳德·扎戈里亚指出的那样：自1975年以来，在非洲和亚洲已经有七个亲共的组织用武力夺取了政权。<sup>①</sup>从全球观点来看，这样的实际情况一定会给许多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改革之风”不但席卷了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南

---

<sup>①</sup> 唐纳德·扎戈里亚：“进入不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新联盟”，《外交季刊》，1979年春季号，第57卷，第4期，第733页。

部非洲，而且席卷了反美的全世界。不做反应就会制造出美国实际上已对苏联让步的假象。

总之，南部非洲的未来将由本地区的人民来决定。不过，必须记住：他们选择的未来，将会受到该地区的内外势力的影响。正是这种实际情况，才使苏联对南部非洲政策继续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既对美国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又对南部非洲各国政府具有重大利害关系。

## 第 四 章

### 苏联与安哥拉

阿瑟·克林霍弗\*

在古巴的帮助下，苏联促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1975—1976年安哥拉战争的胜利。接着，苏联又在1976年10月与安哥拉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苏联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第一次签订这种性质的条约。苏联对安哥拉的政策与苏联全面染指非洲的发展是一致的，不应当看作是异常的。苏联在安哥拉的卷入程度，只不过是着重指出了一种已经明显的趋势而已。所以，1977—1978年苏联在埃塞俄比亚所起的作用，很显然是在安哥拉已经实行的各项政策的进一步扩大。

苏联在安哥拉的行动是其8个基本政策要素的例证，可

---

\* 作者阿瑟·克林霍弗 (Dr. Arthur Klinghoffer)：拉特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专著有：《苏联对非洲社会主义的看法》(1969年版)、《苏联在中东的石油政策与苏美关系》(1976年版)、《苏联与国际石油政治》(1977年版)和《苏联与安哥拉战争》(即将出版)。他还在《非洲报道》、《非洲季刊》、《现代非洲研究杂志》、《今日世界》、《亚洲调查》和《社会经济研究杂志》等期刊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译者

以说明苏联在非洲的政策全面演变过程：<sup>①</sup>

(一) 一般地说来，苏联选定了非洲统一组织的立场：即必须维护非洲国家领土完整。为少数种族争取民族自决的观念受到诽谤，分离主义受到谴责。苏联反对加丹加和比夫拉旨在建立独立国家的尝试，而且，苏联最近还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厄立特里亚分裂主义分子。在安哥拉，苏联始终谴责卡宾达的分裂主义和肢解安哥拉领土的尝试。

(二) 苏联日益关心在非洲的后勤支援特权。最突出的例子是，在1972年以前苏联就在埃及扩大了影响，并且获得了港口和机场的使用权；另一个例子是，1977年以前在索马里就有苏联海军和空军了。苏联海军在非洲沿海的作用愈来愈大，所以，苏联向非洲提出使用港口的要求，以便进行维修和补充燃料。苏联人设法确保在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尼日利亚、刚果和其他国家有使用港口设备的特权。侦察飞机可以在几内亚的科纳克里和索马里的伯贝拉随意飞行。但是，现在这两个东道国已经废除苏联飞机在这些地方进行军事行动的特权。不过，苏联人的侦察飞机可以在安哥拉的罗安达起飞，而且，他们的军舰可以访问罗安达、洛比托和木

---

<sup>①</sup> 关于该作者以前对于苏联在非洲的政策分析，参阅《苏联对非洲社会主义的展望》，新泽西州，克兰伯里市，联合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苏联对非洲社会主义的看法”，《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罗格·卡尼特、伊万·沃尔格耶斯编，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苏联与非洲”，《苏联与发展中国家》，罗格·卡尼特编，巴尔的摩市，琼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苏联与尼日利亚：为什么苏联选择两派”，《非洲报道》杂志，1968年2月；《苏联对南部非洲的政策：安哥拉情况考察》，科罗拉多州，波尔多市，西方观点出版社，1980年版。

萨米迪什等安哥拉的港口。1979年4月，苏联最新的航空母舰明斯克号访问了罗安达。

(三) 苏联军人更加直接地卷入了非洲的冲突。在1967年比夫拉战争中，苏联军事技术人员曾经帮助过尼日利亚。在1969—1970年埃及—以色列的“消耗战”期间，苏联飞行员参加了作战活动。苏联向安哥拉派遣200名军事顾问，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1978年，苏联又向埃塞俄比亚派遣将军们去指挥作战。

(四) 苏联一直在利用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办法，努力与亚、非国家结成非正式的联盟。在1976年的苏联—安哥拉条约以前，1971年5月，苏联与埃及签订了条约，1971年8月，苏联与印度签订了条约，1972年4月，苏联与伊拉克签订了条约，1974年7月，苏联与索马里签订了条约。接着，1977年3月，苏联与莫桑比克签订了条约，1978年11月，苏联与越南、埃塞俄比亚签订了条约，1978年12月，苏联与阿富汗签订了条约。苏联与埃及、索马里签订的条约，后来被埃及、索马里废除了。

(五) 古巴人已经成为苏联人在非洲的重要助手。1963年，古巴士兵曾经跟阿尔及利亚人一起反对过摩洛哥人，70年代初期，他们又跟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一起反对过葡萄牙人。现在，那个国家改名叫几内亚比绍了。从人员（截至1976年3月安哥拉战争结束的时候为止，人数达17,000人）和武器方面来说，古巴军队在安哥拉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它早期在非洲所起的突击作用。古巴人在安哥拉的成功，导致了他们在1978—1979年对埃塞俄比亚的更

大规模的卷入。

(六) 苏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策，受到中国的重大影响。在安哥拉战争期间，中国跟扎伊尔紧密地站在一起，支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反对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中苏竞争也是明显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削弱了中国在南部非洲的地位，并导致了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游击队组织日益转向苏联，以争取物资援助和财政援助。一般说来，独立的黑人政府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七) 南部非洲的问题日益引起苏联的关注。安哥拉战争使苏联在该地区的卷入升级了。接着，1976年7月，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瓦西里·索洛多维尼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驻赞比亚的大使。索洛多维尼科夫将作为苏联在整个南部非洲利益的监督员。他在莫斯科的职务，由苏联外交部长的儿子阿纳托里·葛罗米柯充任。1977年3月，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率领的、由108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问了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他是到该地区进行访问的最高级的苏联官员。苏联向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津巴布韦的“津巴布韦人民联盟”、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等解放运动组织提供援助，苏联坚决承认黑人多数统治，这些行动显然受到了多数非洲国家的赞赏。

(八) 在过去15年多来，苏联与非洲国家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现在似乎已被新的意识形态所取代。苏联人曾经愿意与任何愿意合作的非洲领导人密切接触，不管他

们属于何种意识形态都行。这样，苏联就与阿明、卡扎菲、以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亲密联系。但是，埃及、索马里、苏丹却驱逐了苏联顾问，并废除了苏联的军事后勤特权。这些行动可能使苏联认识到，牢不可破的政治关系必须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作为基础。“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显然是与安哥拉各个组织相互对立的、最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而且，苏联与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

苏联把它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描绘成是继续支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典范，描绘成是对反抗新殖民主义、外国雇佣军和南非势力的贡献。但是，苏联的实际动机是什么呢？从这场冲突的7个不同的方面来估价苏联在安哥拉的作用，或许有助于我们把影响苏联决策家们的那些最重要的考虑，原封不动地再现出来。

## 一、苏联的动机：安哥拉的国内形势

考虑到安哥拉的国内政治动态，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赞扬，显然远远超过了对其对手“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两个组织的赞扬。<sup>①</sup>1964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阿戈什蒂纽·内图访问了莫斯科，苏联人同意向他的组织提供武器、在苏联帮助他的组织进行军事训练。1966

---

<sup>①</sup>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于1956年12月建立，“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于1962年3月建立，“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于1966年3月建立。

年，内图出席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1971年，内图出席了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1967年，内图出席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1970年，内图出席了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内图还是亲苏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团成员。

1973—1974年，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发生内讧的困难时期，苏联暂时停止了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输送武器的活动，但是，到1974年10月内图重新进行统治以后，输送武器的活动又恢复了。12月，至少有200名“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人员到莫斯科接受军事训练。截至1974年年底，苏联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的援助估计达到5,400万美元。<sup>①</sup>有人说，1974年年底苏联恢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的行动，干扰了安哥拉的非殖民化进程，因为1974年4月的葡萄牙革命，对于承认安哥拉的独立权利是有影响的。但是，苏联人却认为，他们一贯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反对葡萄牙人，并且继续执行他们过去的政策。他们指出，美国和中国总的来说仍然对反对葡萄牙的斗争持冷淡态度，但是，在非殖民化进程发展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向“安哥拉民族运动”的竞争对手提供援助。<sup>②</sup>

苏联赞成1975年1月达成的阿沃尔协定，该协定规定3个民族主义组织均等地参加过渡政府。但是，苏联却非常关

---

① 彼得·万尼曼、马丁·詹姆斯：“苏联在安哥拉的干涉：企图与牵制”，《战略评论》杂志，1976年夏季号，第94页；布雷德·布里奇兰的文章，《华盛顿邮报》，1975年11月23日。

② 苏联与美国和中国的势力的相互影响将在下文讨论。



注丹尼尔·奇彭达的行动。奇彭达曾向内图发动过挑战，结果，奇彭达失败了，并于1974年12月被撵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达成阿沃尔协定的过程中，奇彭达没有起作用。奇彭达曾经呼吁，3个组织的军事力量应各为8,000人，他坚持以此作为达成协定的条件。但是，他的2,000—3,000人的军队根本没有得到承认。1974年10月，奇彭达在扎伊尔的金沙萨设立了办事处，并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发展了紧密的关系。虽然奇彭达在阿沃尔协定中没有正式的地位，但是，他也在罗安达设立了办事处。不过，这个办事处在1975年2月曾经遭到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两次袭击，而且，奇彭达在安哥拉首都没有能够采取行动。奇彭达的部队正式加入“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使“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扩大了队伍。苏联早就担心发生这样的情况，结果，这种情况终于在1975年4月发生了。在军事上，“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已经超过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所以，“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补充了奇彭达的“非法的”部队这个现实，使苏联感到惊慌。在1975年3月和4月期间，“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经常严重破坏阿沃尔协定。由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遭到过一次进攻，所以，苏联人把他们在1975年春季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大批武器的行动，看作是对奇彭达和对“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破坏阿沃尔协定的必要反应。

甚至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7月取得了军事优势以后，苏联还在继续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武器，苏联人想与美国、南非和扎伊尔进行对抗，因为美国曾经向

“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提供援助，南非和扎伊尔的部队曾经直接干涉安哥拉的内战。苏联人担心，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势力，会在拟定的11月11日独立日期以前夺取首都罗安达，苏联人还担心，严重的内战会使葡萄牙推迟从安哥拉撤退。为此，苏联采取了加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军事地位的行动，苏联企图借此宣称：它对11月11日独立的罗安达政府是有能力进行控制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苏联人曾经与古巴人积极地进行合作。

当“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宣布建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苏联人立刻予以承认，并开始把他们的援助描绘成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公开支持。他们还把自己的这种援助与美国向反政府势力提供的公开援助加以对比。实际上，“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在新里斯本（万博）建立了一个敌对政府，不过，并没有国家予以正式承认。所以，苏联有理由宣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是合法的主权国家，因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一个月，就获得了大约30个国家的正式承认。

苏联坚持非洲统一组织关于维护非洲国家领土完整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帮助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反对“分裂主义”势力的斗争。莫斯科认为，苏联的援助是为了保卫一个遭受外来侵略的国家。《真理报》宣称：“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安哥拉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内战，而是（分裂主义势力）对安哥拉人民的全面干涉”；另一篇评论断言：“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正在‘内战’的掩饰下对安哥拉进行干

涉，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sup>①</sup> 苏联发言人还指出，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已经提出过援助南部非洲解放力量的要求，因此，苏联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的援助，与这些组织的决议是一致的。而且，“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正在与之进行斗争的组织，是受到“种族主义的”南非支持的。<sup>②</sup> 根据苏联的看法，“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或“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胜利，将进一步促进安哥拉的资本主义发展、扩大帝国主义的影响和投资，阻碍其他南部非洲国家争取黑人多数统治运动的发展。这些都是由于出现了一个与南非进行紧密联系的政权的结果。

## 二、卢西塔尼亚发源地

苏联对葡萄牙革命和对葡萄牙在其他非洲国家的非殖民化进程所采取的反应，影响了苏联在安哥拉的动机。显然，安哥拉事件的发展是比较广泛的卢西塔尼亚政治进程的一部分。苏联领导对于其中的联系，有比较切合实际的了解。

在安哥拉，葡萄牙部队在一场似乎永无休止的反民族主义的斗争中陷入了困境，葡萄牙部队对此十分不满，从而促使“武装部队运动”在1974年4月夺取了葡萄牙政权。进行

<sup>①</sup> 奥列塔·伊格纳泰耶夫的文章，《真理报》，1975年10月30日，见《苏联与第三世界》，第5卷，第6—8期，1975年7月7日至12月31日，第406页；《真理报》，1975年11月8日，见《苏联出版社最新文摘》，第27卷，第45期，1975年12月8日，第16页。

<sup>②</sup> 见社论：“人民的安哥拉事业”，《新时代》杂志，第48期，1975年，12月号，第1页；K·尤拉洛夫：“安哥拉的新发展”，《非洲事务》杂志（莫斯科），1976年，8月号，第8期，第78页。

葡属非洲战争的重要人物安东尼奥·塞巴斯蒂奥·里贝罗·迪·斯皮诺拉，为4月革命提供了导火线。在《葡萄牙及其未来》一书中，他曾经呼吁用“政治社会办法”解决非洲的战争，他还认为，“孤立的军事上的胜利是靠不住的”。<sup>①</sup>斯皮诺拉被“武装部队运动”建立的新政权任命为临时总统。

斯皮诺拉鼓吹，要建立一个联合的卢西塔尼亚共同体，并在非洲的每个领地上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外交部长马里奥·索里斯和“武装部队运动”的多数成员，都想不举行公民投票就迅速实现独立。到7月下旬时，斯皮诺拉接受了后一种主张，于是，葡萄牙就开始了非殖民化进程。9月28日，斯皮诺拉被撤了职，但是，这件事没有使“武装部队运动”放弃让非洲独立的主张。几内亚比绍（在1974年9月10日）、莫桑比克（在1975年6月25日）、佛得角（在1975年7月5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1975年7月12日）相继获得独立。由于民族主义内讧使任何协商过的政治权力的转移都变得复杂化，所以，安哥拉的独立落在其他非洲国家的后面。

安哥拉是由葡萄牙军事委员会进行统治的，在阿沃尔协定签订以后，在安哥拉过渡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则有一名葡萄牙高级专员作为葡萄牙权力的象征。虽然阿沃尔协定允许葡萄牙军队可以驻扎到1976年2月29日，但是，在1975年11月11日安哥拉实现独立的那天，所有葡萄牙军队都从安哥拉撤走了。由于葡萄牙人离开了安哥拉，所以，他们就把主

---

<sup>①</sup> 见《非洲报道》杂志，1974年3—4月号，第19卷，第2期，第38页。除安哥拉外，葡萄牙人还卷入了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

权移交给了安哥拉人民，而不是移交给了安哥拉的民族主义组织，直到1976年2月，当“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葡萄牙一直没有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与葡萄牙共产党和葡萄牙社会党有密切关系，而且，它还通过“葡属殖民地民族组织会议”、与其他葡属非洲领地的主要民族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盟关系。“葡属殖民地民族组织会议”对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偏爱，超过了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对手的偏爱，而且，在后来的1975—1976年战争期间，几内亚比绍的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了一些部队和后勤支援，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也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捐献了基金。在这种形势下，到了1974年中期的时候，苏联领导人认为，在其他非洲领地上已经取得政权的“葡属殖民地民族组织会议”的配合下，左倾的“武装部队运动”，有可能在安哥拉建立一个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政府。后来，苏联又逐渐地对这种可能性不寄予希望，转而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军事解决办法承担了更多的义务。

对于内图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对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与苏联和葡萄牙共产党人的联系，斯皮诺拉将军都持谨慎的态度，而且，斯皮诺拉将军还努力阻止“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权力上升。<sup>①</sup>1974年6月19日，当他与美

<sup>①</sup> 见《每日新闻》，1975年4月21日，《事实和报告》杂志，1975年5月17日，第5卷，第10期，第22页；乔纳森·斯托里：“葡萄牙的红色革命：变化和继续的方式”，《国际事务》杂志（伦敦），1976年7月，第52卷，第3期，第422—423页。

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亚速尔群岛的拉日什会晤的时候，他对尼克松表示关心。那次磋商导致了9月14日佛得角萨尔岛会议的召开。“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奇彭达的代表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都出席了萨尔岛会议，他们想在安哥拉建立一个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内图派排除在外的联合政府。蒙博托同意在金沙萨设立奇彭达的总部，接着，“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就开始从扎伊尔领土进入了安哥拉。但是，9月28日斯皮诺拉被撤了职，这对苏联是有利的。这样，斯皮诺拉反对内图的尝试在萌芽状态时就被扼杀了。

但是，苏联对安哥拉潜在的白人极右派的阴谋非常关心，白人极右派可能企图叫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他们还可能企图叫安哥拉白人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建立联盟。苏联可能夸大了白人的政治力量，不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确实正在想方设法取得白人社团的支持。苏联呼吁白人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并且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描绘成是安哥拉唯一的多种族的组织。<sup>①</sup>苏联分析家们提出了一个居心叵测的理论，认为安哥拉的白人极右分子可能发动政变，其根据是：1974年9月7日至10日，莫桑比克的白人极右派发动了未遂叛乱；9月28日，葡萄牙的亲斯皮诺拉的“静悄悄的多数派”举行了示

---

<sup>①</sup> 见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对非洲英语广播，1974年11月27日，引自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4年12月5日，第235页；莫斯科广播电台对非洲葡萄牙语广播，1974年12月11日；以及同一出处，1974年12月12日，第240页。

威游行。这两者可能有联系。<sup>①</sup>

1974年10月，苏联向内图提供了武器，这可以说是为了对付萨尔会议和对付白人极右分子的阴谋而采取的一种反应，也可以说是为了对付扎伊尔、美国、“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奇彭达的日益发展的联盟而采取的一种反应，该联盟反对被苏联看作是真正的、并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支持的革命进程。1975年1月，亲“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安东尼奥·奥尔巴·罗萨·库廷霍，被免除了安哥拉军事委员会元首的职务，这件事进一步证明：反革命的势力正在增长。同样，由亲斯皮诺拉的势力于3月11日在葡萄牙搞的未遂政变，据认为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在那个月里发动的进攻有联系。<sup>②</sup>而且，斯皮诺拉的支持者们的失败，导致美国更深入地卷入葡萄牙的国内政治，美国企图阻止葡萄牙共产党的发展。正象后来揭露出来的那样，非常委员会（负责批准中央情报局秘密活动的全部专款）在1975年4月投票通过了中央情报局在葡萄牙所需的专款。苏联还认为，美国正在亚速尔群岛煽动分裂主义，以便保住美国在那里的基地。<sup>③</sup>

1975年4月，葡萄牙在举行大选中，共产党人获得了不

---

① 奥列塔·伊格纳泰耶夫：《在非洲的秘密武器》，莫斯科；伊兹达蒂斯泰沃的文章，《进步》杂志，1977年，第103页。见詹姆斯·米特尔曼：“莫桑比克的国家权力”，《争端》杂志，1978年春季号，第8卷，第1期，第7页。

② 法奥多尔·塔拉索夫文章，《真理报》，1975年4月24日，第5页；莫斯科电台对非洲葡萄牙语广播，1975年3月14日，引自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摘要》，1975年3月18日，第1卷，第A5/2页。

③ 塔德·肖尔茨：“里斯本和华盛顿：在葡萄牙的革命背后”，《外交政策》杂志，1975年冬季号，第21期，第36—37页、第42—43页；V·库兹涅佐夫的文章，《消息报》，1975年9月23日，第4页。

到13%的选票。当极左分子瓦斯科·多斯·桑托斯·冈卡尔维斯在8月底被解除首相职务时，共产党人又没有走好运。取代他当首相的是比较温和的乔斯·巴普蒂斯塔·平海罗·迪·阿泽维多。50万安哥拉白人难民的涌入，促使葡萄牙的运动急剧向右转。苏联人对葡萄牙国内政治中潜在的极右倾向很担心，而且早就主张他们应当留在安哥拉。<sup>①</sup>1975年11月25日至26日，葡萄牙共产党人参加了反阿泽维多政府的未遂的极左叛乱。

1975年春季、夏季和秋季，共产党在葡萄牙政府中的力量削弱了。苏联曾经指望共产党有足够的影晌，去推动“武装部队运动”沿着亲“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方向发展。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在安哥拉，“武装部队运动”通常是起中间势力的作用，而且，它不准备把政权移交给“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当苏联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加速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武器，他们想在战场上解决政权问题。冈卡尔维斯政府的倒台，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因为它导致大批的古巴部队站到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一方。

### 三、地区关系

从地区关系来看，苏联人把安哥拉看作是一个试验典型，它将决定整个南部非洲黑人多数统治的命运。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正在企图推迟解放的进程，他们保证支持南非、扎

<sup>①</sup> 鲍里斯·皮尔雅泽金的文章，《消息报》，1975年7月19日，第4页。



伊尔和赞比亚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努力。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问题上，美国被看作是跟南非紧密合作的。莫斯科指出，扎伊尔和赞比亚拥护黑非洲国家与南非进行“对话”或者实行建立联系的“缓和”政策。苏联发言人认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安哥拉的胜利，将为消灭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白人少数统治铺平道路。后来，他们还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描写成是南部非洲解放组织的一种“促进因素”、并对该地区的军事均势的积极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对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全面支持”，是推动这些发展的主要原因。<sup>①</sup>

在“穷追”在纳米比亚、安哥拉边界的安哥拉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部队的过程中，南非部队多次闯入安哥拉境内。为了保护经济工程（主要是水力发电工程和灌溉工程），他们还在1975年8月占领了库内内区的一部分。南非是这些工程的主要参加者。嗣后，当南非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得到发展的时候，南非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以挫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目标的。1975年5月至8月，奇彭达、罗伯特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

<sup>①</sup> 《真理报》，1975年11月8日，第5页；《真理报》，1976年2月11日，第4页；亚历山大·伊格纳托夫：“罗安达的战争风云”，《新时代》杂志，1975年6月号，第23期，第13页；尤里·加夫里洛夫的文章，莫斯科广播电台对非洲英语广播，1976年3月27日，引自《苏联与第三世界》杂志，1976年1月1日至3月31日，第6卷，第1期，第50页。

都曾经与南非官员进行过会晤，到了9月，南非直接参加了安哥拉战争。<sup>①</sup>南非部队从纳米比亚向南推进，并派遣顾问帮助“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10月，南非发动过两次大规模的进攻，这些进攻是南非与白人雇佣军和忠于奇彭达的部队合作进行的。11月初，他们的北进在距离首都罗安达以南150英里的地方受到阻击。与此同时，在“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中服务的南非的顾问们，从北面开赴到罗安达的郊外。11月和12月，南非派遣了增援部队，从而，使参战部队增加到5,000人至6,000人。在这场冲突中，南非还使用了轰炸机。

苏联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武器，1975年秋季古巴部队大规模参加战斗，这两件事都与南非有关。特别是在安哥拉独立后，苏联继续向罗安达空运了大批武器，其目的就是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防御南非人，因为南非人仍然从南方威胁着罗安达。苏联人认为，南非的行动得到了美国的赞许。苏联人持这种看法的根据是：美国官员们曾经谴责“大陆以外的势力”卷入安哥拉战争，但是，直到12月下旬，美国官员却从来没有针对南非在安哥拉战争中所起

---

<sup>①</sup> 关于这些会议的情报，见《每日新闻》（坦桑尼亚），1975年7月29日，引自《事实和报告》杂志，1975年9月6日，第5卷，第17—18期，第5页；《明星周刊》杂志（南非），1975年12月13日，引自《事实和报告》杂志，1975年12月27日，第5卷，第7页；伊格纳泰耶夫：《秘密武器》，第137—138页；约翰·马库姆：《安哥拉革命》，第2卷，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8年版，第269页；莫斯科国内新闻处，1975年8月7日，引自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5年8月8日，第154页；莫斯科广播电台对非洲英语广播，1976年1月10日，引自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6年1月12日，第H页。

的作用向南非提出过公开的警告。<sup>①</sup>

扎伊尔为“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武器、基金和基地，并帮助中央情报局为美国援助“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打通了渠道。“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曾向扎伊尔提出过过境要求，以便它的部队从刚果经过扎伊尔、然后再到安哥拉去，但是，扎伊尔按照惯例一向拒绝这种要求。另外，在萨尔会议上，蒙博托曾经试图把内图从安哥拉危机的协商解决办法中挤走。在苏联人看来，扎伊尔是“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柱，它正在充当美国的代理人。特别是在扎伊尔开始直接干涉以后，苏联人认为扎伊尔在安哥拉战争中起的作用更大了。早在1975年2月，扎伊尔军官们就到“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部队中去服务了，7月，扎伊尔正规部队第一次参加了这场冲突。苏联人还对赞比亚保持警惕。赞比亚曾经援助过奇彭达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鼓励过南非卷入这场冲突。1975年4月在华盛顿会晤福特总统时，卡翁达总统曾经要求美国承担更多的义务。安哥拉独立以后，赞比亚强烈抨击苏联、古巴在援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

<sup>①</sup> 关于南非和美国的合作问题，见爱德华·马尔卡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非洲事务小组委员会安哥拉听证会上的证词，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76年版，第187页；伯纳德·诺西特的文章，《华盛顿邮报》，1976年2月4日；约翰·凯恩伯曼的文章，《卫报》，1978年4月21日；约翰·斯托克韦尔：《寻找敌人》，纽约，诺顿出版社，1978年版，第187页；约翰内斯堡广播电台对外英语广播，1976年1月19日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摘要》，1976年1月21日，第4卷，第B/2页；阿诺·迪·博什格拉夫与约翰·沃斯特的会见，《新闻周刊》，1976年5月17日，第53页。

除了反对美国人、南非人、扎伊尔人和赞比亚人以外，苏联人在该地区还有自己的企图。正在执政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影响，将使苏联对几个南部非洲解放组织（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起一定的影响。安哥拉可以作为对这些组织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把“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挫败，还有助于阻挠南非、扎伊尔和赞比亚进行“对话”的进程，扎伊尔和赞比亚都容易遭受安哥拉向它们施加的压力，因为它们向外运输本国的铜都要依赖通过安哥拉的铁路。因此，它们亲西方的倾向和与南非进行合作的情况，是可以改变的。从刚果到莫桑比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有可能联成一线，这样，苏联今后就会在南部非洲的斗争中获得极为有利的战略地位。刚果已经是苏联人的主要后勤中心，它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部队提供训练设施、向安哥拉转运苏联武器，并且成为古巴部队发动进攻的根据地。

南非卷入安哥拉战争的效果适得其反，因为它有助于把苏、古在那里的作用合法化。“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在黑非洲国家当中失掉了信用，因为：当外交势头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有利的时候，这些黑非洲国家都跟南非结盟了。对苏联的活动持谨慎态度的国家（象尼日利亚），站到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一边，因为南非显然是黑非洲憎恶的国家。据认为，南非的干涉要比苏联和古巴的罪恶大得多。

#### 四、非洲关系

非洲统一组织坚持阿沃尔协定、坚持对安哥拉三派组织进行调解。虽然苏联同意非洲统一组织的这种立场，但是，苏联却破坏了非洲统一组织的限制，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武器，对安哥拉进行干涉。到1975年7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这样，苏联人对非洲统一组织协商出来的任何联合解决办法，就只承担较少的义务了。对于苏联日益疏远非洲统一组织也有帮助的一件事情是，在那个月的下旬，艾迪·阿明当选了非洲统一组织下一届主席，这件事情使苏联与非洲统一组织的关系疏远了。虽然该组织的内部对于选择阿明有争议，但是，它却符合非洲统一组织的传统：由最高级会议的东道国担任下一届主席。7月的最高级会议早就拟定在乌干达的坎帕拉召开。所以，苏联担心阿明将在亲扎伊尔和反“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言行举止中，利用他担任主席职务的方便条件。

阿明在4月和7月与蒙博托举行了会谈，会谈取得了很多成果，所以，阿明同意在安哥拉问题上支持蒙博托。作为回报，蒙博托同意出席坎帕拉最高级会议、并支持阿明担任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sup>①</sup>7月上旬，阿明在金沙萨会晤了路易斯·兰克·弗兰克，他是卡宾达分裂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

<sup>①</sup> 见《非洲当代记录》，1975—1976年，纽约，荷兰人出版社，1976年版，第B362页。

他与蒙博托有密切联系。阿明支持卡宾达的独立权利，在那个月的下旬，兰克·弗兰克应邀出席了坎帕拉最高级会议。阿明的行动违背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利益，因为该组织已在军事上控制了卡宾达的大部分，该组织反对卡宾达分裂主义。

9月23日，阿明和蒙博托在金沙萨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交换了意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没有被邀请参加。<sup>①</sup>9月30日，在坎帕拉安排了另外一次会议，以便安哥拉各派组织向非洲统一组织建立的一个联合委员会反映它们的意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事先得到了通知，但是，直到阿明在9月29日夜晚给内图打电话以前，“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一直没有得到通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认为自己受到轻视，所以，它只派了几名观察员，而没有派正式代表团。<sup>②</sup>11月上旬，扎伊尔外交部长曼邓古·布拉·恩亚蒂说：“阿明总统对安哥拉问题的处理使蒙博托总统感到高兴。”后来，阿明致函蒙博托，感谢他的支持。<sup>③</sup>他还赞扬了美国、英国和中国在安哥拉问题上所采取的立

---

① 罗安达广播电台，1975年9月30日，引自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摘要》，1975年10月2日，第4卷，第B/7页。

② 罗安达广播电台，1975年10月1日，引文同上，《世界广播摘要》，1975年10月8日，第B/3—5页。

③ 坎帕拉国内新闻处英语广播，1975年11月7日，引自《事实和报告》杂志，1975年11月29日，第5卷，第24期，第13页；扎伊尔新闻社法语广播，1975年11月8日，引文同上，第13页。

场。<sup>①</sup>

在安哥拉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导致了苏联和乌干达两国关系的恶化。阿明谴责苏联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武器和在安哥拉独立日前夕暗示承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控制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阿明和非洲统一组织，都曾经希望在11月11日以前制订出某种妥协的解决办法。当苏联人试图在安哥拉问题上向阿明施加压力的时候，他在11月10日驱逐了苏联大使，以示报复。第二天，苏联人断绝了苏乌两国的外交关系。

阿明还使苏联人感到恼火，因为他拖延召开非洲统一组织关于解决安哥拉问题的最高级紧急会议。亲“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国家认为，它们在该组织中有多数的支持，但是，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国家，能把这次最高级会议一直拖延到1976年1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已经有效地疏通了许多非洲国家，特别是法语国家。最高级会议的表决结果是22票对22票，半数成员国同意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半数成员国则主张建立一个由三个组织的代表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乌干达当场避免站在任何一方。虽然阿明是本届会议的主席，但是，阿明在表决之后暗示：他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一边。

苏联人照样在安哥拉活动，他们毫不顾忌非洲统一组织

---

<sup>①</sup> 《非洲当代记录》，1975—1976年，第B366页。

的立场，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能对这场战争的进程起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他们还认为，阿明试图引导非洲统一组织去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不过，他们可能夸张了阿明的派别活动。阿明不同意承认“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新里斯本（万博）政府，他在亚的斯亚贝巴最高级会议上投了弃权票。而且，他也没有试图把他对卡宾达分裂主义的支持，变成非洲统一组织的政策。

苏联为古巴部队提供武器和援助，会得罪非洲统一组织的许多成员国，但是，苏联确切看出了非洲统一组织的弱点。事实证明：这个组织没有能力对各派组织进行调解，而且，它也没有向安哥拉派维持和平部队。在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在把苏、古的军事行动作为合法的行动来承认的问题上，非洲统一组织是有分歧的。当南非更加深入地卷入战争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走向胜利的时候，非洲统一组织中的多数看法与苏联的政策利益一致起来了。反对南非部队和白人雇佣军，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维护安哥拉的领土完整，加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联系，在这几个方面都有共同的想法。亚的斯亚贝巴最高级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非洲统一组织就正式承认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乌干达也正式承认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 五、国际结构

虽然从本质上来看，安哥拉对哪个超级大国都不是生命攸关的地方，但是，从全球的环境来看，安哥拉却是苏、美两国竞争的一个主要焦点。葡萄牙革命已经使两个超级大国都感到吃惊，而且，从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明显威胁来看，每个超级大国都对安哥拉迅速发生的非殖民化的进程起了作用。超级大国对世界战略均势的关心，超过了对非洲固有问题的关心，而且，安哥拉还成了在南非争夺影响斗争的一个试验场。另外，苏联和美国都想通过安哥拉来证明，它们决心使损害它们政治形象的那些最新阻碍发生逆转。苏联已经目睹到：1971—1972年美国和日本与中国亲近；1972年苏联的军事顾问被埃及逐出；1973年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被推翻。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以后，美国已经在中东抓到外交主动权，而且，总的说来，美国已经把苏联从这个进程中排挤掉了。在葡萄牙，共产党人想使“武装部队运动”向左转，但是，并不太成功。在国内，美国在水门事件中受到了创伤，在国外，共产党势力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取得了胜利。1975年春季，美国一直在企图恢复元气。

苏联发现，美国企图把安哥拉纳入美国的经济轨道。美国是安哥拉商品的最大进口国，而且，海湾石油公司是安哥拉的最主要企业，它的租税和特许权使用费的付款额，至少

占安哥拉预算的60%。安哥拉有大量的石油和钻石，而且，它还是一个产咖啡的主要国家。苏联对美国经济目的的解释，自然用的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但是，在安哥拉问题上，苏联对形势的解释是十分荒谬的。从海湾石油公司的活动来说，在国家利益与集团利益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对立，因为在1975年秋季租税和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额，都给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12月下旬，当这项支付开始被有条件的转帐所取代的时候，美国政府对海湾施加的压力，就导致了政策变化。

苏联人还担心美国想把安哥拉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外延，就象安哥拉受葡萄牙的控制时期所出现过的那种情况一样。而且，苏联害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张到南大西洋。<sup>①</sup>显然，苏联不想叫美国继续在安哥拉享有战略特权，其中包括：进出港口的特权、飞机过境和着陆的特权。与此同时，苏联却想享有这些战略特权。70年代，苏联曾经在非洲沿海国家积极地发展了一个装备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打赢这场战争以后，莫斯科就取代了美国原来享有的特权。侦察飞机可以在罗安达上空飞行的特权，也是一项重大收获。从战略上来说，假如人们把部队（古巴人）与设备的关系、海军支援的能力、空中侦察行动的范围和通讯网的发展考虑在内的话，<sup>②</sup>那么，苏联打入安哥拉

---

<sup>①</sup> K·尤拉洛夫：“安哥拉：正义事业的胜利”，《国际事务》杂志（莫斯科），1976年5月，第5期，第56页。

<sup>②</sup> 见斯科特·汤普森：“苏联势力的规划”，圣莫尼卡市，兰德公司，1977年10月，第1页。

的“霸权计划”可能比苏联拥有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更为重要。

在今后的年月当中，假如津巴布韦的主要冲突和南非的主要冲突发展的话，苏联打入安哥拉的“霸权计划”就能利用了。现在，安哥拉已经成为南部非洲的几个解放组织采取军事行动的后勤基地，这些解放组织是苏联武装起来的。另一方面，苏联人却好象不愿意利用他们在安哥拉港口的特权优势，去干涉好望角石油运输线上的油船。因为从波斯湾到西方石油输入国家之间的任何地方，缓慢而又没有武器的油船都可以受到拦截，所以，苏联在安哥拉水域的海军存在是多余的。况且，这种行动将构成类似战争的行动，它很可能引起西方做出军事反应。<sup>①</sup>苏联卷入安哥拉战争，主要是为使苏联处于一种切断西方石油运输线的有利地位。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 六、美国关系

苏联不得不考虑它在安哥拉的军事行动对苏美缓和的潜在影响。美国采取直接军事反应或向安哥拉几派组织及安哥拉邻国提供援助的可能性，苏联也不得不予以考虑。总之，

---

<sup>①</sup> 见罗伯特·普赖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交政策：民族利益与全球战略”，第8期，《国际事务政策论文集》，伯克利市，国际情报研究所，1978年版，第10—13页。

在安哥拉战争期间，尽管苏联的因素对美国决策者有明显影响，但是，美国的因素对苏联却没有太大影响。

1974年下半年美国在安哥拉的秘密活动，可能对1974年苏联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武器有一些影响，但是，苏联人可能更加担心“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扎伊尔和中国进行合作。<sup>①</sup>美国在1975年采取的行动更加重要。1975年1月22日，即在阿沃尔协定签订一周以后，美国的非常委员会决定：中央情报局可以向“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提供30万美元，但是，这笔专款不得购买武器。7月17日，又向“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追加专款，其中包含武器，是通过扎伊尔和赞比亚投入这场战争的。接着，又于8月20日投入了1,070万美元，11月下旬，投入了700万美元。总的说来，3,200万美元是现款，1,600万美元是武器。实际上，总数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因为原来批准向扎伊尔提供的专款实际上转手帮助了“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加上提供的武器作价都比较低，而且，当通过扎伊尔黑市兑换当地货币时，有一部分现金已经增值了。除了武器和专款以外，美国还向安哥拉派遣了军事顾问，中央情报局参加了安哥拉部队的训练

---

<sup>①</sup> 见维克托·塞丹科：“纳库鲁协定”，《时代》杂志，1975年6月号，第26期，第16页；塞丹科：“安哥拉敌人的阴谋”，《时代》杂志，1975年7月号，第30期，第14页；斯托克韦尔的文章，第258页；佩尔·瓦斯特堡（瑞典），1975年3月11日，引自《事实和报告》杂志，1975年4月5日，第5卷，第7期，第8页。

活动，中央情报局招募了雇佣军，有5架在扎伊尔基地上空进行军事行动的美国观测飞机，对安哥拉进行了勘测。<sup>①</sup>

虽然美国也卷入了安哥拉战争，但是，苏联的作用和美国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苏联人正在力图跟美国人进行对抗。苏联人至少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了3亿美元和200名顾问，并帮助古巴人把17,000人的武装部队运到安哥拉。美国的确想扩大自己的作用，但是，基辛格提出的2,800万美元追加专款的请求却被国会否决了。1975年12月19日，参议院以54票对22票表决通过了滕尼提出来的国防经费议案修正案，从而不能再为在安哥拉进行秘密行动增加经费了。1976年1月27日，众议院又以323票对99票表决通过了这项议案，因此，2月9日福特总统便签署了国防经费法案。

当参议院说明美国不会更深入地卷入这场战争的时候，苏联和古巴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持立刻就升级了。无论如何，2,800万美元是改变不了这场战争的进程的。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已经抓住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加上这些专款来得太迟，根本扭转不了这个事件的发展。况且，这些专款也不能有效地转变成为军事力量，因为“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不会使

---

<sup>①</sup> 斯托克韦尔的文章，第55页，第208—209页，第267—268页，第7章和第8章；西摩·赫尔什的文章，《纽约时报》，1978年7月16日，第12页；戴维·宾德的文章，《纽约时报》，1975年12月12日；“中央情报局在安哥拉的秘密战争”，《情报报告》杂志，国家安全研究中心，1975年12月，第1卷，第1期，第4页。

用能使它们避免失败的复杂化的武器。在战术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也有不足之处，但是，它有苏联训练的、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古巴部队的援助。在这个阶段里，只有南非的大规模干涉才可能是有效的，这样，就使美国处于无法获胜的形势之下了。从美国对非洲的全面外交来看，即使通过援助南非获得了胜利，从外交上来看也是一种失败，因为与南非进行联系，美国在多数非洲黑人心目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

1976年1月，苏联新闻部门暗示发现了一种用政治方法解决安哥拉冲突的可能性。<sup>①</sup>“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已经拥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而且，协商解决办法肯定会对它有利。苏联人可能修改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控制的民族团结政府，因为这样就有可能阻止“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继续袭击。但是，苏联人一定认识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反对谈判的，所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和平试探，似乎主要是为了蒙骗美国的。<sup>②</sup>苏联人想弄明白：附有滕尼修正案的国防经费议案，是否已经被众议院通过和被福特总统签署。苏联人不想叫美国把美国对苏联的贸易与美国对苏联在安哥拉行动的恐惧联系起来。苏联人还想弄明白：基辛格会不会取消原定在

---

<sup>①</sup> 关于苏联报纸对于谈判解决的前景的评论，见《真理报》，1976年1月8日，第4页；《消息报》，1976年1月30日，第2页。

<sup>②</sup> 美国政府确实受到苏联关于支持政治解决办法的宣传的欺骗。见菲力普·沙别科夫的文章，《纽约时报》，1976年1月6日，第1页；乔治·威尔逊的文章，《华盛顿邮报》，1976年1月5日；杰里迈亚·奥利赖的文章，《华盛顿明星报》，1976年1月31日。

1月下旬对莫斯科的访问，访问的目的是磋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

从1975年秋季开始，美国官员们就不断地攻击苏联对安哥拉的干涉，他们警告苏联人说，缓和受到了严重破坏。但是，苏联人却可以大胆地行动，因为他们认识到：美国人只会纸上谈兵，不会采取报复行动。美国没有施加经济压力，1976年1月5日，福特总统公开表示，美国不会用粮食禁运的办法去反对苏联在安哥拉的行动。为了继续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国务卿基辛格在那个月的晚些时候到了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否认有联系的说法，而且根本拒绝与他讨论安哥拉问题。

苏联人一定明白，美国对安哥拉问题发表的许多激烈言论，都是从美国的政治需要出发的。在把对水门事件和越南问题的反应继续加以扩大的过程中，国会力图通过向行政部门进行挑战的办法，维持它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权力。相反，共和党政府则想使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看起来是软弱无力的，并且由于在安哥拉不愿与苏联对抗而遭到失败。与此同时，福特总统正在与罗纳德·里根进行共和党的总统提名竞选，为了加强他与该党的保守派的关系，他不得不在口头上对苏联卷入安哥拉采取强硬的路线。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及美国特别想要避免“另一个越南”，苏联领导可能提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做出的大量许诺，会超过美国对“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支持，而且，苏联与美国的缓和关系可以抵挡一阵安哥拉冲突引起的紧张关系。

## 七、中国的牵制

1974年末和1975年初，中国的行动极大地影响了苏联在安哥拉的行动，不过，后来就没有影响了。必须强调，在安哥拉战争前夕，中国在南部非洲和中南部非洲的地位是非常强的。中国已经与扎伊尔、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发展了紧密的关系，1975年6月，当莫桑比克独立的时候，中国和苏联都立刻承认了它。中国还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有真诚的关系，而且，中国正在安哥拉援助“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实际上，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超过了苏联。1974年，中国提供的援助共达2.37亿美元，而苏联提供的援助只有1,700万美元。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总额，远远超过了苏联对非洲的援助总额。中国的援助集中在非洲大陆的南半部。中国向坦桑尼亚、赞比亚、扎伊尔和刚果提供的援助，超过了苏联提供的援助。<sup>①</sup>

1964年，乔纳斯·萨文比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分裂以后，他到中国去旅行、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sup>②</sup> 1966年，在他的领导下，当“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组成以后，有些高级军官是在中国接受的训练，而且，中国提供了少量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后来，当“安哥拉人民

---

<sup>①</sup> 美国中央情报局：《共产党对于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1976年7月，第32—33页。

<sup>②</sup> 马库姆的文章，第160页。



解放运动”内部的丹尼尔·奇彭达变成阿戈什蒂纽·内图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中国也向奇彭达提供了武器。<sup>①</sup>奇彭达与肯尼思·卡翁达的赞比亚政府有紧密的关系，又转过来与中国有良好的关系。

中国在安哥拉的重要卷入，是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合作进行的，两者之间的联系工作是由扎伊尔帮助安排的。扎伊尔跟着美国跑，在外交上承认了中国，而且，蒙博托于1973年1月和1974年12月访问了北京。扎伊尔显然是“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庇护者，而且，扎中两国的新关系，还导致了“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与中国建立了联系。1973年12月，“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霍尔登·罗伯特访问了北京，而且，中国人同意为罗伯特在扎伊尔训练部队提供军事教官。1974年5月29日，中国教官开始到达，他们至少有120人，也可能多达200人。8月和9月上旬，中国向“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提供了武器，10月，苏联向“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提供了武器，这个行动，可能受到了中国行动的影响。

虽然中国向“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援助，是一个刺激苏联的重要因素，但是应当指出，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想在安哥拉实行不偏不倚的政策。1974年，中国向“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圈派提供了武器，还向奇彭达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提供了援助。不过，中国给“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援助比给其他组织的援助要多。

---

<sup>①</sup> 查尔斯·埃宾格：“内战中的外部干涉：安哥拉内战的政治和外交”，《科学世界》杂志，1976年秋季号，第20卷，第3期，第686—688页。

中国称赞阿沃尔协定，并在1975年3月至7月接待了“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团。中国赞成非洲统一组织关于协商解决立场，而且，在安哥拉独立时，中国既没有承认罗安达政府，也没有承认新里斯本（万博）政府。中国还表示对安哥拉的几派组织都要进行援助，并在10月27日撤回了向“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派遣的顾问。在武器或后勤方面，中国是不能与苏联进行有效对抗的，而且，中国当然不准备与古巴部队的卷入进行对抗。中国也不想与南非合作，以免降低威信。中国希望美国能在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方面起较大的作用。

在1975年下半年和1976年的战争中，中国不是重要因素，但是，根据苏联的看法，中国仍然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扎伊尔的军队正在安哥拉作战，而且，它们的武器是由中国提供的。另外，北朝鲜正在向在扎伊尔境内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武器和派遣顾问。罗马尼亚正在武装这三派组织。

苏联特别担心中美两国进行勾结。中国和美国都是“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而且，两国在扎伊尔都起了重要作用。看来，两国从1974年中期起就开始在扎伊尔协调了它们对安哥拉的政策。苏联人断言，美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曾经在北京就安哥拉问题与中国官员进行过接触。<sup>①</sup> 1975年10月19日至23日，即在安哥拉独立以后，亨利·基辛格访问了北京，12月1日至5日，他又陪同福特总统访

---

<sup>①</sup> 伊格纳泰耶夫：《秘密武器》，第120—121页。

问了北京。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参议员查尔斯·珀西问基辛格在北京是否讨论过安哥拉的冲突，基辛格作证说，他不能在公开的会议上回答这个问题。<sup>①</sup>

## 八、战后的势头

1976年签订的友好条约、苏联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莫斯科—罗安达航线的开通、苏联为安哥拉培养学生，这些都加强了苏联与安哥拉的关系。1977年，内图获得了列宁和平奖金。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细微的迹象表明，苏联与安哥拉的关系加深了。安哥拉是1976年苏联在“五·一”劳动节标语口号中提到的唯一非洲国家。1976年11月，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九周年时，内图给勃列日涅夫打了贺电，《真理报》在刊登非洲领导人的贺电时，内图的贺电登在了首位。在以后的革命纪念日中，安哥拉首相洛波·多·纳西门托的讲话和勃列日涅夫的讲话，都登在同一天的《真理报》上。在外宾发表的15篇讲话当中，这是唯一由非共产党人发表的一篇讲话。<sup>②</sup>

安哥拉政府既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利益，也没有在经济上跟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纠缠在一起。在安哥拉，没有永久性的苏联军事基地，而且，安哥拉与许多西方国家发展了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尽管安哥拉政府公开宣布，它要致力于社会

---

① 《安哥拉听证会》，第49页。

② 《真理报》，1976年4月15日，第1页；1976年11月9日，第4页；1977年11月8日，第7页。

主义经济，但是，外国在安哥拉的投资已经增加，而且，海湾石油公司仍然在卡宾达营业。因为苏联不想叫安哥拉在财政上成为苏联的包袱，所以，苏联实际上可能赞成这种政策。

安哥拉政府的某些政治行动象征着苏联受到了挫折。1976年底，当安苏两国签订《友好条约》以后，安哥拉内政部长被解除了职务。苏联关系的强硬支持者尼托·阿尔维斯被调离了内阁。另外一个亲苏的人物乔斯·埃德瓦多·多斯·桑托斯的外长职务被撤销，他成了第一副总理，1978年12月，在另一次改组中，他的副总理的职务也被撤销了。1977年5月，尼托·阿尔维斯搞了一次夺权活动，苏联在这次未遂的活动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谴责尼托主义分子和集会支持内图的活动中，苏联的宣传报道非常迟钝。<sup>①</sup> 现有的证据表明：苏联了解和赞赏阿尔维斯的阴谋，而且，苏联事先没有告戒过内图。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作为马列主义的党而组建起来的，1977年12月，它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该党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标榜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sup>②</sup> 1976年10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sup>①</sup> 《真理报》，1977年5月28日，第5页；5月29日，第5页；5月30日，第8页，5月31日，第5页；6月1日，第5页；6月4日，第5页；6月5日，第5页。另见《安哥拉杂志》，1977年6月24日，引自《事实和报告》杂志，1977年7月13日，第7卷，第14期，第19页。

<sup>②</sup> 见《纽约时报》，1977年12月5日，第11页；《真理报》，1977年12月6日，第4页；《塔斯社》英语广播，1977年12月4日，引自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7年12月5日，第H页；罗安达广播电台，1977年12月10日，引自《事实和报告》杂志，1977年12月28日，第7卷，第26期，第8—9页；《每日新闻》（坦桑尼亚），1977年12月23日，同上引文，1978年1月11日，第8卷，第1期，第8页。

与苏联共产党达成了党的协议。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步骤，因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还没有从一个组织转变成为一个政党，而且，这个协议仅是苏联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伙伴达成的第六个协议。其他几个协议是苏联与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和马里等执政党达成的。

自从安哥拉战争以来，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古巴部队，日益利用军事力量来解决非洲的冲突，例如，在欧加登冲突和厄立特里亚冲突中就是如此。与此同时，古巴人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维持统治，而且，自从1976年安哥拉战争结束以来，古巴在安哥拉的部队实际上增加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担心南非、“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卡宾达分裂主义分子的军事威胁。安哥拉政府中的混血人和白人欢迎古巴人的存在，并把古巴的存在当作反对黑人战士的盾牌，这些黑人战士想把他们现在的职务撤掉。古巴人的撤离可能会有助于黑人势力的兴起，这股势力赞成与苏联保持更密切的关系。所以，苏联和古巴的作用，虽然在性质上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是不能够把它完全看作是互相补充的作用。当尼托·阿尔维斯及其黑人势力支持者企图推翻内图的时候，古巴部队帮助镇压了那次起义，但是，苏联可能更喜欢尼托·阿尔维斯取得胜利。

南部非洲各解放组织受到苏联援助的强烈诱惑，并极力限制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尽量不介入这些革命进程，所以，甚至连“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也正在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过去与中国有紧密关系的南部非洲国家，现在正在摆脱沉船。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都已经转向苏联，把苏联作

为它们的武器供应者，莫桑比克甚至与苏联人签署了一个友好条约。

安哥拉战争迫使美国重新确定它在非洲的政策和更加关注南部非洲的问题。在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中已经工作七年的亨利·基辛格，过去没有访问过南部非洲，1976年4月和5月，他作了一次广泛的访问，他还在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扎伊尔作了短暂的停留。9月，他访问了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南非。基辛格的基本想法是，努力争取使南部非洲问题协商解决，这样，苏联和古巴就不能强迫该地区接受它们的军事优势了。美国开始朝着争取黑人多数统治的方向努力，并加强与解放组织进行联系，其目的是支持黑人温和势力，因为这派势力掌权不会引起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少数白人撤离。基辛格的对非洲新态度，被卡特政府继承了下来，因为白人统治的寿命不会很长了。所以，美国深入地卷入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和津巴布韦问题的谈判，并试图割断美国与南非政府原来的联系。

## 九、一些分析性的意见

苏联公开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考虑到应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未来命运做出自己的反应，苏联在1974—1976年面临着几种政策选择：

(一) 苏联不卷入安哥拉的冲突，从而使自己站在严惩其他国家干涉的立场上。这种选择很容易就被否定，因为这种选择会使美国和中国都能够自由行动，并有助于建立“安

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一个组织的政府或“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两个组织的政府。作为南部非洲解放组织的唯一支持者，苏联还会失掉信任，而且，许多解放组织会日益转而依靠中国，把中国当作它们的保护者。

(二) 苏联武装部队直接进行干涉。同样，由于有后勤方面的因素和存在着美国对抗的可能性，这种选择也被排除了。另外，这样的干涉与过去苏联在东欧以外的行动非常不协调。苏联没有派军队支援北朝鲜或北越，所以，出兵支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最不相宜的。

(三) 苏联与非洲统一组织一起，为建立一个安哥拉民族团结政府而努力。万一“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不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这倒是一种退却的立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鼓励非洲统一组织去武装和资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不过，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非洲统一组织对安哥拉问题分歧太大，它没有办法去实行这样的政策。

(四) 苏联争取与美国达成一项关于任何超级大国都不许干涉安哥拉事务的协议。这样，缓和就会巩固；还可以对非洲人和葡萄牙人提出来的解决安哥拉冲突的办法进行探讨。但是，苏联人却无法保证使南非、扎伊尔和中国不站到“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一方。

(五) 苏联武装“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它派遣苏联顾问、并利用古巴军队进行干涉，但是，应当使苏联武装行动的水平尽量低一些，以免引起美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反

应。苏联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的援助要保障“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而美国由于在越南遭到失败仍然心有余悸，它将尽量限制它对“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支持。苏联人将冒一些恶化苏美关系的风险，但将想法保持缓和的基础。这就是苏联领导做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给苏联带来了最有利的结果。

苏联对安哥拉的外交政策目标是：巩固与南部非洲解放组织的关系，在安哥拉建立一个供它今后在南部非洲冲突中使用的军事行动基地；通过获得后勤特权使苏联势力打入安哥拉。在安哥拉，苏联人还想阻止建立扎一美势力范围或中国势力范围，并从政治上和地理上孤立扎伊尔，以便最后使蒙博托政府垮台。苏联还可能要求限制西方国家取得安哥拉的自然资源。

苏联在战场上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再次控制安哥拉，包括再次控制飞地卡宾达，重点是保住首都罗安达和其他主要港口。这种策略与后勤上的需要、以及“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地理影响和种族影响的方式是一致的。苏联的政治目标是：想把苏联描绘成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国，并想把美国和中国与反革命势力和种族主义势力联系在一起。苏联人还想把自己炫耀成是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可靠盟友和非洲国家领土完整的可靠捍卫者。他们试图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描绘成是一个多种族、非部族化的组织，并把它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进行对比，他们说后两



个组织是种族主义的、排斥其他种族的组织。另外，苏联人还想强调：在第三世界当中，在苏联和美国的重大利益没有受到损害的那些地方，缓和根本没有阻挡它们的行动。<sup>①</sup>

苏联人之所以制订这样的战略，因为他们认为在联合政府中，“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既不能取得选举胜利，也不能取得优势，所以，必须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战场上的英勇战斗和“武装部队运动”对它的偏爱，将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取得最后胜利。苏联领导被葡萄牙革命搞得惊慌失措，因为它没有准备好可以适应安哥拉形势的庞大计划。所以，苏联的政策，只是对于内部的冲突动态、及其他外部参与者制订的计划作出反应。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苏联的策略，主要是受军事形势和“武装部队运动”对待“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态度的制约。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地位的时候，或者当“武装部队运动”宁愿采取中立的态度、而不采取亲“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态度的时候，苏联武器供应的水平适应了这种形势。还有一件重要事情，是苏联不愿意提供战斗机。苏联人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可能会刺激扎伊尔和南非扩大空战，而且，美国也可能进行干涉。另外，在空战当中，“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可能会处于劣势地位，因为它可能更容易成为飞机攻击的目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固定基地是在城镇，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基地是在农村，农村

---

<sup>①</sup> 关于外交政策、战场和政治影响的目标，见莫顿·霍尔珀林：《原子时代的有限战争》，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63年版，第3—4页。

的基地比城镇基地灵活机动。

苏联在安哥拉的政策，至少暂时可以说是成功的。苏联已经得到一个政治的盟国。苏联在安哥拉的作用还产生了一个附带影响：苏联与南部非洲的国家和解放组织之间关系，已经得到重大发展。苏联安哥拉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牢固基础上发展起来，而且，1979年9月阿格什蒂纽·内图的逝世也没有引起重大变化。他的继任者乔斯·埃德瓦多·多斯·桑托斯总统说，他保证与苏联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于苏联人来说，一笔短期的资金可以逐渐变成一笔长期的财产。

## 第五章

### 苏联对非洲之角的政策： 干涉的决定

理查德·雷姆内克\*

这篇论文打算对苏联最近在非洲之角的政策进行评价<sup>①</sup>。时间大致是从1976年到1977年末，也就是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在欧加登发生冲突的时期，以及这场冲突发生以前的一段时期。苏联向埃塞俄比亚激进军政府（临时军政委员会）提供援助的重要决定，就是在这个时期里做出的。这些决定，终于导致了非洲之角外交上的重新组合。因此，这个时期是苏联在非洲之角政策的重要转折点。

这篇论文的意图，不是全面地、历史地叙述这个时期的重要事件。然而，扼要地叙述一下苏联在各个阶段向埃塞俄

---

\* 作者理查德·雷姆内克博士 (Dr. Richard Remnek)，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海军分析中心技术人员，曾在杜克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雷姆内克博士的专著和主编的书籍有：《苏联学者与苏联外交政策：苏联对印度政策的考察》(1975年版)；《苏联的社会学家与政策的制定》(1977年版)。此外，他还撰写过许多关于苏联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等方面的论文。——译者

① 我准备这篇论文时，曾经得到同事肯尼思·韦斯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比亚提供军事援助的重要事件，对于后面的论述将是有益的。

1976年12月，埃塞俄比亚与苏联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但是，援助额是有限的，大约只有1亿美元，而且，提供的只是T-34坦克之类的第二线装备。<sup>①</sup>当时，即将卸任的福特政府取消了军事援助计划。<sup>②</sup>1977年2月，即在亲苏的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中校，通过政变当上了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委员会最高领导人几周之后，美国刚上台的卡特政府以破坏人权为理由，宣布暂停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为了进行报复，临时军政委员会于4月驱逐了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关闭了美国的其他设施，包括一度重要的卡格纽电台。苏联乘机填补真空。门格斯图在5月访问苏联以后，两国签订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根据该协定，苏联将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价值大约5亿美元的现代化武器。<sup>③</sup>索马里不顾苏、埃两国新签订的军事协定，于7月侵略欧加登，这个军事行动，使苏联人增加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1977年11月13日，摩加迪沙毅然废除了它与莫斯科在1974年签订的“友好条约”，取消了苏联利用海军设施的一切特权、驱逐了苏联顾问，而且，还断绝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11月底，苏联人向埃塞俄

---

① 《华盛顿邮报》，1977年5月7日，第A<sub>1</sub>页；《华盛顿邮报》，1978年3月5日，第A<sub>1</sub>页。

② 《华盛顿邮报》，1978年3月5日，第A<sub>10</sub>页。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在过去两年里，福特政府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参阅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1967—1976年世界军事开支和武器转让》，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78年版，第129页。

③ 《华盛顿邮报》，1978年3月5日，第A<sub>10</sub>页。

比亚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运和海运。12月，大约16,000古巴陆军的第一批人员到埃塞俄比亚参战。1978年2月，埃塞俄比亚人在欧加登开始反攻，3月，索马里武装部队从欧加登撤退。

这篇论文主要论述在干涉的三个升级阶段里，影响苏联决定援助埃塞俄比亚的因素。这三个阶段是：在索马里7月入侵之前；在索马里入侵之后；在索马里11月驱逐苏联人之后。我们还试图分析莫斯科在这些阶段里做出政策选择的主要原因。必须了解这些决定，才能进一步评价苏联的政策。

苏联的行动对事态的发展立即产生很明显的影晌，这在苏联卷入第三世界的行动中是少见的现象。假如苏联人及其盟友（古巴人、南也门人、利比亚人等）不来援助临时军政委员会的话，埃塞俄比亚至少会出现混乱，非洲之角的地图也很可能要重新描绘。苏联的行动的确实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还为我们评价苏联的政策和评价苏联在何等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提供了少有的机会。我们还将探讨苏联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他们的政策是现实主义的还是非现实主义的？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或者说，只不过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

国际事务象体育比赛一样，不是在于你取得了哪一项目的胜利或失败的问题，而是在于你怎样进行比赛。所以，如何推行苏联外交政策的问题，例如，苏联人是鲁莽地推行还是谨慎地推行，是懦弱地推行还是大胆地推行，是迟钝地推行还是精明地推行，等等，这些问题为评价苏联的行动提供了附加的标准。

苏联对非洲之角有兴趣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在临近海域经常部署一支大约由18艘船只（1/3是战舰）组成的舰队。<sup>①</sup>但是，这个意见只是提出了苏联人为什么要到那里去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人们经常指出，非洲之角位于红海和印度洋的会合处，是世界上两条最重要海上航线的要冲。苏联舰艇在该地区的存在，对波斯湾石油生命线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全面战争中，人们当然会认为，油轮将成为苏联在该地区部署的军舰的攻击目标，但是，与其他地方的战争行动相比，这种行动的意义不大。在和平时期，苏联也不大可能以拦截油轮作为发动战争的方法。（当然啦，发动全面战争有更好的方法。）

苏联在印度洋部署海军的另外一种解释是：美国部署核动力舰队弹道导弹潜艇，对苏联领土构成了战略上的威胁。诚然，苏联人经常对来自印度洋的美国战略威胁表示担心。不过，他们认为把他们在该地区部署的非常有限的海军反潜作战能力作重大升级是不合适的，<sup>②</sup>而且，也没有听说苏联在那里举行过大规模的反潜作战演习。所以，苏联人似乎认为，在印度洋并不存在美国战略潜艇的威胁。

能够更好地说明苏联在印度洋的海军存在的，不是切断

---

① 实际上，苏联印度洋舰队向来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亚丁湾。

② 海军少校威廉·希克曼：“苏联在印度洋的海军政策”，《美国海军研究所记录汇编》，1979年8月，第44页。

海上航线或战略防御这类具体的战时任务，而是它在平时时期的作用。苏联已经在印度洋地区获得了重大的国家利益。从苏联的欧洲海港至太平洋海港，能够全年通航的最近海上航线要经过印度洋的水域。苏联海军不断地进入印度洋表明，苏联人想使这些海上航线保持畅通无阻。

苏联还尽量与该地区拥有丰富人力资源和非常重要物产的国家扩大联系。在过去十年里，苏联千方百计地利用海军来加强这种联系。苏联海军在印度洋的外交活动包括：正式访问海港（例如1970年4月对摩加迪沙进行的长时间外事访问，显然这次访问的目的是支援索马里政权反对一次所谓政变阴谋）；分别在苏伊士湾和孟加拉湾清除水雷和海港；在1971年印—巴战争时期和1973年10月中东战争<sup>①</sup>开始以后，为了对抗西方的海军势力而进行的紧急调遣；最近，在欧加登战争<sup>②</sup>高潮时期，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支援。因此，苏联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是苏联对该地区外交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苏联的印度洋舰队对海岸支援设施的需要，也是苏联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在估量苏联的印度洋舰队对海岸支援设施的需要时，应当记住：该舰队的活动区域距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有很远的路程，大多数舰队是从那里调遣的。按照一小时10至

---

<sup>①</sup> 苏联在印度洋的海军外交问题，在《苏联海军外交》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该书由布雷德福德·迪斯米克斯、詹姆斯·麦康内尔合编，纽约，珀加曼出版社，1979年版。

<sup>②</sup> 苏联海军直接参加了从亚丁向埃塞俄比亚进行海运的活动和护航的活动。参阅《泰晤士报》，伦敦，1978年2月12日，第9页。

12海里\*的正常航速计算，从那里到亚丁湾（距离为6,700海里）大约得航行3周的时间。<sup>①</sup>在1972年取得索马里的伯贝拉港以前，苏联在印度洋军舰的部署平均需要5个月的时间。因此，苏联军舰部署的时间都浪费在航行上了。为了保证有同样数量的舰艇继续值勤，苏联人只能通过延长部署时间的办法，来减少备用的舰艇数量。<sup>②</sup>

不过，舰艇部署的时间愈长，对后勤支援和维修保养的需要就愈大。而且，由于印度洋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甚远，所以，在当地的海港取得停靠特权是很了不起的事。在当地的海港，舰艇可以补充供给和进行检修，在海上检修是达不到满意效果的。1972年，苏联在伯贝拉港取得了停靠特权。在1972年以前，苏联舰艇访问过一些印度洋海港；1972年秋季，苏联运来一个干船坞，这对印度洋舰队的给养、舰艇维修、以及值勤船员的休息条件，都有很大改善。自那以后，苏联舰艇的访问次数猛增（见表一）。

然而，当地岸上支援的含义并不局限于海港的停靠特权。1972年，继埃及之后，索马里成为向苏联提供海港的停靠特权及岸上其他大量设施的第二个第三世界国家。苏联的停靠特权包括：专门使用长波电台的特权；使用索马里机场定期进行海上侦察飞行的特权。在伯贝拉，虽然苏联人还建立了

---

\* 1海里等于1.852公里。——译者

① 亚丁湾不仅是印度洋及毗邻地区最多的“军事行动”所在地，而且是季风季节的避风水域。关于苏联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参阅查尔斯·彼得森：“苏联海军活动的趋势”，《苏联海军外交》，第2章。

② 实际上，苏联人在伯贝拉取得停靠特权以后，他们增加了舰艇数量，并大大延长了部署时间。



表一 1967—1976年苏联军舰在印度洋的访问①

国 别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67— 1976
索马里	—	—	2	7	22	20	42	61	54	75	283
南也门	—	—	4	5	15	7	14	37	34	18	134
伊拉克	—	—	4	1	2	8	15	17	8	12	67
斯里兰卡	—	1	2	1	—	6	2	5	6	6	29
毛里求斯	—	—	1	7	1	9	1	2	2	1	24
印度	—	—	1	6	2	—	3	2	4	2	20
肯尼亚	—	—	1	4	—	—	2	4	1	—	12
北也门	—	—	1	2	—	—	—	1	2	3	9
巴基斯坦	—	—	5	2	—	—	—	—	1	—	8
马尔代夫	—	—	—	—	3	—	—	—	1	1	5
伊朗	—	—	2	—	—	—	—	—	—	1	3
坦桑尼亚	—	—	—	2	—	—	—	—	—	—	2
埃塞俄比亚	—	—	1	—	—	—	—	—	—	—	1
科威特	—	—	1	—	—	—	—	—	—	—	1
马达加斯加	—	—	1	—	—	—	—	—	—	—	1
塞舌尔②	1	—	—	—	—	—	—	—	—	—	1
苏丹	—	—	—	1	—	—	—	—	—	—	1
共 计	1	1	26	38	45	50	79	129	113	119	601

① 不包括海洋地质考察船和空间支援船的访问。

② 在1976年6月以前塞舌尔是联合王国的殖民地。

资料来源：根据迪斯穆克斯、麦克内尔编的《苏联海军外交》一书中的表2·7编制。

一个导弹操纵和贮存设施、以及一个机场，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这些设施。然而，他们享受的停靠特权是非常重要的。在索马里机场定期进行伊尔-38反潜巡逻机和图-95轰炸机演习，为苏联人的反潜作战提供了掩护，它极大地增进和改进了苏联人在印度洋的空中侦察能力。

应当强调指出，取得其他大量的岸上设施特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停靠特权不但会损害所在国的主权，而且会引起对于所在国不利的宣传（宣传所在国为苏联提供了“基地”）。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举一个实例：1975年7月，由参议员杜威·巴特利特率领的专家小组，被禁止进入伯贝拉电台。由此可见，索马里对这些设施的控制主权已经成了问题。虽然索马里高级军官（索马里秘密警察首脑、西亚德·巴雷总统的女婿苏莱曼上校）要求索马里卫兵允许巴特利特代表团进入该设施，但是，很显然，这个要求被该设施之内的苏联军官驳回了。<sup>①</sup>

因此，为什么甚至那些想为苏联海军提供支援设施的国家，也把它们的支援设施局限在水域之内，这个问题就好理解了。假如索马里不迫切需要武器，苏联人很可能得不到那里的岸上设施。<sup>②</sup>

---

① 美国国会：《苏联在索马里伯贝拉的军事力量》。参议员巴特利特向后勤部队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75年版。

② 从60年代初期起，苏联就成了索马里的主要武器来源。但是，作为海军停靠特权的报酬，他们在1972年实现了索马里武装部队现代化。在《苏联与索马里的影响关系》的论文中，作者探讨了苏联在索马里的停靠特权，认为这种特权是讨价还价的性质。这篇论文是1979年9月在西德举行的“苏联和东欧研究第二次世界大会”上发表的。

拆除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基地”，一向是苏联在印度洋的主要目标。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实际上，苏联人在伯贝拉的设施，都比不上美国在迪戈加西亚的“基地”，但是，苏联人认识到：如果他们丧失在伯贝拉港的停靠特权，他们就没有可供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实际上，在印度洋限制海军武器谈判前夕，苏联对取代索马里设施的前景是很悲观的。作为对苏联援助的回报，苏联人认为可以使用埃塞俄比亚的阿萨布港和马萨瓦港，但是，跟伯贝拉港相比，即使在平时这些海港也是十分拥挤的。<sup>①</sup>到1977年春季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海港可能很快被厄立特里亚游击队包围。<sup>②</sup>苏联海军在亚丁停靠的前景似乎也不美妙，亚丁有大型泊位、修理场和比较凉爽的气候，是一个比伯贝拉港要好得多的海港。但是，苏联军舰在亚丁的停靠特权比不上在伯贝拉的停靠特权。而且，由于1976年南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两国关系得到了改善，沙特阿拉伯不断地想叫苏联减少在该地区的存在，所以，苏联海军在亚丁停靠的前景变得更糟。<sup>③</sup>

---

<sup>①</sup> 1977年6月以后，当叛乱者切断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铁路时（这条铁路控制着埃塞俄比亚60%的海上贸易），阿萨布港的阻塞情况更加严重了。

<sup>②</sup> 后来，苏联印度洋舰队取得了达赫拉克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苏联人把它作为红海中的主要支援基地，用它取代了伯贝拉。参阅《底特律新闻》，1978年7月9日，第19页。

<sup>③</sup> 可以肯定，苏联后来在南也门也取得了重要的停靠特权，显然包括海上侦察飞机起飞的特权。参阅《圣地亚哥团结报》，1978年12月1日，第1页。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些收获与非洲之角发生的事件没有关系。当然，苏联人不能自以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索马里的设施取代。应当记住：苏联人在埃及丧失飞机场特权以后，仍然可以从当地起飞海上侦察飞机。

因此，如果苏联人在限制海军武器谈判期间能够保持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他们就可以从谈判中捞到很多好处，苏联人保住使用索马里的设施特权，是利害攸关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后来又援助埃塞俄比亚，而损害他们的停靠特权呢？显然，在当时来说，取得海军支援设施的特权，并不是主宰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政策的主要因素。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原因。

海尔·塞拉西被推翻两年以后，埃塞俄比亚的革命进入了不稳定的紧要关头。国有化、土地改革、以及为根除旧的帝制秩序而采取的其他措施，在城市和乡村都引起了反抗，出现了不安的风潮。虽然为厄立特里亚实行自治制定了“九点计划”，但是，临时军政委员会仍然坚持使用军事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样做就带来了悲惨的后果。1976年夏季，一支由40,000农民组成的“民兵”队伍，被厄立特里亚游击队轻而易举地击溃。第二年春季，厄立特里亚反叛者取得了胜利（他们几乎控制了主要城镇之外的整个厄立特里亚）。这就严重地挫伤了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士气。1976年底，埃塞俄比亚出现了分裂和混乱的局面。

外部势力也加速了这个进程。1977年5月，苏丹政府驱逐了苏联军事代表团，从而使苏丹与莫斯科的关系迅速恶化到了极点。苏丹政府积极援助厄立特里亚游击队，以及其他反对派组织，例如“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毫不奇怪，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国边境在春季出现了紧张局势<sup>①</sup>。

---

<sup>①</sup> 科林·勒古姆、比尔·利：《非洲之角的冲突》，纽约、伦敦，荷兰人出版社，1977年版。

在前一年里，埃、索两国边境也出现过紧张局势，不过，那次是索马里在吉布提搞的政治策略引起的。<sup>①</sup>从那时起，埃塞俄比亚就开始了征募和训练欧加登游击队的工作，但在1977年初以前，欧加登的叛乱并不活跃。所以，在1976年末和1977年初的几个月中，当苏联开始向埃塞俄比亚作重要许诺时，对于亚的斯亚贝巴军政权来说，迫在眉睫的危险并不是在欧加登。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在非洲之角出现的不仅是一个典型的“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对抗”，而且苏联的国家利益在另一个问题上（即把红海变成“阿拉伯湖”的计划）受到了挑战。红海安全问题是1977年初在阿拉伯国家（苏丹、埃及和叙利亚于2月在喀土穆；苏丹、北也门、南也门和索马里于3月在北也门的塔伊兹）的几次会议上提出来的。虽然这个问题尚未具体化，但是，苏联把这些谈判看作是沙特阿拉伯在该地区策划组成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一种尝试，其目的是阻挠以色列和苏联舰艇通过红海，并最终消除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所以，对厄立特里亚和其他反动势力增加援助，就被看作是企图在红海建立完整的阿拉伯国家链条的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苏联在索马里和南也门的影响仍然是强大的，但是，

---

<sup>①</sup> 1975年12月，法国政府宣布了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地独立的计划。从经济上来说，这个决定只对埃塞俄比亚有重要意义，因为埃塞俄比亚有铁路与该领地相连。虽然索马里想兼并这个领地，但也只好承认吉布提共和国。吉布提共和国的独立（1977年6月）受到法国军事存在的保护。苏联发表文章，欢迎吉布提独立，不过没有提及法国的军事存在。这无疑是暗示：苏联同意法国的安全保护。参阅A·尼卡诺洛夫：“在阿法尔和伊萨领地”，《新时代》杂志，1977年6月，第26期，第29—30页。

莫斯科担心埃塞俄比亚的分裂会迅速破坏它的地位。

苏联人援助埃塞俄比亚还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对于“社会主义大家庭”来说，苏联的援助将证明，苏联不仅愿意、而且能够日益对世界革命运动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对于第三世界，特别是对于非洲来说，这种援助将证明，苏联有能力使这些政权保持稳定、并使它们的领土完整得到捍卫。而且，由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军事作用下降，不稳定的政权可能日益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客座消防员”。

还应当广泛地注意到，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依附国”，曾向苏联提供过某些真正的利益。埃塞俄比亚有占黑非洲第二位的人口（为索马里人口的10倍），有供长期经济发展使用的充足资源，有作为“非洲统一组织”总部的首都（主要因为埃塞俄比亚有独立的历史传统），埃塞俄比亚既是一个重要的非洲国家，又是非洲之角举足轻重的国家。很明显，苏联在埃塞俄比亚的卷入，使苏联人有机会在非洲扩大自己的影响。

但是，莫斯科实现这种机会仍然是有问题的。高度依赖苏联援助的不稳定的埃塞俄比亚，要比稳定的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的事务中所起的影响小得多。但是，随着安全和稳定的增长，埃塞俄比亚可能对苏联采取比较独立的态度。如果莫斯科从它在第三世界的卷入当中吸取了教训的话，那么，教训就是：它不能期望受援国报答它过去提供的援助。当然，所有这些并不否认：一个左倾的稳定而独立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将跟莫斯科持有同样的观点。毕竟，独立的埃塞俄比亚不一定是反苏的。

苏联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是要冒风险的。诚然，在他们开始卷入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能否扭转埃塞俄比亚的混乱和分裂局面。

但是，他们可能有理由相信，埃塞俄比亚不会变成越南那样的泥潭。首先，他们满有把握使非洲之角的军事力量对比，变得对埃塞俄比亚有利。跟越南的情况不同，叛乱者们的武器数量是有限的。虽然阿拉伯的石油美元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购买到轻武器，但是，叛乱者们却买不到重武器。

然而事实表明：索马里援助了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叛乱分子，大部分武器是用苏制武器装备起来的庞大而现代化的索马里军队提供的。<sup>①</sup>这个行动可能使苏联人感到惊奇（甚至索马里的“反对”也有助于反证这一点）。即使是第三国把武器转让给一个违背“非洲统一组织”关于不破坏非洲边界的原则、对别国进行明目张胆的侵略的国家，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是不允许的。虽然索马里能够从其他来源得到油料、军事技术人员、轻武器、甚至重武器备件，但是它却不能补充重武器的损失。<sup>②</sup>所以，索马里刚开始进攻就注定要失败。

第二个因素是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士气。到1977年初期，

---

<sup>①</sup> 在索马里侵略以前，苏联是索马里的主要武器供应者和油料的唯一来源。虽然军事供应、备件、可能还有与军事有关的油料供应不足，但是苏联人未能阻止索马里发动进攻。虽然按非洲人的标准来说，索马里的军队又多又现代化，但是，它仍然不多，不过，它却足以使苏联的“短暂控制”徒劳无益。参阅汤姆·法里尔：《非洲之角的战争风云》，第二版，纽约，“争取国际和平学者签名”，1979年版，第116页。

<sup>②</sup> 《新闻周刊》，1978年2月20日，第40页；《经济学家》杂志，1978年1月7日，第50页。

出现了关于大规模军队叛逃的报道，还出现了在阿斯马拉的第二师哗变的传闻。<sup>①</sup>实际上，埃塞俄比亚人在1977年夏季遭到的一些失败，似乎主要是与军队中的不满情绪有关。7月，设防坚固的克伦市经过3天的战斗，就落入了厄立特里亚人之手。<sup>②</sup>9月，在埃塞俄比亚军队哗变以后，索马里人就攻克了重要的坦克基地季季加市。<sup>③</sup>

不论苏联如何关心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士气问题，都似乎无济于事。早在1977年4月，长达25年之久的美、埃军事友好关系结束以前，苏联就蓄意取代美国，作埃塞俄比亚的主要武器供应者了。<sup>④</sup>但是，要享受这种光荣就得负责保卫埃塞俄比亚的边境，只在口头上讲支援是不行的。<sup>⑤</sup>1977年7月，当索马里使用苏制武器去侵略欧加登的时候，苏联做出

---

① 参阅科林·勒古姆和比尔·利前引书，第48页。

② 法国《世界报》，1977年11月16日，第3页。

③ 法国《世界报》，1977年11月6—7日，第6页。

④ 参阅勒古姆、比尔·利前引书，第13页。

⑤ 到1976年，苏联已经明确赞成埃塞俄比亚在厄立特里亚的主权，撤销了他们对厄立特里亚游击队的援助。参阅1976年6月14日莫斯科电台对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广播；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6年6月16日，第H<sub>1</sub>页。苏联人同意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坚持现有非洲边界不容破坏的宣言，在欧加登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埃塞俄比亚。（关于1964年前同情索马里民族统一主义的声明，参阅1963年3月29日V·库德里亚夫泽夫在《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苏联人怂恿索马里人的领土野心，最近的事例是：1974年苏联索马里签署了友好条约。该条约的俄文版本的第7条，呼吁反对“殖民主义的一切形式和现象”。索马里则将这个短语译成“无论何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这是“索马里民族统一主义”的变相提法〔关于俄文版本，参阅《消息报》，1974年10月30日，第2页；关于索马里文版本，参阅《十月之星报》（摩加迪沙），1975年10月29日〕。应当指出：俄文的措词是不标准的，过去俄文版本似乎只出版过1971年的苏联埃及条约，嗣后，再没有出版过这类条约。为了避免把俄、索两种文本进行比较而产生使人烦恼的后果，该条约的出版时间推迟了好几个月。



反应的义务甚至更大。所以，似乎可以设想：1977年夏季，当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进攻压力之下，就要全面垮台的时候，苏联人应当有所作为，而不只是将外国顾问撤退就完了。事实上，大批古巴军队直接参战是1977年12月才开始的。当时，战线已经巩固，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士气已经提高，那主要是因为运来了大批的苏联武器，而且，埃塞俄比亚军队对索马里的侵略有了爱国主义的反应。因此，引进古巴军队是不必要的。

看来，苏联人低估了索马里，认为索马里不会对他们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做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当然，他们知道摩加迪沙不会欢迎这个决定，还可能预料到，索马里会对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和其他地方的游击队增加援助。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料想到，索马里会利用埃塞俄比亚的分裂和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军事脆弱性（从使用美国武器改为使用苏联武器）的机会，发动大规模的侵略。在这年春季，埃塞俄比亚安全的主要危险是在厄立特里亚和苏丹边境，而不是在欧加登。莫斯科早在4月时曾经明确向亚的斯亚贝巴担保，摩加迪沙不会进攻欧加登。<sup>①</sup>虽然埃塞俄比亚政府人士是在索马里进攻之后才公布这个消息的，但是这似乎十分确切地反应了苏联人当时的想法：他们正想在该地区促进苏联统治下的和平。那么，苏联做出这种错误的估计，原因何在呢？

苏联人把索马里的领导人看作是标准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因为，苏联人可能低估索马里的民族主义势力，就象

---

<sup>①</sup> 《华盛顿邮报》，1977年9月27日，第A14页。

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人士所声称的那样。<sup>①</sup> 苏联人很可能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对索马里人的影响。苏联人信心百倍地认为，索马里必须依赖苏联的武器、石油、技术人员和援助。<sup>②</sup> 确切地说，莫斯科可能还认为，摩加迪沙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承认苏联人支援埃塞俄比亚的决定。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苏联可能正确地推断出：西方国家不会在军事上赞成索马里想用武力达到“大索马里”野心的冒险。而且，为

---

① 7月，埃塞俄比亚电台广播说：

面对邻国的这些革命的活动，真正革命的索马里应当感到高兴，应当跟埃塞俄比亚在一起，去打击反动的敌人和国际帝国主义。对于那些跟社会主义的索马里领导人的看法相同的观察家来说，这种反应使人感到震惊。但是，对于那些傲慢地认识到索马里领导是以种族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观察家来说，这种反应就不足为奇了。

（《亚的斯亚贝巴革命埃塞俄比亚之声》英语广播，1977年7月18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报道》，1977年7月20日，第B2页。）10月，一位索马里官员指出：

俄国人从开始就了解，我们渴望重新统一索马里民族……当他们帮助我们建设军队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想过我们的意图吗？他们不但了解、而且同意我们的愿望，或者说，他们利用了我们的愿望，把我们摆布了……

（《巴尔的摩太阳报》，1977年10月28日，第6页。）

② 除了作为索马里的武器和油料的主要供给者外，到1976年，苏联人提供了2,500名军事和文职技术人员，他们隶属政府各部部长、苏联援助计划专家组和军事顾问团，并为索马里训练高级军官和文职名流。虽然索马里从其他来源接受了经济援助，但是，苏联以优惠条件为索马里的许多重大计划提供了大量信贷。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到1976年时，在索马里的中国经济技术人员比苏联经济技术人员多。参阅中央情报局，“对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援助”，1976年。但是，由于几乎全部中国技术人员都在执行一项建设600英里的公路计划，所以，中国人在索马里是受欢迎的，而苏联人却气势凌人，使人感到讨厌。

了避免索马里用现有武器进行重大侵略的危险，苏联人可能已经向摩加迪沙暗示：他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帮助埃塞俄比亚击溃这种进攻。<sup>①</sup>

虽然我们不知道苏联人为了避免战争而用大棒威胁过索马里没有，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们正在用胡萝卜去促进非洲之角出现苏联统治下的和平。从表面上来看，这好像是对付沙特和苏丹成立红海阿拉伯国家集团计划的行动，继古巴之后，苏联紧接着就在4月建议：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南也门和独立的吉布提共同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联邦，在这个联邦中，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将得到充分的自治。不论苏联人是否想到索马里准备接受这个计划，但是，他们似乎希望摩加迪沙看到，它可以通过莫斯科的调停来实现它的野心。<sup>②</sup>苏联人可能准备答应索马里的任何要求（例如：索马里的牧民通过边境可以不受限制；限制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地区的军事存在），不过，不许在欧加登升索马里国旗。但是，苏联人好象坚决遵守不破坏主权国家边境的原则，甚至在索马里人发动进攻以后战况不明的非常时期，苏联人也是如此。

事实表明，索马里当然拒绝了苏联和古巴的联邦计划，而选择了军事办法去解决索马里的“民族问题”。这种冒险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是使用武力的最好时期（当然不是在埃塞俄比亚完成向苏联武器系统过渡以后），他们还认

---

<sup>①</sup> 毫无疑问，他们也告诉了摩加迪沙，他们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的武器不会威胁索马里的安全。

<sup>②</sup> 科林·勒古姆和比尔·利前引书，第13页。

为：苏联与埃塞俄比亚“相距甚远”，无法援救。<sup>①</sup>

现有的证据表明：苏联期望索马里会比较谨慎地行动，但是苏联人做了错误的估计，正象苏联的一篇评论所说：

为了防止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发生武装冲突，苏联做了一切努力。但是，当索马里国家领导人丧失理智、置索马里人民的真正朋友的努力于不顾，在1977年夏季开始对埃塞俄比亚作战和索马里军队侵略埃塞俄比亚的领土的时候，苏联象历来一样，站在了侵略的受害者一边。为了击溃这次进攻，苏联应埃塞俄比亚的请求，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物资援助。我们这样做是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原则的，尽管这样做可能（事实上果然）使索马里领导人紧接着采取了不友好的反苏行动<sup>②</sup>。

除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外，苏联人在1977年7月以后的选择是被迫的。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援助埃塞俄比亚，特别要反对索马里用苏制武器去发动侵略。索马里的进攻，也是对苏联在非洲之角政策的公开挑战，如果不予以回答，就将损害真正的超级大国的形象。

但是，苏联人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的援助姗姗来迟，这表明，他们在非洲之角脚踏两只船的处境日益困难。据报道，在索马里开始进攻几周之后，苏联向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的速度是缓慢的，而且，数量是有限的。<sup>③</sup>与此同时，虽然苏

<sup>①</sup> 索马里人在这个事件后声称，美国政府唆使了他们的进攻。7月底华盛顿确实宣布过，当索马里正在进攻时，它“原则上”答应满足索马里的“合理的防御要求”。大约在一个月以前，据说西亚德·巴雷的私人医生、美国朋友凯文·卡希尔从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那里获悉，美国政府“反对去促进欧加登游击队的压力”。但是，正如美国负责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理查德·莫尔斯说，“……我们的保证并不是说：一个谨慎的人可以在我们的保证的基础上去发动进攻。”参阅《新闻周刊》，1977年9月26日，第42—43页。

<sup>②</sup> V·沃罗拜奥夫：“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政策”，《国际事务》杂志，1978年，第9期，第42页。

<sup>③</sup> 《华盛顿邮报》，1977年8月12日，第21页。

联向索马里运送重武器系统的活动已经停止，但是，运送轻武器和备件的活动却仍在继续，尽管规模缩小了和时间拖拉了。<sup>①</sup> 还有些情况证明：苏联对保持与索马里的关系是有兴趣的，最重要的兴趣（在索马里政权已经失去许多“革命民主”的诱惑力以后<sup>②</sup>）是海军停靠特权。甚至在苏联向索马里运送苏制武器的活动停止以后（最迟可能是10月中旬停止的），莫斯科仍然想保留它在摩加迪沙的军事援助计划的外表。虽然已经完成任务的苏联军事顾问未被接替，而且，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留在索马里的军事顾问实际上被索马里当局隔离在军营里，11月奉命离开的时候，苏联军事顾问的数量仍然是惊人的。（据索马里官方人士说，当时有1,678名苏联军事顾问及其家属撤退。）<sup>③</sup> 另外，在索马里人发动进攻以后，莫斯科与摩加迪沙签订了两个经济援助议定书<sup>④</sup>，毫无疑问，苏联人是想提醒索马里，它不仅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且，它应当想到苏联援助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虽然苏联人公开对埃塞俄比亚表示同情，<sup>⑤</sup> 强调尊重领土主权原则是谈判解决这场冲突的基础，但是，他们没有直接谴责索马里对

---

① 《纽约时报》，1977年9月16日，第A<sub>1</sub>页。

② 10月初，苏联人把埃塞俄比亚政权与索马里政权作了比较。参阅1977年10月1日莫斯科电台对非洲法语广播；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10月3日，第H<sub>2</sub>页。

③ 《新闻周刊》，1978年2月13日，第48页。

④ 8月，签署了一项协定，包括法诺莱大坝计划；10月，签署了另一项协定，包括水勘探计划。参阅《热带地中海市场》杂志，1977年8月26日，第2294页；摩加迪沙国内新闻处，1977年10月5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报道》，1977年10月6日，第B<sub>1</sub>页。

⑤ 参阅莫斯科塔斯社英语广播，1977年10月11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7年11月15日，第H<sub>1</sub>页。

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以免与索马里发生不必要的对抗。一直到11月摩加迪沙单方面废除友好条约和终止苏联海军设施的时候，苏联人才谴责“反动的”阿拉伯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抨击它们煽动索马里反对埃塞俄比亚、破坏索马里政权的革命成果和苏、索两国的关系<sup>①</sup>。

但是，苏联人显然想保持他们与索马里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却被迫加速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援助。经过几周时间的紧张外交努力，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这场冲突的希望仍然非常渺茫。苏联与索马里的关系十分疏远，当西亚德·巴雷在8月底到莫斯科进行经过长期推迟的访问时，勃列日涅夫甚至没有接见他。<sup>②</sup> 莫斯科认识到，近期之内的和平前景是暗淡的。据报道，莫斯科同意为埃塞俄比亚补充提供价值为3.85亿美元的现代化武器。<sup>③</sup> 从那以后，苏联向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的速度就加快了。<sup>④</sup> 在埃塞俄比亚极想与美国恢复军事关系的时候，<sup>⑤</sup> 苏联承担更多的许诺可以消除埃塞俄比亚对莫斯科骑墙态度的担心。但是，亚的斯亚贝巴对苏联继续向索马里运送武器感到恼火。9月18日，门格斯图在记者招待

---

① 莫斯科和平与进步电台英语广播，1977年10月28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7年10月31日，第H<sub>4</sub>页。

② 莫斯科塔斯社英语广播，1977年8月31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7年9月1日，第H<sub>1</sub>页。

③ 参阅《纽约时报》，1977年9月25日，第2页。大约在同一时期，苏联停止向索马里运送油料，参阅《十月》杂志（开罗），1977年9月11日。

④ 《巴尔的摩太阳报》，1977年9月23日，第2页。

⑤ 《巴尔的摩太阳报》，1977年9月18日，第2页；《华盛顿邮报》，1977年9月29日，第1页。

会上愤怒地说：“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向索马里提供武器，那么，这不仅是破坏它们自己的原则，而且是等于跟反动的摩加迪沙政权串通一气。”<sup>①</sup>这种令人难堪的公开谴责促使苏联人做出决定，很快就停止向索马里运送武器了。到10月中旬，苏联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公开宣布：苏联已经停止向索马里运送武器。<sup>②</sup>10月底，在门格斯图秘密访问哈瓦那和莫斯科期间，这两个社会主义施舍国似乎答应了门格斯图的请求，决定进一步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sup>③</sup>两周以后，在埃塞俄比亚的古巴军事顾问就从150人猛增到400人。<sup>④</sup>

虽然苏联人明显地日趋“偏袒”埃塞俄比亚，但是，在索马里人决定驱逐他们前夕，莫斯科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仍然不是公开结束的。索马里的断言是截然相反的，<sup>⑤</sup>然而，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古巴部队已经直接参战。大量苏联物资的空运和海运，古巴士兵的涌入，都是在索马里下达驱逐照会以后才开始的。

苏联掌握着惩罚索马里的大量手段，但是，在形式上，苏联继续与索马里保持着关系，苏联希望索马里不要采取这一最后步骤。所以，苏联对索马里的决定所做的第一个官方

---

① 《华盛顿邮报》，1977年9月27日，第A<sub>1</sub>页。

② 《亚的斯亚贝巴革命埃塞俄比亚之声》英语广播，1977年10月19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报道》，1977年10月22日，第B<sub>1</sub>页。

③ 《纽约时报》，1977年11月27日，第E<sub>1</sub>页。

④ 《纽约时报》，1977年11月15日，第1页。

⑤ 早在19月，索马里就断言说：有大批古巴军队正在欧加登作战。参阅1977年10月21日摩加迪沙国内新闻处索马里语广播；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报道》，1977年10月25日，第B<sub>1</sub>页。

反应只是说：“在索马里政府中，沙文主义情绪胜过了常理。”<sup>①</sup>

索马里执政的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一连开了十小时的马拉松会议才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不明智的。<sup>②</sup>它充其量是孤注一掷的决定。索马里人认为，作为驱逐苏联人的报酬，西方马上就会把援助送来。索马里人正在为得到这种援助而制造“理由”，他们声称，苏、古、埃三国对索马里的侵略已经迫在眉睫。<sup>③</sup>据说，由于驱逐了苏联人，沙特阿拉伯可能赏赐3亿美元。但是，这种传说并没有成为事实，<sup>④</sup>索马里人只得到很可怜的一点儿赏赐。

毫无疑问，由于莫斯科事先警告过摩加迪沙，指出这种反苏的行动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莫斯科不得不对索马里的大逆不道进行报复。为此，莫斯科和哈瓦那决定为亚的斯亚贝巴增加大量的援助。第一个标志是：在索马里下达驱逐照会以后，没过几天，苏联陆军副总司令彼得罗夫就来到埃塞俄比亚、并参加指挥反索战争。<sup>⑤</sup>更加明显的标志是：苏

---

① 莫斯科塔斯社英语广播，1977年11月15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7年11月15日，第H<sub>1</sub>页。

② 摩加迪沙国内新闻处索马里语广播，1977年11月13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报道》，1977年11月14日，第B<sub>2</sub>页。

③ 摩加迪沙国内新闻处英语广播，1977年11月14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报道》，1977年11月14日，第B<sub>3</sub>页。10月，索马里在摩加迪沙机场放走了被巴勒斯坦人劫持的西德人的一架勒夫特汉萨喷气式飞机。毫无疑问，这是想改进索马里在西方心目中的形象的一种表示。

④ 1977年11月24日，多哈卡塔尔国家通讯社阿拉伯语广播；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报道》，1977年11月25日，第B<sub>7</sub>页。

⑤ 《华盛顿星报》，1978年1月17日，第2页。



联在当月月底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空运活动。第二月，古巴部队也来到埃塞俄比亚直接参战。

除了索马里的公开挑战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对苏、古决定直接大规模干预欧加登战争起了作用。鉴于摩加迪沙已经下了“最大赌注”，所以，也就不能阻止苏联去加速这场战争的进程了。只要索马里的军队呆在欧加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坚决反对向索马里运送武器，即使通过第三国运送也不行。苏联人预言，只要没有苏联武装部队参战，只要苏联的目标仍然限于把索马里军队从欧加登驱逐出去，那么，就不会发生苏联与西方的军事对抗。实际上，苏联人和古巴人的直接卷入，使他们掌握了战局的较大控制权，并使他们比较容易地阻止了埃塞俄比亚去侵略索马里。<sup>①</sup>此外，苏联人可能认为，在索马里武装部队失败之后，大批的古巴军队仍留在欧加登，不但会阻止索马里的再次进攻，而且会阻止埃塞俄比亚对欧加登部族进行报复。的确，1.5万古巴士兵驻扎在欧加登，使莫斯科和哈瓦那在将来与摩加迪沙打交道时有了讨价还价的力量。

还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莫斯科大规模卷入欧加登战争的原因，似乎都与战况无关。不错，摩加迪沙废除索、苏“友好条约”与索马里发动最后一次重大攻势，从时间上来说两件事情赶在一起了。但是，恰恰是在苏联第一次空运开始时，

---

<sup>①</sup> 临时军政委员会的某些成员显然想夺取索马里的北部地区，以便在将来的谈判中用该地区交换欧加登。参阅《非洲》杂志，1978年3月，第79期，第19页。

对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的阵地发动的进攻达到了高潮。<sup>①</sup>在战场形势仍然严重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人需要苏联和古巴提供更多的援助，然而，在索马里刚刚发动进攻的几周里，这种援助却非常少。直到9月底，当埃塞俄比亚的哈勒尔外围防线已经巩固以后，苏联的武器援助才开始运进了埃塞俄比亚。

苏联和古巴对欧加登战争的联合干涉，也遇到了种种问题，并在实践中承担了种种费用。进行大规模的空运和海运是十分需要的，不过，政治方面的原因可能要比技术方面的原因多。苏联运输机通过的领空多数是直接援助索马里或同情索马里的国家。为了向埃塞俄比亚空运物资，苏联人发现，他们必须使用多种航线，必须践踏蒙特罗协定关于通过土耳其空中走廊的规定，<sup>②</sup>他们必须施用各种诡计，例如：列举假的最后目的地（通常是亚丁，它是苏联为埃塞俄比亚运送物资的主要中转站）。<sup>③</sup>有一次，他们还用民用飞机执行军事运输任务，因为民用飞机通过领空的要求已经获准。<sup>④</sup>

苏联人还不得不克服与海运有关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由于连接吉布提的铁路被切断，亚的斯亚贝巴不得不依赖通

---

① 《曼彻斯特卫报》，1977年11月28日。

② 《伊斯坦布尔国民报》，1978年1月27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西欧每日报道》，1978年1月30日，第T<sub>2</sub>-T<sub>3</sub>页。

③ 《新闻周刊》，1978年1月23日，第35页；《新闻周刊》，1978年7月17日，第54页。

④ 巴基斯坦当局在检查货物时，把几架可疑的安-22军事运输机扣留了。但是，当苏联大使亲自去进行干预时，这几架飞机又被放行了。参阅《外事报道》杂志，1978年1月11日，第5-6页。

往阿萨布的公路。但是，这条公路要经过阿法尔和厄立特里亚，在这些地区里，公路运输容易遭到游击队袭击。由于阿萨布港和适应两栖运输活动的亚丁的霍尔马克萨机场都很拥挤，所以，苏联人广泛使用登陆艇进行海运。<sup>①</sup> 为了海上护航，苏联人空前增加他们在印度洋的海军数量。<sup>②</sup> 他们是在丧失伯贝拉的停靠特权以后这样做的。

甚至在苏联的第一次空运以前，莫斯科就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大约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起码有一部分援助是需要偿还的。这次干涉本身，需要补充大量的费用，包括直接与空运和海运有关的费用，以及与用苏联驾驶员代替古巴在埃塞俄比亚值勤的驾驶员有关的费用。<sup>③</sup>

苏联为了进行干涉而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与在经济上付出的代价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美国政府声称苏联人在欧加登战争高潮时增加他们的海军力量，这表明，他们对限制印度洋海军力量没有诚意，所以，美国政府终止了1978年2月第四轮以后的会谈。<sup>④</sup> 但是，苏联人可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实际上，会谈早就因为他们丧失伯贝拉港而终止了。

另外，苏联人可能预料到他们的干涉在那些支持索马里的阿拉伯国家当中引起的反感，充其量只是暂时性的。鉴于

---

① 《泰晤士报》，1978年2月12日，第9页。

② 美国《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海上力量小组委员会海军课报处处长里尔·阿德米拉尔·沙皮罗的声明》，第12页。

③ 《纽约时报》，1978年2月14日，第1页。

④ 《纽约时报》，1978年2月22日，第2页。

没有采取阻止苏联空运和海运的有效措施，所以，阿拉伯的反应看起来并不十分严峻。

如果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苏联统治下的和平，那么，莫斯科显然没有成功。苏联人已经明显实现的目标，是给埃塞俄比亚带来了相当程度的稳定，这样，他们就打乱了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想在该地区建立军事集团的长远计划。鉴于索马里的武装部队（但不包括游击队）从欧加登被撵走，鉴于厄立特里亚和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所以，埃塞俄比亚激进的左倾军事领导人比过去安全了。但是，临时军政委员会对于苏联援助的依赖性，似乎并没有使莫斯科对埃塞俄比亚革命的进程起多大影响。实际上，苏联提供的武器可能使门格斯图有了勇气，他想利用军事办法解决埃塞俄比亚的政治问题。鉴于埃塞俄比亚军队向厄立特里亚发动了进攻，所以，临时军政委员会早些时候提出来的地区自治建议，便成了一纸空文。临时军政委员会能否用武力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仍然有待观察。从目前情况来看，临时军政委员会的现行政策，似乎已经为将来的不稳定播下了种子。

在埃塞俄比亚的执政党——劳动人民党的组建过程中，苏联人的努力也迟迟未获成功。<sup>①</sup>但是，这个“先锋”党能否成为莫斯科期望的党，即把埃塞俄比亚革命加以制度化，

---

<sup>①</sup> 《非洲秘闻》，1979年8月22日，第6—7页。

或者只是进一步巩固门格斯图的权力，这是不能断定的。应当指出，索马里军政权在1976年也组建了一个党。当时，苏联人曾把它册封为先锋党。但是，第二年这个党就加入了“反动势力”。尽管苏联人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除了把门格斯图的势力基础巩固之外，苏联人在埃塞俄比亚指导革命转变方面，可能不会有多大作用。

苏联人在埃塞俄比亚的收获不会象开始那样动人，苏联人在索马里的损失也不会象开始那样不可挽救。首先，苏联人在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获得的支援设施，已经弥补了他们在索马里的损失。

其次，尽管苏联人在索马里的存在结束了，但是，他们在那个国家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虽然原来的关系（即“用武器换取停靠特权”）的基础再也不能重新建立，但是，在将来恢复一定限度的亲善关系，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够排除的。<sup>①</sup>实际上，只要索马里人想用谈判办法解决欧加登问题，那么，苏联人和古巴人就会是理所当然的斡旋者。所以，不论非洲之角在苏联统治下的和平前景是如何遥远，但是，这样的前景确实是存在的。

---

<sup>①</sup> 关于索马里在最近有兴趣改善索、苏两国关系的表现，参阅1979年1月西亚德·巴雷在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特别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摩加迪沙国内新闻处索马里语广播，1979年1月20日；英国国外广播新闻处：《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报道》，1979年1月23日，第B页。）还应当指出：不论将来苏、索两国关系亲善的前景如何坏，西亚德·巴雷掌权总好比不掌权要好些。他毕竟曾经是苏、索两国友好关系的缔造者；任何想加强自己地位的继承人，都可能要摆脱苏、索两国关系亲善的障碍。作为在近年来幸免骚乱事件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之一的西亚德·巴雷，还可能有能力做出与莫斯科亲善的安排。

苏联人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可能是印度洋条约。虽然苏联丧失伯贝拉以后又获得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美国可能对以后的谈判丧失了兴趣。如果谈判不恢复，莫斯科就会丧失使苏联的主要安全得到法律保护的良机。

苏联人在索马里的损失，特别是印度洋谈判中止的损失，应当与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收获放在一起进行权衡。苏联人如果预料到支援埃塞俄比亚会引起这些后果的话，他们准会采取别的行动，这种可能性是排除不掉的。在开始卷入的时候，苏联人显然是想把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都搞到手。苏联援助埃塞俄比亚的理由是：苏联人十分强大，可以去冒险，他们不会使索马里最后疏远到废除海军支援设施的程度。

另外，人们有理由相信：即使苏联人预料到索马里的反应，他们也会这样干的。在非洲之角，苏联人企图迁就索马里人的民族感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答应过摩加迪沙叫他们不援助埃塞俄比亚的要求。他们可能认识到，如果他们屈从了索马里人在倚靠特权方面的敲诈勒索，那就会开创一个极为危险的先例。

所以，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莫斯科在非洲之角的得大于失。苏联人声称，他们援助埃塞俄比亚是做得对的。他们的确由于卷入非洲之角而坚持了“有原则性的政策”。由于对一个极端革命的政权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由于保卫了主权国家边境的不可侵犯性，由于对过去的决定（例如：先武装索马里，后武装埃塞俄比亚）承担了义务，最后，由于在遇到公开的挑战时采取了大胆的而不是轻率的行动，苏联人在非洲之角“站到了正义的一方”。

## 第六章

### 苏联对伊拉克的政策 (1968—1979)

罗伯特·弗里德曼\*

为了估价苏联对伊拉克政策的成功或失败，首先必须考察苏联对整个中东的政策，因为苏联对伊拉克的政策是它对中东总政策的一部分。其次，还必须考察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政权性质，因为苏联在与伊拉克交往中获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问题，都起源于伊拉克政权的特性。伊拉克政权自执政以来，一直是内外交困的。讨论完这两个问题之后，本文将考察自1968年7月伊拉克复兴社会党通过军事政变重新掌权以来，苏、伊两国关系的演变。

---

\* 作者罗伯特·弗里德曼博士 (Dr. Robert Freedman)，美国珀尔斯通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巴尔的摩希伯来语学院政治学教授。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著作有：《共产党集团中的经济战：苏联对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压力》(1970年版)；《1970年以来苏联在中东的政策》(1975年版，1978年12月修订再版)。另外，他还编写过《世界政治与阿以冲突》一书(1979年版)。——译者

## 一、苏联在中东的目标和策略

为了判断苏联在伊拉克的政策，首先必须论述莫斯科确定在中东目标的问题。观察家们对苏联在这个盛产石油、并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的政策，大体有两种看法。①一种看法认为，苏联的中东政策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即：竭力防止别国把该地区作为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和进行政治颠覆的基地；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苏联的中东政策基本上是进攻性的，其目的是限制并消除西方在该地区的影响，最后，由苏联取而代之。②笔者认为，苏联的中东目标主要是进攻性的，至

① 关于最近对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的研究，参阅罗伯特·弗里德曼：《1970年以来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第二版，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8年版。乔恩·格拉斯曼：《供给阿拉伯的武器：苏联与中东的战争》，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76年版。加利亚·戈兰：《赎罪日以后：苏联与中东危机》，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雅可夫·罗伊：《从蚕食到着人：苏联在中东的政策文件集》，耶路撒冷，以色列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关于苏联在中东的目标，参阅贝克尔·霍雷里克：《苏联在中东的政策》，加利福尼亚州，兰德出版社第R-504-FF号，1970年版。关于阿拉伯的看法，参阅穆罕默德·赫尔卡尔：《难题与人民委员》，纽约，哈普尔和罗出版社，1978年。

② 解决对苏联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联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 政治模式仍然是比较少的。关于对影响的一般考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戴维·辛格的文章：“国际影响：一种有效的模式”，载《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一书中的“影响理论”一节，詹姆斯·罗斯诺 编，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9年版。辛格对于在某一个对象国里导致行为缓和的影响和导致行为加强的影响做了有用的区分。用对象国的观点来对影响进行分析的另一本有用的著作是，马歇尔·辛格写的《强权世界中的弱国》，纽约，弗里出版社，1972年版，特别是其中的第6、7、8三章。参阅理查德·科塔姆：《竞争干涉与20世纪的外交》，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关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参阅《苏联和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阿尔文·鲁宾斯坦，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5年。关于苏联在埃及的影响，参阅阿尔文·鲁宾斯坦：《尼罗河上的红星：6月战争以来的苏联埃及影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少从60年代中期以来是如此。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中，苏联正与美国进行一场一方得益、而另一方受损的争夺影响的竞争。

为了削弱、并最终排除西方在中东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苏联领导人们施展了许多策略。首先是向该地区的依附国提供军事援助，<sup>①</sup>接着是提供经济援助。苏联援建的埃及阿斯旺水坝和叙利亚幼发拉底河水坝，是突出的实例，虽然这两个项目都有严重的问题。近年来，莫斯科又用签订长期友好合作条约的办法来确保自己的影响。已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国家有：埃及（1971年）、伊拉克（1972年）、索马里（1974年）、埃塞俄比亚（1978年）和阿富汗（1978年）。不过，埃及（1976年）和索马里（1977年）事后又把条约废除了。这两件事情表明：这种策略并不是太成功的。莫斯科还企图利用人们对西方的殖民主义和他们对阿拉伯产油国的威胁这种长期耿耿于怀的情绪。另外，在联合国、以及在阿、以和谈的日内瓦会议等国际讲坛上，俄国人还从外交上支持阿拉伯人。但是，苏联的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都有一定的限度。莫斯科继续支持以色列人的生存权利，因为在要求达成限制战略武器补充协议和改善贸易关系的时候，俄国人害怕不合时宜地影响苏联与美国的关系，还因为以色列的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借口，以便俄国人去团结阿拉伯世界中潜在的反西方势力。<sup>②</sup>

<sup>①</sup> 关于苏联的军事援助，参阅格拉斯曼、乔治·伦乔夫斯基：《苏联在中东的推进》，华盛顿，美国企业学院出版社，1972年版。

<sup>②</sup> 关于以色列在苏联的中东战略中的作用，参阅弗里德曼前引书，第8章。

苏联在中东用这些策略去追求影响时，也遇到了一些严重问题。在通常情况下，许多阿拉伯世界内部和地区性的冲突（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的冲突，南也门与北也门之间的冲突，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冲突，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冲突），都意味着每当苏联赞助一方的时候，就要得罪另一方，而且，往往会把另一方推向西方。其次，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存在，也给俄国人带来了麻烦。有时，共产党的活动造成了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1971年共产党支持的苏丹政变，70年代中、后期伊拉克共产党在伊拉克军队中发展组织的活动，这两件事是说明这种问题的最近的实例。<sup>①</sup>第三，自从1973年底石油提价以来，流进阿拉伯世界（至少是主要产油国）的财富，使阿拉伯人能够从西方和日本购买到先进技术，这有助于削弱苏联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关系。第四，自从1967年特别是自从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都复兴了起来。俄国人是无神论者，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活动遇到了障碍。最后，美国，其次还有法国和中国，都尽量反对苏联在这个地区取得占优势的影响。这常常会使中东国家在大国的争夺中坐收渔翁之利，从而阻止任何国家想建立优势影响的企图得逞。

---

<sup>①</sup> 关于苏联对阿拉伯世界共产党的政策，参阅罗伯特·弗里德曼：“苏联与阿拉伯世界的共产党，靠不住的关系”，《苏联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罗杰·卡尼特、唐娜·巴赖合编，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5年版，第100—134页。约翰·库利：“变迁中的阿拉伯共产主义沙滩”，《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第24卷，第2期，1975年，第22—42页。

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情况下，俄国人采取的总战略是：尽量扩大自己的影响，尽量削弱西方的影响。这个总战略企图把阿拉伯各国（不管它们之间是否有冲突）和“进步的”阿拉伯政治组织（例如阿拉伯的共产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联合成为一个广泛的阿拉伯“反帝”阵线，反对苏联所说的由西方帝国主义、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组成的所谓轴心。虽然阿拉伯人在1973年战争期间团结起来，反对以色列，并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他们的行动似乎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因为该阵线的成份非常复杂，所以，苏联的战略并不怎么成功。对莫斯科尤其不利的是，基辛格的精明外交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政策变化，使“阿拉伯的反帝团结”遭到分裂，并在1973年战后出现了一个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核心。当1977年1月卡特政府就职时，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sup>①</sup>但是，到1978年9月卡特、萨达特和贝京举行戴维营首脑会议时，苏联的地位又得到了改善。随后，1978年11月和1979年3月，伊拉克主持召开了两次反对萨达特的巴格达会议，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集团似乎已经瓦解了，苏联的地位则进一步得到了加强。然而，苏联却没有能够利用这种形势，去组成它梦寐以求的亲苏的阿拉伯国家集团。部分地说，这种发展至少是由于遭到了它的昔日盟国伊拉克的反对。

---

<sup>①</sup> 关于苏联在1975—1976年黎巴嫩内战时期的外交困难，参阅弗里德曼前引书，第7章。

## 二、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政权性质

伊拉克最近发生的未遂政变及事后一大批复兴社会党高级官员被处决表明，1968年7月开始掌权的伊拉克统治集团的权力基础是脆弱的。<sup>①</sup>1970年、1973年和1979年，先后发生了三次反对该政权的重要政变尝试，该政权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内，它面临着聚居在伊拉克北部山区的库尔德人争取自治的地方性冲突，它还面临着在伊拉克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对少数逊尼派穆斯林政权的统治的怨恨，执政的逊尼派高级领导人，大多数来自塔克里特城。甚至在塔克里特集团的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副总统哈尔丹·提克里蒂在1970年被赶下台，在1971年被暗杀（很可能是伊拉克“打击小组”干的），就是例证。

伊拉克复兴社会党还面临着许多国外问题。其一，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与统治邻国的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存在着矛盾。戴维营会议以后，双方的矛盾至少暂时有所缓和，虽然1979年7月的伊拉克未遂政变又使两国关系变坏了。其二，伊拉

---

<sup>①</sup> 关于用迥然不同的观点看待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的两本书，参阅伊迪丝·彭罗斯：《伊拉克：国际关系与国家发展》，博尔德，西方观点出版社，1978年版。马吉德·卡杜里：《社会主义的伊拉克：伊拉克政治考察》，华盛顿，中东研究所，1978年版。彭罗斯的文章严厉批评复兴社会党政权，而卡杜里的书却对复兴社会党政权推崇备至。关于复兴社会党的历史背景，参阅约翰·德夫林：《复兴社会党：从起源到1966年的历史》，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76年版。伊拉克共产党的作用在汉纳·巴塔图著的《伊拉克旧的社会阶级和革命运动》一书中有广泛的论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克与伊朗存在着边界争端。在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占绝对多数。国王倒台以前，伊朗一直接受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虽然1975年的两伊条约使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是，霍梅尼回国掌权以后，两国的冲突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回合。伊拉克复兴社会党面临的其他国外问题还有：伊拉克与科威特的边界争端一直未断，伊拉克与邻国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是紧张的，伊拉克与埃及的关系是不好的。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在与埃及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

最近，统治伊拉克的少数派独裁政权，对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颠覆威胁，是十分敏感的。伊拉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转向苏联的，伊拉克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虽然并非完全依赖）苏联的武器装备。同时，伊拉克领导人一直对伊拉克共产党的目标深表怀疑，认为伊拉克共产党是事实上的和潜在的夺权者。这种戒心有时会反过来导致苏、伊两国关系的矛盾，因为伊拉克把苏联看作是伊拉克共产党的强大支持者。尽管苏联不时地表白，各国共产党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夺取政权，但是，这种表白未能消除伊拉克领导人的戒心。

伊拉克领导人的这种长期疑虑的特性，还表现在它争取不过分地依赖任何外国援助的方针上。因此，在最初几年实行国有化和优先开发石油期间，伊拉克既向苏联寻求援助，又向法国寻求援助。石油提价以后，在全国发展国民经济时期，伊拉克不仅与苏联的公司，而且还与法国的、日本的甚至美国的公司，签订了重要合同。因此，苏联发现，它与伊拉克的贸易额在日益减少。为了避免过分地依赖苏联，伊拉

克还小心翼翼地向法国寻求军事援助。

然而，伊拉克领导人一面设法避免过分地依赖苏联，一面却又采取许多“苏联模式”的做法，对整个社会加强控制。伊拉克领导人在军队中建立了准政委的制度。这既有助于防止军事政变，也有助于用复兴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来教育军官。另外，伊拉克领导人还坚持党政分开，使复兴社会党居控制政府活动的地位，其方法是在每个政府部门里都建立复兴社会党的组织。同样，复兴社会党还在全国许多工厂、工会及其他官方或非官方机构中，建立了这种基层组织网。<sup>①</sup>虽然这种制度没有能够防止社会动乱或政变尝试，但是，这种制度至少有助于使执政者维持统治。不用说，推行这种制度可能是仿效了苏联共产党的做法，但是，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伊拉克领导是依赖苏联的。实际上，正如本文下面将要说明的，1973—1974年是伊拉克领导依赖苏联的高峰时期，后来，伊拉克就改变了这种依赖地位。

### 三、苏伊关系的演变（1968—1979年）

#### （一）依赖关系的发展

（1968年7月—1973年7月）

对伊拉克复兴社会党1968年7月重新上台执政，莫斯科的心情是百感交集的。一方面，5年前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在

---

<sup>①</sup> 参阅卡杜里前引书，第36—38页关于复兴社会党努力使党政分开的描写。

短短10个月的执政期间，屠杀了大批的伊拉克共产党员。这个政权是在推翻了阿卜杜勒·卡西姆之后建立起来的，俄国人与该政权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结果，苏伊关系就严重恶化了。另一方面，以贝克尔为首的复兴社会党人至少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温和稳健，比被推翻的阿里夫政权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但是，更重要的是，新政权的内外困难和波斯湾的动荡形势，为莫斯科改善苏伊关系提供了有利时机。

贝克尔上台后不久，两伊冲突就升级了。1969年4月19日，德黑兰宣布废除1937年签订的条约，该条约规定把两国的边界线定在夏台阿拉伯河的东岸。<sup>①</sup>又因伊拉克敌视亲西方的土耳其及波斯湾的君主制国家，实际上，伊拉克人受到了所有邻国的怀疑。他们还有国内的问题，例如：与库尔德人的持续斗争，普遍对现政权进行公开和隐蔽的反抗，1970年1月发生的未遂政变，等等。因此，伊拉克新政权陷入了内部矛盾和外部威胁的困境，它急需得到帮助。

苏联利用这种形势是可能的和适时的。1968年1月16日，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宣布：英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力量将只维持到1971年底。苏联看到了填补政治和军事势力真空的可能性。鉴于伊拉克公开反对有西方倾向的波斯湾君主制国家、公开反对美国拼凑波斯湾安全条约的尝试，所以，看来伊拉克是接受苏联援助的理想国家。<sup>②</sup>

苏联向伊拉克提供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1969年初，

---

<sup>①</sup> 参阅卡杜里前引书，第7页。

<sup>②</sup> 关于这个时期苏联在波斯湾的政策，参阅约德法特、艾比尔合著：《波斯湾的方向》，弗兰克·卡斯出版社，1977年版，第6章。

在巴格达开始举行出售军火的谈判，同年5月，伊拉克军事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两国达成了一项协议。<sup>①</sup>对于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人来说，与提供军事援助几乎同样重要的是，苏联愿意帮助伊拉克发展石油工业。在油价和钻探油量的问题上，伊拉克人与西方拥有的石油公司一直矛盾重重。<sup>②</sup>所以，伊拉克欢迎它的国家石油公司与苏联签署的协定。1969年6月，苏联向伊拉克提供了一笔为数7,200万美元贷款，用于钻井、勘探及油田设备，7月，苏联又向伊拉克提供了一笔为数7,000万美元的追加贷款，帮助伊拉克开发北部的鲁米利亚油田。1971年4月，苏联又提供了一笔为数2.22亿美元的重要贷款。按规定，后两笔贷款要用石油偿还，因为苏联发现自己的石油供应已经开始紧张了。<sup>③</sup>虽然苏伊两国在石油开发问题上意见一致，而且，苏联政府欢呼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人在1970年3月11日达成的自治协议，但是，在对阿一以冲突的问题上，苏伊两国的政策是有分歧的。伊拉克反对联合国第242号决议（苏联和埃及都承认了该决议），伊拉克还反对1970年8月的埃一以停火协议。1970年8月1日，《真理报》声称，伊拉克反对后一项协议是“莫名其妙的”。伊拉克反对苏联支持的这些协议，妨碍了苏联一直渴望建立的阿拉伯国家“反帝”联盟计划。但是，苏联领导并未对伊拉克领导施加任何压力，而是继续推进两国关系的发

---

① 卡杜里前引书，第144页。

② 参阅彭罗斯前引书，第10章和16章。

③ 同上，第427—428页。参阅阿瑟·克林霍弗，《苏联与国际石油政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展。1970年8月13日，两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合作议定书。1970年8月30日，苏联答应再向伊拉克提供一笔为数3,400万美元的贷款。<sup>①</sup> 这些事件表明，苏联对伊拉克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俄国人显然想与这个盛产石油和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在纳赛尔逝世和萨达特出任埃及总统以后，苏埃关系开始冷淡恶化。<sup>②</sup> 相反，苏、伊关系却开始迅速发展。

1971年12月，在印—巴战争时期，伊朗乘机强占了波斯湾的3个战略岛屿。伊拉克向阿拉伯世界的兄弟国家呼吁支持，但是，没有得到响应。这使伊拉克更加孤立了。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人的停战谈判破裂了。库尔德族领导人穆斯塔法·巴尔扎尼，指责当局不履行1970年3月11日的协议和阴谋杀害他本人。伊拉克政府开始大批逮捕库尔德人。库尔德族领导人返回巴尔扎尼山区基地，准备重新开战。1971年12月初，伊朗外长阿巴斯·卡拉特巴里声称，如果伊拉克内战重新爆发，伊朗将援助库尔德人。<sup>③</sup> 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为加强石油控制和增加石油产量而同西方石油公司进行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由于受到挫折和孤立，伊拉克再次转向了苏联。

1972年2月，伊拉克第二号实权人物、贝克尔的指定继承人萨达姆·侯赛因访问莫斯科，要求签订一项条约。苏联出于自身的需要，对此也很感兴趣。首先，这样做可以使俄

---

① 参阅弗里德曼：《1970年以来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第24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的描写，参阅前引书，第54—60页。

③ 《中东箴言》杂志，第2卷，第1期，1972年1月1日，第2—3页。

国人在阿拉伯世界建立另一个强有力的据点，并使苏联减少对埃及的依赖。或许更重要的是，苏联与伊拉克签订条约，可以加强苏联在这个盛产石油和政治形势动荡的波斯湾地区的地位。两个月之后，在柯西金赴伊拉克参加北部鲁米利亚油田竣工典礼期间，两国就正式签订了条约。

该条约与在11个月以前签订的苏—埃条约有许多相同之处。有效期为15年的这项条约规定，“在形势的发展威胁任何一方的和平或制造威胁和平的事件中，”伊拉克和苏联要相互联系。另外，双方都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加入反对另一方的任何联盟。但是，苏联在军事方面的许诺比苏—埃条约中的措词更模棱两可，苏—伊条约只是说，双方“将为加强防御能力而继续发展合作”。<sup>①</sup>

得到条约支持的伊拉克政府同西方石油公司谈判的立场更加强硬了。由于同西方的对抗日趋尖锐，伊拉克政府接纳了两名伊拉克共产党员进入内阁，进一步向苏联做出了姿态。<sup>②</sup> 1972年6月1日，苏—伊条约签订还不到两个月，主要的西方石油公司——伊拉克石油公司就被收归国有了。毫无疑问，苏联积极鼓励伊拉克的国有化决定。苏联早就敦促过阿拉伯国家把石油企业国有化，以便打击“西方帝国主义”。

实行石油国有化的第二天，伊拉克外长巴基就飞往莫斯科，要求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以弥补因为实行石油国有化而造成的损失。实行国有化的结果，使伊拉克损失了7.8亿美

---

① 卡杜里前引书中有该条约的内容，第241—243页。

② 彭罗斯前引书，第409页。

元的硬通货收入。俄国人自然愿意伊拉克增加对苏联的依赖，以便双方在动荡的波斯湾局势中更加紧密地合作。不过，俄国人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巴基到达五天之后，双方签署了一项协定，规定苏联帮助伊拉克运输石油，在摩苏尔（基尔库克油田附近）建设一座年产为150万吨石油的炼油厂，勘探南部地区的油田，并增加对巴格达—巴士拉输油管道的援助。同过去签订的苏—伊协定一样，这个协定规定，苏联的援助要用石油来偿还。<sup>①</sup>1973年，伊拉克向苏联的出口骤增，出口的几乎全部是石油产品。<sup>②</sup>

然而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严重依赖苏联期间，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人仍然小心谨慎，避免与莫斯科搞得过分紧密。所以，在巴基访问苏联不到一周以后，侯赛因立刻到巴黎进行正式访问。6月18日，双方签订了一项为期10年的协定。协定规定，法国石油公司将购买伊拉克国有化油田的23.75%的产品。<sup>③</sup>为了强调伊拉克愿意同法国进一步发展关系，侯赛因对《世界报》记者表示，他希望伊法关系的水平能上升到伊苏关系的水平。<sup>④</sup>为了避免过分依赖苏联，伊拉克还不局限于同法国发展关系。1972年8月，伊拉克还同意在比利时驻巴格达使馆中，增设一个美国办事处。1973年，伊拉克还与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了重要的石油协定。

---

① 《消息报》，1972年7月22日。

② 《1974年苏联对外贸易》，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75年版，第238页。

③ 彭罗斯前引书，第434页。

④ 同上，第435页。

虽然伊拉克想与苏联在相互关系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莫斯科在1972年7月被迫退出埃及后，为了抵消这次打击的影响，苏联更加强调大力发展苏伊关系。莫斯科欢呼伊拉克跟阿拉伯世界的“反苏主义”进行斗争。<sup>①</sup>苏联在这个时期采取的另一项策略是，鼓励阿拉伯国家建立民族解放阵线，希望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能起小伙伴的作用，以便影响阿拉伯民族领导人们采取更亲苏的立场。虽然伊拉克政权在口头上答应，要建立伊拉克共产党长期以来争取实现的民族进步阵线，但是，在实际上，它并没有认真去这样做。1973年6月30日，伊拉克发生了未遂政变，差点儿杀掉贝克尔和推翻他的政权。苏联的《新时代》周刊在报道这一事态的发展时，敦促贝克尔政府吸取经验教训，并最终实现复兴社会党、伊拉克共产党和库尔德民族党组成民族进步阵线的许诺。<sup>②</sup>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未遂政变的巨大震动，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伊朗的战争迫在眉睫，贝克尔政权答应组成全国民族进步阵线，不过要以保证复兴社会党进行绝对控制为先决条件。得到合法化的伊拉克共产党接受了全部条件，并参加了民族进步阵线，而库尔德人则拒绝参加这个阵线，从而使他们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当时，已经濒临全面战争爆发的边缘。

民族进步阵线建立后，在伊拉克内阁中有了共产党的两个席位。在伊拉克的石油工业发展中，苏联的援助起了关键性作用。苏联还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反对伊拉克的邻

---

① 参阅弗里德曼，《1970年以来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第100页。

② 《新时代》周刊，第28期，1973年，第17页。

国。1973年7月，苏联海军访问了伊拉克的乌姆卡斯尔港，这是苏联在伊拉克的影响达到高峰的标志。<sup>①</sup>不过，莫斯科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而且，在嗣后两年当中发生的事件，导致了这种有限的影响进一步减少。

## （二）依赖程度的减低

（1973年7月—1975年3月）

从未遂政变的影响中恢复过来以后，伊拉克政权面临着两大难题：一个难题是伊拉克与伊朗的冲突；另一个难题是伊拉克与接受伊朗军事援助的库尔德人的斗争。为了反击伊朗的挑战和把库尔德人从山区根据地撵出去，在这个时期里，伊拉克不但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而且需要额外赠款。石油提价的结果，该政权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购买到帮助经济发展的货物，还可以购买到军事装备。而且，该政权停止了伊拉克与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以货换货的交易，并要求直接用现金购买伊拉克的石油。这种新变化使伊拉克减少了对苏联的依赖。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它或许并不喜欢帮助伊拉克人去反对库尔德人。过去，苏联对库尔德人的政策是起伏不定的。两国关系紧张时，苏联向库尔德人提供援助；两国关系改善后，苏联又呼吁双方实行合作；到1974年春季伊拉克政府准备全面进攻库尔德人时，苏联认为有必要向巴格达提供援

---

<sup>①</sup> 关于苏联的这种港口访问的影响，参阅安妮·凯利：“苏联海军的港口访问与国际主义使命”，《苏联海军影响：国内外的困境》，迈克尔·麦克格维雷、约翰·麦克唐奈合编，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7年版，第510—529页。

助。在1973年阿—以战争期间，苏联在中东的地位一度有所改善，但是，很快就命运不佳了，因为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国埃及开始加入了美国阵营，而且，美国在战后努力寻求阿以脱离战斗的解决方法中担任了主角。在亲西方的埃及—沙特阿拉伯轴心产生以后，苏联在阿拉伯世界中就面临孤立的危险了。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必须与伊拉克建立良好的关系。1974年2月，侯赛因访问莫斯科以后，苏联表示全力支持伊拉克政府反对库尔德人。苏联宣传工具声称，库尔德人受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渗透和影响。<sup>①</sup>1974年3月，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访问伊拉克，其目的很可能是检查伊拉克进攻库尔德人的准备情况，苏联为此加紧提供军事援助。<sup>②</sup>作为对苏联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的报答，复兴社会党与苏联签署了一个联合公报，声称阿拉伯国家要“在反帝基础上”实现团结和“加强”它们与苏联的合作。

虽然苏联准备支持伊拉克人去反对库尔德人，但是莫斯科不愿意公开卷入。显然，苏联不喜欢伊朗充当美国在波斯湾的警察的做法。而德黑兰在这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总比美国直接卷入要好一些。另外，苏联没有放弃尽量使伊朗中立化的希望。所以，苏联大力发展与伊朗的贸易关系，进口伊朗的天然气，甚至向伊朗国王的政权出售一些军事装备。实际上，在1974年两伊冲突高潮时期，苏联与伊朗的贸易额

---

<sup>①</sup> 参阅《真理报》，1974年8月14日；1974年4月26日。

<sup>②</sup> 《真理报》，1974年8月27日。它说，格列奇科的来访是为了“详细讨论苏联伊拉克在军事领域和其他领域进行合作的现状和发展的问題”。

(49,570万卢布)超过了苏联与伊拉克的贸易额(45,310万卢布)。<sup>①</sup>

在两伊冲突中，苏联尽量保持不偏不倚的姿态，它不断地敦促两国的领导人改善两国的关系。因此，当1975年3月两伊达成协议时，苏联表示热烈的欢迎。随着两伊冲突的结束，随着与此有关的库尔德人自治斗争的结束，苏联在波斯湾的地位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加强。长期以来担心苏联参加两伊战争的可能性已经排除。苏联又可以继续与伊朗和伊拉克发展关系了，而且，还可以保证苏联继续得到伊拉克的石油和伊朗的天然气了。

不过，两伊协议对苏联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由于协议消除了伊拉克政府的两大威胁，伊拉克对苏联军事援助的依赖也相应地大幅度减少了。另外，随着1973年12月的石油提价，伊拉克政府对苏联的经济依赖也减少了。巴格达在实行重要经济发展计划中，一改过去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局限性，越来越多地向西欧、日本甚至美国公司发出购置工厂设备和其他货物的订单。在这个时期里，苏伊贸易虽然有很大增长，但是，这主要是与伊拉克开始偿还过去的欠债有关，伊拉克的出口已经超过从苏联的进口。当然，苏联仍然积极参与伊拉克的经济发展，例如，帮助培训技术工人，建设工厂、运河和电站等。1975年7月，伊拉克还与经互会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sup>②</sup>但是，伊拉克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是

---

① 《1974年苏联对外贸易》，第14页。

② 参阅《对外贸易》杂志(莫斯科)，第10期，1975年，第8—14页，苏联对苏联与伊拉克经济合作的看法。

面向西方的。1975—1978年，这种发展甚至更明显了。

### (三) 独立路线的推行

(1975年7月—1978年9月)

两伊协议签订以后，伊拉克与波斯湾邻国，特别与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实行改善关系的政策。1975年7月，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签订协议，明确划定了两国边界的中立地区。<sup>①</sup>另外，伊拉克的几位官员访问波斯湾国家，努力推进相互合作和加强伊拉克在海湾地区的作用。伊拉克还向约旦提供经济援助，并计划建筑一条从约旦的亚喀巴港到伊拉克的公路。

苏联认为伊拉克的新动向既有利又有弊。假如伊拉克进一步向阿拉伯靠拢，那么，就可望影响沙特阿拉伯政府实行不那么亲西方的政策，进而削弱沙特阿拉伯—埃及轴心的影响。到1976年时，该轴心已经吸收了包括苏丹和北也门在内的若干阿拉伯国家。<sup>②</sup>另一方面，伊拉克向沙特阿拉伯靠拢，也可能因受到对方的影响而进一步脱离苏联。在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获胜和苏联的地位继续恶化的时候，苏联是不会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

两伊冲突解决后，伊拉克的首要外交问题，是解决它与叙利亚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伊拉克不能指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诚然，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讲

---

<sup>①</sup> 卡杜里前引书，第160页。

<sup>②</sup> 关于这个时期的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外交，参阅弗里德曼：《1970年以来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第7章。



话中，当谈到苏联的阿拉伯盟友时，曾经公开地把叙利亚排在了伊拉克的前面，伊拉克的领导不会欣赏这种做法。<sup>①</sup>但是，造成两个复兴社会党政权敌对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叙利亚把流向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水截断；伊拉克把通向叙利亚的输油管道切断；还有，各自都想把对方的领导人杀害，等等。渴望成立阿拉伯“反帝”联盟的苏联，显然对叙伊之间的冲突十分关注。苏联总理柯西金想通过公开告诫和内部调停的办法，去努力解决这种冲突。在黎巴嫩的内战达到高潮之际，因为它们各自支持冲突的一方，所以，柯西金便亲自到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去游说，但是，柯西金的努力全然无效。<sup>②</sup>虽然叙伊两国为了反对萨达特1977年11月对耶路撒冷的访问，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起组成了抵抗阵线，但是，这种团结没有能够维持多久。伊拉克不但与叙利亚有矛盾，而且在1978年夏季参与了暗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活动。伊拉克声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正在谋求与以色列达成协议。<sup>③</sup>

这时，伊拉克甚至反对苏联的和平计划，例如1977年10月的苏美联合声明。这是苏联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因为苏联正想与美国共同发起，重开日内瓦会议，以便恢复苏联在中东的地位。在这个时期里，使苏联更恼火的是，伊拉克在发

---

① 关于这个时期的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外交，参阅弗里德曼：《1970年以来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第7章，第230页。

② 关于这个时期的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外交，参阅弗里德曼：《1970年以来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第7章第242—245页。

③ 参阅富尔维奥·格里马尔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伊拉克的冲突”，《中东》杂志，第47期，1978年9月号，第38—39页。

展对外经济关系中继续转向西方。实际上,到1977年,伊苏贸易开始下降,而伊美贸易却急剧增长,接近了伊苏贸易水平。①一向强调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苏联领导人,对伊拉克反复声称经济联系决不影响政治关系的说法,感到很不舒服。②

1978年,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为苏伊关系投下了阴影。在埃塞俄比亚,苏联支持门格斯图政权去打要求独立的厄立特里亚人,伊拉克则支持厄立特里亚人的一派。很明显,苏联的行动引起了巴格达的反感。③另一方面,1978年春季,伊拉克政府宣布处决了若干伊拉克共产党员。这件事只会使莫斯科恼火。

伊拉克共产党与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之间的矛盾,早就酝酿已久。到1976年,伊拉克共产党日益对自己在政府中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感到不满,公开主张增强伊拉克共产党在民族进步阵线中的作用。另外,伊拉克共产党开始主张让库尔德人实行真正的自治,并公开反对复兴社会党政府在库尔德斯坦以外地区重新安置库尔德人的政策。很明显,伊拉克共产党对伊拉克的经济倾向西方的变化是不高兴的,伊拉克共产党还对“私人资本”的日益增长和伊拉克“继续依赖资本

---

① 《中东》杂志,1978年7月号,第63页。1977年,伊拉克与美国的贸易总额为59,240万美元。

② 参阅伊拉克贸易部长马赫迪·乌巴迪的评论,《中东》杂志,第41期,1978年8月号,第101页。

③ 关于这个论点,参阅戴维·奥尔布赖特:“非洲之角战争与阿以冲突”,《世界政治与阿以冲突》,罗伯特·弗里德曼编,纽约,珀加曼出版社,1979年版。

主义世界市场”进行了谴责。<sup>①</sup>

共产党人除了公开批评复兴社会党的政策外，据说，他们还想在伊拉克军队中建立组织，并在库尔德人和对逊尼派统治最不满的什叶派人中进行反政府的宣传。<sup>②</sup>复兴党人怀疑伊拉克共产党参与了1977年2月什叶派的宗教性示威。鉴于伊拉克政权准备消灭任何对立派，所以，镇压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sup>③</sup>1978年春季，伊拉克政府决定对大批共产党人进行镇压。尽管伊拉克领导人声称，他们想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苏伊关系也不得不因此而经受严峻的考验。

#### （四）戴维营会议以后的苏伊关系

（1978年9月—1979年7月）

毫无疑问，苏联领导对戴维营会议的结果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埃、以、美三方最高级会议在阿拉伯世界引起的新发展，却使莫斯科感到十分欣慰。这些新发展包括：伊拉克与叙利亚、约旦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伊拉克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出现了和解的气氛。接着，于1978年11月举行

---

① 参阅巴克尔·易卜拉欣：“群众、政党和民族阵线”，《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杂志，第19卷，第8期，1976年8月号，第49—56页。阿齐兹·穆罕默德：“伊拉克革命力量的任务”，《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杂志，第19卷，第9期，1976年9月号，第10—18页。

② 图菲克·米什拉维：“对伊拉克共产党人的镇压”，《中东》杂志，第45期，1978年7月号，第29—30页。

③ 关于伊拉克反对该政权的行为，参阅史密斯的文章，《华盛顿邮报》，1978年8月6日。

了巴格达会议。这次会议几乎使整个阿拉伯世界在反萨达特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

莫斯科把叙伊和解看作是戴维营会议的最积极的成果，把约旦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和解看作是有利的发展，因为它进一步减少了约旦人参加戴维营协议和与阿拉伯世界中的反萨达特势力紧密结盟的机会。这两项和解都为巴格达会议的举行奠定了基础。这个发展受到了莫斯科的热烈欢迎。在巴格达，不仅戴维营协议受到谴责，而且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约旦联合委员会，以便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合作。在巴格达，还做出了反埃及的具体措施：如果萨达特继续一意孤行在协议上签字，就把阿拉伯联盟总部撤离开罗，并对埃及实行经济制裁。总之，巴格达会议提出来的关于在中东实行“正义和平”的方案，非常接近苏联自1974年以来的主张。所以，苏联对巴格达会议的召开及其取得的成果是满意的。这次会议以后，苏伊关系得到了改善。一个月以后，侯赛因应邀访问了莫斯科，其主要目的可能是协调双方反对戴维营会议的立场，同时还讨论了贸易关系、伊拉克共产党问题、以及苏联在戴维营会议之后向伊拉克提供武器等问题。在发展经济关系方面，会谈似乎有进展，但是，军事援助问题比较含糊其词。最后公报只提到：“双方重申，愿意为加强伊拉克共和国的防御能力而保持合作”。<sup>①</sup>关于伊拉克共产党问题，则更少提及。唯一提到一次苏伊关系中的分歧是柯西金在宴会上的讲话。他说，苏联“高度赞扬苏联同伊拉克共

---

<sup>①</sup> 《真理报》，1978年12月14日。

和国的友好关系。我们正尽一切努力，维护这种永恒的友谊。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不受任何偶然事件的影响的”。<sup>①</sup>

如果苏联领导人确实曾经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劝说过双方改变对伊拉克共产党态度的话，那么，结果是不成功的。在这次访问以后不到一个月，《真理报》于1月10日转载了伊拉克共产党《光明之路报》的一篇社论，对伊拉克政府镇压共产党人、破坏伊拉克共产党组织和报刊的做法，表示遗憾。三天之后，《真理报》还刊登了1978年12月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会议的声明，谴责伊拉克政府对伊拉克共产党的迫害。<sup>②</sup>

苏联报刊的反伊活动是很不寻常的。过去，只要有关政权坚持正确的“反帝”立场，苏联便对迫害共产党的行为勉强地采取克制态度。有时，为了避免冲突，苏联甚至要求阿拉伯国家共产党自行解散或者限制它们的活动，要求第三世界国家一些政党只能充当“科学社会主义”教员的角色。<sup>③</sup>

莫斯科这次公开对伊拉克政府表示反对，很可能是因为认为伊拉克政府对伊拉克共产党的迫害，不单纯是伊拉克的国内问题，在1979年上半年，这种迫害一直在继续。在领导反埃—以条约的活动中，伊拉克正在设法充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为此，伊拉克不仅要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

---

① 《塔斯社》英语广播，1978年12月12日（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第3卷，1978年12月13日，第F—3页）。

② 《真理报》，1979年1月13日。

③ 关于这个论点，参阅弗里德曼：“苏联与阿拉伯世界的共产党”。

解，而且，还要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工作关系。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世界的主要财政支持者，是波斯湾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苏联怀疑，伊拉克公开反苏的目的，可能是向沙特阿拉伯表明，伊拉克不再是苏联的亲密盟国。伊拉克实权人物萨达姆·侯赛因甚至公开说：“我们反对苏联在阿拉伯领土的广泛扩张”，“阿拉伯人必须向任何企图侵占沙特阿拉伯领土的人作斗争，即使是苏联人那样的朋友这样干也一样”。这就使苏联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怀疑。<sup>①</sup>

伊拉克作为阿拉伯世界反美和反萨达特力量的领袖作用，又与它的另一种作用相互抵消。这就是伊拉克与南也门之间发生的严重争吵。南也门是苏联在阿拉伯盟国中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盟国。争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当南也门于1979年2月下旬侵犯亲美的北也门时，伊拉克率领阿拉伯国家调解团，强迫南也门在其主要目标未达到以前就实行撤军。很明显，北也门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南也门的这次入侵是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于是，伊苏两国的目标就发生了冲突。<sup>②</sup>第二，几个月以后，在南也门讲学的伊拉克共产党员图菲克·鲁什迪被杀害，这是由隶属伊拉克驻南也门使馆的伊拉克保安部门“袭击小组”干的。南也门军队强行搜查了伊拉克使馆，抓走了凶手。这样，就引起了巴格达的一

---

<sup>①</sup> 内德·特姆科的报道，《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9年4月11日。

<sup>②</sup> 关于苏联在南也门侵略北也门中所起的作用，参阅罗伯特·弗里德曼：“戴维营会议后苏联的中东政策”，向1979年美国政治学会年会提交的论文，华盛顿，1979年版，第33—36页。

系列抗议风潮。<sup>①</sup>

阿拉伯世界反萨达特势力的团结，不但受到伊拉克与南也门冲突的威胁，而且受到伊拉克与霍梅尼领导的伊朗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政府之间日趋激烈的争吵的威胁。这个问题起源于伊朗的库尔德斯坦，那里的库尔德人乘伊朗国王政权和伊朗军队瓦解之机，起来要求自治。<sup>②</sup>这就导致伊朗当局与库尔德人之间发生了流血战斗。伊朗库尔德人鼓噪独立，不可避免地对生活在美国的库尔德人产生了影响。他们接受了伊朗库尔德人的武器，再次点燃了反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的战火。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伊拉克飞机对伊朗境内库尔德边境村庄进行轰炸，还导致了两伊关系急剧恶化。<sup>③</sup>随后，伊朗胡齐斯坦省总督指责伊拉克把武器偷运给伊朗的少数民族。伊拉克政府对国内与霍梅尼保持密切联系的什叶派宗教领袖进行镇压。<sup>④</sup>于是，两伊关系进一步恶化。两伊冲突还影响了伊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针对伊拉克提出的叫伊朗把伊朗国王在1971年抢占的霍尔木兹海峡中三个岛屿退还的要求，伊朗霍梅尼的一个亲密宗教领袖对伊朗国王在1970年放弃的巴林重新提出要求。<sup>⑤</sup>

---

① 这个事件在图菲克·米什拉维的文章“伊拉克外交政策的头痛问题”中讨论过，《中东》杂志，第57期，1979年7月号，第10页。

② 关于伊朗事件的讨论，参阅罗伯特·弗里德曼：“伊朗的革命与中东的霸权均势”，《犹太人的国界》杂志，第46卷，第6期，1979年6—7月号，第4—5页和30页。

③ 参阅《华盛顿邮报》，1979年6月15日。

④ 参阅《美联社》自德黑兰发的报道，《巴尔的摩太阳报》，1979年6月6日。

⑤ 参阅威廉·布兰尼金的报道，《华盛顿邮报》，1979年6月16日。

两伊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导致了阿拉伯世界反萨达特阵营的分裂，科威特和巴林站在伊拉克一边，而霍梅尼的早期支持者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继续支持伊朗人。<sup>①</sup>两伊关系的进一步紧张，还影响了伊朗与苏联的关系。所以，受政府支持的《伊斯兰共和国报》在第一版社论中说：“伊拉克统治集团”正在策划反伊朗，是为了“阻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蔓延到伊拉克”，并“为他们的大主子打开通向波斯湾暖水的道路”。这里所说的大主子明显是指苏联。<sup>②</sup>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件，但是，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并没有达到破裂的程度。在双方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伊拉克仍然能够在苏联的战略中起作用。例如，1979年3月下旬召开的第二次巴格达会议，决定对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定的埃及实行制裁，并谴责美国在和平解决办法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到1979年6月，伊拉克就不再是苏联的依附国了，它不再为换取苏联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而继续发表亲苏声明了。虽然苏联继续向伊拉克出售军事装备，但是，伊拉克人却从法国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军事装备。（1978年，法国卖给伊拉克18架海市蜃楼 F-1截击机和30架直升飞机，<sup>③</sup>而且，两国正在谈判1979年夏季的一笔为数20亿美元的飞机、坦克和其他武

---

① 参阅内德·特姆科报道，《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9年6月18日。

② 参阅《美联社》自德黑兰发的报道，《巴尔的摩太阳报》，1979年6月6日。

③ 《1979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报》，伦敦，泰勒和弗朗西斯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220页。



器的重要军事交易。)①另外,在经济发展上,伊拉克加深了对西方的依赖。伊拉克是想在阿拉伯国家、本地区和世界的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1979年7月的政变使叙伊关系有所缓和,使伊拉克放慢想当阿拉伯世界领袖的要求。自从1968年复兴社会党人重新掌权以来,这个事件可以作为一个评论苏伊关系的有用的论点。

#### 四、结 论

评论1968—1979年苏联对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政策,人们可以从其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得出几点一般性的结论。首先,事实证明:苏联对伊拉克统治集团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把能否左右一个国家统治集团的行为作为衡量影响的标准,那么,可以说苏联对伊拉克重大问题的影响,是一厢情愿的、无效的。所以,苏联始终改变不了伊拉克对苏联提出的解决阿—以冲突方案的反对立场,更阻止不了伊拉克政府对伊拉克共产党的迫害。实际上,复兴社会党人只是在1972—1975年最需要苏联援助的时候,才同意向伊拉克共产党做出一些让步:吸收了两名伊拉克共产党人加入内阁、并成立了有伊拉克共产党参加的民族进步阵线。不过,这种让步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复兴社会党人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自1977年以来,伊拉克政府对伊拉克共产党的多次镇压,已经

① 参阅《纽约时报》的报道,1979年7月28日。(美国)《合众国际社》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的报道,1979年8月5日。

使苏联的希望全部破灭了。苏联曾经希望伊拉克共产党能够在伊拉克政府中起到影响。

在对伊拉克政府施加低调的内部影响方面，苏联却颇有成就。苏联对伊拉克发展石油工业的援助，加强了伊拉克同西方石油公司进行斗争的地位，并构成了伊拉克1972年6月对伊拉克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的一个因素。同样，苏联对伊拉克的军事支持，帮助伊拉克打败了库尔德人，防止了亲西方的伊朗的进攻，加强了伊拉克的军事力量，使伊拉克变成了与埃及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对手。事实上，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问题上，例如：在伊拉克实行石油国有化和伊拉克反对萨达特的和平行动上，苏联向伊拉克提供援助，就使伊拉克变成了苏联在中东削弱、并最终排除西方影响的总战略中的一支重要的“反帝”力量。

但不幸的是，伊苏目标并非总是一致的。在1975年两伊签订条约和伊拉克逐步减少对苏联依赖时，两国的意见分歧就日益明显了。在苏联把伊拉克看成是阿拉伯世界反西方力量中心的同时，伊拉克就开始与法国发展了密切的经济关系和军事关系，并使其经济发展趋势转向了西方。另外，为了争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伊拉克的反共国内政策还带有反苏的对外政策的含义。最后，伊拉克与南也门和伊朗的争端，伊拉克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持续的紧张关系，冲淡了莫斯科的希望。莫斯科曾经希望，在戴维营会议和伊朗革命以后，中东能够产生一个团结一致阿拉伯国家“反帝”联盟。

总之，在苏伊两国的交易中，苏联的记录是成败参半。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在发展两国关系中是有用的，但

是，这两个政策手段的价值却因伊拉克与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发展了关系而趋向失势。与此同时，伊拉克共产党是莫斯科与巴格达发展紧密关系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为伊拉克政权发现，在伊拉克共产党活动的背后有莫斯科在插手。总的来说，1968—1979年期间苏伊关系的进程表明，苏联对伊拉克这个“依附”国的影响是低水平的。苏联在用大量经援和军援来换取对方在政治上顺从的做法中，所得到的东西相对来说是很少的。

## 第七章

### 苏联对伊朗政策的演变

罗伯特·艾拉尼\*

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1941—1978年），苏联对伊朗的外交政策的演变反映了国际体系的变化，因为苏联和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变成了两个主要的势力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伊朗与苏联的关系反映了英苏两国在伊朗的对立，它们在战后日益受到了美苏两国对立的影响，因为美国开始取代英国，变成了西方在中东势力的主要支柱。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步其他波斯君主们的后尘，在处理伊朗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中，实行的是小心谨慎、自私自利和圆滑老练的政策，以便确保伊朗的独立、领土完整和

---

\* 作者罗伯特·艾拉尼博士 (Dr. Robert Irani)，先后在美国的格伦维尔州立大学、美国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就读，曾获得过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从1975年起在战略研究所工作。艾拉尼博士曾到波斯湾进行考察，并以伊朗德黑兰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的非正式会员的身份进行过一年实地研究。他的专著有：《美国外交——对1945至1946年阿塞拜疆危机的分析》（1978年版）；《1941—1974年伊朗的外交政策文献目录集》（1976年版）；以及为专门杂志撰写的英文和法尔西文的论文等。——译者

他的孔雀王朝宝座。尽管这位国王偏爱美国，但是，他却想与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建立一种这样的关系：当发生危机时，美国和苏联都要维护伊朗的独立。在巴列维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的整个当政时期，这种努力一直是伊朗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

本文的目的是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对伊朗的外交政策的变化情况。第一，从毗邻一个超级大国的小国角度来看，苏联对伊朗的目标应当用历史的观点来观察。过去，在沙皇时期和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是牺牲伊朗利益的扩张主义政策。到了当代，苏联实行的是缓和和睦邻的政策。第二，莫斯科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是不公平的关系。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伊朗想采取与美国结盟的方法。总之，伊朗紧挨着苏联，这是地理上的实际情况。这样的实际情况给伊朗领导人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他们必须努力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去求得德黑兰的稳定地位。

从全球角度来看，对于苏联对伊朗和波斯湾地区的政策的最终方向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苏联在该地区基本上实行的是防御性政策，其目的是阻止伊朗被当作反对苏联的基地。第二种解释认为，苏联的目标是进攻性的，其目的是在该地区削弱西方的影响和增加苏联的影响，以便控制直接与苏联接壤的欧、亚国家和取得历史上沙皇想取得的暖水港。对于苏联政策的两种对立的解释，是以两种不同的设想为依据的。但是，实际上难以否认的是，苏联领导人可能把伊朗和波斯湾地区看作是他们的“后院”，而且，苏联人正在这个“后院”增加他们自己的影响和削弱他们对手的影响。

响。为了达到这个长期目标，苏联已经把斯大林时期那种直接的、咄咄逼人的军事方法和意识形态方法，改变成为比较狡猾的方法。从基本上来说，这是非意识形态的和防御性的方法，是建立在扩大商业关系和经济关系基础上的方法。

## 一、伊朗的战略地位

正象在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北部被占领所示，伊朗既是沙俄的战略目标，又是苏俄的战略目标。<sup>①</sup>的确，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伊朗曾几次成为英国与沙皇政权和后来的苏维埃政权之间进行竞争和干涉的一个领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是同盟国反对纳粹德国获胜的桥梁。由于伊朗的地位，苏联领导人要继续维护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就得避免伊朗在今后的冲突中被用作侵略苏联内陆的桥梁。伊朗则别无他法，只好无可奈何地选择苏联，把苏联作为它有力的北方邻国，不过，它已经把这种地理上的实际情况，既作为苏联政策变化和美苏在中东利益转向的受益者来对待，又作为受害者来对待。结果，伊朗的外交政策就反映了国际体系的变化情况和美苏两国对伊朗和波斯湾地区的政策变化情况。尽管伊朗想在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实行独立的“等距离”外交政策，但是，伊朗却充当了超级大国在欧、亚大陆竞争棋盘上的马前卒。

伊朗在地理上毗邻苏联这种实际情况，将继续要求这个

---

<sup>①</sup> 参阅瓦尔·斯佩克特：《1917—1958年的苏联与穆斯林世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5页。

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人更适当地、更孜孜不倦地和更井井有条地执行均势外交政策。象伊朗这样的小国，要想叫苏联按照波斯湾的方向，去永久性地修改它扩大影响的长远传统目标，那是十分幼稚可笑的，因为苏联是要维护它的长远的目标的。

只要美国和同盟国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性继续增加，它们就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苏联的潜在行动，苏联拒绝西方使用这种极为重要而又不能补充的资源的特权。在80年代，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也可能要依赖波斯湾的石油，这样的形势将进一步增加苏联对伊朗和波斯湾的兴趣。总之，伊朗毗邻苏联、苏联取得波斯湾暖水港以使苏联势力长驱直入印度洋地区的企图、以及全球对于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性因素。这些因素将使伊朗在东西方的全球均势中起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伊朗领导人要想在将来避免潜在的外部干涉、竞争和阴谋诡计，是困难的。

## 二、苏联对伊朗的政策演变

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政策，具有“继承老沙皇政策的显著特点”。<sup>①</sup>沙俄对南下波斯湾的扩张兴趣，是帝俄的历史目标，也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俄的目标。但是，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认为苏联会制订南下伊朗、并向波斯湾暖水港

---

<sup>①</sup> 参阅瓦尔·斯佩克特：《1917—1958年的苏联与穆斯林世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5页。

和阿拉伯海推进的宏伟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苏联可以利用与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商业关系、经济关系和出售武器的方法，牺牲西方的利益，尽量扩大自己的收获。但是，在恢复冷战的环境下，苏联可能再次进行军事干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1921年的苏伊条约的第6条和第13条，曾经被苏联用作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第6条阐明，“如果任何第三国企图在波斯湾领土内推行一项侵略政策，或者使波斯湾领土成为在军事上攻击俄国的根据地，或威胁苏维埃俄国或与其结成联盟的国家的边界，而且如果苏维埃政府要求伊朗政府消除此种威胁未遂时，则苏维埃政府有权派军队进入波斯，以便采取为自卫所必要的军事步骤。苏维埃政府同意一俟此种危险消除后，立即将其军队撤出波斯。”<sup>①</sup>

条约的第13条规定，“波斯政府方面答应不根据本条约移交给波斯的租让权和财产让任何第三国政府或任何第三国政府人民占有、管理或使用，并答应为波斯人民的福利，保全一切上述权利。”<sup>②</sup>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伊朗的北部、以及与此有关的苏联的政治阴谋、苏联的干涉和苏联在建立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和在伊朗的北部建立马哈巴德共和国中所起的作

---

<sup>①</sup> 参阅瓦尔·斯佩克特：《1917—1958年的苏联与穆斯林世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4页。

<sup>②</sup> 参阅瓦尔·斯佩克特：《1917—1958年的苏联与穆斯林世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4页。



用，是对战时同盟国答应支持伊朗独立和领土完整精神的最赤裸裸的破坏。苏联部队完全从伊朗的北部撤走，是由于伊朗首相格瓦迈斯·萨尔塔奈·艾哈迈德的圆滑外交、新建立的联合国的存在和亨利·杜鲁门的坚决有力的支持。

美国的支持在苏联部队从伊朗北部撤走中确实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伊朗的领导人认识到了和正确评价了这种支持的重要性，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显然坚持了亲美的外交政策态度。所以，想把伊朗的北部并入苏联势力范围和把伊朗的其他部分实行中立化的斯大林企图失败了。遏制苏联的美国新政策（虽然这个政策在限制苏联向伊朗扩张中是成功的），标志了国际体系中的冷战和新的危险时代的开端。

在50年代初期，伊朗人民开展了反对英国控制伊朗石油工业的斗争。摩萨台是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先行者，在1978—1979年革命时期，民族主义达到了伊朗历史上的顶点。在50年代里，美国误解了和低估了伊朗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性。苏联人支持这个运动，因为它想削弱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不过，他们的主要手段是支持想控制伊朗的人民党。

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机关——民族联合阵线是1950年成立的，\*这样，在议会中就有了4个政党的代表。该阵线由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伊朗国王任命他作了首相。在他任职期间，人民党在伊朗是最积极的政治组织，它在示威游行、罢工、工会和油田的其他活动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被疏

---

\* 民族联合阵线的成立时间应为1949年10月。——译者

远的城市青年投身人民党了。

人民党用伊朗民族主义的旗号掩盖了它亲苏的目标。结果，党员们在摩萨台时期成功地扩大了民族联合阵线，从而玷污了民族联合阵线及其在西方的形象。亲国王分子很快就重视民族联合阵线问题和摩萨台时代的形势，他们把民族联合阵线描写成是误入歧途的亲共分子。亲国王派的派别系统地宣传这种神话。这就妨碍了国王去认识民族联合阵线日益壮大的势力和潜力，到70年代的时候，民族联合阵线变成了伊朗社会中生机勃勃的、合法的、大众的和影响很大的一部分势力。这种自欺欺人的错误神话，最终导致了国王在1979年的下台。

国王曾在1953年离开过伊朗，但是，没过几天他就重新掌握了政权。据说，他那次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帮助。重新掌权之后，他镇压民族联合阵线、并审判或流放了民族联合阵线的主要领导人。人民党则变成了非法的党。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帮助下，伊朗在50年代成立了国家保密局。

苏联在中东的失败之一是，它没有能够在该地区建立强大的共产党。中东领导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对，可以用埃及、伊朗、伊拉克、以及叙利亚作为实际例子来加以说明，它们决心与克里姆林宫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些中近东国家反对克里姆林宫在它们国家中建立、维护和支持共产党的企图，因为它们认为，作为莫斯科工具的共产党是要夺取政权的。人民党没有能力在伊朗夺取和保持政权，是莫斯科想在中东建立成功的共产党的一次更大的失败。

1954年，由一名苏联武官在伊朗陆军和空军中导演的一

次人民党的阴谋活动，增加了国王对苏联的目标的怀疑。尽管发生了那次事件，但是，国王仍然能够与苏联保持和睦关系。1956年，国王正式访问了莫斯科，双方签署了一项为期3年的商业议定书，它使苏联再次成为伊朗的主要买主之一。到1957年，伊朗向苏联出口的物资占其总出口额的21%。<sup>①</sup>

但是，在面对苏联的情况下，伊朗处于不安全的地位，所以，国王决定与美国实行紧密的联盟。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巴格达条约，不久，这个条约组织又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此后，美伊两国的关系得到了重大发展。在中东地区，中央条约组织被看作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堡垒。由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联合王国组成的、并有美国积极参加的中央条约组织，是实施西方遏制苏联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59年，美国与伊朗签订了一个双边防御协定，其目的是促进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在安全和防御方面进行合作。<sup>②</sup>通过与中央条约组织各成员国签订的双边防御协定，美国成功地与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建立了“友谊的纽带”。美国势力在中央条约组织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sup>③</sup>

在1959年与美国签署双边防御协定之前，伊朗国王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伊朗国王与

---

① 沃尔特·拉克：《争夺中东的斗争：苏联在地中海，1958—1968年》，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9年版，第45页。

②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政策最新文件，1959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63年版，第1060页。

③ 同上。关于对美国在伊朗的政策分析，参阅罗伯特·艾拉尼：“美国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战略利益”，《参数》杂志，1977年秋季号。

苏联的主要对手签订防御协定，遭到了苏联猛烈的攻击。苏联把他描绘成是美国的傀儡，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伊斯兰的叛徒。在东德流放的伊朗共产党人也发表广播讲话，激烈地抨击这位国王。<sup>①</sup>

莫斯科的亲密朋友纳赛尔也发动了反对伊朗国王的运动，并在1960年断绝了埃及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但是，由莫斯科和埃及发动的反对国王的心理战是短暂的，到1960年后期就结束了。在与赫鲁晓夫交换的许多备忘录中，国王都表示要维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只要这种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就行。但是，国王把苏联反对伊朗与美国的防御关系撇在了一旁。最后，赫鲁晓夫认识到，这种反对是枉费心机的。苏联变得温和了，实现了友好和睦的关系，对国王认为伊朗需要与美国建立防御关系表示尊重。

苏伊关系的转折点是1962年9月，当时，伊朗国王向莫斯科保证，他的政府不会允许任何外国在伊朗建立军事基地。正象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甚至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前，伊朗就开始与苏联改善关系了。实际上，在这场危机期间，伊朗的会谈小组就在莫斯科”。<sup>②</sup>对于苏联人来说，国王的这些保证排除了苏伊关系朝良好方向发展的障碍。苏联评论家们开始称赞国王的土地改革，而他们过去是批评他的土地改革的。<sup>③</sup>

---

① 拉克前引书，第46页。

② 阿巴斯·阿米尔：“伊朗对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外交政策态度”，向在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奇举行的第二次亚洲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新西兰，1977年5月14日，第1页。

③ 拉克前引书，第49页。

在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1963年11月正式访问德黑兰期间，双方签订了几个包括交通、经济和技术援助、联合使用伊苏两国界河（阿特拉克河和阿拉斯河）附近的资源等方面的协定。双方还在莫斯科和德黑兰建立了联合文化协会。而且，几个东欧国家都为伊朗增加了贷款，结果，伊朗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进行了巨额贸易。<sup>①</sup>

王权的脆弱性、伊朗国内的主要经济问题、苏联的压力，这些是60年代初期迫使伊朗国王改善伊苏关系的主要因素。国王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计划，而且，他搞的所谓“白色革命”达到了独裁的程度。这些主观的变革都是由他发动的。他已经废止了议会，而且，伊朗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要求大幅度削减经济计划。在苏联强制国王反对把伊朗作为美国基地的同时，美国则强制国王提高伊朗的生活水平。伊朗国王的地位摇摇欲坠。武断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是，疏远了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领袖，并在1963年把坚决反对土地改革和反对国王的领袖大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从伊朗逐出。这种政治活动导致了巴列维王朝的毁灭。

反对国王及其计划的伊朗宗教界、传统的土地贵族、正在发展的中产阶级、学生和商人，这些都是60年代反对国王的庞大的国内势力。代替满足这些国内需要的是，国王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外事务上，例如寻求改善伊朗与苏联的关系。国王想减少国外对他的王朝的压力，因为他发现，在确保巴列维王朝的生存中，使美国和苏联满意比国内舆论和国内支

---

<sup>①</sup> 拉克前引书，第46—47页。

持更加重要。这是1978年萦绕在他头脑中的错误观念。

60年代美苏之间的“解冻”，预示了苏联与邻国（例如伊朗）之间的关系变化。全球范围的显著变化，对于德黑兰和莫斯科发展商业和经济关系是有好处的。国王在1965年对苏联的访问，是伊苏关系改善和国际体系“解冻”的明显标志。苏联领导人向国王表达了他们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缓和紧张局势和发展合作的兴趣。苏伊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发表的联合声明，表达了彼此对于发展经济和商业的兴趣。<sup>①</sup>

伊朗国王还访问了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他在整个东欧都受到了称赞。例如，根据索菲亚公报，保加利亚人民“最高度地称赞国王陛下在扫盲运动中的创造性”。波兰人民称赞国王的“进步的外交政策”，并表示承认伊朗的“进步”。与此同时，在东欧流亡的人民党员，则批评东欧各国政府“过分地”称赞了这位统治者，他们认为他是“人民痛恨的反动君主”。<sup>②</sup>

在60年代期间，作为对伊朗长期以来以优惠价格出售天然气的回报，苏联为伊朗建设了第一个炼钢厂和第一批机器制造业，帮助伊朗搞工业化运动。苏联人扩大了伊朗的机场跑道、开发了一些煤矿、在阿拉斯河上建设了两个水力发电工程、建设了穆加姆水坝和一个水力发电综合企业、并且铺设了第一条穿过伊朗高原通到苏联的天然气管道。这条伊朗天然气管道，是从胡齐斯坦省盛产石油的比德博兰德自治

---

<sup>①</sup>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政策最新文件，1965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68年版，第611页。

<sup>②</sup> 拉克前引书，第52页。

市开始的,它经过700英里,最后与苏联的阿斯塔拉市相接。伊朗第二条通向苏联的天然气管道,是在国王掌权期间规划的。它经过840多英里,每天可以向苏联提供22.6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①但是,在天然气价格方面的不同意见,可能导致了这条管道的长期中断。根据建设第二条天然气管道的有关协定,苏联将向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西德输送天然气。但是,欧洲人得直接用硬通货向伊朗交付天然气钱,而且,苏联人要收输送费。②根据第二条管道协定的规定,天然气的价格是每立方英尺1.25美元,这个价格比苏联人根据第一条天然气管道向伊朗付的价格要高,③但与其他高价的能源相比,仍旧算是很低的。

伊苏贸易在60年代后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德黑兰在1966年7月宣布,它正在考虑从苏联购买地空导弹,因为波斯湾北口特别是哈格岛的伊朗石油设施,容易遭到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伊拉克部队的攻击。苏联未能就伊朗的宣布做出热情的表示,因此,德黑兰便转向华盛顿去索要这种武器。④

在国王进行统治的期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使伊朗成为波斯湾地区警察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上,特别是在英国宣布1969年从波斯湾撤军的计划以后更是如此。美伊外交政策目

---

① “伊朗增加向苏联出口天然气: 12个其他买主签订石油协定”,《纽约时报》,1979年4月26日,第4页。

② “天然气管道被伊朗切断: 准备供应苏联和其他四个国家的计划”,《纽约时报》,1979年7月19日,第1页和第5页。

③ 同上。苏联是伊朗天然气的主要买主,但是,对于苏联来说,伊朗的天然气并没有特别的重要性,在1978—1979年的伊朗动乱时期,伊朗切断了向苏联输送天然气的管道,就证明了这一点。

④ 拉克前引书,第58页。

标则集中在双边、地区和国际最重要的问题上。苏联基本上是用积极而实用的观点来看这位国王，而国王则尽量使两个超级大国对它们与伊朗的各自关系都感到满意。反过来，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支持国王，并称赞他对伊朗现代化的领导。

国王忽视伊朗人民的基本要求，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庞大的军事规划上。他的目的是想实现他所梦想的波斯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领导称赞国王，却不顾他是倾向西方、亲美、把伊朗共产党宣布为非法、并继续在伊朗关押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实际情况。到70年代初期，苏联人与伊朗都提到，它们的边界是“和平和睦邻的边界”。<sup>①</sup>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苏联设法成为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苏联在伊朗的投资，成为“苏联在世界上投资的最大企业”。<sup>②</sup>通过帮助伊朗搞工业化，伊苏关系的改善达到了可观的程度。苏联人对伊朗实行的是负责的、重实效的和非意识形态的政策，其目的是想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1972年10月，在国王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签订了一个长期经济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伊两国的贸易额增加了三倍。1973年初期，柯西金访问了德黑兰，两位领导人宣布，他们“坚信”波斯湾地区的有关问题，可以在没有外部大国干涉的情况下得到解决。<sup>③</sup>

---

① 阿米尔前引文，第8页。

② 阿米尔前引文，第8页。

③ 引自《消息报》，1974年11月29日，罗伯特·唐纳森：“苏联对南亚的政策：渴望与局限性”，《苏联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罗杰·卡尼特、唐娜·巴赖合编，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5年版，第222—223页。



但是，国王过多地购买武器，使伊拉克和苏联愈来愈感到不安。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以后，苏联经常有不高兴的表示。柯西金在1974年访问德黑兰期间的声明警告国王说，“实行实力地位和武器竞赛的政策，向来是人民的沉重负担。虽然实行了这种政策，但是，并没有使国家强大起来”。<sup>①</sup> 这个声明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支持伊拉克。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和学术团体，却对国王增加武器和在处理伊朗严重社会经济问题方面的失败深表关心。<sup>②</sup>

苏联想在南亚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没有得到伊朗国王的支持，尽管伊朗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曾经点头默认，这可能是支持苏联努力的一种表示。在多数情况下，国王发现苏联在南亚的目标是扩张主义的，他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南亚的事务，将其看作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和使局势保持稳定的力量。

### 三、1978至1979年的伊朗革命与苏联

在1978至1979年的动乱时期，人们对苏联在伊朗的全面卷入情况（暗中的或公开的）仍然弄不清楚。目前没有证据

---

<sup>①</sup> 罗伯特·唐纳森：“苏联对南亚的政策，渴望与局限性”，见《苏联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罗杰·卡尼特、唐纳森·巴赖合编，第223页。

<sup>②</sup> 戴尔·塔蒂南，《波斯湾的武器》，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74年版。沙拉姆·查宾，“伊朗的外交政策与防御前景”，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和斯坦福研究所联合召开的“80年代的伊朗”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华盛顿，1977年10月4—6日。

说明苏联公开和直接煽动过伊朗动乱，尽管伊朗国内外的亲国王分子持与此相反的看法。然而，苏联却已经并将继续为伊朗的动乱贡献力量，而且，当有机会在伊朗建立革命的、反西方的和亲苏的政权的时候，苏联准备提供援助。

在任命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作伊朗首相以前的第一个阶段的革命中，苏联的官方声明是支持伊朗国王的。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说，苏联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的“不满情绪应当予以控制”。<sup>①</sup>特纳指出，只有当苏联完全弄清伊朗国王反对伊朗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斗争将要失败的时候，苏联才公开对伊朗国王采取了反对的态度。而且，苏联人认真地观察了美国对伊朗国王的反应，他们很可能不甚了了美国对伊朗国王的支持将会达到何种程度。这种不甚了了促使勃列日涅夫在1978年11月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明确地说，根据1921年苏伊条约的第6条，外国部队进入伊朗“威胁了苏联的安全”。<sup>②</sup>卡特总统针对勃列日涅夫的声明断言，美国“无意干涉伊朗的内政”，而且它也“无意允许其他国家干涉伊朗的内政”。<sup>③</sup>他补充说，伊朗的动乱是被外国“无节制的声明给搞恶化的”，“它们煽动进行大屠杀和使用暴力”。<sup>④</sup>

---

① 沃伦·布朗：“局长说，中央情报局没有预料到伊朗的民族革命”，《华盛顿邮报》，1979年2月5日，第A5页。

② “伊朗：今后的持久战”，法国《今日阿拉伯报道与实录》杂志，第2卷，1978年12月11日，第5页。

③ 理查德·伯特：“200名美国工人撤离，美国考虑派军舰到该地区；若干应急计划”，《纽约时报》，1978年12月29日，第1页和第4页。

④ 理查德·伯特：“200名美国工人撤离，美国考虑派军舰到该地区；若干应急计划”，《纽约时报》，1978年12月29日，第1页和第4页。

1979年1月，设在巴库的《伊朗民族之声》电台声明说，“现在，国王已经完蛋。下面该轮到美国人了。美帝国主义应当滚蛋！”<sup>①</sup>

1979年1月下旬，《真理报》说，国王的命运应当成为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其他国家的警告。《真理报》说，它支持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因为大阿亚图拉反对国王的暴政。<sup>②</sup>这时，伊朗的亲苏组织都非常积极，它们企图消灭国王政权的残余。伊朗共产党人支持霍梅尼的胜利，正象《真理报》指出的那样，“这是通向人民的最后胜利的第一步”。<sup>③</sup>1979年1月下旬，由5,000至10,000名马克思主义分子和其他左倾分子组成的队伍，列队穿过德黑兰。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在致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信中，警告伊朗领导人及其追随者说，他们反对“把垄断革命的企图作为恢复宗教法庭的借口”，并且反对伊朗的一党制宪法。<sup>④</sup>

人民党和其他左派组织都对伊朗的油田颇有影响。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情报，人民党在伊朗有2,000党员，其中将近一半是在油田工作。估计马克思主义组织在伊朗有20,000成员和“同情者”。在伊朗的油田中，除了人民党外，还有两

---

① “支持伊朗的国家认为苏联是反美广播的根源”，《纽约时报》，1979年1月31日，第4页。

② “《真理报》说，伊朗证明美国不可信”，《纽约时报》，1979年1月22日，第9页。

③ 克雷格·惠特尼：“超级大国们正在搞试验”，《纽约时报》，1979年2月22日，第7页。

④ 小阿普尔：“新的反美浪潮席卷伊朗”，《纽约时报》，1979年1月22日，第8页。

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一个是“人民圣战者组织”<sup>\*</sup>，另一个是“斗争党”<sup>\*\*</sup>。根据美国情报分析家说，它们的组织规模“非常小，但有严明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

另外一个有武装的共产党组织叫“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sup>\*\*\*</sup>，它也很小但非常有效，而且组织特别严密。它积极参与了1978至1979年伊朗的革命。但是跟人民党不一样，“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不依赖苏联，而且渴望在伊朗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共产主义。

1979年2月12日，苏联承认了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表示苏联准备在“平等、睦邻、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伊朗发展关系。<sup>①</sup>据报道，在苏联承认这个新政权之前，亚瑟·阿拉法特曾向苏联领导人转达了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保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与苏

---

\* “人民圣战者组织” (Sazman-e Mojahedin-e Khalq)：1965年成立，由“自由运动”分裂出来的激进派和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宗教人士组成，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成员数万人。该组织强调武装斗争，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对内主张制定新宪法，成立“民族、民主和伊斯兰的政府”，反对宗教专制；对外主张不结盟，不依赖美国和苏联。1980年6月巴尼萨德尔被解职后，该组织转入了地下，并采取了一系列暗杀和爆炸活动。——译者

\*\* “斗争党” (Hezb-e Peikar)：1975年从“人民圣战者组织”分裂出来的一个组织，对现政权持反对态度。——译者

\*\*\* “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 (Sazman-e Charik-haye Fedai-ye khalq)：1971年2月成立，是一支较有实力的城市游击组织，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新政权成立后，它拒绝交出武器，反对推行伊斯兰化政策，主张建立人民共和国。1980年6月，该组织内部发生了分裂，多数派倒向了亲苏的人民党，拥护现政权，公开为苏联侵略阿富汗辩护；少数派倾向“人民圣战者组织”，反对现政权。——译者

① 克雷格·惠特尼，“俄国人承认伊朗新政权”，《纽约时报》，1979年2月13日，第9页。

联发展商业和经济关系。<sup>①</sup>但是，这个报道的真实性有待观察，因为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已经系统地批评了国王，说他“屈服于超级大国的压力和牺牲国家利益”。<sup>②</sup>1979年7月，这些对国王的控制得到重申。<sup>③</sup>看来，伊斯兰共和国有兴趣与苏联发展经济关系，但是，这种发展必须公平和符合伊朗的民族利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似乎要削弱任何外国在伊朗的潜在力量，在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实行“等距离”政策。伊朗退出了中央条约组织。同时，伊朗还单方面宣布废除了1959年的美伊防御协定和1921年的苏伊条约的第6条。这些行动表明，这个伊斯兰共和国采取的是这种“等距离”政策。伊斯兰共和国领导人们十分清楚，伊朗的战略地位是处在超级大国的潜在冲突地区，所以，他们采取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国王的下台确保了伊朗退出西方势力范围，这个发展一定使莫斯科感到高兴。伊朗与以色列和南非断绝关系，伊朗停止向这两个国家输送石油，伊斯兰共和国明确宣布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些行动也可能使莫斯科感到很高兴，特别是因为：这些行动跟石油的大幅度涨价、跟密切监视苏联军事行动的美国在伊朗北部情报网的关闭，都是联系在一起。<sup>④</sup>从广义上来说，伊朗的革命伊斯兰共和国的建

① 引自“大阿亚图拉与美国”，《纽约时报》，1979年2月20日，第4页。

② “天然气管道被伊朗切断：准备供应苏联和其他四国的计划”，《纽约时报》，1979年7月19日，第1页和第5页。

③ 同上。

④ 关于对伊朗动乱的分析，参阅罗伯特·艾拉尼，“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大国在该地区的潜在意义”，在年度安全问题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美国陆军战争学院，1979年。

立，可以说对苏联是有利的，因为它打乱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亲西方的均势。

但是，从长远意义上来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外交政策和防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跟巴列维政权所面临的挑战基本上是一样的。伊朗处在超级大国潜在冲突地区，处在两个严重地区冲突（阿—以冲突和印—巴冲突）之间，被几个分裂主义组织（西部边境的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北部和东部边界的俾路支人和土库曼人）所困扰，它不能完全忽略自己的外交、国防和军事部门。

在不久的将来，虽然伊斯兰共和国正在努力加强它的统治，但是，美国和苏联很可能避免在伊朗采取直接的行动。在伊朗的革命风暴平静下来以前，两个超级大国在伊朗都会保持低姿态。美国和苏联都可能认识到，这种干涉会对它们与伊朗的长期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 四、结 论

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统治时期，苏联在伊朗的成功与失败说明，苏联的政策有了大幅度的变化，从公开的扩张主义变得比较谨慎了，苏联想在“睦邻关系”的掩盖下来进行控制。

尽管从1921年以来做过几次努力，苏联都没有能够用外部势力在伊朗建立起长久性的苏联式的共和国。虽然在伊朗北部建立过几个寿命不长的共和国，但是，在几个对伊朗有兴趣的外部势力的压力下，莫斯科每次都被迫退却。

目前，苏联对波斯湾地区的侵略性和进攻性政策可能要被搁置起来。但是，苏联对于石油需求量的增加，东欧对于苏联和中东石油依赖性的增加，这些情况可能使苏联采取比较直接的冒险措施，以便扩大它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然而，波斯湾地区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动态，可能妨碍苏联或美国排斥对方，妨碍美国在该地区成功地进行长期的控制。苏联或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个别国家中的影响程度会仍然不同，这反映了国际和地区体系以及美苏关系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例如，沙特阿拉伯在80年代可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在与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交往中，伊朗可能实行“不结盟”的政策，而伊拉克则可能进一步脱离莫斯科。

不论是这样还是那样，苏联肢解或控制伊朗的前景看来都是暗淡的。苏联对伊朗采取任何直接的进攻，都可能导致苏美关系的高度紧张，甚至可能导致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世界大战，伊朗很可能再次成为反对超级大国的战场和苏联失败或胜利的桥梁。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对于莫斯科和华盛顿来说，伊朗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区和超级大国竞争的目标。这种竞争可能再度使伊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 第八章

### 苏联在阿富汗的收益和代价

希林·塔赫—凯莉\*

俄国对阿富汗的垂涎，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当时，这个落后的内陆小国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而且，它对这个强大的北部邻国是敏感的。虽然莫斯科与喀布尔的关系是变化万端的，但是，由于苏联的幅员辽阔，由于两国有共同边界，所以，在阿富汗的外交政策中，苏联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将考察苏联在阿富汗的目标，并估价苏联在达到这些目标中所取得的成功和所付的代价。

#### 一、苏联的目标

在50年代，阿富汗没有成为反苏联盟的成员，而它的

---

\* 作者希林·塔赫—凯莉博士 (Dr. Shirin Tabir-Kheli)，坦普尔大学政治学助教、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问题博士，从1978年开始，一直是外交政策研究学会的研究员。她的专著有：《苏联在亚洲的行动》(1976年版)；《巴基斯坦的核决定》；与詹姆斯·卡茨和翁卡尔·马瓦合编的《发展中国家的核决定》(即将出版)。另外，她还在《海战学院评论》、《科学世界》、《亚洲调查》和《世界事务》等刊物上发表过论述南亚和西南亚的文章。她的最新著作是：《1971年以后的美国—巴基斯坦关系》(1980年版)。——译者



邻国伊朗和巴基斯坦都参加了那个联盟。苏联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继续不让阿富汗变成西方的势力范围。正象波德戈尔内主席在1967年6月结束对阿富汗的访问之后所说，苏联“高度评价阿富汗的外交政策，它是以积极中立、不参加集团和军事组织的原则为基础的……”<sup>①</sup>

苏联政策的第二个目标是，利用它与阿富汗的关系为巴基斯坦制造困难。巴基斯坦是美国的盟国，曾一度是进行反苏监视活动的基地。苏联默默支持对阿富汗在1953年12月做出废除1921年条约的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阿富汗曾经在1921年的条约中承认“杜兰线”是阿富汗与当时的英属印度的国界。同年，阿富汗首相宣布，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军事援助是一种威胁，莫斯科也支持这种观点。而且，当喀布尔明确表示它支持巴克同尼斯坦的时候，<sup>②</sup>莫斯科宣布并且反复重申，它支持阿富汗的行动。<sup>③</sup>

在外交危机中，阿富汗的反巴政策得到了苏联的坚决支持，这些危机曾经两次导致了阿巴两国断交。今天，莫斯科敦促伊斯兰堡，必须建立强有力的苏巴关系，作为改进阿巴关系和巴基斯坦北部边境和平的唯一真正保障。

苏联在阿富汗的第三个目标是，证明它的“睦邻”政策。

---

① 《真理报》，1967年6月4日，《苏联报纸最新摘要》，1967年，第19卷，第17期。

② 从多方面为讲普什图语的人民明确规定一个自治区，这是在统一的巴基斯坦内部的一种自由的措施。

③ 例如，莫斯科阐明，它不能够置若罔闻，因为苏联直接与这个地区接壤。所以，苏联政府支持“公正”解决这个问题，言下之意是，要“尊重在普什图尼斯坦居住的人民的利益”。《真理报》，1961年8月21日，《苏联报纸最新摘要》，1961年，第14卷，第18期。

苏联人反复强调它的政策，用赫鲁晓夫在1960年的话来说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友好邻国在困难时感到孤独无援”。<sup>①</sup>苏联对阿富汗的援助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苏联与穆斯林阿富汗培育的良好关系，维护了共同边界的和平，没有煽动同族的苏联穆斯林。苏联在阿富汗的目标是要证明，它对一个留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是有好处的。

苏联的第四个目标，可以说是苏联对其作用认识的副产品。苏联既是亚洲国家又是欧洲国家，它在第三世界把自己装扮成是关心欠发达国家的亚洲国家。尽管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对，但是，莫斯科却顽固地坚持这一点。苏联在阿富汗的卷入，有助于它对亚洲的关心合法化。阿富汗还为苏联在该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据点，3个超级大国一直在该地区进行竞争。苏联的目标是，使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保持中立，假如可能的话，就把它从该地区赶走，阿富汗是这种地区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 二、苏联的政策手段

超级大国苏联随时都有几种手段，它可以利用这些手段去追求它的外交政策目标。

最初，为了对抗美国向巴基斯坦和伊朗提供援助，苏联向阿富汗提供了军事援助。从强权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苏联不得不关注阿富汗，以便牵制这个邻国加入正在迅速发展的

---

<sup>①</sup> 《黎明报》，卡拉奇，1960年9月30日。

美国联盟体系。1955—1972年，原来不结盟的阿富汗获得了价值为4.5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sup>①</sup>迄今，苏联向阿富汗提供的军事援助已经超过6亿美元。<sup>②</sup>自从1956年以来，阿富汗的95%的军事装备都是苏联提供的。另外，到1979年，在阿富汗帮助维修军事装备和指导反暴战斗的苏联军事顾问已达4,500人左右。由于阿富汗进一步靠拢莫斯科，所以，阿富汗的军事依赖性增加了。由于苏联侵略阿富汗，苏联军人已经基本上接管了阿富汗军队过去的一切职能。

苏联的军事教官随着苏联的现代化武器一起来到了阿富汗。实际上，苏联教官已经取代了土耳其军官和德国军官。土耳其军官和德国军官是阿富汗军队的传统教官。无论是在喀布尔军事学院还是在演习场，苏联教官都秘密地卷入了阿富汗军队的发展，帮助安装和维修军事装备、训练当地人员使用和维修军事装备、充任军事顾问和军官。而且，苏联教官已经训练了大批的阿富汗驾驶员和空勤地勤人员，以便操纵苏联提供的现代化喷气式飞机。这种密切的关系已经在阿富汗军队的军官组织当中发展了强大的亲苏势力。由这些亲苏势力组成的集团，在1973年发动了反查希尔国王的政变，该集团还在1978年反达乌德总统的政变中起了关键作用，那次政变使共产党人掌握了阿富汗的政权。

向阿富汗提供军事援助，是苏阿关系的组成部分。起初，

---

<sup>①</sup> 美国国务院：《共产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1972年的援助和贸易》，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73年8月。

<sup>②</sup>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7年共产党对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编号，第ER78—10478U号，1978年11月，第35页。

建立军事关系是为了增加苏联的势力和声誉。为了继续追求这种势力和声誉，莫斯科向阿富汗政权作的军事援助承诺，比它起初预料的还要多。

经济援助也是苏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1975年，苏联向阿富汗提供的经济援助达12.63亿美元，从而使阿富汗成了苏联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之一。<sup>①</sup>在给阿富汗的援助当中，赠款占的比例比给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都大。估计有1,500名苏联经济顾问和技术人员，正在帮助阿富汗搞大量的援建项目。<sup>②</sup>

自从达乌德倒台以来，阿富汗对苏联经济援助的依赖性已经变得明显起来。的确，为了帮助减少这种依赖性，伊朗国王曾经许诺向阿富汗提供20亿美元的援助，这是达乌德被推翻的因素之一，阿富汗的亲苏派发现，他正在向右转，正在削弱阿富汗与莫斯科的关系。到1977年，美国的援助达到了5亿美元，但是，当美国大使达布斯在1979年2月被暗杀之后，美国就断绝了援助。因此，喀布尔再也不能利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竞争了，过去，喀布尔在这方面干得很成功。

苏联是阿富汗的最大贸易伙伴。阿富汗与东欧的贸易是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巴基斯坦一直允许阿富汗使用运输设施，但是，因为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关系不好，所以，阿富汗更加依赖苏联，通过苏联与东欧进行贸易。

苏联的外交支持一向是加强阿富汗的反巴要求的手段。

---

①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苏联经济的新展望》，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76年版，第194页。

②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引书，第35页。

由于有苏联支持，所以，阿富汗要求归还巴克同尼斯坦就可靠了，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巴基斯坦才认真对待阿富汗的要求。苏联的外交支持，是奖赏阿富汗对苏政策的“正确性”的一种手段。

### 三、对收益和代价的评价

查希尔国王统治时期是苏阿关系最顺利的时期。回想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莫斯科的默默支持变成了他的亲苏侄子穆罕默德·达乌德和阿富汗军队中的亲苏分子推翻国王、建立共和国的手段。在掌权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达乌德采取了典型的亲苏反巴立场，因此，军队中的“积极分子”感到高兴。他们认为，苏联的支持是解决阿富汗的“唯一问题”——巴克同尼斯坦问题的根本。<sup>①</sup>

莫斯科热烈欢迎达乌德的政变，并支持新政权执行不结盟政策和“不依附军事集团”政策的决心。<sup>②</sup>当提到苏联对南亚政治的传统态度时，《真理报》阐明：“显然，苏联人民不能对阿富汗发生的政治变化漠不关心。我们的南部邻国阿富汗不但与我国有2,000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而且，阿富汗是一个友好国家，阿富汗人民是我们的朋友。”<sup>③</sup>

除了达乌德本人和苏联训练的阿富汗军事人员以外，还有其他争取苏联亲善友好的竞争者。(以塔拉基和哈菲祖拉·

① 1973年掌权后达乌德发表的声明，引自《纽约时报》，1973年7月29日。

② 《真理报》，1973年7月18日，引自《美国与第三世界》，第8卷，第6期，1973年9月2日，伦敦，中亚研究中心，第380页。

③ 同上，1973年7月22日。

阿明为首的)“马列主义人民派”,比达乌德走得更远,他们呼吁实行减轻“阿富汗被压迫人民极端痛苦”的政策,用国际社会主义战胜国际资本主义,用公共部门压倒私人部门,用土地改革来代替控制阿富汗社会的封建制度。(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比较赞成在该制度之内开展工作。1978年政变以后,他们被指责与达乌德进行合作。实际上,他们早就对他不抱幻想了,因为他的政权中的“进步”派正在削弱。他们早就大幅度地撤销了他们对他的支持。虽然在1978年他们曾经帮他反击过反达乌德的政变,但是,当“人民派”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旗帜派”的领导人不是被遣送国外,就是被整肃。

莫斯科把1973年的政变看作是可以进一步实现它在阿富汗的目标,而且,它确实一度起了这样的作用。开始时,达乌德允许有较多的亲莫斯科左派分子在阿富汗参政,并重申阿富汗感谢莫斯科的支持和慷慨援助。他不仅在一般的问题上向苏联靠拢,而且,他还支持莫斯科的亚洲“集体安全”计划,他对伊朗和巴基斯坦就更敌视了。但是,达乌德不久就陷入了困境,失掉了亲苏分子的支持,他们认为,他的现代化计划和各种改革只不过是一场闹剧。那种认为达乌德会把曾经帮他掌权的人都囊括到决策阶层里去的想法,实际上是错打了算盘,而且,权力基本上仍然掌握在穆罕默德扎伊的手中。另外,阿富汗社会中的传统保守分子,怀疑达乌德向莫斯科讨好,怀疑达乌德是依靠莫斯科在1973年掌握了政权。<sup>①</sup>

---

<sup>①</sup> 汉纳·尼加伦:“1978年4月的阿富汗政变:革命与国际安全”,《科学世界》杂志,第23卷,第1期,1979年春季号,第93—113页。

苏联为达乌德付出的代价是，增加了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虽然莫斯科答应给喀布尔的13亿美元援助已经支付了一半，但是，到1973年以后，交付的间隔时间拉长了。苏联在农业、灌溉、发电、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矿产和金属加工、运输等方面，承担了20个大的援建项目。<sup>①</sup>

在伊朗国王成功地使阿富汗总统不再单独依赖莫斯科以后，莫斯科与达乌德的蜜月就开始冷淡下来了。当达乌德在国内与左派和右派都发生麻烦时，他做出的反应是，设法与巴基斯坦解决分歧。他指责说，造成国内困难的原因，是拖延签署承认“杜兰线”为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合法边界的协定。在1978年访问萨达特的埃及期间，达乌德强烈地指责了古巴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非中立立场。那时，苏联发现，它在阿富汗的目标有遭到失败的危险。

#### 四、塔拉基政变：与莫斯科结盟

虽然达乌德的倒台是在莫斯科对他的政策日益不高兴的时候发生的，但是，没有多少迹象证明，苏联直接干涉了1978年4月的政变。在那次政变中，达乌德和他的29名家庭成员都被杀死了，据估计，还有3,000人被杀死，有的是穆罕默德扎伊分子，有的只是因为与统治家族有联系。但是，莫斯科不高兴达乌德的政策，可能是莫斯科鼓动“旗帜派”和

<sup>①</sup> 苏联人发展了阿富汗的天然气生产设备，并建设了通向苏联的输气管道。1975年出售的天然气占喀布尔向苏联总出口的1/3。美国中央情报局，《1975年共产党向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编号：第ER76-10372U号，1976年7月。

“人民派”进行联合的关键因素。

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苏联在阿富汗的新影响是很好理解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虽然连续几个阿富汗统治者能够用俄国人的利益去反对英国人的利益和后来的美国人的利益，自己从中渔利，但是，由于在国内出现了接受莫斯科训练或影响的势力，现在再搞平衡行动就复杂了。换句话说，莫斯科已经有了当地的盟友，他们能够强行贯彻对苏联有利的改革和政策，但是，莫斯科在过去是不能够直接强迫这么做的。军队中的亲苏势力证明对莫斯科实行的这种战略是特别有用的。<sup>①</sup>

一位阿富汗问题观察家认为，1978年的政变是“偶然性的政变”，<sup>②</sup>那次政变是由达乌德的挫折引起的，是“旗帜派”思想家艾克巴·基伯于1978年4月17日被暗杀的直接结果。虽然“人民派”被怀疑卷入了那次政变，但是，人们都痛恨达乌德，因为他命令镇压了左翼领导人。“旗帜派”的两首脑之一、后来当上了阿富汗总统的哈菲祖拉·阿明，在他被捕之前立刻与三个军官（两个陆军少校和一个空军上校）进行联系。他们发动了政变，因为他们感到“机不可失”。最后，达乌德的2,000卫队终于被空军的轰炸征服了。忠于达乌德的空军中队未能进行还击，因为通讯中断了。这样，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就诞生了。它主张不结盟、工农福利和土地改

<sup>①</sup> 希林·塔赫—凯莉：“苏联的南部侧翼：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海战学院评论》杂志，1979年冬季号，第36页。

<sup>②</sup> 路易斯·杜普雷：“阿富汗的昨天和今天——战略评价”，《战略研究》杂志，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第2卷，第3期，1979年春季号。



革。塔拉基在1978年9月11日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达乌德政权。

政变后的阿富汗立刻再次倒向了莫斯科，所以，苏联承认了这个新政权。莫斯科对阿富汗倒向它感到很高兴，因为亲苏的阿富汗政权使苏联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继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的一系列成功之后，阿富汗是另一次“成功”。事实证明，日益上升的苏联势力正在大肆推进。相反，在该地区国家的心目中，美国是处于守势，而且，行动是迟钝的。

继1978年政变之后，苏联增加了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结盟的代价可以从这次增加援助看出来。1978年4月—1979年3月，莫斯科签署了75个新的经济援助协定，同时派遣了将近4,500名苏联顾问。当塔拉基政权在为合法性和支配权力而奋斗时，它设法（用自我宣布与莫斯科结盟的方法）使苏联提供了更多的援助。

达乌德小心谨慎地实行了均势政策，他既从东方寻求了经济援助，又从西方寻求了经济援助。现在，阿富汗又主张完全依赖苏联的援助了。由于塔拉基政权反对一切受过技术训练的阿富汗人或阿富汗的政界人物，他们多数都与原来的政权有联系，所以，它迫切需要苏联顾问来填补政府各部门的空缺。此外，苏联顾问被紧急派到总统办公室。一边倒的高潮标志，是塔拉基1978年12月5日到莫斯科签署了“友好条约”。这个条约使阿富汗对苏联的依赖变成制度化了。

塔拉基的新阿富汗思想，没有得到多数阿富汗人的支持。由于几个同族的起义在28个省份中的多数地区都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抵抗运动，他在教育、土地所有制和社会政策等

方面搞的改革，都陷入了困境。1978年5月以后，大批的难民涌入了巴基斯坦，到了1979年8月，难民的数量增加到了10万人。难民们说，反对喀布尔共产主义政权的运动，是宗教性的民族主义起义，因为塔拉基反对伊斯兰教，并“把阿富汗出卖给了苏联”。

巴基斯坦是第一个承认塔拉基政府的国家，并答应在运输和贸易方面进行充分的合作。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将军未经邀请，就在1978年9月访问了喀布尔。但是，由于人民大众抵抗塔拉基政权的运动正在发展，所以，巴阿两国关系恶化了。巴基斯坦指控阿富汗56次侵犯它的领空和领土（在巴基斯坦的1,200多英里长的边境地区渗透到达3英里纵深）。阿富汗则指控巴基斯坦（以及中国、伊朗和美国）与阿富汗国内正在发展的叛乱进行勾结。这些指控得到了苏联的声援。

苏联继续敦促巴基斯坦把45万阿富汗难民遣返回国，因为难民的存在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麻烦。巴基斯坦的反应是，由于人道主义方面的原因，它不能够强迫难民回国。而且，这些难民在巴基斯坦都有亲戚，许多难民都与亲戚生活在一起。边界的许多地方都能够渗透，巴基斯坦无法阻止难民越境。但是，巴基斯坦政府说，假如可以的话，应当由阿富汗政府去阻止难民越境。后来，莫斯科又敦促印度劝说巴基斯坦遣返难民。德赛政府的反应是：印度建议阿富汗在国内为难民回国创造条件。

由于战斗正在发展，苏联人增加了对阿富汗的军事援助，而且很快就有报道说，苏联驾驶员执行了反对阿富汗叛乱据点的战斗任务。另外，阿富汗还开放了东德大使馆，古

巴使团增加到了80人。相反，喀布尔却要求美国、中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外交使团减少人员。

由于阿富汗盲目地追随莫斯科的路线，1978年4月以后，苏联得到了好处，但是，代价也正在增加，莫斯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它象转圈的疯狗一样，第一次在阿富汗陷入困境。它有义务支持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政权，但是，在物质方面和外交方面的代价都愈来愈大。假如莫斯科不支持阿富汗政权，那就意味着阿富汗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意味着阿富汗“反动分子”的胜利，意味着伊朗、巴基斯坦、中国和美国胜利。

（作者为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现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五、阿明的政变：莫斯科的 依附国吗？

（作者为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现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苏联顾问们告诫过塔拉基和阿明，要慢点实行改革，不要那么着急把那么多的财产所有权转变。据报道，苏联曾经与阿富汗国王查希尔的支持者们进行过联系，这些报道散布了苏联庇护国王回国的谣言。这个谣言可能对1979年9月的喀布尔政变起了作用。

哈菲祖拉·阿明是“人民派”的铁腕人物和思想家。他发现，塔拉基在压力面前变得温和了。例如，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塔拉基盾退了，不与邻国直接对抗了。这种温和态度很合乎苏联人的胃口，所以，当塔拉基从哈瓦那回国中途经过莫斯科的时候，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有传闻说，莫斯科对哈菲祖拉·阿明不怎么满

意，而且，要采取换马的行动，以便取得叛乱者们的支持。不过，阿明却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塔拉基刚从哈瓦那回国一周，他就被政变推翻了，而且丧失了性命。可是，阿明却宣布说，塔拉基仍然活着，但是他身体有病。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阿明才承认，塔拉基是因为“长期有病”而死的。

阿明宣布，他在1979年9月16日发动的政变，标志着“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开端”，这个制度把人民的敌人“消灭了”。<sup>①</sup>他迫不及待地采取了对付反动派的行动，向叛乱的村庄投了凝固汽油弹，除掉了政治对手，建立了由他直接控制的秘密警察，任命他的兄弟当上了4个省的总督，任命他的亲朋好友担任了要职。过去，他没有听苏联叫他慢慢来的建议，现在，也没有迹象证明，他在夺权以后会这样做。

苏联在阿富汗下了大赌注，而且，莫斯科不得不当机立断地支持阿明，或者说，假如叛乱胜利的话，莫斯科就会遇到极为不利的反应（就象后来在伊朗的反美情绪一样）。虽然在这次政变后不久，勃列日涅夫主席就致信阿明，祝贺他“当选”总统，但是，莫斯科正在想法物色换马人物。<sup>②</sup>阿明被迫保证1978年以后所实行的改革不会开倒车。这次政变是竭力阻止政策发生变化的尝试。为了得到莫斯科的青睐，阿明扮演了莫斯科仆从的角色。但是，这个仆从对他的主人说，不能强迫他放弃他已经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种新型的主仆关系，不过，莫斯科并不喜欢它与阿明之间的这

① 《纽约时报》，1979年9月19日。

② 《费城询问者报》，1979年9月19日。

种新的对等关系。

## 六、苏联的干涉与卡尔迈勒

1979年12月27日，苏联人向阿富汗派遣了5万军队，<sup>①</sup>并且控制了阿富汗的局势。在此期间，他们杀害了哈菲祖拉·阿明，在“政变”后三天，他们叫“旗帜派”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当上了阿富汗的新总统。卡特总统把这个行动说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这个行动破坏了缓和，把西南亚直接引上了美苏可能对抗的道路。

苏联行动的时机是很妙的。早在1979年6月，在巴基斯坦就有报道说，在阿富汗境内有一师苏军正在待命行动。奇怪的是，美国却没有搞到这个情报。与许多报道相反，12月的叛乱运动使喀布尔政府遭到的损失，没有过去几个月的损失多。实际上，有迹象表明，以苏联为后盾的阿富汗军队，将在冬季大雪到来之前向叛乱分子发动一次成功的进攻。那么，苏联人为什么现在要入侵阿富汗呢？

苏联的行动有若干似乎有理的原因。第一，莫斯科发现，美国在西南亚的政策基本上是破产了，而美国的反应是有局限性的，因为除了临时性的海军存在之外，美国没有力量部署军队。10万快速部署部队已经规划了多年。而且，美国在距离海岸90英里的古巴部署部队的过程中得到了教训（在发现苏联部队以后，美国部队根据卡特总统的命令搞了

---

<sup>①</sup> 现在的估计数字为85,000。

演习)。这些都不会使莫斯科错过机会。这次演习表明，美国在关键形势下所采取的反应是不适当的。

第二，苏联利用美国人正在专心于伊朗的机会。1978年1月，卡特总统曾经断言，伊朗是“世界不稳定地区的一座孤岛”，正是这个国家扣押了人质，遭到了美国的谴责。这种情况为莫斯科把自己的势力打入原来被美国统治的地区，提供了极难得的机会。

第三，在侵略阿富汗的过程中，苏联趁机向印度洋暖水港推进。现在，从苏联的陆军基地，途经有麻烦的俾路支斯坦，到暖水港的距离只有300英里了。为了达到如此重大而具体的目标，暂时破坏一下缓和看来是值得的。虽然美国威胁说，它要对苏联的进一步推进采取行动，但是，苏联现在已经明显改变了在它统治和控制下的这个地区的政治地图。人们不得不去认识比侵略阿富汗更大的目标。苏联的侵略已经破坏了“地区性”领导人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布热津斯基博士提出来的，卡特在访问新德里和德黑兰时承认了这种概念。由于伊朗国王已经垮台和他的波斯湾警察作用已经消失，由于倾向莫斯科的甘地夫人重新当政，由于苏联接管了阿富汗，美国再也不能指望它在西南亚的地区大国来保卫它的利益了。

第四，苏联不希望看到出现一个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反动的”伊斯兰复兴主义地区，因为这样的地区可能会刺激苏联本国的穆斯林。苏联和印度很可能都有这样的目标。这个目标不仅首先在苏联策划者们脑海中浮现，而且，这个目标还与其他因素有联系。毫无疑问，这个

目标对于做出干涉的决定起了影响。

最后，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前景，使苏联做出了行动反应。为了达到目标，苏联诉诸了武力。虽然社会主义的尊严需要捍卫，但是，莫斯科一定认识到，对这种行动所做的反面宣传不会为它增加好处，联大会议上和伊斯兰国家会议上对苏联行动的谴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用一位阿富汗人的话来说，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是“坐着苏联的坦克”回国掌权的。虽然他企图把阿明描绘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助手”，而且，他答应释放阿富汗的政治犯和消灭阿明的暴政；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证明他是一个比较仁慈或比较有独立见解的人。虽然苏联人正在执行的策略，是使共产党政权的反宗教和反传统观念变得温和一些，<sup>①</sup>但是，苏联部队的到处存在，却使人产生了相反的信念，即卡尔迈勒并不是他自己国家的主人。

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苏联在亚洲的长期战略。

七、**结论**

迄今，苏联对阿富汗的政策一直是成功的。苏联的目标是，不让阿富汗陷入西方的势力范围，利用该国使苏联对亚洲的关注合法化，向巴基斯坦证明苏联友谊的必要性。现在，这些目标已经大部分实现。

莫斯科的主要阵地已经在阿富汗有了保证。数十年来，苏联外交已经在阿富汗培育了亲信。在过去5年里，苏联曾

<sup>①</sup> 《纽约时报》，1986年1月28日。

经深深卷入喀布尔的事态发展。1973年以后，苏联对阿富汗的政策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阿富汗国内有不满的情绪和亲苏的阿富汗组织想搞“进步的”改革。这些情况使莫斯科得到了好处。这些组织开展活动，常常要得到苏联的直接批准才行，而它们想使阿富汗的政策明显倾向苏联的努力，却总是得到莫斯科的默默支持。

现在，苏联已经深深地卷入了阿富汗，而且，这场卷入的代价愈来愈大。虽然莫斯科希望阿富汗政府与不赞成“社会主义道路”的叛乱者们能够和解，甚至希望争取妥协，但是，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该政权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不过，叛乱者们控制了军事，而且，虽然苏联的势力占统治地位，但是，叛乱者们的控制是有保证的。苏联人甚至可以成功地使用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和毒气来“平定”叛乱者们。苏联人将在喀布尔建立傀儡政权，他们认为，不这样办保守的穆斯林叛乱势力就会取得胜利，从而把西南亚变成由“毛拉”控制的舞台，这对苏联控制本国的穆斯林是不利的。

苏联侵略阿富汗可能是莫斯科选择的最后王牌，但是，毫无疑问它宁愿玩这张王牌，也不愿失掉它在阿富汗长期苦心经营才取得的地位。莫斯科不希望阿富汗的革命出现纰漏，然而，这场革命已经面临失败，但是，“苏联人将保护这场革命”。<sup>①</sup>

---

<sup>①</sup> 哈菲祖拉·阿明在苏联革命第61周年纪念会上作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断言。



## 第九章

# 苏印之间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关系

拉詹·梅农\*

在苏、印两国关系的现有书籍当中，涉及政策手段的多数是研究苏联经济援助的著作。很少有人去考察印、苏之间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关系，并估计这些关系作为实现苏联目标的手段的意义。<sup>①</sup>这种忽视是毫无道理的。从60年代中期起，印度的外债就超过了即将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而从前提供的大约4.6亿美元发展信贷却尚未使用。另外，1977年5月提供的3.4亿美元是1966年以来许诺的第一笔发展援助。<sup>②</sup>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援助已经日趋减少，但是，自从1965年

---

\* 作者拉詹·梅农博士 (Dr. Rajan Menon)，1978年成为范德比尔特大学政治学客座教授。他毕业于印度德里圣斯蒂芬大学，曾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为《亚洲调查》、《现代历史》等刊物撰写过不少文章。

——译者

① 最近两篇关于苏印关系的文章是：查理：“印苏军事合作：回顾”，《亚洲调查》杂志，第19卷，第3期，1979年3月号，第230—244页；阿绍克·卡帕：“印苏军事关系：依赖、相互依赖和变化”，《印度季刊》，第33卷，第8期，1977年7—9月号，第263—280页。

② 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1977年共产党对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年报，第77—10296号，1978年11月，第7页和第37页。

以来，苏联却成了印度重武器的最大供应者和印度安全考虑中的核心因素。

本文的目的是说明苏印之间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关系，并估价这些关系为苏联带来的好处。要想确切地断定苏联在任何具体国家或地区的目标，那是成问题的。本文断定苏联在印度的目标可能有3个：第一，为稳定的双边关系奠定基础，使之经受住印度政权更迭和不稳定时期的考验；第二，唤起印度领导关心苏联的利益；第三，把印度作为苏联反华战略中的一笔财产。

## 一、苏联与印度的安全

印苏关系与印度安全需要之间的联系，最好是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苏联的相互影响这个角度来进行探讨。但必须了解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已经改善的程度，还必须了解印度对自己安全关心的方式。这些方式与这两国（巴基斯坦和中国）都有关系。印苏两国的关系是为这些方式服务的。

印巴关系一直是有麻烦的，使两国产生分歧的问题引起了4次战争。但是，为了解决双边的问題，已经做了许多努力。最近的例子有：继孟加拉国战争以后，在1972年举行了西姆拉谈判；1978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伊和巴基斯坦军政府首脑齐亚·哈克举行了讨论。西姆拉谈判想就孟加拉战争遗留下来的主要问题达成谅解，并为恢复双边关系做出承诺，以便实现两国之间的缓和。此后，两国恢复了通讯和贸

易联系，并在1976年恢复了外交关系。瓦杰帕伊—齐亚谈判表明，双方都愿意加强和发展这种趋势。

虽然印巴关系业已摆脱1971年的战争给它带来的那种沉闷气氛，但是，有几个因素限制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展。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克什米尔争端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的充满感情的摩擦根源了，但是，一直到1979年3月，齐亚还把克什米尔争端看作是两国和睦的唯一障碍。<sup>①</sup>另外，巴基斯坦继续提防印苏关系。有几种因素促使了巴基斯坦人去向中国寻求援助。自从60年代中期以来，巴基斯坦人产生了一种情绪，他们认为，在西方发起的军事联盟中的成员资格，没有给巴基斯坦带来预期的好处（例如，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机时期，巴基斯坦所需要的武器和明确的支持，巴基斯坦都没有得到）。结果，巴基斯坦在70年代退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另外，卡特总统不愿提供福特政府时期答应提供的A-7飞机；1979年4月，美国决定撤销新的经济援助，以此作为对关于巴基斯坦正在企图获得铀分裂设备的报道的反应；齐亚认为，美国在伊朗国王废黜期间所采取的行动和美国对阿富汗塔拉基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表明，美国缺乏对抗苏联的决心。所有这一切都使巴基斯坦对美国产生了不信任感，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却倾向把中国看作是目前情况下最可靠的援助来源。<sup>②</sup>相反，印度却继续把印苏关系看作是对于中巴结盟的合适的反应。

---

① 《巴基斯坦时报》（拉合尔），1979年8月20日。

② 关于上述巴基斯坦的文章，参阅阿卜杜勒·西迪基，“巴基斯坦及其邻国”，《防御杂志》（卡拉奇），第4卷，第8期，1978年，第6—11页。

新德里除了重视苏联在抵消巴中密切关系方面具有明显的价值之外，新德里还重视苏联向印度提供武器的价值，因为苏联向印度提供武器能使印度在将来有充足的军事力量去对抗巴基斯坦。这种考虑依然很重要，因为尽管自1971年以来印巴关系已有所改善，但是，两国仍认为对方是自己的外部威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每个国家在制定防御计划和购买武器时，都将考虑到另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sup>①</sup>

虽然自1965年以来苏联一直是印度最重要的武器来源，但有迹象表明，苏联的主要动机是想在印度谋求影响和使中国的安全计划复杂化，而不是明确地想使巴基斯坦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实际情况得到证明。从60年代中期起，莫斯科在日益向印度增加武器供应的同时，还在印巴争端中采取了更加不偏不倚的态度。这是一种搞平衡的做法，其目的是想通过援助方面的承诺，甚至在1968年仍然向巴基斯坦提供有限的武器，来抵消巴基斯坦日益对中国的支持。<sup>②</sup>甚至在1971年8月印苏签订条约以后，莫斯科仍然继续要求印巴双方采取克制态度，并在12月印巴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以前，一直避免承认违背巴基斯坦统一的政治解决办法。<sup>③</sup>虽然如此，无论苏联向印度提供武器的动机如何，在

---

① 关于印度对巴基斯坦目前军事力量的估计，参阅拉维·赫克瑟：“限制武器的建议：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困难”，《印度时报》（新德里），1978年6月26日。

② 参阅瓦杰伊·巴德拉杰：“俄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的演变”，《澳大利亚政治历史杂志》，第16卷，第8期，1979年12月号，第343—360页。

③ 同上，“莫斯科与孟加拉国的诞生”，《亚洲调查》杂志，第13卷，第8期，1973年5月号，第482—495页。

印度看来，苏联提供武器对于印度的军事需要（为了对付巴基斯坦）来说，仍然是重要的。

中印关系和印巴关系的发展过程是相似的。虽然从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在中印关系中一直存在着麻烦，但是，最近的发展表明，彼此都正在为改善这种局面而努力。事隔15年之后，两国在1976年重新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第二年，中国也打破了长达15年之久的僵局，同印度签订了一项进口协定。同时，印度的代表参加了广交会。接着，中国发表了一些对改善关系有兴趣的声明。据1978年夏季宣布，瓦杰帕伊外长将访问北京。虽然这次访问延期过一回，但是，瓦杰帕伊终于在1979年2月到了中国。

然而，20年的仇视，加上许多把两国隔离开来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不大可能使中印关系发生迅速而根本性的变化。除了涉及大约5万平方英里领土的边界争端以外，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怀疑在印苏之间存在着一种他们认为是联盟的关系。而新德里似乎不愿意检验一下下面的理论，即：印苏关系的松弛将必然导致更亲近中国。<sup>①</sup>

印中之间的另一个争端，<sup>②</sup>关系到印度有西藏难民及其

---

① 一位著名的印度防御分析家说：“据认为，中国人受到印苏关系的阻碍，但是，印度不会为了与中国发展关系而牺牲这种久经考验的关系。”查理：“外部的威胁”，《讨论会》杂志（新德里），第225期，1978年5月号，第14页。

② 关于中印关系不和的主要原因，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过说明。《美国、印度和南亚：国会关心的利益、趋势和事件》年报，国会研究署编，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78年版，第23—24页。

领袖达赖喇嘛。<sup>①</sup> 印度方面一直关心的是，中国在印度的政治上敏感的东北边境地区武装，并训练米佐和那加部族叛乱分子。新德里还发表声明说，它反对中国建设喀喇昆仑公路（1978年6月，这条公路正式举行通车典礼）。喀喇昆仑公路通过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把中巴两国连接了起来。另一个有问题的领域是，印度对中国支持巴基斯坦感到关切。在最近几年里，巴基斯坦变成了接受中国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再有，中巴两国都对苏联在阿富汗增加存在和影响感到关切，这就导致了中巴两国加强联系和中国重申支持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争端的立场。<sup>②</sup> 1979年12月，苏联对阿富汗的大规模军事干涉，导致了哈菲祖拉·阿明的被驱逐（他曾在9月政变中推翻塔拉基）和由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领导的更加顺从的政府的建立。美中两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的速度，引起了印度的严重担心。1980年1月，英迪拉·甘地在 대선中重新当选印度总理。虽然她呼吁苏联人从阿富汗撤军，但是，她可能把印度与苏联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抗衡中美两国努力加强巴基斯坦军事力量的可行办法。

关于瓦杰帕伊在北京的会谈对将来中印关系的影响，印度的宣传工具曾经暗示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节制他们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尽管印度外长说北京过

---

① 尽管中印关系的最近发展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莫拉尔吉·德赛总理却在1977年4月会晤了达赖喇嘛，北京用正式备忘录进行抗议。

② 《纽约时报》，1979年1月19日。《巴基斯坦时报》（拉合尔），1979年3月26日。吉里拉尔·贾因，“对中国政策的最新看法”，《印度时报》（孟买），1979年3月14日。

去的立场一直是中印关系中的主要刺激因素。<sup>①</sup>虽然中国告诉瓦杰帕伊说，中国已经不再支持米佐和那加叛乱分子了，但是，边界争端的讨论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瓦杰帕伊只好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冻”。但是，在他访问北京以后，当他和德赛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都认为这个争端仍然是中印和睦的障碍。他们重申，印度不愿意为了求得一项容易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把有争议的领土让给中国。<sup>②</sup>在试探性的访问以后，瓦杰帕伊向议会作了报告。其要点是：虽然中印双方对许多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是，必须在双边关系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以后，讨论才能取得重大进展。<sup>③</sup>

在中印关系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印度将继续把印苏之间的密切关系，看作是满足印度安全需要的可行战略。同样，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继续支持，将是印度不松弛印苏关系的重要原因。总之，只要印度继续认为印苏关系与印度对抗巴基斯坦和中国方面的安全需要是联系在一起的，印苏关系的牢固基础就会维持下去。苏联认为，因为这样的形势能使印苏关系具有稳定性和预知性，所以，这样的形势对苏联是有利的。

---

① 关于印度新闻机构对瓦杰帕伊访问的报道，参阅《政治家》（加尔各答），1979年2月22日。《印度时报》（孟买），1979年8月15日。在瓦杰帕伊访问北京期间，巴基斯坦的军事代表团正在中国访问，这是意味深长的。参阅吉里拉尔·贾因：“对中国政策的最新看法”。

② 《印度时报》（孟买），1979年8月15日。

③ 关于这个报告的内容，参阅《海外印度斯坦时报》（新德里），1979年8月8日。

## 二、苏联对印度的武器转让

印苏关系与印度安全之间的联系，说明苏印军事关系的一个侧面。另外一个侧面涉及到苏联所起的作用，苏联是印度武装部队重武器的供应者。对苏联向印度提供的军事补给品所作的分析表明，苏联作为武器来源的重要性明显地增加了，而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的重要性则减少了。

在1962年中印战争以前，印度避免从任何方面接受军事援助，进口的全部武器都是用现款购买的。在50年代购买的绝大多数武器都来自英国，那时，印度避免从任何超级大国购买大批武器。<sup>①</sup>部分地说，由于中印关系出现了紧张局势，采购武器的政策在1960年便发生了变化，印度在那年购买了24架伊柳辛·伊尔-21运输机。由于中印战争的爆发，美国、苏联、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澳大利亚向印度转让了大批武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印度从1965年起开始主要依赖苏联。<sup>②</sup>

这种政策上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与50年代印度主要依赖英国形成对照的是，苏联在1967—1977年期间向印度转让的

---

<sup>①</sup> 关于在1962年以前从美国和苏联获得的武器的清单，参阅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与第三世界的武器贸易》年报，斯德哥尔摩，阿尔穆克维斯特和维克塞尔出版社，1971年版，注册编号：第②号，第833—886页。

<sup>②</sup> 说明印度日益依赖苏联的因素包括削减向南非出售武器，由于共同关注中国，苏联和印度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苏联不愿意接受印度以出口形式支付印度购买的武器。



武器，就其价值而言，已占各国向印度转让武器的81.2%。对比起来，印度从英国得到的武器只占4.5%，印度从美国和法国得到的武器各占2.4%。另一方面，印度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得到的武器共占6%。所以，在此期间，在全世界向印度转让武器的活动中，苏联卷入得最深，起的作用最大。

1960年，印度购买了24架伊尔-21飞机之后，印苏两国达成了一项协定，规定由印度购买12架米格-21飞机，并由苏联援助在印度根据特许制造这些飞机。

苏联最初在中印争端中的矛盾心理推迟了这笔交易的实现。但是，莫斯科和北京的公开分裂排除了这个障碍。这个协定在1964年后期得到了实现。<sup>①</sup>

那年以后，苏联向印度的武器转让得到了飞速发展，后来，苏联向印度提供了下列各种类型的重武器：米格-21截击机，苏克诺伊SU-7和SU-7B战斗机，安东诺夫-安-12，伊柳辛·伊尔-14和图波列夫·图-124运输机，米格-4和米格-8直升飞机，别佳级护卫舰，北方级登陆艇，回收级海洋巡逻艇，纳奴契卡级大型导弹艇，黄蜂级导弹快艇，乌格拉河级潜艇支援舰，环礁空对空导弹，A-2地对空导弹；

---

\* 据1978年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世界军费开支和武器转让》，1967—1976年外国向印度转让的武器价值达到16.81亿美元，其中，苏联向印度转让的武器价值达到13.65亿美元。——译者

① 关于米格飞机交易的详细情况，参阅伊恩·格雷厄姆，“印苏的米格飞机交易及其国际反响”，《亚洲调查》杂志，第4卷，第5期，1964年5月，第623—830页。

冥河地对地导弹，T-54、T-55和PT-76坦克。<sup>①</sup>

很自然，苏联向印度大量转让武器，对印度武装部队的构成是有影响的。在3个军种当中，空军和海军受到苏联武器转让的影响最大，陆军受到的影响最小。就武器的种类而言，苏联制造的巡洋舰、潜艇、巡逻艇和导弹艇、战斗机、截击机、直升飞机、坦克和装甲人员运输舰是特别突出的。

尽管苏联是重要的武器供应者，但是，印度却没有为了满足自己的武器需要而完全转向莫斯科。几年来一件优先考虑的事情是：取得远程轰炸机，取代亚音速堪培拉式和猎兔狗式飞机，这些飞机曾经是印度轰炸机队的主力，但是，现在已经老化了。<sup>②</sup> 1978年10月，官方宣布说，英、法合制的美洲虎式飞机已被选中，以便满足印度对远程轰炸机的需要，这对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法国的海市蜃楼 F-1飞机和瑞典的雷电式多用途战斗机）是有利的。<sup>③</sup> 虽然据报道苏联人已经表示愿意以优惠价格出售，并规定可以根据特许证在印度制造米格-23、SU-20和SU-22飞机，但是，印度从技术上

---

<sup>①</sup>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贸易注册，与第三世界的武器贸易》年报，斯德哥尔摩，阿尔穆克维斯特和维克塞尔出版社，1975年版，注册编号：第17号，第33—37页。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均势》年报（1969—1970年和1976—1977年两期年报）。《简斯战船》年报（伦敦），1976—1977年，第226—232页。马哈拉杰·乔普拉佩翼司令（退役）：“与俄国相爱”，《组织者》杂志（新德里），1977年10月31日。关于1977年向苏联的武器定货清单，参阅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均势》年报，1978—1979年，第105页。

<sup>②</sup> 参阅“印度的困境：数量还是质量？”《国际航空母舰》杂志，1975年10月号，第174—176页。

<sup>③</sup> 《泰晤士报》（伦敦），1978年10月7日。

考虑谢绝了这项建议。<sup>①</sup>同样，印度和英国就购买猎兔狗式-5或短距起降飞机举行过谈判，以便取代最近在印度唯一的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过时的海鹰式飞机。<sup>②</sup>

虽然苏联作为一个突出的武器来源，并没有妨碍印度去谋求使自己的供应来源多样化，某些因素却表明，苏联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供应者。现代化军事装备的费用十分昂贵，这就必然出现信贷的支付问题，对于象印度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由于印度购买武器时不得不考虑到费用问题和质量问题，而苏联又同意用出口商品支付，而不是用可以兑换的通货支付，所以，苏联的许诺将继续具有吸引力。而且，鉴于苏联人把印度作为抗衡中国的国家而加以重视，而且，他们长期以来对保持密切和稳定的印苏关系感兴趣，所以，莫斯科很可能愿意满足印度将来的军事需要。对比之下，对国际武器贸易中的其他重要参加者来说，向印度转让武器的政治战略基础仍然不够突出。

在讨论外国供应者对印度防御需要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必须考虑到印度武器工业所取得的进步，因为印度对外国来源的依赖性将随着印度的国内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减少。作为印度武器达到自给自足的长期目标的一部分，印度正在根据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苏联的特许证，制造各种武器。<sup>③</sup>

<sup>①</sup> 关于苏联的许诺，参阅《印度时报》（孟买），1978年2月10日。《印度人报》（马德拉斯），1978年2月10日。《经济与政治周刊》（孟买），1978年4月8日，第596页。

<sup>②</sup> 《印度人报》（马德拉斯），1978年10月21日。《航空周和空间技术》杂志，1978年10月23日，第26页。

<sup>③</sup> 苏联米格飞机特许在海德拉巴市、科拉普特和纳西克的8个工厂制造，它们分别制造电子设备、飞机发动机和机身。这8个工厂是根据1962年协定由苏联援建的。

此外，有本国设计的几种武器正在研制或制造，现在，国内生产可以满足印度对小型武器、炸弹和炸药的需要。<sup>①</sup>

尽管取得了这样的进步，但是，在最近的将来，国内生产还不可能满足印度的全部防御需要。在根据外国特许证制造的武器中，尽管本国制造的成分正在稳步增长，但在设计、关键部件和次修方面，仍然要依赖持特许证的国家。而且，这类武器，以及本国制造的武器系统，由于生产上的延误，有时还必须依赖进口。<sup>②</sup>最后，如果人们考虑到，在1969—1970年到1977—1978年期间，印度每年在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平均开支还不到每年国防预算的2%，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印度的国防工业是难以赶上现代化武器技术迅速提高的步伐的。<sup>③</sup>

### 三、安全方面的依赖性、武器的 转让和苏联的政策

印度领导认识到，作为武器的一个来源，作为印度安全

<sup>①</sup> 关于本国设计制造或发展的武器的详细情况，参阅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76年世界武器和裁军年报》，斯德哥尔摩，阿尔穆克维斯特和维克塞尔出版社，1976年版，附录GE，第24页。《全世界的简斯飞机》年报（伦敦），1974—1975年，第101—106页。

<sup>②</sup> 推迟制造常胜者型坦克导致60年代中期向苏联订购75辆T-55坦克。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与第三世界的武器交易》年报。后来，由于推迟制造HJT-16教练机，结果印度购买了波兰的TS-11喷气式教练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75年世界武器和裁军年报》，第230页。同上，1976年年报，第264页。

<sup>③</sup> 关于印度的军费开支资料，参阅高塔姆·沙曼中校（退役），“印度的防御生产”，《防御研究与分析杂志学会》（新德里），第10卷，第4期，1978年4—6月号，表7，第242页。

中的一个因素，苏联是个重要的国家，这种认识为稳定的双边关系提供了基础，已经使苏联获得了好处。印苏关系的最近发展说明了这种形势对于苏联人的价值。

在甘地夫人于1977年3月大选中失败、获胜的人民党组成政府以后，莫斯科对于将来印苏关系的发展方向当然是没有把握的。<sup>①</sup>苏联的新闻工具热情洋溢地支持甘地夫人在1975年6月26日宣布的紧急状态声明。在以后将近两年里，公民权利被剥夺，人民党政府的许多成员被逮捕。此外，不仅是新政府的主要成员在过去几年里被苏联的宣传工具描写成右翼分子，而且新总理莫拉尔吉·德赛也批评甘地夫人过分地屈从了苏联的利益。<sup>②</sup>

尽管苏联担心印苏关系发生变化，西方也预言印苏关系会发生变化，但是，德赛政府在执政期间，却继续奉行50年代中期以来历届国大党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坚持与苏联保持紧密的关系。在德赛执政的27个月里，<sup>③</sup>进行过5次高级访问，并且签订了新的贸易和援助协定。由于1966年到1977年5月期间的经济发展信贷没有增加，印苏之间军事和安全关系的重要性，对于德赛政府决定对苏态度显然起了重大作用。

<sup>①</sup> 关于1977年3月大选以后印苏关系的讨论，是以拉詹·梅农的论文为基础的。论文的题目是，“印度与苏联：新的关系阶段吗？”《亚洲调查》杂志，第18卷，第7期，1978年7月，第731—750页。

<sup>②</sup> 1975年7月，在接受奥里安娜·法拉西采访时，德赛说：“她（甘地夫人）从来没有放过向苏联人讨好的机会。”奥里安娜·法拉西，“甘地夫人的反对派：莫拉尔吉·德赛”，《新共和国报》，1975年8月2日和9日，第155页。

<sup>③</sup> 由于党员普遍背叛他的党，莫拉尔吉·德赛于1979年7月辞职。以辛格为首的新政府宣誓就职，但是，在1980年1月竞选以后，甘地夫人成了总理。

用。

除了鼓励新德里避免骤然中止它与莫斯科的关系外，印苏之间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关系也使印度关心苏联的外交政策利益。印度政府对于苏联在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尽管印度的主要报纸和在野党谴责了这次入侵，尽管由甘地夫人发表的议会声明呼吁尽早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外国军队，但是，起草这个声明时显然考虑到了苏联的感情。<sup>①</sup>印度代表在联合国同样采取了低姿态。8月23日，印度对一个西方决议投了弃权票，因为那个决议对苏联的谴责太过火了。继苏联行使否决权以后提出来的另一项决议，呼吁秘书长指定一位代表去查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的安全情况。虽然印度代表赞扬了捷克人民的英雄气概，但是，在阐明印度对于该建议的立场时，他表示反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干涉。<sup>②</sup>反映印度采取小心谨慎姿态的最后行动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印度国务部长在离开联大的10月会议之前，表示反对把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列入这届会议的议程。<sup>③</sup>

虽然印度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采取这样的立场，部分地说起码是由于考虑到了苏联的利益，但是应当指出，印度采取小心谨慎态度的代价实际上是不大的，印度没有在涉及到

① 该声明还提到了印苏之间久经考验的友谊。参阅《甘露市场报》（加尔各答），1968年8月22日。

② 同上，1968年8月24日。

③ 《星期日政治家报》，1968年9月29日。在部长声明几天以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拜访他时表示，他们对于印度报纸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批评态度表示关注。《印度斯坦时报》（新德里），1968年9月24日。

它的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做出牺牲。

人们认识到，在下列事例中按照苏联的好恶行事不符合印度的主要目标，于是印度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姿态。尽管莫斯科的反北京战略中把印度看得很重要，印度却避免变成苏联政策的工具。虽然苏联人极想使印度赞成亚洲集体安全计划（这个计划是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6月首先提出来的），但是，新德里一直不愿意表示赞成这个计划。印度显然了解，北京认为这个倡议是苏联为建立一个遏制中国的联邦而做的努力。同样，虽然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苏印条约是苏印相互关系中一个新的比较紧密的方面，但到1976年时，甘地夫人便开始致力于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瓦杰帕伊的访问表明，德赛政府同样决心执行一项独立的对华政策。而且，尽管柯西金1979年3月对印度的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使印度支持苏联对中越战争的立场，但是，结果是平平淡淡的。新德里拒绝参加柯西金对中国的反复批评，并拒绝匆匆忙忙地承认越南人支持的柬埔寨韩桑林政府。联合公报避免提及柬埔寨，而且只笼统地呼吁撤走在越南的中国军队。<sup>①</sup> 印度对禁止核扩散条约的立场同样表明，它不愿意为推

① 参看德里特·德塞的著作

① 关于柯西金的努力和印度的反响的详细情况，参阅《印度时报》（孟买），1979年3月14日，1979年3月15日，1979年3月17日。关于对这次访问的进一步分析，参阅罗伯特·兰德：“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印度”，《自由电台研究公报》，第RL78/79号，1979年3月8日，第1—3页。继柯西金的访问以后，两名前印度官员（考尔和迪尼施·辛格）访问了东盟国家的首都，努力为承认韩桑林政府进行游说。印度做这些努力是因为新德里对北京不信任和与河内有传统的良好关系，而不是因为柯西金的访问。参阅罗德尼·塔斯克：“河内朋友的轻慢”，《远东经济评论》（香港），1979年3月10日，第9—10页。

进苏联的目标而作巨大的牺牲。在导致这项条约的谈判中以及在那以后的年月里，新德里曾拒绝支持这项条约，理由是这项条约规定的义务是不平均的，它对无核国家是不利的。莫斯科赞成把禁止核扩散条约作为一种限制手段，据说，它还企图使印度同意该条约，但它却没有改变印度的立场。<sup>①</sup>

在德赛1979年6月访问苏联期间，苏联也没有成功地使印度支持阿富汗的塔拉基政府。在1978年4月塔拉基政变掌权以后，苏联在阿富汗的顾问增加了，两国在1978年12月签订了安全条约。当该政权面临武装对手的压力日益增长时，苏联的宣传工其越来越多地发表支持该政权的声明，并指责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国支持叛乱分子。德赛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进行访问的期间，柯西金说，印度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帮助塔拉基政府取得稳定和劝说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反对派。<sup>②</sup> 尽管苏联努力争取印度的支持，但是据报道，德赛告诉苏联领导人说，塔拉基应当与反对派进行对话，并在阿富汗扩大该政权的支持基础。<sup>③</sup> 访问结束时签署的联合公报，只笼统地提一下阿富汗“人民”有权不受外国干涉，有权决定他们的未来。鉴于苏联在那个国家的势力加强了，这是一种非常含糊的措词。<sup>④</sup>

① 据一位学者说，“在新的国际分工中，苏联注定要给印度套上马具，而美国却敦促德签字”。迪特马·罗瑟芒德：“印度与苏联”，《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鉴》，第386卷，1969年11月，第87页。

② 《印度斯坦时报》（新德里），1979年6月13日。

③ 《印度斯坦时报》（新德里），1979年6月13日。

④ 文本载《真理报》，1979年6月15日。



所以，总的说来，印苏之间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关系，并没有为莫斯科提供影响印度姿态的可靠基础。显然，一味强调苏联对于印度安全的重要性，一味强调专门研究关于苏联武器转让的资料，就会造成把依赖性和存在与影响等同看待的危险。正确地估计苏联武器供应的资料和训练计划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1967—1976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价值为13.65亿美元的武器，但是应当指出，仅仅是1977—1978年度的印度国防预算就达到了34.5亿美元。<sup>①</sup>而且，前面提到的数字\*是最新的，但是，它没有包括印度与英国之间最近达成的美洲虎式攻击机交易的价值。这笔交易的价值达到15—20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印度签订的一项最大的武器协定。<sup>②</sup>

虽然1956年至1977年期间，在苏联接受训练的印度军事人员有2,175名，但是，应当把这个数字与印度的109.6万军事人员联系起来看。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拉克、索马里和叙利亚等国，都有更多的（从绝对数字和在武装部队中所占的比例来说都是更多的）人接受过苏联的训练。<sup>③</sup>而且，没有证据说明在苏联接受过训练的人员在武装部队中形成了亲苏集团。在印度的苏联军事人员一直比较少，而且人数比较固定。1972年为200人，1973年和1974年上升到300

---

① 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均势》年报，1977—1978年版，第58页。  
\* 关于前面提到的数字，参阅前面的译注。——译者

② 查理：“印度—苏联军事关系”，第238页。

③ 美国中央情报局：《共产党对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年报，1977年版，表3，第4页。

人，1977年下降到150人。但是，比印度小得多的国家（例如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埃及、索马里和叙利亚）却接待了更多的苏联军事技术人员。<sup>①</sup>虽然在印度有一个庞大的后勤武装人员训练设施网，但是，苏联人员从来没有对军事战略和训练产生影响，就象在埃及等国那样。<sup>②</sup>

#### 四、结论：得与失

在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今后，印度会坚持与苏联保持紧密关系的政策。作为武器来源的苏联的重要性还会继续存在，尽管由于政治原因和技术原因印度还会继续执行多样化的采购政策。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印苏之间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关系将继续是牢固的，并将为莫斯科提供稳定的双边关系的基础。考虑到苏联与埃及和索马里关系在近年来已经严重削弱（尽管与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关系都是重要的），所以，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总之，苏联利用武器供应和印度在安全方面依赖苏联这两点来影响印度的姿态，成效极微。印度一直不愿意投苏联之所好，因为那样做会牺牲巨大利益。新德里也根本没有直

<sup>①</sup> 同上页注<sup>②</sup>，表2，第8页。情报研究所：《共产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1973年的援助和贸易》年报，第INR RS—20号，1974年10月。美国国务院公共服务局：《共产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1974年的援助和贸易》，特别报告，第23号，1976年2月，第14页。

<sup>②</sup> 关于印度军事训练设施的详细情况，参阅印度政府情报和广播部：《印度：参考年鉴》（1975年），新德里出版社，1975年版，第40—43页。



## 第十章

### 苏联与东盟

托马斯·威尔伯恩\*

在70年代末，由于中越冲突正在继续，由于苏联支持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地位还没有解决，所以，苏联决策者日益重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以及组成东盟的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这些国家靠近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它们如果不是苏联的依附国，也是苏联的盟国），中国与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华侨又受到了那样的对待，这就使该地区变成了莫斯科与北京进行冷战的另一个战场。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波尔布特游击队和其他反越势力与苏联扶植的韩桑林政权继续不断的冲突，也可能使东盟的成员国泰国的一部分

---

\* 作者托马斯·威尔伯恩博士 (Dr. Thomas Wilborn)，自1974年开始到战略研究所工作。他曾在肯塔基大学获得新闻学学士学位、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除了在麦迪逊学院、密苏里州立大学教授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课程外，他还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肯塔基大学教育研究所中任职。威尔伯恩曾经编写过几份关于核战略和东南亚问题研究备忘录，他还为专门杂志撰写过书评。

——译者

\*\* 指韩桑林傀儡政府。——译者

地区变成一个热战的战场。

如果东盟国家承认越南扶植的柬埔寨政府，那就不仅意味着追认了越南入侵的合法性，而且显然是否定了中国武装进攻越南的合法性。所以，东盟国家这样做本身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惨重失败。但是，如果东盟继续承认波尔布特的民主柬埔寨，并承认中国对越南的进攻与越南军队在柬埔寨的继续存在有关系，那就是苏联外交的失败，那就是越苏在该地区扩大影响的障碍，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日益增长的标志。

然而，苏联对东盟较为重视起来是最近的事。从1965年雅加达未遂政变时起，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就下降了，直到1978年苏越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时，苏联一直比较强调它与美国、中国、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苏联好象已经比较重视其他第三世界地区，例如南亚、中东和非洲。在东南亚，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国家比东盟这个组织或它的成员国，都更加受到克里姆林宫的重视。<sup>①</sup> 考察一下苏联在1965年以前卷入印度尼西亚的各种原因、那种政策的失败，以及从那时候起直到最近苏联都对印度尼西亚比较重视等情况，将有助于了解和估价苏联对该地区的政策。

---

<sup>①</sup> 参阅罗伯特·霍恩：“苏联与东南亚：影响的局限性”，载《苏联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罗杰·卡尼特、唐纳·巴赖合编，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5年版，第156—178页。杰弗里·朱克斯：“苏联与东南亚”，《澳大利亚的看法》杂志，第31卷，1977年4月，第174—184页。

## 一、苏联在印度尼西亚的 卷入与失败

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政策首先承认第三世界是一个竞技场。在那里，苏联可以鼓励中立主义，以便限制西方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后来，当赫鲁晓夫开始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中打上他个人的标记时，为了在苏联选择的几个前殖民地当中扩大苏联的影响和得到盟友，苏联便发动了攻势。

印度尼西亚被称作是新兴的国家之一，而新兴的国家则被赫鲁晓夫称作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和平地带”。据认为，这些国家特别容易接受苏联的援助，特别容易接受苏联对国际环境所做的论述。<sup>①</sup>

印度尼西亚有一位大众喜爱的、反西方的、颇有魅力的领袖苏加诺总统；有一批基本上主张根除西方的经济控制、并愿意与国内共产党人实行共同合作的全国名流；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强有力的共产党（到1965年时，它是非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党）；由于主办第一届亚非最高级会议（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在前殖民地国家中起了领导作用；印度尼西亚还有潜力控制东南亚的政治。另外，由于印度尼西亚与荷兰在西伊利安的地位问题上有分歧，印度尼西亚需要武器和政治支持，看来美国及其盟国是不会提供的。对于莫斯科

---

<sup>①</sup> 参阅伊丽莎白·瓦尔凯尼尔：“苏联与第三世界：从赫鲁晓夫的‘和平地区’到勃列日涅夫的和平计划”，载卡尼特和巴赖前引书，第4页。

来说，支持印度尼西亚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办法，用来加剧这个与西方有着重要利益关系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样做将会显示出，苏联既是另一个外援的来源，又是弱小的前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的坚决的支持者。<sup>①</sup>

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至少估计到，印度尼西亚不会支持苏联的敌人，不过，他们的期望大部分没有实现。在苏联的支持下，印度尼西亚确实在该地区制造了紧张和冲突，并为美国及其盟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不过，苏联在雅加达的影响却一直是有限的。苏联答应向印度尼西亚提供10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但是，实际支付额要比这个数目少得多）。<sup>②</sup> 苏联还答应在政治上完全支持印度尼西亚的西伊利安战役，并有效地（虽然不是那么积极地）支持印度尼西亚反对马来西亚。但是，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都坚决领导印度尼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从那时候起，印度尼西亚便与苏联公开对立，直接反对莫斯科在第三世界国家扩大影响的努力。因此，在1965年的流产的政变以前，苏联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就失败了，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过分依赖苏加诺一人的响应，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领导没

<sup>①</sup> 在分析1965年的政变和苏联对东南亚的政策时，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与苏联的关系。参阅安东尼·达克：《红色的文登精神：1959—1965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印尼共产主义者》，海牙，莫顿出版社，1973年版。霍恩前引书。朱克斯前引书。盖伊·波克：“苏联与东南亚”，《兰德论文集》，第5080页，1973年7月。尤里·拉阿南：《苏联武装第三世界：苏联外交政策的考察》，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版，第175—245页。

<sup>②</sup> 波克前引书，第8页，信贷共计10亿美元以上。除了雅加达体育场和一所医院这两项给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礼物外，苏联的援建项目都没有完成。霍恩前引书，第164页。

有象认真注意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需要那样，去注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需要。<sup>①</sup>

不论赫鲁晓夫的接班人从这个“轻率的”计划<sup>②</sup>中吸取了什么教训，他们都倾向于采取一种较为谨慎的外交政策，这一点显然得到了证实。将来，只有当苏联的重要利益受到危害的时候，只有当肯定可以取得有利结果的时候，他们才会大规模地干涉第三世界的事务。

## 二、东盟在苏联政策中的低下地位

直到最近，苏联决策者们一直把东盟地区摆在不重要的地位，这是出自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目标的性质、经济利益和战略上的考虑。

用来表达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的意识形态框框，别人已经做过描写和分析，<sup>③</sup>这里不需要再探讨了。现在需要说明的是，正统的马列主义仍然信心十足地认为，社会主义胜利

---

① 霍恩前引书，第164页。朱克斯前引书，第176页。贾斯特斯·克罗诺夫：“苏联与东南亚”，载《苏联与发展中国家》，罗杰·卡尼特编，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103页，作者强调说，苏联外交受挫的基本原因，是过分依赖苏加诺个人。另外，拉阿南在其前引书的第235页中，则侧重强调这样的实际情况：苏联没有能够劝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中国的立场。

② 瓦尔凯尼尔前引书，第4页。

③ 参阅霍恩前引书和朱克斯前引书。罗杰·卡尼特：“斯大林以来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态度”，第27—50页。森·格普塔：《70年代以来的苏联亚洲关系》，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6年版，特别是其中的第1章，以及“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探讨”，载卡尼特和巴赖前引书，第20—32页，瓦尔凯尼尔：第9—9页。



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又要求人们采取谨慎和灵活的策略。资本主义仍然被认为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在核战争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仍然有能力摧毁世界的大部分以及社会主义的许多成就。另外，核战争给农业社会带来的损害要比给工业社会带来的损害小，“因而将消灭大多数的产业工人阶级，并把未来留给以农民为基础的毛泽东主义的‘模式’。”<sup>①</sup> 正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杰弗里·朱克斯所说：

……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框框（与其说它是十诫不如说它是福音）反映了某一政权的历史条件，这个政权发现：第一，世界的变化并不象它看起来来得那么快；第二，与它的奠基者的期望相反，它不但设法维持了几乎两代人之久，而且把它控制的国家推进到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地位。总之，历史似乎是在它这方面，而且人们可以不时地、安全地推动它，但不能使它发生大变动的程度；最大限度地提高苏联在现有体系中的地位，不仅不能否认革命原则，而以其他东西去代替它，而且，假如最后的必然变化值得欢迎的话，革命原则仍是必要的先决条件。<sup>②</sup>

换句话说，为苏联决策者们提供意识形态框框和解释国际环境的那种理论，不仅不要求苏联深入地卷入第三世界的事务，而且在不加干涉的情况下确保取得最后胜利——尽管有暂时性的挫折和牵制。马列主义似乎不想叫苏联实行比强权政治还要激进的政策。相反，正象苏联最近所做的解释那样，它

---

① 参阅朱克斯前引书，第1页。

② 同上，第2页。

要对第三世界实行带有保守倾向的政策。

不久以前，“最大限度地提高苏联在现有体系中的地位”，显然不需要苏联的领导人们去特别关注组成东盟的国家，当然也不需要它们去关注东盟本身。苏联在亚洲的主要政治目标（限制中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影响）是消极的，<sup>①</sup>而且，苏联没有受到严重威胁，因为这三个对手都没有为了使苏联的战略地位受到不利影响，而把它们的活动水平升级。诚然，自从南越在1975年失败以来，美国在东盟的存在特别是军事存在已经显著减少。应泰国政府的请求，美国从泰国撤走了2.5万人，他们的装备也撤走了，其中包括350架飞机。<sup>②</sup>还有，派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军援顾问团人数也明显减少了。现在，在这三个国家的美国军事人员可能还达不到过去派到泰国的一半。<sup>③</sup>虽然日本还在继续向东盟国家进行经济渗透，中国还在继续努力争取东盟国家支持它的“反霸”运动，但是，日本并没有对莫斯科在那里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产生严重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也没有获得成功。

从数量上来说，东盟国家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从1971年的1.341亿美元增加到1977年的4.322亿美元，但是，1977年东盟国家与苏联的贸易额在东盟总贸

---

① 参阅霍恩前引书。格普塔：《70年代以来的苏联亚洲关系》。波克对于苏联在东南亚目标的探讨。

② 《纽约时报》使用过这些数字。《纽约时报》，1975年8月18日，第1页。

③ 1980年提出的安全援助计划，批准向这三个国家派98人。美国国防安全援助署：《安全援助计划：国会的陈述》，1980年版，第40页。

易额中的份额(0.7%)还低于1971年(0.9%)。苏联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数字表明,在整个贸易中,苏联贸易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在这个时期里,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大约为苏联贸易额的两倍。据统计,在苏联这个不大的贸易额中,<sup>①</sup>30%是与马来西亚进行的贸易,而这个贸易额只占马来西亚1977年贸易总额的1.2%。

虽然贸易额不大,但是,苏联与东盟特别是与马来西亚的贸易,在经济上说却对苏联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苏联进口的97%的天然橡胶和橡浆都是从马来西亚购买的,占马来西亚此类商品总出口的12—15%,占印度尼西亚此类商品总出口的7—8%。<sup>①</sup>天然橡胶和橡浆的供应,使苏联在贸易差额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过,这对苏联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来说并不重要。无论如何,天然橡胶和橡浆是可以通过正常的商业途径买得到的,除非在该地区发生重大冲突;否则,这种途径可能一直保持畅通。

东盟地区通常被说成是对西方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因为那里有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这些海峡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至少有85%的日本进口原油和其他重要商品要从这里经过。但是,对苏联来说,这些海峡的战略意义,与整个东盟地区的战略意义是不一样的。<sup>②</sup>

苏联人并不过分依赖经过这些水道的贸易,虽然苏联海军的太平洋舰队确实要经过东盟国家的水域。苏联在印度洋

---

① 联合出版研究服务局,第72385号,第37页。

② 朱克斯前引书,作者在181—183页中有详细论述。

中的大多数舰只，包括监视美国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反潜飞机，是来自太平洋舰队，而且必须穿过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自称属于自己的那些海峡才能到达那里。<sup>①</sup> 在发生危机期间，不能自由通过这些海峡，这对苏联来说至少也会感到不方便，但是，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这样的发展是非常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沿海国家是自觉不结盟的，它们不可能跟任何超级大国进行直接对抗。

一旦发生大战，对苏联海军来说，该地区海峡的重要性是有限的。苏联的海军学说假设了一种短暂的冲突，<sup>②</sup> 而且，苏联四个舰队中最软弱的太平洋舰队，<sup>③</sup> 无论如何也没有力量凭借其遥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的基地和陆地上的空军掩护，来与美国的海军进行交战。<sup>④</sup> 在发生涉及日本的危机或冲突时，苏联可能企图干涉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但是，正象朱克斯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有更容易的办法去破坏日本的贸易，他们不必对马六甲海峡发动进攻。<sup>⑤</sup> 如果苏联将在金兰湾建立海军基地这种推测是正确的话，那么，西南太平洋中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

---

① 唐纳德·丹尼尔：“苏联在太平洋的海军”，《亚洲太平洋共同体》，1979年春季和初夏两季合刊，第73页。

② 在持续的海上冲突中，太平洋舰队不得不通过该地区进行补给。但是，苏联人使用现有能力特别是使用空军进攻，是保护不了这些航线的。为什么苏联的理论只适用于短期的海上行动呢？这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当然也是充分的原因。

③ 《亚洲年报》，1979年版，第39页。

④ 丹尼尔前引书，第73页。《了解苏联的海军发展》，第三版，华盛顿，1978年1月，第14页。

⑤ 朱克斯前引书，第183页。

任务就会改变，东盟地区在苏联海军战略中的战略重要性就会增加，虽然苏联人在南中国海维持一个军事设施的后勤问题。将限制苏联太平洋舰队在战时的作用。

### 三、苏联对东盟的政策

当东盟在1967年成立的时候，莫斯科只与东盟的两个成员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有外交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并不亲密。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曾经允许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并怀疑苏联窝藏和保护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

美国最忠实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盟友泰国政府，被苏联的宣传说成是为帝国主义事业服务的反动叛徒集团，<sup>①</sup>显然是不配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实际上，苏联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1968年以前并未互派正式外交代表，但它与这两国的相互关系却比它与那些没有苏联大使馆的国家更好、更有益处，因为它正与这两国发展互利的贸易。但是，甚至这些前英国殖民地也与苏联的敌人结盟了，因为它们都接受前殖民分子的保护。它们不久就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了防御条约。

鉴于苏联与东盟成员国关系的性质，人们并不期待苏联承认这个新组织，苏联也不会承认这个新组织。相反，苏联

---

<sup>①</sup> 参阅库兹涅佐夫：“泰国：人民与基地”，《新时代》杂志，第12期，1967年10月。

的宣传工具谴责它明显地为美国及其追随者拉拢更多亚洲国家参加反共的军事联盟效劳。

今天，美国特别对东盟感兴趣，因为除了那些已经通过军事条约跟西方连接一起的国家之外，该组织还包括东南亚最大国家之一的印度尼西亚。正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的那样，印度尼西亚的成员国资格立即使这个新组织具有“特别声望”。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甚至已经同意在东盟宣言中包括一项条款，规定可以在它们领土上设立临时性的外国军事基地。但是，据路透社报道，这不过是为了“吸引印度尼西亚”而已。

东盟的幕后发起者，也希望把不结盟国家拉入该联盟。……重要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东盟以后，雅加达开始与蒋介石政府和南越傀儡政权发展了关系，而且，在它的外交政策中出现了消极的特点。<sup>①</sup>

最后，在劝使其他不结盟国家参加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希望把东盟和亚太理事会合成一个大的军事集团。苏联人进行了斗争。另外，他们宣称，东盟没有可能达到经济合作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才是它存在的真正基础。

实践证明，地区联盟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有关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国垄断者压力的基础上的团结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它们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受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程度。<sup>②</sup>

---

<sup>①</sup> 巴甫洛夫斯基：“亚洲的地区主义问题”，《国际事务》杂志（莫斯科），1969年4月号，第50页。

<sup>②</sup> 同上，第46页。

显然，东盟是不会有机会的。

苏联最初对东盟的评论是非常尖刻的，它集中谴责了美国与该地区组织的关系。这是十多年中评论的固定主题。但是，在12年期间，对东盟的评价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到1972年初，苏联的评论员一直在为签订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和苏美关于基本关系原则的声明做准备。<sup>①</sup>除其他东西外，这些协定和声明等于美国正式承认了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和以和平共处或缓和取代冷战。而且，根据缓和的精神，现在，苏联人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内）发现了积极进步的势力，而在这之前这些国家似乎完全是受垄断资本的代理人控制的。他们报道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竞选主张是“符合民族利益”的，虽然他用参加东盟并允许在菲律宾领土上保留美国基地的方法接受了美国的指导。<sup>②</sup>

苏联出版物对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的描写，仍然没有能够说明任何可取的社会主义，<sup>③</sup>但是，现在的确已经注意到，苏哈托和他的将军们曾经拒绝表示赞同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而且，印度尼西亚曾经反对东盟变成军事集团。据说，这两种主张都激怒了五角大楼，所以，使克里姆林宫感到高

---

① 基本关系原则声明，是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签订的。与此同时，还在莫斯科签订了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这些原则重申，美国和苏联应当实行和平共处或缓和。

② 威廉·波默罗伊：“菲律宾的新趋势”，《新时代》杂志，第5期，1970年2月，第20页。V·斯潘达瑞安：“在橡胶之国”，《新时代》杂志，第22期，1967年5月，第21—24页。

③ B·维廷：“印度尼西亚的形势”，《新时代》杂志，第8期，1973年2月，第26—27页。

兴。<sup>①</sup>

1972年1月，在一篇对东盟国家外长签署支持在东南亚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的宣言的评论中，《消息报》政治观察家库德里亚夫泽夫推论说，“某些人士”之所以支持中立化是因为他们担心，美国所实行的越南化政策是中国或日本发挥更大影响的前奏。库德里亚夫泽夫认为，谋求该地区中立化的倾向是积极的，“因为这样的倾向表明幻想业已破灭，有人曾经幻想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找到一个毫不自私的保护者，这样的保护者，有助于加强亚洲一、两个国家的独立性。”但是，除了印度尼西亚之外，其他东盟国家都与帝国主义国家做了某种军事安排。在撵走全部美国军队、撤除美国基地、解散军事联盟和拒绝尼克松主义以前，亚洲是得不到和平、自由和中立的。<sup>②</sup>他认为，缺少这些条件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中立化的思想是建立在“东南亚目前形势”的基础上，所以，这种思想大概是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的利益也要以目前的形势为基础。“中立或许有助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争取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议，得到了所有寻求亚洲局势的正常化和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那些国家的支持。”<sup>③</sup>

6个月以后（在与东盟保持友好的方针确定以后），这位观察家撰写了一篇乐观的文章，他不再强调对苏联不利的

---

① 同上，N·沃尔金：“印度尼西亚面临的选择”，《国际事务》杂志，1971年12月号，第65—68页。

② 《苏联最新出版文摘》，第24卷，第1期，第11页，译自《消息报》，1972年1月7日，第2页。

③ 同上，第12页。



形势了。虽然鼓吹东南亚中立化的人们并不是始终言行一致的，但是，他说这种思想正在逐渐变得不可抗拒。人们必须警惕的是，新殖民主义并不掩饰它的某种阴谋，不过，

忽视许多亚洲国家政界人士的精神状态是错误的，他们开始认识到，封锁是有害的，这种封锁妨碍他们在民族独立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潜在机会。<sup>①</sup>

这种有利趋势的唯一证据是，马科斯总统在口头上攻击允许美国在菲律宾的领土上拥有军事基地的各项协定。

苏联决策者们显然认为，在1976年下半年以前，在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内部发展中，积极的倾向仍然占优势。在此期间，当东盟的各国政府正在反对尼克松主义、南越已经崩溃和美国势力已经被泰国逐出的时候，苏联对各国的评论总的来说已经温和了。他们实际上总是认为，根据缓和的精神和承认印度支那爱国力量取得的胜利，东盟国家正在谋求与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关系和实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适用于东盟本身的主要论点是，宣布把东南亚变成和平、自由和中立的地区，可能符合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的建议，而且，这种宣布证明，该地区的各国人民的确要求真正的独立和把外国的军事力量撤走。<sup>②</sup>

1976年，特别是在解散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协定达成以

---

<sup>①</sup> 《苏联最新出版文摘》，第24卷，第25期，第9页，译自《消息报》，1972年6月22日，第3页。

<sup>②</sup> 迪米约里·沃尔斯基：“亚洲人民的共同事业”，《新时代》杂志，第50期，1974年12月，第18—19页。

后，美帝国主义者想把东盟变成一个军事条约的论点又出现了。这很可能是当时美苏关系全面恶化的反映。跟1968—1970年的评论不同，新的说法总是指出，1977年以前东盟领导人反对过美国军国主义者的阴谋，而且还积极地提出了中立化建议。莫斯科电台的听众从1976年7月印度尼西亚的广播中得知，“接近五角大楼的人士们”曾证实，美国提出每年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的援助将从1亿美元增至7亿美元，交换的条件是同意为东盟建设一个“所谓的训练基地”，该基地准备扩大一倍，作为第七舰队的一个停泊港口。<sup>①</sup>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拒绝了这样的建议，这表明他们是致力于真正和平的正直的领导人。

在同一时期（1967—1976年）苏联在东盟国家的活动比它的宣传报道中的论点更有连贯性了。苏联不断地努力扩大贸易，增加东盟国家访问苏联的人数，扩大文化交流。1976年，当苏联最后与菲律宾正式建交时，苏联在所有东盟国家中都有了正式代表。据一些观察家说，<sup>②</sup>苏联派往这些国家大使馆的贸易官员和其他方面的官员，都比实际需要超员很多。这种情况表明，苏联的活动规模大大地超过了东盟各国政府所习惯的规模。1971年，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描述说：

我们在亚洲开始感受到苏俄进攻的冲击，这样的进攻，我们过去从

---

<sup>①</sup>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6年7月13日，第K<sub>2</sub>页，译自莫斯科对印度尼西亚印尼语广播，1976年7月7日。

<sup>②</sup> 罗德尼·塔斯克：“东盟：取缔红色”，《远东经济评论》杂志，1979年8月24日，第24页和26页。

未经历过。苏联人向该地区除了大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派遣了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团；苏联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举办了交易会，并在本国接待了来自这些国家的代表团。苏联存在的增长是否否认不了的。①

苏联在该地区采取了重大的主动行动。1975年，它为印度尼西亚建设两座水力发电厂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它还表示愿意为印度尼西亚在民丹岛建设一个铝矾土厂提供3.6亿美元。②后一个行动的目的是想重新在印度尼西亚取得影响地位呢？还是主要反映苏联的资源需要呢？这是不能断定的。③无论如何，苏联的建议在1977年被拒绝了，据推测，因为苏哈托政权反对大批的苏联技术人员乘搞援建项目的机会涌入印度尼西亚。

1976年后期，说美国企图把东盟改变成为另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言论多了起来。对东盟的评论中，这些言论占了优势。跟1976年初期的评论不同，这些广播和文章说，有些东盟领导人（例如泰国的军事家们和印度尼西亚的国防部长）支持美国的将军们。④诚然，有人指出，东盟和美国之间已经签订了许多双边的军事合作协定，如果这些活动继续扩大的话，东盟就会变成军事集团，虽然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还不是军事集团。⑤象过去一样，这些广播和文章仍然

① 森·格普塔：《70年代以来的苏联亚洲关系》，第234页，复印自《马尼拉公报》，1971年2月17日。

② 美国中央情报局，第24页。

③ 苏联依赖进口铝矾土和铝。

④ 亚历山大·乌斯瓦托夫：“东盟在何处感到紧迫”，《新时代》杂志，第8期，1977年1月，第8—9页。

⑤ 同上，第8页。

强调，美国要对东盟领导人施加强大的压力，但是，新的曲解认为，东盟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已经被美国争取过去了。

五角大楼认为，东盟在共亚洲战略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它特别关注那个组织的军界。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正在竭力通过收买、奉承、邀请游览美国的娱乐场所，通过各种招待会和许诺，来使东盟国家的军界采取亲美的立场。

五角大楼主要是在东盟军界的帮助下，不仅加强了它在泰国的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它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地位，并且向其他国家进行了渗透。<sup>①</sup>

一年来，指责美国企图把东盟变成反共军事联盟的宣传报道日益增多，这种指责几乎成了宣传报道中的唯一主题。为了对付东盟国家，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军事工业家们简直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提供经济援助，他们想用政治手段来左右东盟国家的军事政策，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武器和弹药强加给它们”。<sup>②</sup>在用东盟取代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活动中，美国还得到了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帮助。<sup>③</sup>在这个时期里，苏联的宣传工具避免称赞东

---

<sup>①</sup>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7年1月7日，第K<sub>1</sub>页，和平与进步电台对亚洲英语广播摘要，1977年7月5日。

<sup>②</sup>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7年4月6日，译自《红星报》，1977年4月2日。

<sup>③</sup>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7年8月2日，第K<sub>1</sub>页，译自莫斯科电台对印度尼西亚印尼语广播，1977年2月21日。

盟各国政府。只有那些反对危险倾向的“人民”或“进步人民”才受到称赞。<sup>①</sup>

有些发展显然使苏联的宣传工具非常苦恼。一个发展是，东盟国家的代表在雅加达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军事问题讨论会，据说，那次讨论会与东盟的目的不一致。印度尼西亚的武装部队副司令苏罗诺在那次讨论会上讲了话，并呼吁东盟各国“要为保卫该地区（大概是指反对共产主义）而牺牲某些民族利益”。<sup>②</sup>另一个发展是，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所谓阴谋与东盟的军事化更紧密地联系起来。<sup>③</sup>中国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军队的支持受到反复谴责，北京还被指责操纵东盟国家的华裔并将他们作为“第五纵队”。第三个危险的发展是，东盟国家当中的双边的军事协定不断增加。据说，美国用第七舰队向1976年在巴厘岛举行的最高级会议的决议和1977年举行的外长会议的决议施加了影响。<sup>④</sup>苏联宣传工具说，为了向东盟施加压力，美国在这两次会议期间都在印度洋中部署了军舰。

多数西方观察家们认为，东盟的经济成就在大多数西方观察家看来是不大的，但是，苏联作家们却把它们说成是经

---

<sup>①</sup>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7年8月2日，第K<sub>2</sub>页。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7年8月23日，第C<sub>1</sub>页，译自莫斯科电台对印度尼西亚印尼语广播，1977年6月20日。

<sup>②</sup>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7年2月7日，第K<sub>1</sub>页，译自《塔斯社》国际处，1977年2月3日。

<sup>③</sup> 参阅A·车尔尼绍夫：“太平洋：国际安全与合作问题”，《国际事务》杂志（莫斯科），1977年11月号。

<sup>④</sup>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9年8月2日，第K<sub>1</sub>页，译自莫斯科电台对印度尼西亚印尼语广播，1977年2月21日。

济合作的重大成就。人们谅解东盟国家接受外国垄断资本，因为新老殖民主义的多年剥削造成的贫困，使它们没有其他的选项。它们受到称赞，因为它们正在设法“限制帝国主义资本剥削的实质表现”。<sup>①</sup>东盟的国际政策，被说成是“具有建设性的”政策，<sup>②</sup>其各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则被说成是与越南的外交政策几乎完全一样。<sup>③</sup>

东盟之所以受到称赞，显然是由于它提出了四个主张。它主张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它不愿叫东盟变成军事条约。这一点，已经在前面讲过了。此外，东盟提出把东南亚建成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的建议，也受到了称赞（有时还受到了非常过分的称赞），因为该建议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sup>④</sup>（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建议再也不提了。）但是，苏联作家却难以措词，因为越南抛出了自己的建议。越南建议建立“和平、独立和中立”的地区，东盟建议中的“自由”与越南建议中的“独立”两者之间的分歧，变成了争论的题目。<sup>⑤</sup>越南的方案，至少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与原来东盟的建议一致的。<sup>⑥</sup>

---

①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8年10月10日，第K<sub>1</sub>页，译自V·卡利宁的文章，《真理报》，1978年10月4日，第4页。

②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8年8月16日，第K<sub>1</sub>页，译自和平与进步电台对东南亚官话广播，1978年8月8日。

③ 尤里·尼科拉耶夫：“苏联作家对印度支那的看法”，《商业时报》（吉隆坡），1978年4月15日，第6页。

④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8年9月13日，第K<sub>1</sub>页，译自和平与进步电台对东南亚官话广播，1978年9月9日。

⑤ 参阅克罗埃夫：“苏联与印度尼西亚”，第6—7页。

⑥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9年3月19日。

苏联称赞东盟国家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原因，与他们反对中国把东盟纳入反苏战略的努力有关。中国对东盟的威胁是莫斯科宣传的主题之一，莫斯科的宣传提醒听众和读者说，大汉族主义的霸权主义者，正在与帝国主义者一起图谋把东盟变为军事条约；<sup>①</sup> 他们的间谍遍布东南亚；<sup>②</sup> 华侨是潜在的第五纵队。<sup>③</sup> 如此等等。

在将近两年里，东盟在1979年7月围绕着难民问题发表了第一批重要评论。鉴于有大批的人从“船上”和“陆地上”涌入东盟国家，东盟外长会议发表的最后公报呼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把难民问题归咎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sup>④</sup> 苏联认为，整个难民问题是由美国和中国煽动起来的，越南是无可责难的。但是，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批评，这种批评显然是针对苏联国内散布的；<sup>⑤</sup>

已经反映出来的各种态度，很难导致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制造所谓难民问题的责任竟被加于越南，尽管众所周知的实际情况证明，华侨从越南撤离是北京领导人煽动的。这种主张与西方对印度支那形势的评价如出一辙。观察家们认为，这与下列事实有关：在东盟代表

---

①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9年1月12日，第K页，译自和平与进步电台对东南亚官话广播，1979年1月10日。

②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9年2月14日，第K页，译自莫斯科对印度尼西亚印尼语广播，1979年2月9日。

③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8年9月12日，第C页，译自《塔斯社》国际处，1978年9月8日。

④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9年7月8日，第E页，译自莫斯科国际处，1979年7月2日。

⑤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不包含对外国听众的批评。

与美国国务卿万斯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长今天开始的会谈中，东盟各国都希望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更广泛的经济援助。<sup>①</sup>

在此后几天里，苏联对东盟的批评直接指向东南亚，对东盟的存在是不是由于北京制造的紧张而遭到了威胁的问题，提出了疑问，但是，苏联的评论没有提到难民问题，而是以积极的评价作为结论。<sup>②</sup>

#### 四、成功还是失败？

苏联对东盟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对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哪怕是一般的估价，也总是困难的，因为国际事件和环境是复杂的。例如，苏联对东盟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是削弱美国的影响，但是，美国现在的影响可能比较小些（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比1967年要小些），这不一定意味着1967年以后的苏联政策是有效的。一种比较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影响的削弱是越南战争的结果（至多可能部分地说是因为苏联的政策），再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决定集中注意世界的其他地区——欧洲和中东地区，而不是东南亚地区。所以，苏联决策者们所希望出现的环境可能达到了一部分目的，至少暂时是如此，不过，那多半是因为机会好，而不是有意计划的结果。

---

①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9年7月8日，第E<sub>3</sub>页。

② 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处：《苏联每日报道》，1979年7月10日，第E<sub>1</sub>—E<sub>3</sub>页，  
《塔斯社》英语广播翻译稿，1979年7月2日。



跟1967年相比，苏联在东盟地区的地位得到了重大改善。这是苏联努力利用美国政策变化提供的机会的直接结果，是苏联与东盟五国发展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的直接结果。不过，不应当把这看作是极重要的成就，因为东盟的多数上层人士都倾向于与苏联改善关系。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成功。东盟的上层人士对美国在越南失败后有何意图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他们在1975—1978年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对苏联的政策需要作出反应（虽然他们同时对苏联的政策需要持怀疑态度）。

直到最近，由于苏联决策者们显然并不重视这个地区，所以，要估价苏联对东盟的政策，也是不易的。由于苏联并不重视这个地区，所以，苏联认为可取的办法是，只要通过宣传、外交和其他花钱不多的策略来限制中国的影响就行了。对莫斯科来说，东盟只要正式放弃起军事作用可能就够了。苏联的评论员们会说，尽管有帝国主义的严重压力，但是，只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胜利。毫无疑问，他们更喜欢看到东盟起到使其成员国减少对西方的经济依赖作用。但是，由于苏联向该地区投资有限，所以，1977年的环境可能使苏联人感到高兴，特别是跟60年代后期的环境相比，苏联人更感到高兴。

假如东盟不再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地区，那就得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苏联的现行政策。要使自己的政策成功，苏联至少得加强越南在东南亚的地位、并竭力削弱中国的影响。东盟各国政府制定了越柬政策、越中政策和印度支那难民争端的政策。这些政策有一部分是与美国协调一致的，这些政策

与北京的立场和莫斯科的立场相比更接近前者。而且，自从第二次越南战争结束以来，苏联人好象没有能够参加他们认为是重要的地区性决定，他们受到了排斥。东盟曾经在短时期内对苏联采取了有限度的依从和响应，由于苏联支持了越南侵略柬埔寨，由于河内逐出了数10万的难民，原来的依从和响应都化为乌有了。

苏联人特别感到不高兴的是，直到1979年底，所有东盟国家政府仍然承认波尔布特政权是柬埔寨的合法政府，它们为安理会的辩论起草了决议，该决议把越南军队驻扎在柬埔寨的问题与所谓“中国入侵越南”的问题二者联系在一起，它们指责越南制造了难民问题，而没有指责美国和中国制造了难民问题。

实际上，自从苏联认为东盟已经明显变得比较引人注目以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苏联人对于改善自己的地位可能感到无计可施了。目前，在任何东盟国家里，都没有与莫斯科或与河内有联系的重要的共产党，所以，苏联无法利用这些共产党向该地区的政权施加压力。苏联与东盟的贸易很少，在目前的地区冲突中，苏联无法利用贸易关系来向任何政府施加影响。在苏联今后的战略中，援助的许诺可能成为使东盟各国政府做出对苏联有利决定的一个因素，但是，由于印度支那事态的飞速发展，由于难民问题的敏感性，援助的许诺可能成为使莫斯科政策短期奏效的工具。用显示军事力量的办法，苏联也比不了美国，不会给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而且，万一这种办法被那些支持美国军队在该地区存在的集团所利用，那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苏联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和有效的力量。不能达到短期的目标，是苏联为了与越南保持关系而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苏联领导人可能很愿意在短期之内付出这种代价。然而，从较长时期的观点来看，同中国相比，尽管苏联通过印度支那的亲莫斯科政府取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假如东盟各国政府比较愿意满足中国或美国的希望，这种有利的地位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价值。起码，苏联需要去劝说东盟各国政府承认柬埔寨韩桑林政府和支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反华，苏联很可能利用越南由于在印度支那的胜利而得到的财富（例如叛乱组织和军事基地）来反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苏联的努力可望加强，而且，很可能更加多样化。

所以，关于苏联对东盟的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回答必然是：现在依然没有成功的证据。在印度支那取得一定程度的稳定以前，最后的判断是做不出来的。最后的判断的确需要漫长的时间。

## 第十一章

### 苏联对第三世界的经援与贸易

罗杰·卡尼特\*

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位极为软弱。苏联人不但与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而且，在欧洲、中东和远东地区，他们发现自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日益发展的军事联盟网的包围。当时，苏联只与东欧新建立的国家 and 亚洲的共产党盟国有国际联系。

到70年代后期，世界两大军事集团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殖民帝国的崩溃、第三世界许多反西方政权的兴起、西方国家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紧缩以及其他事态的发展，削弱了西方国家在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影响。与此同时，苏联人却在这些地区建立起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关系网，使他们通过广泛的关系在历史上第一次起

---

\* 作者罗杰·卡尼特博士 (Dr. Roger Kanet)，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他的著作有：《行为革命与共产主义》(1971年版)；《论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1972年版)，与伊万·沃尔格耶斯合编；《苏联与发展中国家》(1974年版)；《苏联和东欧的外交政策：文献目录》(1974年版)；《苏联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关系》(1975年版)，与唐娜·巴里合编；《吉尔雷克的波兰政策与政治》(1980年版)，与莫里斯·西蒙合编。——译者

到全球性势力的作用。<sup>①</sup> 在1955—1964年的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向非共产党发展中国家承诺的军事援助，平均每年为3.75亿美元；经济援助平均每年为4.25亿美元。<sup>②</sup> 此外，在1955—1965年的5年内，苏联与非共产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增长了5倍，从3.37亿美元（占苏联外贸总额的5.2%）增加到19.35亿美元（占苏联外贸总额的11.9%）。在很大程度上说，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对美国在亚洲建立联盟体系的尝试的一种反应。

根据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地区”概念，苏联不再把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看成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前哨阵地，而是看成独立、和平的组成部分。所以，苏联认为，向这些国家提供支持和援助是值得的。<sup>③</sup> 初期，苏联在第三世界卷入的地区是中东和南亚。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前后，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正部分地处于混乱状态，苏联统治集团内部，对50年代的那

---

① 关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参阅罗杰·卡尼特，“斯大林以来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态度”，载《苏联与发展中国家》，罗杰·卡尼特编，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7—50页。

② 关于军事援助的数字，参阅中央情报局，《1978年共产党在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活动》，第1页。同上，1975年版，第1页。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共产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1972年的援助和贸易》，1973年6月15日，附录表九。关于经济援助的数字，参阅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1964年共产党的经济攻势》，1965年8月4日，第6页。

③ 参阅理查德·洛温撒尔：“是楷模还是盟国？”《共产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85—186页。洛温撒尔在该书的第8章和第4章中，对苏联的意识形态与苏联在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极好的分析。

种乐观主义发生了怀疑，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被正在成长中的现实主义所代替。苏联虽然已经结束了与这些国家的隔绝状态，但是，未能成功地建立起具有重要影响的关系。<sup>①</sup>

70年代初期，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大力推行“经济互利”和“国际分工”政策。<sup>②</sup>最近，苏联日益认识到，它同社会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非共产党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形式的合作，是有好处的。<sup>③</sup>这样的合作，不仅可以使苏联对铝矾土和磷酸盐等原料的需求得到保障，而且可以使苏联和西方在发展中国家的大批联合企业得到保障。

本文主要是介绍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关系，研究20年来苏联经济援助与贸易政策的演变，以及经济政策在苏联对第三世界总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

<sup>①</sup> 我这里所说的“影响关系”，是指叫其他国家做它们不愿做的事情。但是，苏联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确实允许个别发展中国家实行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能实行的政策。关于苏联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影响的充分讨论，参阅阿尔文·鲁宾斯坦：《尼罗河上的红星：6月战争以来的苏联影响关系》，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拉詹·梅农：“印度与苏联：国家之间的影响”，伊利诺斯大学未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1978年。

<sup>②</sup> 关于苏联经济政策的讨论，参阅伊丽莎白·瓦尔凯尼尔：“苏联与第三世界经济关系的新趋势”，《世界政治》杂志，第22卷，1970年，第415—432页。“苏联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载《苏联与发展中国家》，卡尼特编，第215—236页。

<sup>③</sup> 关于苏联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看法，参阅伊丽莎白·瓦尔凯尼尔：“苏联、第三世界与全球经济”，《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第28卷，第4期，1979年，第17—33页。理查德·波特斯：“东方、西方和南方：中央计划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东西方比较研究杂志》，第10卷，第3期，1979年，尤其是第63—71页。

## 一、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

苏联人声称，他们提供的发展信贷，“不是以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接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为依据的”。<sup>①</sup>事实上，苏联经济援助的主要受援国，一般都是战略地位与苏联的全球利益相一致，并在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上愿意接受苏联指导的国家。

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绝大部分从一开始就是以有偿信贷方式提供的。信贷的利率通常是2.5—3.0%，借期一般为12年。苏联以无偿的捐赠方式提供的援助数额很小，通常仅限于惹人注目的项目，例如建设医院、学校及其他训练设施等。这些项目可以获得重大的宣传效果。信贷多用于重要工程建设，以增加受援国总的生产能力。苏联经济援助总额的75%，是用于国营经济部门的基础工业建设。<sup>②</sup>

1954—1967年，苏联承诺的经济援助平均每年为4.05亿美元。1968—1977年，上升为平均每年7.25亿美元。1978年，总额达到37亿美元，大部分是向摩洛哥和土耳其提供的工程项目贷款（见表一）。但是，苏联经济援助的实际交付额，早期平均每年只有1.82亿美元，近11年内上升为平均每年近

---

<sup>①</sup> 罗曼诺娃、梯斯维克列斯：“苏联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经济学》杂志，第3期，1978年。

<sup>②</sup> 参阅波尔什科夫：“发展中的大陆”，《国际关系》，莫斯科，1976年版，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的共产党援助》，第12页。

表一

## 苏联对非共产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

(单位:百万美元)

年 份	承 诺 额	交 付 额
1954--1978	17,088	7,595
1954--1968	6,081	2,870
1969	476	355
1970	200	390
1971	1,123	420
1972	654	430
1973	714	500
1974	816	705
1975	1,934	500
1976	979	460
1977	402	540
1978	3,707	430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1978年研究报告》。



4.6亿美元。<sup>①</sup>虽然苏联在过去的20年里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的数额并不算少，但是，必须指出：第一，苏联的经济援助相对集中在少数国家。第二，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工业国相比，苏联的经济援助数额是很少的。例如，1977年的苏联经济援助只占全部海外发展援助的1%，排在包括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等小国在内的11个西方发达国家之后。第三，苏联的对外经济援助约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0.02%，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约占0.31%，美国占0.22%。<sup>②</sup>1977年，将近3/4的苏联信贷和赠款集中在中东和南亚（见表二）。1978年以前，阿富汗、埃及、印度、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接受的苏联经济援助，占苏联对外经济援助总额的71%。

苏联的经济援助政策，是以一些明显的相互联系的动机为依据的。第一，要求支持“进步的”或反西方的政权，例如：纳赛尔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后来的南也门等；第二，要求减少伊朗（1979年初期国王被推翻以前）、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对美国或中国的依赖；第三，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印度、索马里和埃及等，使苏联感兴趣的，是它们的战略地位和在世界与地区政治事务中潜在的重要性；第四，近10年来，苏联的经济援助已经日益同苏联的长远经

---

<sup>①</sup> 中央情报局最近对外援的估计是，苏联对外发展基金的实际交付额，占其对外发展基金总数不到60%。与此同时，西方工业国家对外发展基金的实际交付额几乎占76%。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非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方经济援助形式的变化：研究论文》，1978年3月，第7页。

<sup>②</sup>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卷，1978年9月。

表二

苏联对非共产党第三世界国家的  
经济信贷与赠款

(单位: 百万美元)

地区或国家	1954—1978年		1977年		1978年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总 额	17,088	100%	402	100%	3,707	100%
非 洲	3,989	23.3	31	7.7	2,010	54.2
北 非	2,918	17.1	0	0	2,000	54.0
阿 尔 及 利 亚	716		0			0
毛 里 塔 尼 亚	3		0			0
摩 洛 哥	2,098		0		2,000	
突 尼 斯	96		0		0	
黑 非 洲	1,071	6.3	31	7.7	11	0.3
安 哥 拉	17		6		1	
贝 宁	5		0		0	
喀 麦 隆	8		0		0	
佛 得 角	3		0		3	
中 非 帝 国	3		0		0	
乍 得	5		0		0	
刚 果	28		0		0	
赤 道 几 内 亚	1		0		0	
埃 塞 俄 比 亚	105		0			
加 纳	94		1		0	
几 内 亚	212		1		0	
几内亚(比绍)	11		0		0	
肯 尼 亚	48		0		0	
马 达 加 斯 加	20		0		6	
马 里	90		0		1	

续表

地区或国家	1954—1978年		1977年		1978年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毛里求斯	5		0		0	
莫桑比克	5		5		0	
尼日尔	2		0		0	
尼日利亚	7		0		0	
卢旺达	1		0		0	
塞内加尔	8		0		0	
塞拉利昂	28		0		0	
索马里	164		0		0	
苏丹	65		0		0	
坦桑尼亚	38		18		0	
乌干达	16		0		0	
上沃尔特	6		0		0	
赞比亚	9		0		0	
其他	67		0		0	
东南亚	261	1.5	0		0	0
缅甸	16		0		0	
柬埔寨	25		0		0	
印度尼西亚	214		0		0	
老挝	6		0		0	
拉丁美洲	934	5.6	30	7.5	15	0.4
阿根廷	220		0		0	
玻利维亚	69		0		0	
巴西	88		0		0	
智利	238		0		0	
哥伦比亚	211		0		0	
哥斯达黎加	15		0		0	

续表

地区或国家	1954—1978年		1977年		1978年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牙 买 加	30		30		0	
秘 拉 鲁	25		0		0	
乌 圭 圭	52		0		0	
中 东 东	6,918	40.5	0	0	1,399	37.8
埃 及 及	1,440		0		0	
伊 朗 朗	1,165		0		0	
伊 拉 克	705		0		0	
约 旦 旦	26		0		0	
北 也 门	143		0		38	
南 也 门	204		0		90	
叙 利 亚	768		0		0	
土 耳 其	2,380		0		1,200	
其 他	79		0		71	
南 亚	4,956	29.0	341	884.8	283	7.6
阿 富 汗	1,263		0		0	
孟 加 拉	304		0		0	
印 度	2,282		340		0	
尼 泊 尔	30		1		0	
巴 基 斯 坦	921		0		225	
斯 里 兰 卡	158		0		60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1978年研究报告》。

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了。最近，苏联向既非社会主义也无反西方倾向的摩洛哥提供的20亿美元信贷，对方将以磷酸盐偿还。属于这一类的信贷还有苏联在早期与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等国签订的以货换货的协定。苏联用机器设备换取对方的石油、天然气；第五，由于苏联的经济援助都是以提供机器设备为主，所以，经济援助就为苏联的工业产品确保了市场。一般来说，苏联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没有竞争能力的。

一般来说，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主要非洲国家，是地理位置具有一定战略意义、对外政策具有“反帝”倾向，或者，经济发展对苏联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1978年以前，苏联对非洲经济援助的2/3给了6个国家，即：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索马里和苏丹。在苏联承诺重要经济援助时，这些国家都被认为是“进步的”国家。<sup>①</sup>然而在70年代，苏联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逐渐减少了。

苏联向拉丁美洲提供的经济援助，大部分是作为打开苏联工业品出口市场的手段。只有在阿连德总统任职期间，苏联向智利提供的2.38亿美元的信贷，可以看作是以政治动机为主的经济援助。

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大部分是工程项目的成套机器设备，而且，绝对集中在国营部门。帮助受援国发展重工业、

---

<sup>①</sup> 唯一的例外是，1959年，苏联答应给埃塞俄比亚贷款1亿美元。象在伊朗和土耳其一样，苏联企图在对苏联来说具有潜在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破坏美国的垄断地位。

能源和矿产资源，实际上是苏联经济援助政策的主要目标。例如，在最近几年里，苏联人为土耳其援建了一座钢铁厂，为阿尔及利亚援建了一个炼铝联合企业和一座钢厂，他们还援助摩洛哥发展磷酸盐生产等。从第三世界国家的角度看，苏联援建的工程尽管有一些问题，但是，仍然为它们带来了不少的好处。第一，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减少对西方工业国的依赖，与此同时，还可以得到发展援助，通常，这样的发展援助从其他方面是难以得到的；第二，由于苏联的经济援助可用投产企业的产品偿还，所以，受援国可以不必担心难以得到供偿还贷款用的可以兑换的货币；第三，有一些证据表明，苏联加入援外国家的行列，客观上推动了西方向第三世界国家追加提供经济援助。<sup>①</sup>

自50年代以来，苏联的对外经济援助计划，都包括向受援国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的条款，以便指导安装和使用设备，并在当地训练研究生和技术人员。例如，1978年，苏联和东欧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了7万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80%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派到了中东和北非(见表三)。此外，第三世界国家也派遣大批的技术人员到苏联去接受培训，或由苏联派人到当地的训练中心去帮助培训。1978年，约有4.8万技术人员到苏联和东欧国家接受培训。由于在当地培训花钱少、效果好，所以，近年来在当地接受培训的人数日益增加，而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接受培训的人数却减少

---

<sup>①</sup> 关于苏联的经济援助，参阅迪帕克·内亚尔编，《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新泽西州，艾伦霍尔德—奥斯曼出版社、纽约宇宙出版社，1977年版。

表三 苏联东欧国家和古巴在非共产党第三世界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

年 份	1970年		1975年		1977年		1978年	
	苏 联	东 欧	苏 联	东 欧	苏 联	东 欧	苏 联	东 欧
总 人 数	10,600	5,300	17,785	13,915	58,755	6,575	72,655	12,525
非 洲	4,010	3,150	5,930	10,290	34,390	5,900	43,805	11,420
北 非	—	—	—	—	21,850	15	36,165	450
撒哈拉以南非洲	—	—	—	—	12,540	5,885	7,640	8,500
东 亚	100	60	25	30	125	0	85	0
拉 丁 美 洲	35	140	330	225	830	335	700	190
中 东					20,010	330	23,890	915
南 亚	6,455	1,950	8,375	3,370	3,475	0	4,145	0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1978年研究报告》。

表四 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培训的第三世界国家  
技术人员

年 份	苏 联	苏联与东欧	东 欧
1965		2,000	
1970	1,020		530
1971	1,310		1,435
1972	1,355		975
1973		3,715	
1974		4,380	
1975		?	
1976	4,250		?
1977		3,200	
1978		3,300	
1954—1978		48,000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1978年年度报告》。

了（见表四）。① 到1978年，苏联人和东欧盟国已经在第三世界建立了26所中等专业学校和100所辅助训练中心。在这些学校接受培训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已有55万人，另外，在共产党的建设工地上接受培训的还有60万人。② 在苏联、东欧国家和在第三世界国家训练中心接受训练的人，大部分是来自苏联提供工业发展援助的主要受援国。在60万在职培训的人当中，只有2.5万人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

苏联提供长期发展援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苏联高等院校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大批留学生。招生人数正在迅速

①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的共产党援助活动》，第15—16页。

② 同上；美国中央情报局：《1977年的共产党援助活动》，第10—11页。





增加。到1978年，在苏联留学的学生有2.6万多人，在东欧国家留学的学生还有1.85万人（见表五）。这种计划的重点一直是在黑非洲。自从60年代初期以来，到苏联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留学生是来自非洲。例如，1978年，在苏联留学的26,445人中，有13,635是来自非洲，其中，85%以上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早在1970年，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的非洲留学生中，大约有81%是来自黑非洲。跟其他各种经济技术援助相比，苏联实行的长达21年之久的招收留学生计划在它所有的援助计划中是特权最多的，因为苏联提供的奖学金，包括了留学生的生活费和交通费等一切费用。

苏联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留学生和训练工程技术人员，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为苏联援建的工程项目配备技术人员，这是受援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第二，为受援国未来的上层集团准备人材。经过苏联培训的留学生，至少思想上是倾向苏联的。<sup>①</sup>

在进一步讨论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和苏联经济援助与贸易的相互关系之前，我们应当概述一下苏联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相互关系。在过去10年中，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最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从强调发展经济关系改为更多地依靠军事援助手段，来发展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1955—1967年，苏联平均每年向第三世界国家交付3亿多美元的武器装备（经济援助的交付额约为2亿美元）。1968—1971年，苏联武器装备交付额上升到平均每年7亿美元。

---

<sup>①</sup> 关于初期阶段的苏联训练计划，参阅罗杰·卡尼特：“非洲青年：苏联的对非洲政策目标”，《俄国评论》杂志，第27卷，1967年，第161—175页。

表六 苏联对非共产党第三世界国家的军援

(1955—1978年)

(单位：百万美元)

年 份	达成 协议 额	交 付 额
1955—1978总额①	29,825	25,310
1978①	1,765	3,825
1977①	5,215	3,515
1976①	3,375	2,575
1975①	2,035	1,845
1974①	4,225	2,310
1973①	2,810	3,130
1972①	1,635	1,215
1971①	1,590	865
1970①	1,150	995
1969①	360	450
1955—1968总额①	5,495	4,585
1968②	450	505
1967③	525	500
1966③	450	500
1965④	260	

## 续表

年 份	达成协议额	交 付 额
1964①	875	
1963②	390	
1962③	415	
1961④	830	
1955—1960总额④	1,285	
1960⑤	570	
1959⑤	40	
1958⑤	470	
1957⑤	240	
1956⑤	290	
1955⑤	110	

①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公布的材料。

②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7年公布的材料。

③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5年公布的材料。

④ 美国国务院1972年公布的材料。

⑤ 美国国务院1970年公布的材料。

注意上述数字的不同来源，所有数字都是估计的，总数也不完整。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

表七

## 苏联对非共产党第三世界各地区的军事援助

(单位: 百万美元)

年份	1956—1978	1956—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协议总额	29,655	13,040	4,225	2,035	3,375	5,215	1,765
北非	4,965	490	1,825	535	...	1,800	315
撒哈拉以南非洲	3,900	330	365	145	800	1,415	845
东亚	890	890	...	...	...	...	...
拉丁美洲	650	150	...	55	335	110	...
中东	14,960	8,860	2,020	640	2,105	1,235	100
南亚	4,290	2,320	15	660	135	655	505
交付总额	25,310	11,240	2,310	1,845	2,575	3,515	3,825
北非	3,875	435	150	380	810	925	1,175
撒哈拉以南非洲	2,750	275	90	255	325	585	1,220
东亚	880	880	...	...	...	...	...
拉丁美洲	630	10	25	60	80	380	75
中东	13,800	7,760	1,780	975	1,065	1,125	1,095
南亚	3,875	1,880	265	175	295	500	260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研究报告》。

1972年以后，则有大幅度的增加。1977年，总额达35亿多美元。1978年，总额达38亿美元（见表六）。1972年以来，苏联经济援助的交付额，平均每年约5.1亿美元，而军事援助的交付额，则相当于经济援助的交付额的5倍，即每年26.3亿美元。苏联增加的军事援助主要给了利比亚（以出口石油换得的硬通货交付）、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到70年代初期，苏联80%以上的武器输出运往了中东和南亚。近年来，非洲国家，特别是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变成了苏联武器装备的主要销售市场（见表七）。显然，向第三世界提供武器装备，为苏联带来了许多好处。第一，为了军事上的安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深深地依赖苏联了。而苏联则以此作为向对方施加影响的手段。通常，随着苏联武器装备的到来，苏联的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也接踵而至。他们不仅担负训练任务，而且，他们有时还直接参与军事行动。<sup>①</sup>第二，通过出售武器装备，苏联赚到了愈来愈多的硬通货。据估计，苏联在1977年通过军火交易，大约从第三世界捞到了15亿美元的硬通货。

## 二、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

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是与积极扩大贸易

---

<sup>①</sup> 1978年底，在发展中国家有1.2万苏联和东欧军事人员，并有3.8万古巴人。75%以上的苏联和东欧人，分布在6个国家。它们是：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参阅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的共产党援助活动》，第4页。

表八 苏联对非共产党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

(单位: 百万美元)

年 份	苏 联 外 贸 总 额		苏 联 与 第 三 世 界 国 家 贸 易 额			
	出 口	进 口	出 口	进 口	占 外 贸 总 额	占 外 贸 总 额
1955	3,392	3,029	141	194	4.2%	6.4%
1960	5,508	5,572	334	529	6.1%	9.5%
1965	8,093	7,978	1,111	807	13.7%	10.1%
1970	12,672	11,822	2,019	1,280	15.9%	10.8%
1975	33,166	36,805	4,569	4,138	13.8%	11.2%
1976	38,110	39,074	5,087	3,815	13.3%	9.8%
1977	45,227	40,926	7,258	4,076	16.0%	10.0%
1978	51,362	49,762	8,229	4,077	16.0%	8.2%

兑换比价: 1970年 1.11美元 = 1 卢布, 1975年 1.38美元 = 1 卢布,  
 1976年 1.33美元 = 1 卢布, 1977年 1.36美元 = 1 卢布,  
 1978年 1.44美元 = 1 卢布。

资料来源:《1970、1976和1978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年鉴》。

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同苏联出口援建工程的机器设备和进口某些援建企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关系。1955—1978年，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额，按绝对价值计算增长了35倍，即从3.55亿美元增加到117.84亿美元。当然，从苏联总的贸易比例来看，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发展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仅从5.2%增加到12.2%（见表八）。在最近5年中，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额的增长，主要是在出口方面，而在进口方面，贸易额实际上还有所下降，即从1975年的29.99亿卢布下降到1978年的28.31亿卢布。数字表明，近年来苏联出口贸易的增长，有很大一部分在苏联的外贸统计中并未指明具体商品的去向（见表九），估计是向少数第三世界出口的军用物资。例如，1978年，有47%的出口贸易额就没有具体列出商品项目。其余的35.99亿美元多数是机器设备和向某些国家出口的石油和石油产品。<sup>①</sup>

在最近10年中，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政策曾经经过重大的修改。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一般是以政府之间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为基础，按预定的价格以物换物和以非兑换货币进行支付结算的。近年来，约有3/4的第三世界贸易伙伴，是以可兑换货币同苏联进行贸易结算的。1977年，第三世界国家同苏联的贸易，约有40%

---

<sup>①</sup> 1970年，苏联的60%出口物资是工业机器、设备和石油，还有16%的出口物资是其他加工商品。1976年，大约76%的商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参阅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1976—1977年苏联与欠发达国家贸易的变化形式：研究论文》，1978年5月，第3页。



表九 苏联对非共产党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①

(单位: 百万美元)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③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对第三世界国家贸易总额	4,567.7	4,138.3	4,960.2	3,730.9	7,227.2	4,074.3	7,707.9	4,076.6
未具体列明的剩余额②	1,877.1	11.0	2,325.6	33.4	3,896.6	63.5	3,598.7	64.3
具体列明的总额	2,690.6	4,127.3	2,634.6	5,697.5	3,330.6	4,010.8	4,109.2	4,012.3
中东和北非	1,651.5	1,824.1	1,661.4	1,617.5	1,933.3	1,698.7	2,633.7	1,740.8
撒哈拉以南非洲	184.8	324.2	182.1	284.9	317.7	388.8	403.8	428.6
拉丁美洲	14.6	116.3	32.0	164.3	220.6	655.6	133.6	755.9
南亚	622.8	700.1	593.2	646.2	802.7	944.9	883.8	777.0
东亚	29.2	219.5	41.3	280.0	56.3	372.8	51.3	310.0

① 数据来源于《苏联对外贸易统计年鉴》，苏联贸易卢布与美元的比价，1975年——1.38美元，1976年——1.33美元，1977年——1.36美元，1978年——1.44美元。

② 未具体列明的剩余额是按外贸统计年鉴所列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总额减去第三世界各个国家的总和。据信这些剩余额主要是苏联出口的军需物资。

③ 1978年美元贬值使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额被夸大了。按卢布计算，1978年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增加7.1%，进口减少5.5%。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以上是以硬通货交付的。

苏联的经济援助与贸易政策，日益朝着对苏联经济有利的方向发展。苏联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扩大武器装备和石油产品的出口，以便换取硬通货。<sup>①</sup>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机器设备，是为了支付进口原料和食品的费用，并使这些进口商品的来源得到保障。<sup>②</sup>

苏联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的物资，与西方工业国大体上是一样的。苏联宣传说，它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产品提供了销售市场，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例如，1976年苏联进口的原油和天然气，约占苏联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总额的20%；食品进口，包括可可、咖啡和茶叶，约占43%；其余多为工业原料，例如：橡胶、棉花和金属矿石等。<sup>③</sup>在苏联的第三世界贸易伙伴中，只有印度从1978年起向苏联出口了一些机器设备，约占向苏联出口总额的7.8%（见表十）。

如表九所示，在第三世界国家当中，苏联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在南亚、中东、北非的国家。而苏联与拉丁美洲的贸易，1977年和1978年大约只占第三世界国家贸易总额的11%。苏联从拉丁美洲地区进口的农产品的数额日益增多。

---

① 苏联向巴西、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家都被苏联列入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出口，是用硬通货支付的。到1976年，向欠发达国家的石油出口换来的硬通货，占苏联向全世界的石油出口换来的硬通货的15%。1977年，向上述四个国家出售的石油，达到6.67亿美元以上。但到1978年，下降到4.86亿美元。参阅《1978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汇编》，第61页。

② 1977年，苏联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机器、设备和运输材料，有52.2%运到了发展中国家，1978年上升到55.8%。在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这些商品中，50%以上的商品，是作为全面的经济合作协定的一部分，是用苏联贷款进行的。

③ 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与欠发达国家贸易的变化形式》，第4页。

表十 1978年苏联对第三世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

(单位: 百万美元)

国 家	出口总额	主 要 出 口 商 品	占总额的百分比
伊 拉 克	970.1	机器设备和运输材料 其中空运设备 其中能源设备	44.8% 14.0% 9.4%
伊 朗	623.1	机器设备和运输材料 其中能源设备 其中食品加工工业设备	35.6% 12.4% 4.6%
印 度	524.3	石油和石油制品 机器设备和运输材料 其中钢铁工业设备	60.4% 15.6% 6.4%
埃 及	212.4	机器设备和运输材料 其中卡车和卡车设备	48.5% 20.6%
阿 富 汗	200.6	机器设备和运输材料 其中地质设备 石油和石油产品	51.8% 13.2% 16.8%
叙 利 亚	188.9	机器设备和运输材料 其中卡车 其中空运设备	54.8% 10.2% 13.6%
土 耳 其	127.9	机器设备和运输材料 其中钢铁工业设备	53.1% 41.1%
阿尔及利亚	127.2	机器设备和运输材料 其中地质设备	49.9% 37.6%
尼日利亚	108.6	机器设备和运输材料 其中卡车	74.0% 58.5%

续表

巴基斯坦	99.2	机器设备和运输材料 其中钢铁工业设备	86.5% 66.3%
国 家	进口总额	主 要 进 口 商 品	占总额的 百分比
伊 拉 克	590.8	燃料、材料、金属	98.1%
印 度	596.5	茶叶 加工和半加工皮革 黄麻袜	14.4% 15.5% 8.6%
阿 根 廷	444.7	小麦和玉米 毛织品	68.8% 15.2%
伊 朗	343.3	棉纱	8.1%
埃 及	285.1	棉线	41.5%
巴 西	187.5	可可豆、可可黄油	61.6%
马来西亚	174.4	化学制品、化肥、橡胶	79.4%
加 纳	157.4	可可豆	97.7%
利比亚	153.8	燃料、矿产、金属	100.0%
阿 富 汗	109.0	天然气 水果、葡萄干、干果仁	44.5% 36.1%
叙 利 亚	106.3	棉纱	26.5%
土 耳 其	99.2	榛子	60.2%

资料来源：《1978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年鉴》。

苏联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虽然在1975—1978年期间，苏联的出口成倍地增加了，但是，黑非洲国家仍然是苏联最次要的贸易伙伴。

### 三、对苏联经济援助与贸易政策的评价

在过去20年中，政治因素在苏联对外经济政策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苏联的绝大部分经济援助给了那些被苏联人认为是“进步的”、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一点，在非洲特别明显。苏联的早期经济援助，大部分给了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和苏丹。苏联在承诺重要信贷时，把这些国家都看成是“进步的”国家。同支援激进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苏联积极与那些被认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发展关系。例如阿富汗，早在现在的激进领导人政变上台以前的50年代中期，就是苏联经济援助的重要受援国。苏联对伊拉克、埃及和印度的兴趣，也有战略方面的考虑。近年来，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已经成了苏联同“进步”政权发展关系的主要手段。

但是，在与第三世界发展关系中，苏联一面由提供经济援助变成了提供军事援助，一面加紧推行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至少在最近10年中，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多地强调“经济互利”。在实践中，“经济互利”意味着，苏联一般只愿意提供从长远来看可以为苏联带来经济利益的援建项目。食品、工业原料和能源是苏联的主要进口物资。苏联的经济援助，是与苏联的出口工业设备、进口原

料和能源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具有双重的目的，即：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援助“进步的”政权，同美国争夺影响；采取实用主义的经济方向，强调苏联的长期经济利益。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同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双边关系，苏联人可以把这两个目的结合起来。<sup>①</sup>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人绝不会舍弃其中任何一个目的。为了进行争夺而推行的政策，已经使苏联近年来在亚洲和非洲取得了若干“胜利”，因为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柬埔寨建立的新政权与苏联结盟、并依赖苏联的支持。<sup>②</sup>过去10年左右的实践证明，为了苏联经济上的需要，在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总政策中，实用主义的方针将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因素。

---

<sup>①</sup> 关于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最近政策的不同解释，参阅唐纳德·扎格里亚，“进入突破口：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新联盟”，《外交季刊》杂志，第7卷，1977年，第733—754页。罗伯特·莱格沃尔德，“超级对手：第三世界的冲突”，《外交季刊》杂志，第7卷，1979年，第755—778页。

<sup>②</sup> 但是，假如对依附国家的援助使苏联卷入当地的冲突和需要苏联增加开支的话，那么，这些胜利证明是暂时性的胜利。

## 第十二章

### 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武器援助

罗杰·帕亚克\*

苏联理论家们把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看作是共产主义世界的潜在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的时候，苏联领导全神贯注国内建设问题和欧洲的发展，对新兴国家政府的注意是微乎其微的，莫斯科把新兴国家看作是西方的走狗。虽然好战的行动受到某些新兴国家中想夺权的共产党的欢迎，但是，苏联却无所作为，它只是在形式上反对西方在这些地区的影响。由于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独立，所以，苏联的政策日益过时，需要用新的战术去迎合发展中世界争取民族独立和争取经济独立的广泛要求。

继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发

---

\* 作者罗杰·帕亚克博士 (Dr. Roger Pajak)，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高级外交事务顾问、美国大学国际关系和苏联问题博士，自1971年以来一直在该署任职。1961—1963年，他曾在美国政府中当苏联外交事务专家。除了代表美国国际联络局在国外发表演说外，他还在全美战争大学、外交服务研究所、陆军俄国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几所大学中任教。他著有《苏联对中东的武器援助》一书（1976年版），并发表过许多关于苏联对中东的政策和国际武器贸易方面的文章。——译者

生了显著变化。苏联的新领导日益认识到了新兴国家中非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结果，苏联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新兴国家的政策方针。莫斯科开始强调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并通过认真安排外交、贸易和援助等方面的计划，发展各种双边的国家联系。显然，这种战术上的变化反映了莫斯科的估价：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削弱西方影响的最有效的战略，是使自己跟许多国家中存在的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和反西方的感情结合起来。

苏联改变对发展中国家态度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模仿西方新构思出来的援外计划。特别是苏联在1955年做出的承诺军事援助的决定，可能至少受3个因素的影响：第一，苏联的战后恢复工作取得了全面的成功；第二，由于军事人员减少和军事理论的改变，军事装备有了剩余储存；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分子缺少显著的成功。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都热情地接受莫斯科在斯大林之后所做的政策变化，总的说来，他们都准备接受苏联的对外援助。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愿意使自己新赢得的独立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联系起来，这种想法使它们更加容易接受苏联的对外援助。为了发现若干心甘情愿的受援国，苏联只要把自己打扮成是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的一个补充来源就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援助立即变成了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大影响的重要外交手段。从5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对外援助计划以来，莫斯科一直把这种政策手段，看作是它在第三世界的势力和影响的指标。



## 一、组 织

全面负责实施武器援助和销售计划的部门是苏联工程总局，该局是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工程总局是军事援助合同的“执行者”，由它主管与受援国政府进行谈判事宜。此外，关于设备的种类和数量事宜，它得与国防部进行协商，关于拟议提供的培训和技术援助事宜，它得与总参外联局局长进行协商。武器协定的修改需经工程总局批准。如果依附国家要求改变协定所规定的价格或者需要先进武器系统，显然，工程总局得将这种要求报告国防部或政治局。最后，工程总局再与外贸部和海运部一起安排载运事宜。<sup>①</sup>

## 二、价格和条件

苏联向第三世界提供的军事援助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莫斯科的要价低，条件优惠。例如，美国向以色列出售的F-15战斗机每架为1,200万美元，而苏联的米格-23战斗机每架约为670万美元；米格-21战斗机每架标价为200万美元，而美国的F-4战斗机每架标价为570万美元。<sup>②</sup>

---

<sup>①</sup> 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国际常规武器的转让》，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74年4月，第37页。

<sup>②</sup> 安南·塞拉：“争夺制空权的斗争：1973年10月—1975年12月”，《皇家统一服务组织杂志》（伦敦），1976年12月，第34页。

除了价格低廉之外，苏联人还向受援国许诺富有吸引力的财政条件。通常，信贷利率为2%，偿还期平均为10年，宽限期为1—3年。而且，莫斯科还常常答应用当地货币或商品支付。另外，如果受援国不能按期偿还，莫斯科通常都许可延期偿还。<sup>①</sup>

打折扣也是苏联军事援助的一个特点。据报道，这类折扣平均为苏联合同价格的40%。虽然折扣可能部分地要根据莫斯科对受援国偿还能力的估计而决定，但是在实践中，苏联的政治上的偏爱也是显而易见的。<sup>②</sup>

苏联武器援助计划的动机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为了获得硬通货，苏联最近愈来愈强调出售武器。在过去几年中，苏联人日益要求用可以兑换的货币支付，至少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等产油国家是这样要求的。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仅在1977年出售的武器，就赚取了大约15亿美元的硬通货利润。<sup>③</sup>显然，为了赚取硬通货而销售的武器，已经大大地取代了早年的“商品武器”，而且，很可能在总的武器销售中占有愈来愈大的份额，因为苏联的武器援助计划还在继续。<sup>④</sup>

---

① 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国际常规武器的转让》，第27页。

② 同上，第37页。

③ 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1977年共产党对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华盛顿，1978年11月，第1页。

④ 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1978年共产党对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华盛顿，1979年9月，第3页。

### 三、计划的组成部分

#### (一) 装 备

在这个计划的初期年代里，观察家们普遍把苏联出口的装备描绘成是过时的装备，许多装备都是破旧不堪的。但是，甚至在该计划的头10年里，实际提供的装备表明，其中，有半数种类的装备仍在苏联军队或华沙条约组织军队中使用，有多种装备仍在苏联生产。<sup>①</sup>虽然购买的某些装备在战术上来说是不符合要求的，但是，提供的多数装备都与现有军事结构结合得既紧密又顺利。

在初期年代里，这个计划的初步好处是，苏联承诺军事援助的费用非常少，但却非常有效，武器都是它根据现代化计划制造的。那时，苏联提供的装备种类既有小型武器，又有大型武器，例如大炮、装甲车辆、驱逐舰、潜水艇，喷气式飞机，直升飞机和通讯工程设备，此外，还有备件和弹药。

在60年代，苏联向主要受援国提供的装备包括：图-16中型喷气轰炸机、米格-21喷气战斗机、安-12运输机、蚊子级导弹摩托艇和各种地对空、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当时，这些装备中的多数，苏联已经在使用着，或者输入了华沙条

---

<sup>①</sup> 利奥·海曼：“莫斯科的出口武器：苏联集团与中东武器竞赛”，《东欧》杂志，1964年5月号，第3页。

约国家。<sup>①</sup>

虽然，一般地说来，苏联供应的装备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在使用这些装备的过程中，有时出现问题。其中一个不断出现的问题是备件问题。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旧设备的更新换代问题。苏联人向他们的依附国家提供了愈来愈多的过时的装备。

## (二) 技术援助

安装、维修和使用现代化的军事装备，需要苏联人提供技术援助。苏联制定的计划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在苏联为发展中国家训练军事人员；第二，向接受援助的国家派遣苏联军事技术人员和教官。每个受援国都接受两种形式的技术援助，这说明，要使武器援助计划发挥作用，技术援助是非常需要的。

## (三) 受训人员

在1955—1978年期间，估计有4.4万军事受训人员到苏联接受各种训练，而且，还有6,000受训人员正在东欧接受军事训练。<sup>②</sup>在1978年底大约有2,000受训者在共产党国家接受训练。绝大多数军事受训人员是来自8个国家，它们是：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叙利亚和索马里。虽然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计

<sup>①</sup> 利奥·海曼：“莫斯科的出口武器：苏联集团与中东武器竞赛”，《东欧》杂志，1964年5月号，第3—4页。

<sup>②</sup>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共产党在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活动》，第5页。

划在1965年中断了，但是，印度尼西亚的受训人员却最多，大约有7,500人，或占受训人员总数的16%。<sup>①</sup>苏联训练的课程设置是广泛的，既有汽车维修保养训练课程，又有莫斯科军事科学院三年制高级军官训练课程，各种级别的训练都有。<sup>②</sup>

#### (四) 技术人员

继续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让高级苏联武器系统，要求苏联日益增加技术援助，以便操作和维修受援工业中的这种设备。据估计，1978年，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军事技术人员和顾问有1.08万苏联人，有1,300东欧人。这个数字比1977年的数字大约增加20%。<sup>③</sup>拥有最庞大的苏联军事顾问队伍（苏联技术人员超过1,000名）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sup>④</sup>

苏联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基本上有3个职能：第一，交货、安装和维修军事装备；第二，培训当地人员操作和维修装备；第三，指导当地的军官。苏联军官还在这些国家的干部学校和军事院校充任教官。在受援国的军事设施的现代化和改革过程中，苏联军官有时起关键作用。<sup>⑤</sup>

---

①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共产党在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活动》，第3页和第5页。

② “苏联的军事援助——国际冲突的根源”，西德《国防和经济》月刊，1961年5月号，译载《军事评论》杂志，1962年2月号，第34—35页。

③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共产党在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活动》，第3页。

④ 同上，第4页。

⑤ 海曼前引书，第5页。

## （五）对军事工业的援助

苏联计划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在发展中国家帮助发展当地的军火工业和维修设施。在建设新的空军基地、训练设施和海军基地方面，比较大的受援国已经接受了大量的援助，与此同时，现有的设备已经扩大并实现了现代化。此外，在阿富汗和埃及等国，已经建立了许多小型军火工厂。<sup>①</sup>最大和最引人注目的苏联援建项目，是在印度制造米格-21喷气式战斗机。在印度，实现系列化生产飞机及其附属设备的3个工厂已经投产。<sup>②</sup>建设这种高级的军事联合企业，需要大量的苏联工业设备、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

## 四、数量和分布情况

要想弄清苏联军事援助计划的确切数量，那是困难的，因为该计划的许多方面都是保密的。由于苏联的计划部分地要以可利用的机会而定，由于该计划受到受援国吸收能力的影响，所以，每年的援助数量和销售额的变化是很大的（见表一）。从1955—1956年度开始，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阿富汗、埃及、叙利亚和也门\*提供的军事援助，估计价值

---

① 斯坦伯格编：《政治家年鉴：1960—1961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60年，第795页。阿诺德·里夫金：《非洲与西方》，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2年，第94页。

② 伊恩·格雷厄姆：“印苏的米格飞机交易及其国际影响”，《亚洲调查》杂志，1964年5月号，第823—830页。

\* 此处是指南也门。——译者

表一 苏联向非共产党发展中国家的武器转让

(单位: 百万美元)

年 份	承 诺 额	交 付 额
1955—1968	5,495	4,585
1969	360	450
1970	1,150	995
1971	1,590	865
1972	1,635	1,215
1973	2,810	3,130
1974	4,225	2,310
1975	2,035	1,845
1976	3,375	2,575
1977	5,215	3,515
1978	1,765	3,825
总 计	29,655	25,310

资料来源: 美国中央情报局: 《1978年共产党在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活动》, 华盛顿, 1979年9月, 第2页。

为2亿美元。①苏联的军事援助计划是1956年开始实行的。在这一年里, 苏联直接与阿富汗、叙利亚和埃及进行了武器交易。②到1957年底, 据估计, 苏联向中东国家提供了价值为4亿美元的武器援助。③

由于贸易和援助攻势发展了, 苏联人遇到了复杂的问题, 经济发展缓慢不前, 毫无疑问, 军事援助计划对援助国和受

① 《纽约时报》, 1958年4月8日。

② 沃尔特·拉克尔: 《苏联与中东》, 纽约, 普雷格出版社, 1959年版, 第272—273页。

③ 《纽约时报》, 1958年1月15日。

表二 苏联向非共产党发展中国家进行武器转让的地区分布情况 (1955—1978年)

(单位: 百万美元)

地 区	承 诺 额	交 付 额
北 非	4,965	3,875
撒哈拉以南非洲	3,900	2,750
东 亚	890	880
拉 丁 美 洲	650	630
中 东	14,960	13,800
南 亚	4,290	3,375
总 计	29,655	25,310

资料来源: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共产党在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活动》, 华盛顿, 1979年9月, 第3页。

援国都更加有吸引力了。1960年, 由于中苏争论的公开化, 苏联开始大规模扩大军事援助活动, ①至少部分地说, 苏联努力向共产党世界的其他国家和不结盟国家表示, 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武器计划的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1961年。在这一年里, 莫斯科签订了若干大笔的补充协定, 印度尼西亚对此特别关注, 因为它与荷兰的争端加剧了。②在此以后的几年里, 新的军事援助承诺额减少了, 或许, 吸收过去订购的装备需要一段时间。③后来, 由于1965年的印巴战争和1967年的阿以战争都迫切需要提供装备, 所以, 苏联在60年

① 盖伊·波克尔:“苏联在印度尼西亚的挑战”,《外交季刊》杂志, 1962年7月号, 第615页。

② 同上, 第616页。

③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与第三世界的武器交易》, 纽约, 人文科学出版社, 1971年版, 第190页。



代后期的武器出口又有了显著增加。<sup>①</sup> 70年代，多数武器援助和武器出售活动，对印度在1971年12月印巴冲突以后进行的不断的军事扩张和军事现代化，以及对阿拉伯国家在1973年战争以后向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伊朗和利比亚做出重要承诺都是有影响的。表二是在该计划进行过程中，苏联武器转让的地区分布情况。到1978年底，苏联向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和武器出售承诺额约为300亿美元。<sup>②</sup>

(关于该计划的补充统计数字，参阅附录。)

## 五、该计划对实现苏联目标的作用

在苏联提供的各种援助当中，要数军事援助最突出和最重要。军事援助已经把苏联塑造成一个慈善而强大的反殖民主义的国家形象。它有助于苏联在对西方利益有重要性的地区施加影响。而且，军事援助还常常在外交、贸易、文化和其他关系中打进楔子，例如50年代在阿拉伯国家，60年代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和近年来在埃塞俄比亚那样。

苏联人迅速发现，军事援助具有无以伦比的好处，用经济援助或传统外交方法是得不到这种好处的。武器援助容易计划，可以迅速实行，而经济援助则需要长时间的细致准备。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武器和装备常常是有现成的储备，或

---

①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与第三世界的武器交易》，纽约，人文学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0—191页。

② 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1978年共产党在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活动》，第2页。

者把目前的生产一转产就行了，而且，在成交以后可以比较快地交货。<sup>①</sup>苏联可以迅速把军事技术人员派到受援国，去安装设备和执行培训计划。稍后，苏联就可以提供比较高级的设备。通常，受援国维修或使用这种设备的能力，并不是压倒一切的考虑。

因此，军事援助证明是莫斯科在不结盟国家建立重要存在的最有效、最灵活和最永久的手段之一。用提供这种援助的方法，莫斯科成了受援国民族情绪的鼓吹者，并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这种地位去损害西方的利益。阿以紧张、也门\*与联合王国在亚丁的矛盾，印巴冲突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土争端，这些都是苏联利用的好机会。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寻求苏联的武器，是为了反对它们的邻国和维护本国的声誉，只在偶尔情况下才是为了维护国内的安全，例如，阿富汗从1978年以来就是这样。

除了破坏西方在受援国的影响这个比较广泛的目标之外，苏联领导还利用军事援助和销售武器的手段，去影响西方的战略利益和摧毁苏联边界邻近的西方军事设施和联盟。为了瓦解西方反苏的“北层”防御，莫斯科寻求使巴格达条约（后来演变成为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中立化。莫斯科在早期向阿富汗提供军事装备，是为了确保喀布尔保持独立和投靠苏联。苏联向印度提供援助，是企图减少

---

<sup>①</sup> 例如，在1973年的十月中东战争中，减少了苏联驻匈牙利部队的装备并把裁减下来的装备空运给阿拉伯军队。参阅罗杰·帕亚克：“苏联武器与埃及”，《生存》杂志，1975年7—8月号，第170页。

\* 此处是指南也门。——译者

印度对西方的依赖和使苏联的存在扩张到南亚次大陆。苏联对东南亚和非洲国家提供武器援助，是想加强苏联的影响和牺牲西方的利益。

西方一直把自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看作是民族稳定的一种影响，而莫斯科却把武器援助，看作是制造国际不稳定的一种手段，并频繁地将武器运到西方想限制或控制军事集结的地区。例如，把武器运到对手阿拉伯国家，一部分企图是使该地区保持分裂和处于骚乱状态。苏联对阿拉伯内部的竞争是敏感的，其表现是：它大约同时把先进的武器提供给不同的受援国。

## 六、苏联对该计划的评价

根据将近25年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得出了结论，认为该计划可以很好地为苏联的利益服务。虽然苏联没有利用武器援助的手段，去直接要求受援国改变意识形态（阿富汗的塔拉基—阿明政权除外），但是，苏联却要求在第三世界拥有实质性的影响。苏联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各项武器协定，几乎都是苏联在第三世界进行重要推进的起点。第一个协定是1955年与埃及签订的。苏联对民族主义政府的支持，极大地削弱了西方在许多国家的影响，并使苏联的存在扩张到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和敏感的地区。现在，许多国家（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已经几乎完全用苏联的军事装备武装起来了，它们在后勤和技术方面对莫斯科的依赖性都是很大的。

通过军事训练和技术援助计划，结合经济援助和专科学校训练，苏联已经把共产主义方向强加给这些国家的人民。莫斯科希望这个方向能够对第三世界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发展起影响。而且，苏联人已经与军事领导人以及那些最终可能掌握国家大权的下级军官建立了重要联系。

毫无疑问，莫斯科已经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取得了最显著的成功。虽然阿拉伯受援国偶尔也批评莫斯科的某些政策，但是，它们实际上已经从它们原来声称的不结盟政策后退了，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倾向与莫斯科进行合作。

另一方面，军事援助关系未能使苏联人强有力地控制他们的阿拉伯依附国，而且，增加了苏联的存在，也未能使当地共产党的命运好转。此外，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使苏联人认识到，与武器受援国的特别关系，可能会导致各种危险：不必要的军事卷入、可能与美国对抗、依附国的失败所造成的外交上和声誉上的损失、补充设备损失的耗费和恢复被破坏的关系，等等。

在南亚，武器援助也为莫斯科带来了有利的结果。20年来，通过作为阿富汗的主要武器提供者，苏联确保了那个政府的友好中立和近年来的积极友好。苏联人向印度出售军事装备，改善了莫斯科在新德里的状况，限制了西方在那里的状况，这有助于苏联人在印巴冲突中站在印度一边。

在经济领域里，一般说来，苏联的武器援助计划，密切了苏联与多数受援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只要援助条款要求用原产品偿还，贸易方向就得从传统市场转向苏联。只要莫斯科要求用现款交易，受援国就得负担这些开支。虽然

没有肯定的数字，但是，莫斯科提供的大量信贷可能仍未偿还，而且，苏联人最终可能一笔勾销许多债务。但是，通过宽宏大量的重新安排债务，莫斯科可以继续政治上获得额外的利益。

尽管在某一两个依附国家里会偶尔遭到挫折或失去机会，但是，从全面来看，武器援助计划对于苏联的外交政策似乎是有积极效果的。虽然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共产党人尚未使他们的事业得到明显发展，但是，在过去25年里，苏联在这些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却迅速增加了，可能已经达到了斯大林曾经梦寐以求的那种水平。莫斯科的结论是，该计划已经全面地加强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 七、苏联的影响能持续多久？

苏联在某个地区已经取得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当然是难以估量的。至于有多少收获是直接归功于军事援助，有多少收获是直接归功于比较广泛的政治上的考虑，那就更难估量了。

尽管军事援助可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增加莫斯科的潜在影响，但是，军事援助却不能使苏联人控制这些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而且，苏联人也不能使他们的依附国的目标跟自己的目标一致起来。

许多事例说明，苏联的影响是有限的。尽管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受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但是，当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重要利益处于危险之际，它们都毫不迟疑地反对了莫斯科。阿

尔及利亚对苏联敬而远之，避免与它过分亲密。利比亚并不掩饰自己对苏联在中东的企图的怀疑。

另外，阿拉伯国家采取了使军事装备来源多样化的行动，这说明，它们对把武器关系作为政策手段的作用是有怀疑的。尽管苏联武器在阿拉伯国家的货物清单上占优势的情况，将使这种多样化的进程放慢速度，但是，从长远来看，即使是微小的成功，也会削弱苏联的潜在影响。

与此同时，引人注目的阿拉伯共产党人，却没有得到苏联的适当的支持。实际上，莫斯科在阿拉伯国家的许多主要支持者都被迫流亡。一个特别显著的事例是，由于苏丹共产党在一次左翼政变之后死人很多，苏联与苏丹的关系受到了严重削弱。毫无疑问，苏联政治局感到特别恼火的是，它支持的领导人（例如卡赛姆、本·贝拉、恩克鲁玛和苏加诺）都不能维持政权，尽管苏联人输入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苏联在埃及和印度尼西亚遭到的失败最为突出。埃及逐出苏联人，使莫斯科在最大最有影响的阿拉伯国家丧失了影响和地位。同样，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共产党政变以后把苏联人撵走，也是对莫斯科在东南亚战略地位的严重打击。迄今，苏联人一直没有能够充分地弥补上这两个重大的损失。

## 八、矛盾重重的承诺

莫斯科最近发现，它的军事援助计划的扩大和它在国际领域的更多卷入，已经使它的承诺变得矛盾起来，使它的双边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使它的选择性狭隘起来。苏联最近在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卷入，就是最明显的实例。埃塞俄比亚政权在1977年向莫斯科要求援助的时候，苏联不惜牺牲它与索马里的14年援助关系，而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这个行动不仅使苏联与索马里的双边关系变坏，而且使苏联失掉了在那里的重要海军供应设施。毫无疑问，这个事件使莫斯科的其他依附国很敏感，因为在将来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苏联还可能故技重演，重新选择站队。

莫斯科还可能注意到，武器受援国使用苏联武器的目的，跟苏联的利益不尽一致。没有证据证明，苏联怂恿过任何主要受援国去进行公开的战争行动。不过，苏联领导人显然知道，受援国可能利用他们的装备去反对“敌对的”邻国，而且，拥有大量的武器可能会刺激各国去卷入政治或军事行动，否则，它们可能不去卷入这类行动。例如，尽管它与叙利亚有全面的和久经考验的军事援助关系，但是，莫斯科在1976年就没有能够劝阻叙利亚政府去干涉在黎巴嫩的左派巴勒斯坦军队。

## 九、基本权利

在建立正式军事基地的尝试中，苏联人直接地使用他们的援助计划达到了何种程度，这是不清楚的。直到1976年3月埃及废除了这类设施以前，苏联人一直使用亚历山大的海军维修和燃料储藏设施及塞得港去支持他们的地中海舰队行动。同样，在1977年，由于苏联在埃塞俄比亚的武器集结而造成的紧张，结果，索马里逐出了苏联人，不许他们进入在

伯贝拉的海军维修、导弹控制、通讯和其他设施。<sup>①</sup>显然，苏联人正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寻找类似的支援设施，但是，他们能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使用他们曾在埃及和索马里使用过的那种设施，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阿拉伯和非洲对这个问题是敏感的。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常规活动中，苏联的军事策划者们期望广泛依赖外国的设施，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在受援国是有军事利益的，苏联人的企图似乎是想阻止受援国与西方的军事合作、使受援国充当主动反对西方利益的代表，而且，一旦需要时，就乘机进入受援国的港口、机场和其他设施。

## 十、计划的前景

毫无疑问，苏联领导将继续把军事援助和销售武器，作为保持和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的主要外交政策手段。这种军事援助见效比较快，而且，能比其他援助产生更大的信任。大量的苏联军事援助将继续提供给过去的那些主要受援国，结果，它们便增加了对苏联武器援助和政治支持的信任。苏联人很可能继续为受援国增加武器，以便更换过时的装备和对付竞争对手。这种现代化的需要，将保证继续要求技术援助。除了这些基本趋势之外，苏联的武器援助额和销售额，将依地区紧张局势和各种冲突等国际环境和偶然事件

---

<sup>①</sup> 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中心：《1977年共产党在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第19页。



而定，而国际环境和偶然事件是很难预料的。

看来，苏联的武器很可能继续流入阿拉伯国家，苏联在那里的声誉是非常显赫的，而且，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不支持”受援国，那将对莫斯科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南亚，为了保持既得的大量投资和影响，阿富汗和印度将继续接受大量的装备。在非洲，国内和地区政治的紧张和不稳定的形势，毫无疑问会使苏联人有希望继续为了自己的政治战略利益，而去牺牲西方和中国的利益。

在拉丁美洲，莫斯科已经与秘鲁建立了现行的销售武器的关系，此外，它还已经与古巴建立了长期存在的关系；再有，不断发展中的紧张局势，还可能为苏联增加机会。由于拉丁美洲国家想从传统来源取得现代化装备的尝试受到了挫折，所以，它们对现代化武器的迫切要求，可能使它们接受苏联在武器援助方面的承诺。

苏联领导人似乎相信，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范围内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有利于苏联增加影响，而且，这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莫斯科似乎正在依赖它的外交和贸易上逐渐累积起来的影响，特别是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去使至少某些比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物质上依赖它和在政治上服从它。

## 附录： 统计 表

**表三 苏联武器转让的主要不结盟受援国**  
(1967—1976年)

(单位：百万美元)

次序	国 家	数 额	占国家武器总进口的百分比
1	埃 及	2,365	84
2	叙 利 亚	2,015	89
3	伊 拉 克	1,795	73
4	印 度	1,365	81
5	利 比 亚	1,005	55
6	伊 朗	611	12
7	阿尔及利亚	315	71
8	安 哥 拉	190	60
9	索 马 里	181	98
10	南 也 门	151	92
11	阿 富 汗	100	32

资料来源：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1967—1976年世界军事开支和武器转让》，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78年版，第158—159页。

表四 在共产党国家培训的不结盟发展中国家的  
军事人员 (1955—1978年) ①

(单位: 人数)

	总 计	苏 联	东 欧	中 国
总 计	52,890	43,790	5,935	3,135
非 洲	17,525	13,420	1,400	2,705
北 非:	3,735	3,385	335	15
阿尔及利亚	2,260	2,045	200	15
利比亚	1,330	1,365	65	...
其他	145	75	70	...
撒哈拉以南非洲:	13,790	10,035	1,065	2,630
安哥拉	60	55	5	...
贝宁	20	20	...	...
布隆迪	75	75	...	...
喀麦隆	125	...	...	125
刚果	855	355	85	415
赤道几内亚	200	200	...	...
埃塞俄比亚	1,640	1,190	450	...
加纳	180	180	...	...
几内亚	1,290	870	60	360
几内亚 (比绍)	100	100	...	...
马里	415	355	10	50
尼日利亚	730	695	35	...
塞拉利昂	150	...	...	150
索马里	2,585	2,395	160	30
苏丹	550	330	20	200
坦桑尼亚	2,855	1,820	10	1,025
多哥	55	...	...	55

① 数字系指训练完毕离开的估计人数。人数是最接近 5 的数字。

## 续表

	总 计	苏 联	东 欧	中 国
扎伊尔	175	...	...	175
赞比亚	130	85	...	45
其他	1,600	1,310	230	60
东 亚:	9,300	7,590	1,710	...
印度尼西亚	9,270	7,560	1,710	...
柬埔寨	30	30	...	...
拉丁美洲:	725	725	...	...
秘鲁	725	725	...	...
中 东:	18,115	15,630	2,485	...
埃及	6,250	5,665	585	...
伊朗	315	315	...	...
伊拉克	4,330	3,650	680	...
北也门	1,180	1,180	...	...
南也门	1,095	1,075	20	...
叙利亚	4,495	3,745	1,200	...
南 亚:	7,225	6,425	370	430
阿富汗	4,010	3,725	285	...
孟加拉	485	445	...	40
印度	2,285	2,200	85	...
巴基斯坦	430	45	...	385
斯里兰卡	35	10	...	5

资料来源: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共产党在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活动》, 华盛顿, 1979年9月, 第4、5页。

表五 1978年在不结盟发展中国家的苏联和东欧  
军事技术人员

(单位: 人数①)

总计	12,070
非洲:	6,575
北非:	2,760
阿尔及利亚	1,000
利比亚	1,750
摩洛哥	10
撒哈拉以南非洲:	3,815
安哥拉	1,300
赤道几内亚	40
埃塞俄比亚	1,400
几内亚	100
几内亚 (比绍)	65
马里	180
莫桑比克	230
其他	500
拉丁美洲:	150
圭亚那	...
秘鲁	150
中东:	4,495
伊拉克	1,200
北也门	155
南也门	550
叙利亚	2,580
其他	10
南	850
阿富汗	700
孟加拉	...
印度	150

① 一个月和一个月以上人数最低估计数字。人数是最接近5的数字。

资料来源: 美国中央情报局: 《1978年共产党在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活动》, 华盛顿, 1979年9月, 第4页。

表六 转让给不结盟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武器 (1973—1977年)

装备类型	总计	美国	苏联	法国	英国	中国	意大利
陆军武器	15,411	4,921	7,300	585	1,015	1,580	10
坦克和自行火炮	7,506	3,543	3,140	130	30	310	350
火炮 (100毫米以上)	14,249	7,104	5,510	1,145	90	170	230
装甲车辆							
海军舰艇							
主要水面舰艇	90	73	5	—	12	—	—
次要水面舰艇	414	134	50	45	120	35	30
潜水艇	36	18	5	—	8	4	1
导弹巡逻艇	51	—	44	7	—	—	—
飞机							
超音速战斗机	3,181	996	1,670	300	15	200	—
亚音速战斗机	1,248	793	325	5	50	75	—
其他飞机	1,640	750	200	70	270	60	290
直升飞机	2,562	1,202	410	550	40	40	320
导弹							
地空导弹	20,219	4,459	14,870	270	620	—	—

资料来源：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1968—1977年世界军事开支和武器转让》，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79年版，第159页。

## 第十三章

###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成败

约瑟夫·诺吉\*

正如“1979年军事政策讨论会”的会名所示，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那么，对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努力，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最后，这些努力或多或少是成功的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因地区而不同吗？我们能以同苏联接近、文化环境、莫斯科使用的手段种类、或以莫斯科承担义务的程度，来证明它的成功吗？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的重要手段是什么？当然，所有这些问题的前提，是这样一个问题：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目标是什么？对某一具体努力的目标或目的搞不清楚，就无法估量成功的程度。最后，还有这样的问题：对于美国政策来说，这些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呢？这篇文章是在这次讨

---

\* 作者约瑟夫·诺吉博士 (Dr. Joseph Noguee)，休斯敦大学政治学教授、耶鲁大学国际问题博士、俄国研究计划室主任。他的专著有：《苏联对国际控制原子能的政策》(1961年版)和《裁军的政治》(1962年版)；他与别人合作的著作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苏联外交政策》(即将出版)，另外，他还编写过《苏联的人类、国家和社会》(1972年版)。诺吉博士一直在美国政治学会理事会供职。最近，他在《美国政治学评论》编委会工作。——译者

论会上发表的各篇论文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加以详细评述，本文将概述这些作者的研究成果，以便指出，哪些问题有一致结论，哪些问题有重要分歧。在研究那些可供广泛适用于第三世界的结论以前，我们将首先概述一下上述研究成果，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比较具体地适用于我们所研究的四个地区：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

对于莫斯科来说，在第三世界的所有地区当中，拉丁美洲是处于最次要的地位。部分地说，苏联忽视拉丁美洲，是因为拉丁美洲不在苏联的重要军事和经济地区之内。它既不为苏联提供稀有的重要作战物资，也不为苏联提供重要市场。而且，莫斯科似乎承认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和权力。美国电台、电影院和文学作品，都从文化上抵消苏联的影响，正象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从经济上削弱苏联的基础一样。

雷蒙德·邓肯把莫斯科在拉丁美洲的目标归纳为：

- (一) 加剧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冲突；
- (二) 阻挠美国获得战略原料和市场，而使自己获得这些东西；
- (三) 加强拉丁美洲的共产党；
- (四) 遏制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

当前，另外一个目标是，保持苏联与古巴的特殊关系。诚然，古巴是苏联取得上述所有主要目标的唯一拉丁美洲国家。但是，正如保罗·西格蒙德指出，古巴的经验很可能引起了一种反应，从而使拉丁美洲不大可能出现更多的“古巴”。首先，加勒比海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存在，已经促使美国去抵制共产主义的传播。其次，卡斯特罗使莫斯科花费太大了，



所以，莫斯科要避免在其他地方承担同样的负担。

古巴是苏联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实例吗？对这个问题进行直接评论的两位作者一致认为，古巴是苏联的一个胜利。西格蒙德认为，“古巴在非洲的干涉（这种干涉显然使安哥拉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形势发生了逆转），使苏联在过去20年里没有白白地付出代价”。加布里埃尔·马塞拉和丹尼尔·帕普指出了古巴的重要性，他们说，克里姆林宫指出，古巴是最成功的例子，它证明：苏联的马列主义，……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关于古巴在非洲的作用，这两位作者都认为，卡斯特罗不完全是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例如，古巴在安哥拉的卷入，起初并不受莫斯科的支配。有时，看起来是一种代理人的关系，那主要是因为苏联和古巴的利益实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马塞拉和帕普估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和古巴的关系仍然是紧密的。

智利怎么样呢？尽管阿连德被推翻了，但是，西格蒙德认为，苏联在那里的政策并没有失败。基本情况是，莫斯科从一开始就没有对阿连德抱多大期望，所以，在经济援助或其他援助方面，克里姆林宫当然没有向他做过坚决保证。莫斯科在智利是谨小慎微的。西格蒙德说，诚然，直到现在，苏联卷入拉丁美洲的总的方式，一直是“保守主义的和谨小慎微的方式，它宁可选择渐变的方式”。

相反，苏联在非洲的卷入，特别是在葡萄牙殖民主义垮台以后，一直是积极的，如果不是冒险的话。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前，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存在，损害了小心培育的苏美缓和。苏联在非洲的直接军事卷入，是前所

未有的。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克里姆林宫在非洲进行新的冒险呢？阿瑟·克林霍弗、丹尼尔·帕普和理查德·雷姆内克说，这是因为苏联的政策把进攻和防御两种目标结合起来了。这些目标包括：

(一)削弱西方和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

(二)破坏南部非洲现存的白人占优势的政权，特别是破坏南非想与某些黑非洲国家进行的对话；

(三)取得对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组织(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津巴布韦人民联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配；

(四)加强与非洲各国，特别是与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前线”国家的关系；

(五)阻挠美国在安哥拉获得战略特权，包括进出港口的特权，飞越领空和着陆的特权，而苏联却正在谋求这些特权；

(六)不仅抵消美国在南部非洲的影响，而且抵消南非、扎伊尔和赞比亚在南部非洲的影响，还要反对这些亲西方政权向“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支持。克林霍弗认为，克里姆林宫用军队和武器援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有一部分动机是防御性的；

(七)阻挠西方获得南非的矿产资源，包括黄金、钻石、铬、铜、铋、铂、钴和铀；

(八)在非洲为苏联海军获得供应设施。至于这些海军的目的，人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帕普设想，莫斯科可能想用非洲的设施来威胁美国和欧洲的石油供应线。雷姆内克则认为，和平时期的任务很好地说明了苏联在印度洋的海军存在

的原因。因为苏联的欧洲港口与太平洋港口之间，终年通航的最短海路要通过这些水域，所以，莫斯科对保持这些海路的畅通非常关注。

苏联干预欧加登战争(1977—1978年)，支持埃塞俄比亚反索马里，其动机既是进攻性的又是防御性的。门格斯图通过政变，在人口最多的非洲国家之一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权。从意识形态看，苏联人把军政府及其敌人之间的斗争，看作是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对抗。到1976年末或1977年初，当莫斯科向埃塞俄比亚作出军事许诺的时候，该国面临分裂和混乱的威胁。从国内来说，国有化和土地改革造成了广泛的不稳定。埃塞俄比亚没有能够粉碎厄立特里亚分裂主义分子。埃塞俄比亚有陷入分裂局面的危险。而且，在沙特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厄立特里亚和苏丹，有可能组成阿拉伯联邦，从而使红海变成反苏的阿拉伯湖。为了对抗这个潜在的联邦，莫斯科提议，由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南也门和吉布提建立马克思主义国际联邦。

在所有这些目标当中，优先考虑的目标，显然是民族利益和苏联权力。然而，克林霍弗、帕普和雷姆内克都一致认为，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内图政权和门格斯图政权，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权，这一点很重要。就后者的情况来说，军政府的各项政策甚至更重要，制定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根除埃塞俄比亚的封建制度。在为非共党政权提供广泛援助之后，莫斯科在非洲遭到了许多挫折，所以，它显然想建立起以共同的意识形态观点为基础的联盟，这样的联盟才有保障。

上述作者对于苏联在非洲的成功所做的评价，与普通的看法迥然不同，因为普通的看法认为，苏联最近的活动，使苏联获得了丰硕成果，而使西方受到了损害。上述作者充其量只是认为，莫斯科是成败参半。克里姆林宫在任何情况下获得成就，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总的说来，帕普说，“苏联在南部非洲实现其目标方面，不能过分地说苏联的政策一直是成功的”。莫斯科与“前线”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真诚友好的”，但是并不是亲密的。显然，这些国家并没有从属于克里姆林宫。安哥拉也是如此，尽管苏联在那里投了资。安哥拉既不使自己的经济跟共产党集团的经济纠缠在一起，也不终止它跟西方的经济关系。或许最重要的是，非洲国家都不允许苏联将其领土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克林霍弗描述了安哥拉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胜利后所获得的一些国内政治发展，这些发展表明，在内图政府中存在着反对跟苏联建立牢固联系的分子。1977年发生过一次反内图的未遂政变，那次政变可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索马里是苏联的明显损失，虽然并不一定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莫斯科支持埃塞俄比亚，这导致摩加迪沙在1977年11月13日废除了它与莫斯科的“友好条约”，并且，终止了苏联使用索马里的广泛海军供应设施的特权。雷姆内克认为，苏联领导错误地估计了摩加迪沙的态度，因为它估计，从常理和国家利益来看，索马里都不致入侵欧加登。但是，他相信，比莫斯科在索马里的损失甚至更严重的损失，是印度洋海军武器谈判的流产，而这个谈判或许可以限制内陆国家在印度洋中的海军活动。

引证莫斯科在非洲的挫折，并不是否认它的明显收获。在非洲之角，今日苏联的地位比过去强大。丧失了伯贝拉，“或多或少”可用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的供应设施来弥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苏联的援助使埃塞俄比亚获得了稳定。而且，虽然俄国人没有能够建立马克思主义国家联邦，但是，他们已经挫败了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的野心，这些国家想在非洲之角动员并建立保守的阿拉伯国家集团。最后，应当指出，苏联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中国在南部非洲的影响。

研究中东问题的作者们一致认为，苏联在最近几年采取的是进攻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总目的是，牺牲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扩大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为了把中东的阿拉伯国家联合成为亲苏的“反帝”集团，苏联做了极大的努力。正象罗伯特·弗里德曼所说，确定这个目标使克里姆林宫感到为难，部分地说，是因为伊拉克反对，从表面上来说，伊拉克是苏联的盟国。伊拉克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是伊拉克与该共产党施主建立紧密关系的障碍，正象是伊拉克与所谓帝国主义敌人们建立紧密关系的障碍一样。复兴社会党政权不能容忍其他反对党，更不能容忍共产党。尽管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技术援助，莫斯科仍然没有说服巴格达把伊拉克共产党作为“民族阵线”政府的组成部分。在中东，伊拉克对国内共产党的迫害，确实是最残酷的。1978年，伊拉克处决了许多共产党员。苏伊关系似乎是随着伊拉克对苏联的依赖程度而变化的。1973—1974年，这种依赖性是很大的；从那以后，这种依赖性减少了，苏联的影响也就减弱了。弗里德曼说：“总之，1968—1979年的伊

苏关系表明，苏联对受援国的影响程度是低的，伊拉克很少利用在政治上顺从苏联的方法，来换取苏联的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穆斯林革命以前，伊朗亲西方的程度与伊拉克反西方的程度是一样的。这并没有妨碍莫斯科与伊朗国王保持极为良好的关系。正象罗伯特·艾拉尼所指出的那样，假如莫斯科不能把伊朗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它就要决心使伊朗至少保持中立。60年代和70年代，苏伊关系如果不是紧密的话，至少也是融洽的。莫斯科对伊朗采取的是“合理的、实用主义的和不讲意识形态的”政策。确实，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苏联变成了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但是，70年代的苏伊关系是令人满意的。毫无疑问，1979年1月，大阿亚图拉·霍梅尼掌握了政权，这是苏联的重大胜利，是美国的重大失败。爱德华·科科伦和艾拉尼都认为，莫斯科是德黑兰事态发展的受益者，虽然这些事件不是它干的。1979年，在导致霍梅尼复位的动乱时期，有苏联进行煽动的某些证据，而且，苏联的宣传也坚决支持这场革命，但是，莫斯科确实没有策划过推翻国王，因为支持邻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会刺激苏联的穆斯林要求更多的宗教自由。

在苏联与全世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中，苏联中亚的穆斯林民族起了一定的作用。莫斯科想把中亚各民族作为与各穆斯林民族打成一片的手段，并作为整个第三世界的发展模式。甚至早在入侵阿富汗以前，克里姆林宫的这种尝试，就获得了有限的成功。科科伦指出，穆斯林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

来自一个方面。由于莫斯科与第三世界有关系，所以，它在处理国内的穆斯林问题时，一直是克制的。的确，在阿富汗利用苏联的穆斯林部队，使苏联边界两边的穆斯林建立了极好的联系，对于苏联控制中亚来说，这样的联系很可能会产生预料不到和捉摸不定的后果。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目标之一，可能是想阻止那个国家建立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在苏联心目中是“反动的”）共和国，伊朗和巴基斯坦就是这样的共和国。另一个目标，可能是想进一步向靠近印度洋上的一个港口推进。正如科科伦所指出的，现在，把苏联跟它长期追求的暖水港分割开来的，只有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了。

在苏联入侵的背后，还有其他因素。希林·塔赫—凯莉认为，苏联发现，美国软弱无能、并被伊朗缠住了，所以，苏联及时抓住了能使莫斯科得到它们长期渴望的印度洋暖水港的有利时机。为了使阿富汗的“有气无力的社会主义实验”恢复活力，显然，苏联的行动也是必要的。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和哈菲祖拉·阿明，曾经粗暴地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和教育改革，这些改革刺激大批人民起来反对他们的政权。

总之，塔赫—凯莉认为，苏联在阿富汗的政策是成功的。对于莫斯科来说，主要的有利条件是，阿富汗仍然留在西方势力范围以外，阿富汗可以作为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的基地。不过，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代价是巨大的。现在，莫斯科被迫支持一个声名狼藉的政权；缓和已经（起码是暂时地）遭到破坏；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穆斯林国家中，苏联的宣传已经遭到严重挫折。最后，正象科科伦指出的那样，苏联与

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正在恶化，这可能会使穆斯林世界将来的能源计划变得极为复杂化。

苏联在亚洲的目标如下：

- (一) 与该地区的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
- (二) 使它的政策赢得普遍支持，特别要使印度和“东盟”支持它的对华政策；
- (三) 遏制中国、并使中国的安全需要复杂化；
- (四) 削弱中国、日本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
- (五) 把越南纳入苏联的经济和战略势力范围。

印度是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实例，因为它是跟苏联建立紧密关系的唯一民主国家。拉詹·梅农认为，它们建立这种关系是为了互相照顾对方的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77年亲苏的英迪拉·甘地下台以后。从1965年起，为了对付来自中国或巴基斯坦的巨大威胁，印度一直依赖苏联提供武器。这种依赖性能使印度顺从苏联的外交政策利益，但是，顺从的程度是有限的，即：不能与印度的国家根本利益发生冲突。例如，印度曾经避免公开批评莫斯科在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但是，它拒不赞成克里姆林宫支持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或“非扩散条约”。对印度来说，由于跟中国和睦是重要的，所以，在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印度政府不支持越南的立场，在柬埔寨，印度政府也不支持中国的敌人。梅农说，总之，“苏联想利用向印度供应武器和利用印度在安全方面依赖苏联去影响印度的态度，但是，苏联获得的成功是很少的。”

道格拉斯·派克否定苏联在亚洲取得了成就。他指出，



“苏联在亚洲的所作所为看来并不怎么顺利。尽管它多年来花费了很大本钱，耗费了很多精力，但是，跟它所做的努力相比，收效却少得惊人。目前，它在越南倒有希望，是个例外……。”越南对苏联是顺从的，这跟越南的军事供应和非军事供应都完全依赖苏联有密切的联系。今天，越南消费的大米，有大约20%（可能是30%）是由苏联供应的。虽然有这样的依赖性，但是，越南的顺从是勉强的。派克对于越南人对俄国人固定看法的分析，说明这两个民族的相互仇视是有理由的。越南人认为，俄国人是异己分子、种族主义者、野蛮人和沙文主义者。他们既对俄国人起疑心，又认为自己比俄国人强。所以，在越南战争期间，尽管河内依赖苏联的战争机器，但是，莫斯科却对河内的战争政策起不了多少影响。越南能够从中苏冲突中渔利，这使某些苏联领导人认为，越南人是忘恩负义者。莫斯科对这个名义上的盟国采取了高压策略，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好处。

直到最近，在莫斯科考虑的优先顺序中，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一直是排在后面的。当东盟在1967年创建的时候，莫斯科只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有外交关系。现在，苏联人不仅与每个国家都有外交关系，而且，还有比较广泛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对莫斯科来说，由于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中越冲突公开化，该地区的重要性增加了。但是，托马斯·威尔伯恩得出结论说，苏联最近的东盟政策“没有成功的迹象”。在最近几年中，美国的影响已经下降，这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不是苏联活动的结果。而且，西方影响的下降，也并不意味着苏联影响的相

应增加。克里姆林宫曾经想把东盟争取过去，叫它支持克里姆林宫与中国进行政治斗争的立场，但是克里姆林宫没有取得成功。克里姆林宫对东盟支持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而不支持韩桑林，感到特别不满。由于在1979年策划越南入侵柬埔寨，而且未能阻止住川流不息的难民逃出越南（许多难民都涌入了东盟国家），所以，莫斯科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受到了损害。

苏联在第三世界使用的政策手段，正是大国与小国关系中所使用的那种传统手段：经济和军事援助、技术援助、贸易、外交、宣传，在罕见的情况下还使用武力。在这些政策手段当中，经济和军事援助一直是特别重要的。苏联利用援助计划影响第三世界，是在斯大林以后时期开始的。在不发达国家中搞大规模的、显眼的（有时从经济上来说是无用的）工程项目，是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在苏联援助计划方面，勃列日涅夫采取了在经济上比较合理的措施，用设计得较好的项目取代华而不实的项目，以便为苏联以及受援国带来经济利益。

罗杰·卡尼特指出，70年代，“经济互利”变成了莫斯科经济援助计划的主要目的之一。苏联经济援助计划的其他目的是：支援“进步的”或反西方的政权；减少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国家中取得影响。卡尼特强调苏联经济援助与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在，苏联的大部分出口商品，是为苏联援建的工程提供的机器和设备，而有些进口商品，则是由苏联援建的工程生产的。作为莫斯科硬通货的一个来源，苏联与第三世界的贸易也是重要的。

苏联出售的工业品、军事装备和石油，是购买铝矾土和磷酸盐等急需原料的重要收入来源。卡尼特认为，将来人们可以期望，“苏联对外经济政策中重实效的发展，……将成为苏联对发展中国家总政策中的永久性因素。”

在过去10年中，苏联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联与第三世界联系的手段，由原来提供经济援助改为更多地依靠军事援助了。苏联军事援助的目的是：破坏和取代西方的影响；限制中国的影响；建立军事基地，以便显示苏联的力量；在经济上谋取实惠。关于上述最后一个目的（经济实惠），武器转让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取得硬通货的重要手段。例如，据报道，苏联在1977年仅通过出售武器一项，估计就获得了15亿美元硬通货。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的很大一部分军事援助却没有得到偿还。

那么，苏联军事援助计划取得了多少成功呢？罗杰·帕亚克认为是有得有失，但是，总的来说，从苏联方面来看，他的估计是，得大于失。帕亚克指出，“对于莫斯科来说，军事援助，……是在不结盟国家中建立影响地位的最有效、最灵活和最持久的手段之一。”今天，几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国家（具体地说就是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拥有主要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军事力量，所以，它们依赖莫斯科的武器零件，供应和服务。

还有一个这样严肃的问题：通过军事联系所取得的影响，实际上广泛到什么程度和牢靠到什么程度呢？罗伯特·唐纳森说，苏联人发现，仅用军事手段是很难维持他们的影响或支撑代理人政权的。今天，克里姆林宫的最大成功是在

阿拉伯世界，不过，这是阿以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它制造的形势。莫斯科并不能决定它的任何代理人的国内外政策，而且，正象帕亚克所指出的那样，在最近几年中，许多接受苏联武器的最大的受援国，在非常重大的问题上，都反对莫斯科。

尽管有这些局限性，军事援助仍然是克里姆林宫施加影响的最好手段。肯定还没有其他手段比这种手段更有效。苏联把自己作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模式，显然，这种模式失败了。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苏联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正象唐纳森所评论的那样，苏联的“有限国际经济能力”削弱了它“在第三世界进行政治扩张野心”的基础。在第三世界的全部国际贸易中，苏联的贸易只是一小部分，只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额的1/15。苏联的经济援助也不多。苏联平均每年的援助额，大约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05%，而西方国家则占0.33%。

在70年代，第三世界积极要求建立它们所说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其目的是在全世界的发展中经济和发达经济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和财富。虽然苏联的经济是发达经济，但是，它却拒绝参加导致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对话。莫斯科企图利用世界上较穷国家的经济状况，为它与西方进行政治对抗服务。苏联的论点是，使第三世界贫穷的是西方而不是东方，苏联的责任仅限于遏制“帝国主义”。莫斯科的这种态度和在国际贸易关系中进行讨价还价的强硬态度，使第三世界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愤怒。唐纳森的结论是，“莫斯科的经济政策，……可能已经达到了报酬递减的地步。”

最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卷入，对于美国的对外防御政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本书作者当中只有基斯·邓恩直接讲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们的研究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关。

首先，显然，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卷入，总的来看是对抗了西方的利益，特别是对抗了美国的利益。作者们的一致意见是，苏联在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活动的目的是：破坏美国的影响，为苏联谋求影响。因此，这条战线上的冷战正在继续。但是，苏联这个对手究竟有多大力量呢？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不一致了。

再一个问题就是，影响的概念是难以捉摸的。总的来说，作者们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跟阿尔文·鲁宾斯坦所使用的概念是一样的，“当A（苏联领导）用非军事手段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B的行动时，影响就表现了出来，……B就对A的政策利益做了反应。”<sup>①</sup>正象鲁宾斯坦在他关于苏联、埃及关系的经典性著作中所述，影响的概念是难以使用或估量的。所以，虽然人们容易用实例来说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存在，在80年代初期比10年以前多，但是，人们却不能把影响和存在两者等量齐观。

这些论文中所举出的证据是，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当一个国家把军事设施抵押给苏联时，象古巴和越南那样，苏联影响的事实是否认不了的。否则，莫斯科

---

<sup>①</sup> 阿尔文·鲁宾斯坦：《尼罗河上的红星：6月战争以来苏联埃及影响的相互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出版社，1977年版，第14页。

就几乎不能逼迫某个第三世界政府采取它根本不想采取的政策。虽然有的政府被迫那样做了，但是，那是迫不得已做的。至于重要的问题，例如，在许可共产党人加入第三世界政府的问题上，苏联显然是不成功的。甚至那些欠了莫斯科重债的政府，也一直能够保留很大的回旋余地，它们用其他大国的影响，去抵消苏联的影响。例如，伊拉克曾经使法国势力与苏联势力相抗衡，在越南战争期间，越南曾经使中国势力与苏联势力相抗衡。

在莫斯科无法控制的偶然事件中，它倒取得了许多最大的胜利。在非洲，葡萄牙统治的破产，导致了反西方政权的建立，这些政权自动地盼望苏联支持。在伊朗，穆斯林革命导致了中东一个最亲美的政府的垮台。甚至，美国为了稳定第三世界政治而制定的某些政策（例如，埃及—以色列戴维营协议），也产生了对克里姆林宫有利的副作用。邓恩告诫说，有一种倾向认为，美国在第三世界遭到的每个挫折，都是苏联阴谋策划的结果。实际上，象西方一样，尽管苏联的所作所为不好，但是，它却给人以良好的印象。

这些研究成果对美国政策所做的判断是很含蓄的，因此必然是一般化的。这些研究成果建议，美国应当把政策重点主要放在第三世界的内部情况上，其次才能放在美苏的关系上。双方之中任何一方的影响能力，都有严重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对这些国家的偶然事件的控制能力了。美国也许可以从苏联的失败中了解到大国能力的局限性。除了公开军事侵略（只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公开军事侵略）以外，使用军事手段没有使用经济手段的效果大。虽然美国是一个

强大的国家，但是，在使用武力方面，美国比苏联受到更多的政治限制。所以，美国在第三世界首先应当使用的是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尽管希望不大，特别是自从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还是应当努力得到苏联的合作。假如行动比言词更重要的话，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美国比苏联更能影响第三世界的偶然事件的结果。